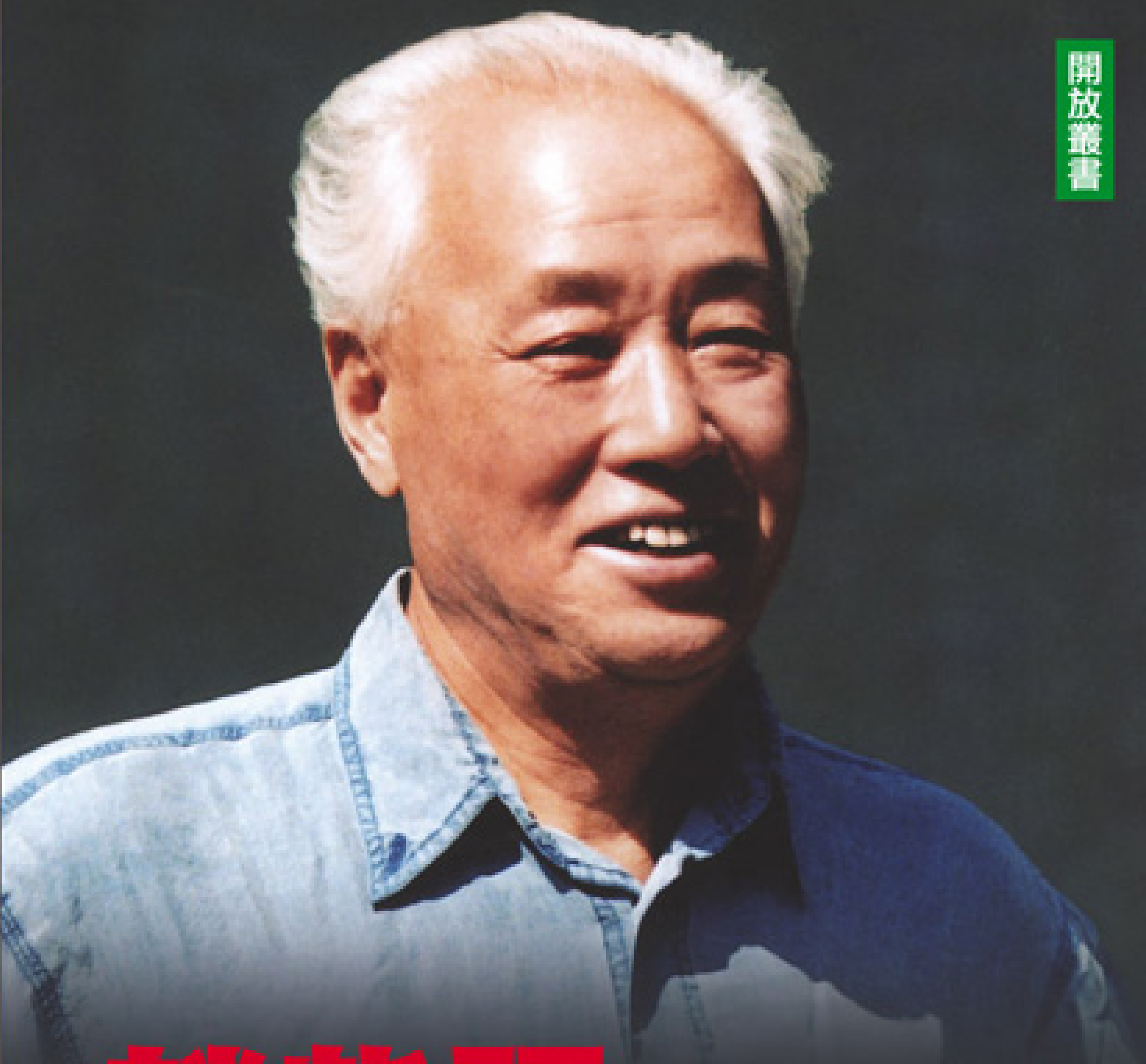


開放叢書



趙紫陽

宗鳳鳴 記述
李銳 鮑彤 序

軟禁中的談話

Zhao Ziyang : Captive Conversations

by Zong Fengming

——趙紫陽——

浩然正氣，人間永存！

趙紫陽 軟禁中的談話

宗鳳鳴◎記述

Zhao Ziyang: Captive Conversations

by Zong Fengming

OPEN

Zhao Ziyang: Captive Conversations

By Zeng Fengming
P.O. Box 31429, Causeway Bay,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January, 200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記述：宗鳳鳴
發行人：金鐘
出版：開放出版社

總經銷：田園書屋

電話：(852) 2385 8031 傳真：(852) 2770 2484

印刷：遠東設計印刷公司

電話：(852) 2274 1314 傳真：(852) 1344 5919

出版日期：2007年1月初版 第1次印刷

定價：88 港元

國際書號：ISBN 962-7934-20-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開放出版社調換

目錄

獻辭	
李銳 序	1
鮑彤 序	7
杜潤生題辭	12
宗鳳鳴自序	13
出版前言（全錄）	17
1 1991年7月10日	
一、「這是自我選擇」	1
二、關於兩個過渡的觀點	3
三、趙紫陽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中辯詞	6
2 1991年10月9日	
一、兩個奇特的現象	22
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26
3 1992年1月12日	
一、社會進步新指標的探討	30
二、鄧小平的特殊作用	33
4 1992年4月12日	
一、落後國家革命勝利後不能實行社會主義	37
二、對鄧南巡講話的一些看法	40
5 1992年7月5日	
一、改革的理論與中國改革的特色	45
二、最未料及的誤解：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47
三、「六四」鎮壓不足迫不得已	50
6 1992年9月5日	
一、毛澤東與鄧小平晚年歷史的相似性	57

二、鄧明確提出要趙接軍委主席	60
三、在四川工作時曾鑽研過經濟學	61
7 1992年10月11日	
一、中央向趙紫陽宣布三條處理	64
二、鄧小平的「模糊政治學」	67
8 1992年11月6日	
一、趙紫陽：沒有想到會被軟禁	70
二、鄧小平的悲劇	73
9 1992年12月24日	
一、人才流動利於實現人的價值	76
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所在	77
10 1993年1月4日	
一、在市場經濟帶動下矛盾暴露了	79
二、複雜麻煩問題簡單化處理	80
11 1993年4月3日	
一、老人領導：中國政治領導的特色	83
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與事實不符	85
12 1993年4月28日	
一、必須解決所有制問題	86
二、斯大林、毛澤東的悲劇在於沒有資本主義補課	86
三、走漸進的改革道路效果好，讚揚安志文	88
13 1993年5月6日	
一、關於甚麼是社會主義	90
二、無產階級專政的由來	91
14 1993年5月16日	
廖季立向趙紫陽談社會主義問題	94

一、關於所有制問題	94
二、關於分配問題	95
三、關於市場問題	96
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96
五、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的走向	97
15 1993年5月31日	
一、鄧的政經兩手都是硬的	100
二、指軟禁違反黨章憲法	101
16 1993年7月1日	
約請于光遠談中國改革的理論問題	104
17 1993年9月9日	
一、對國有企業非動大手術不可	107
二、國外的評論	108
18 1993年10月7日	
一、趙紫陽的蜀步樂方	110
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111
19 1993年10月18日	
一、主張改國有制為企業所有制	114
二、會見蔡德誠表心跡，家庭會議反戒嚴	115
20 1993年12月14日	
回顧中國近代史，評毛的烏托邦社會主義	119
21 1994年1月2號	
一、評毛澤東思想：要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	122
二、鄧小平理論：搞經濟、黨領導、不爭論	124
三、關於第二防線問題	125

- | | | | |
|----|------------------------|-----|--|
| 22 | 1994年1月17日 | | |
| | 一、改革處在膠著狀態 | 127 | |
| | 二、趙紫陽改革開放的三個觀點 | 128 | |
| 23 | 1994年4月12日 | | |
| | 一、人權與民主不是一回事 | 131 | |
| | 二、改革有險情 | 133 | |
| 24 | 1994年6月7日 | | |
| | 一、趙紫陽的聯邦自治思想 | 135 | |
| | 二、改革形勢可能逆轉，三種可能性 | 136 | |
| | 三、點評聶石、李瑞環、朱鎔基、萬里 | 137 | |
| 25 | 1994年7月14日 | | |
| | 談同胡耀邦的關係 | 139 | |
| 26 | 1994年7月30日 | | |
| | 民主問題，不能讓黨委書記成為太上皇 | 146 | |
| 27 | 1994年8月7日 | | |
| | 高度集權的體制需要有強人政治來推行 | 151 | |
| 28 | 1994年10月6日 | | |
| | 一、鄧是主張個人權威政治的 | 153 | |
| | 二、地方自治權，聯邦或邦聯有道理 | 155 | |
| 29 | 1995年4月11日 | | |
| | 一、美國專家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報告 | 156 | |
| | 二、實行市場經濟，就不能實行公有制與一黨專政 | 157 | |
| | 三、經濟上不能烏托邦，政治上也不能烏托邦 | 159 | |
| 30 | 1995年5月1日 | | |
| | 一、批評列寧的領袖專政理論 | 161 | |
| | 二、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有個新的突破 | 162 | |
| | 三、當今的腐敗是制度的產物 | 163 | |
| 31 | 1995年5月27日 | | |
| | 一、中國不能出現權力真空 | 165 | |
| | 二、關於黨的自我更新 | 166 | |
| 32 | 1995年7月8日 | | |
| |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體制的發展 | 169 | |
| 33 | 1995年8月15日 | | |
| | 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 173 | |
| 34 | 1995年9月10日 | | |
| | 國家發展不要從既定模式出發 | 176 | |
| 35 | 1995年11月4日 | | |
| | 一、顧准是個大思想家 | 179 | |
| | 二、無產階級專政不放棄，民主政治就不能實現 | 184 | |
| 36 | 1995年11月23日 | | |
| | 一、李鵬報復性強，欲置趙於死地 | 186 | |
| | 二、胡頌偉一篇論文斥責對趙長期軟禁 | 188 | |
| 37 | 1995年12月14日 | | |
| | 一、鄧小平留下一個難題——政經分治 | 190 | |
| | 二、吳江的書《十年的路》歪曲事實 | 192 | |
| 38 | 1995年12月16日 | | |
| | 同楊繼錕的談話記錄 | 195 | |
| 39 | 1995年12月24日 | | |
| | 同施濱海的談話記錄 | 211 | |
| 40 | 1996年4月8日 | | |
| | 一、軍演嚇台灣只會喪失民意 | 218 | |
| | 二、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不是高明之舉 | 220 | |

41	1996年9月26日	223
	一、中國的改革出現了特權階層	223
	二、李銳「是立了一功的」	226
42	1996年10月3日	228
	一、不形成中產階層，社會是不穩定的	228
	二、議會民主是今後必走的路	229
43	1996年10月29日	232
	同楊繼繩、張廣友的談話紀要	232
44	1996年12月13日	241
	一、從掛出第三代領導核心畫像談起	241
	二、經濟增長必須保持百分之十	243
45	1997年5月16日與6月17日	245
	一、對〈意見書〉草稿的意見	245
	二、我的建議	246
46	1997年7月6日	249
	一、鄧小平逝世後，趙紫陽誠盼萬里站出來表態	249
	二、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事與願違	255
47	1997年9月11日	258
	給中共十五大寫信	258

續 篇		263
1	1998年5月27日	264
	我對門禁的一次「圍關突破」	264
2	1998年6月4日	266
	關於印尼專政體制的瓦解	266
3	1998年	268
	我向趙紫陽轉達與鮑彤的一席談話	268
4	1998年8月19日	278
	江澤民傳話給趙紫陽：「這是你自己造成的！」	278
	一、關於國有企業的產權股份化改革的問題	279
	二、關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問題	279
	三、關於建立健全的黨內民主制度的問題	280
	四、關於堅持革命人道主義的問題	281
5	1998年9月18日	283
	「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政治改革」	283
6	1998年10月17日	287
	趙紫陽談人權	287
7	1999年5月16日	291
	杜潤生希望趙紫陽研究黨的理論問題	291
8	1999年7月16日	293
	趙紫陽：「鄧小平的路線走到盡頭」	293
9	1999年9月26日	299
	趙紫陽推薦鮑彤的論文：《中國的憂思》	299

10 1999年12月19日	301	20 2002年8月25日	336
趙紫陽對江澤民心理狀態的分析	301	中國的危機已浮上水面	336
11 2000年5月13日	303	21 2002年10月1日	338
我們不能過於苛求馬克思	303	思想觀點不一致容易引起不愉快	338
台灣問題只能在和平民主的基礎上實行統一	308	22 2002年10月5日	339
12 2000年5月30日	311	胡錦偉建議突破軟禁，趙十六大不表態	339
一切社會弊端淵源於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	311	23 2002年11月24日	341
13 2000年7月4日	315	江澤民戀棧軍委，令人啼笑皆非	341
蔣經國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	315	24 2003年8月15日	343
14 2000年10月18日	318	人們對胡錦濤期望值過高	343
歷史總不能留下空白	318	25 2003年10月17日	345
記者稱：「江是世界上共產黨最後一位專政獨裁者」	318	往事的一個遺憾	345
趙：「這些話是確實的」	319	26 2003年10月25日	347
15 2001年	320	中國目前發展的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347
2001年與趙紫陽多次談話的綜合記述	320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鞏固一黨專政	349
16 2002年1月27日	324	上層革命與下層革命	350
關於中國的文化傳統	324	27 2003年12月20日	351
17 2002年2月23日	327	社會主義旗幟舉不起來，自由、民主、	351
我對趙紫陽思維方式的一點感受	327	人權旗幟又不敢舉	351
18 2002年5月8日	329	胡錦濤是正統意識形態下培養的青年幹部	353
關於經濟危機能否演變為政治危機問題	329	28 2004年1月25日	355
19 2002年6月22日	333	老戰士的民主心結	355
趙紫陽表示中共十六大不再表態	333	29 2004年3月20日	356
江澤民的最佳選擇問題	334	約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姚監復談話	356
最好由美國主導人類社會	334		

30	2004年5月15日	364
	約姚監復的第二次談話	364
31	2004年5月25日	371
	近在咫尺，老戰友生病不准看望，死不得告別	371
32	2004年6月20日	372
	這個體制實際上是腐爛了	372
	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	373
	陳水扁依靠的是台灣民意	374
33	2004年9月8日	376
	解決社會危機的出路	376
	政治改革就是要放棄黨的壟斷權力	377
34	2004年10月24日	379
	南有孫志剛，北有孫大午	379
	胡錦濤的面目暴露出來了	381
	鄧小平改革與趙紫陽改革發展道路的不同點	383
	結束語：趙紫陽走出了舊的思維方式	386
	中共高層領導提出中國要走上民主與法治的第一人	
	後記	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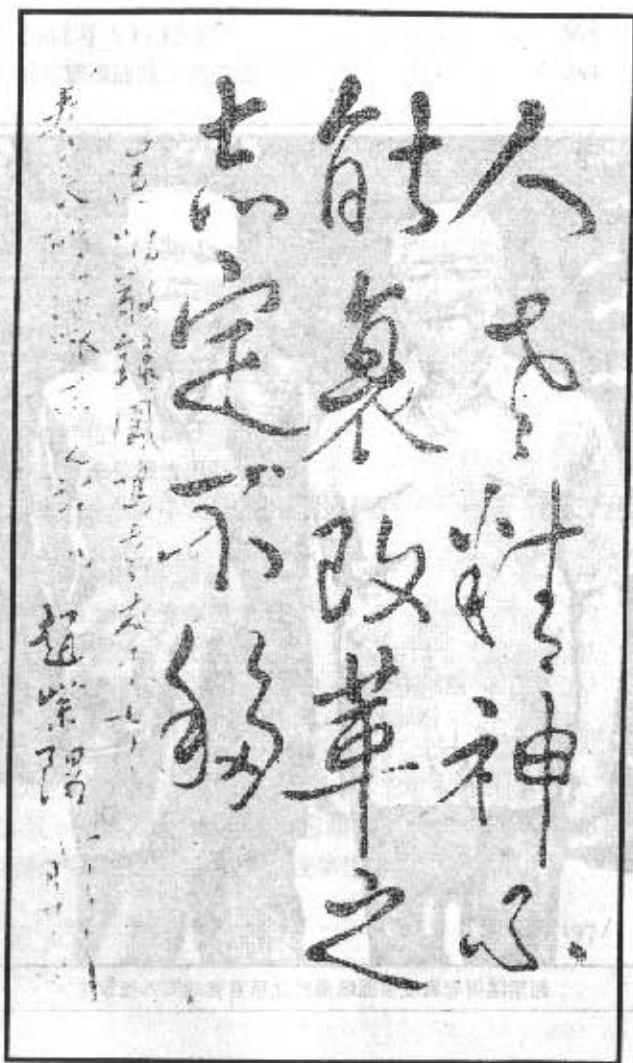


趙紫陽與老戰友宗鳳鳴攝於北京富強胡同六號家中。

趙紫陽與老朋友



趙紫陽與夫人梁伯琪1996年與宗鳳鳴在家中。



趙紫陽1997年8月22日給宗鳳鳴的題詞
「人老精神不能衰，改革之志定不移。」

趙紫陽與老朋友



趙紫陽與宗鳳鳴(左)和鮑鴻閏(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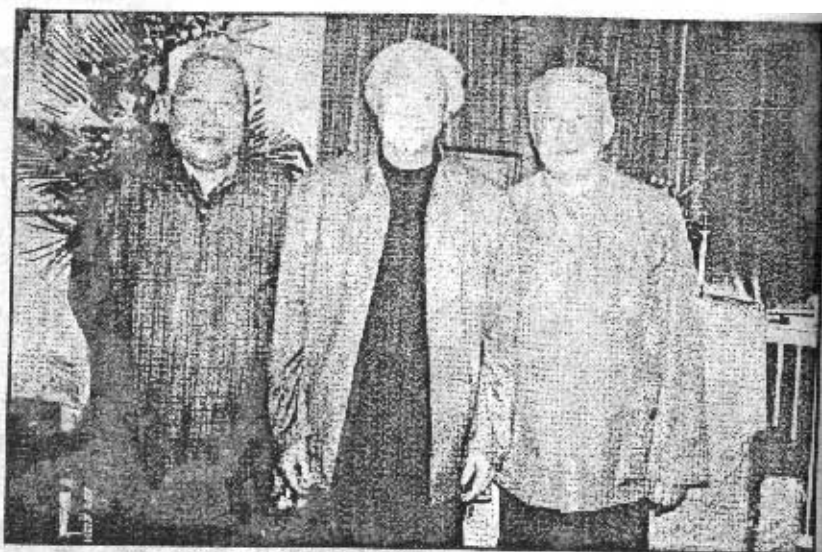
1998年5月27日趙紫陽及夫人梁伯琪(中)與宗鳳鳴(右)和鮑鴻閏(左)。



趙紫陽1993年與宗鳳鳴。



趙紫陽夫婦和宗鳳鳴(左)及河南濮陽縣老區領導人在趙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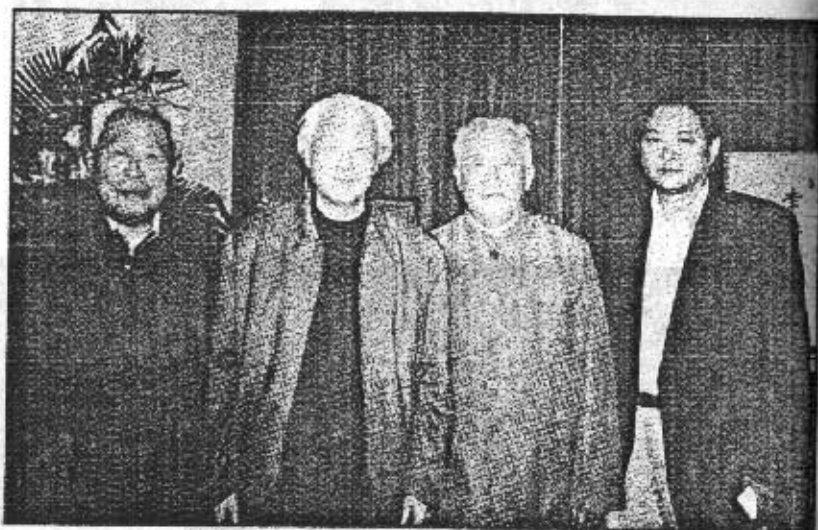
趙紫陽2003年10月17日84歲生日與宗鳳鳴(右)和張策(左)合影。



2004年3月21日趙紫陽在病中。宗鳳鳴(左)與姚登復(右)前來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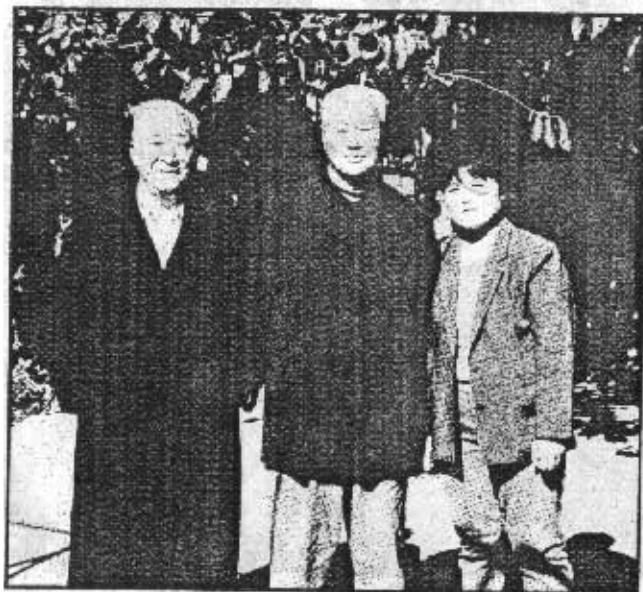
2004年5月23日趙紫陽與宗鳳鳴(左二)及鮑漢芻的子女於富強胡同六號。



趙紫陽2003年10月17日83歲生辰和張策(左)、宗鳳鳴(右二)與兒子趙四軍(右一)攝於家中。



趙紫陽與老戰友鮑鴻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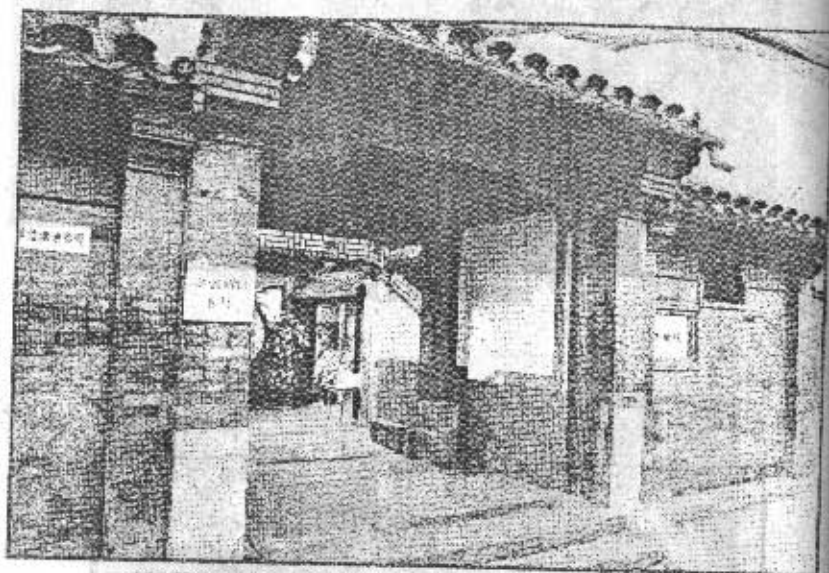


趙紫陽和宗鳳鳴(左)與傅樺竹(右)。



宗鳳鳴2000年元月17日八十生辰紀念。

趙紫陽與家人



趙紫陽1989年六四事件後被軟禁的住家北京富強胡同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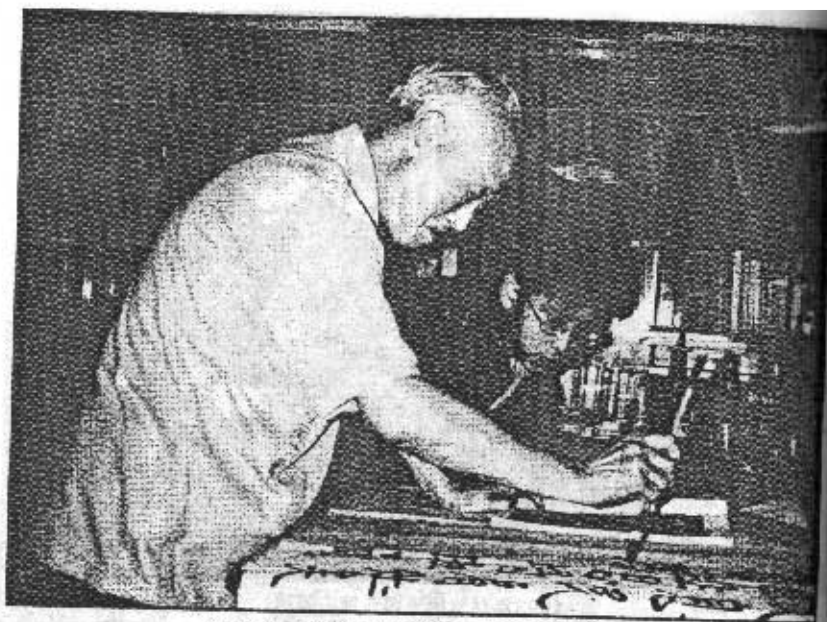
1993年趙紫陽夫婦在家中書房。

——趙紫陽與家人——



1991年2月23日趙紫陽與家人在北京唯一被允許散步的郊區象鼻子溝。

左起：孫子頓頓、兒媳李娟娟、女兒王雁南、趙紫陽、梁伯琪。



2002年夏趙紫陽家中揮毫，旁為孫子顥顥。



2004年春趙紫陽與家人最後一張合照。左起：外孫斗斗、趙紫陽、趙五軍、兒媳李娟娟、老伴梁伯琪、女兒王雁南、孫子顥顥、女婿王忠華、孫女妥妥、兒媳汪建莉。



1990年趙紫陽與外孫斗斗。



1993年夏趙紫陽在家中院裡練高爾夫球。



1994年趙紫陽在北京富強胡同六號家中。



1992年2月7日趙紫陽與夫人梁伯琪在家中下棋，右為外孫斗斗。



1990年8月趙紫陽被軟禁在家的第一個夏天。左起：夫人梁伯琪、兒媳李娟娟、女兒王雁南、外孫斗斗、趙紫陽。

漫長的征途

趙紫陽與宗鳳鳴歷史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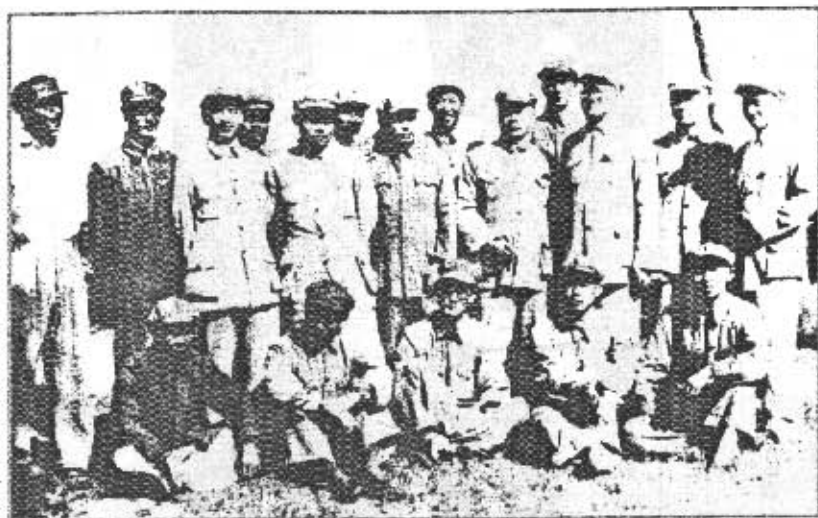
宗鳳鳴（前排左一）1935年與同學攝於河北保定育德中學。



趙紫陽(右)1944年12月與中共地委書記張國華(中)、
副書記白濤(左)在河南濮陽縣東關天主教堂。



1945年趙紫陽(前排左)在河南滑縣與中共地委、專署、軍分區負責人。



1948年趙紫陽(右二)參加中原局方城會議時與劉伯承(後排右三)、陳毅(後排右五)、李雪峰(前排右一)等合影。



1949年3月趙紫陽(前排中)與中共南陽地委成員合影。



宗鳳鳴(前排右一)抗日戰爭時期和戰友在河南濮陽縣。



1949年宗鳳鳴(前排左一)與戰友在江西上饒。



宗鳳鳴1960年在東北
瀋陽航空發動機廠。



1965年宗鳳鳴(前右
一)在哈爾濱軍用飛機
發動機廠接待來視察
的賀龍元帥(中)。



1984年冬趙紫陽(中)在廣東佛山。



1985年12月趙紫陽
夫婦在河南。



1988年4月趙紫陽在山東威海。



趙紫陽1988年7月
在東北長春。



宗鳳鳴(右一)在北京郊區與解放軍參謀長楊得志(右二)
討論中原貧困地區促進委員會的工作。



趙紫陽1980年8月在黑龍江。



趙紫陽1989年5月19日清晨五時前往天安門廣場
慰學生停止絕食。這是趙最後一次公開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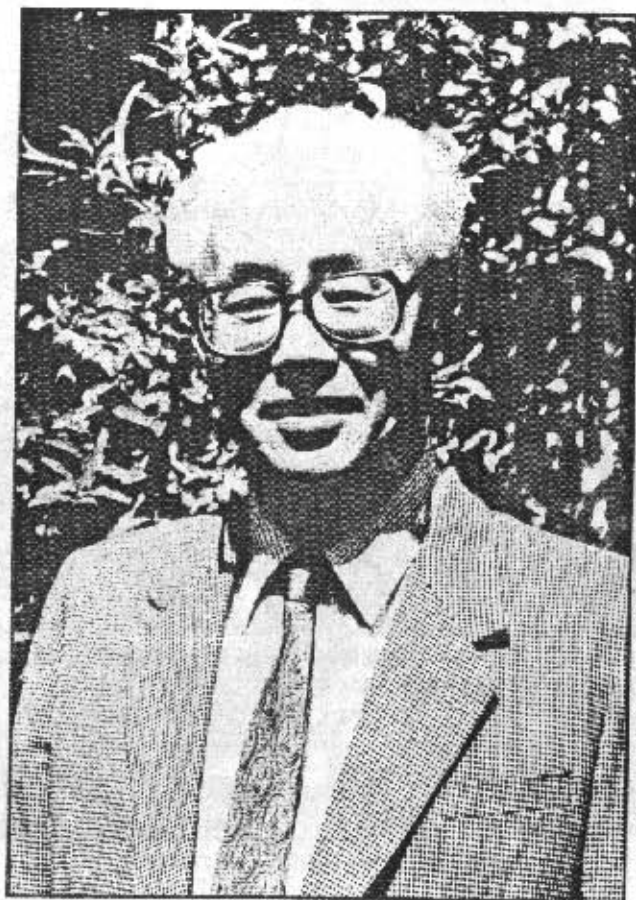


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中絕食抗議的學生。



1989年5月16日下午趙紫陽與來訪的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會談。會談中趙披露鄧小平才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告別紫陽



趙紫陽於1989年5月下旬開始被軟禁。攝於家中庭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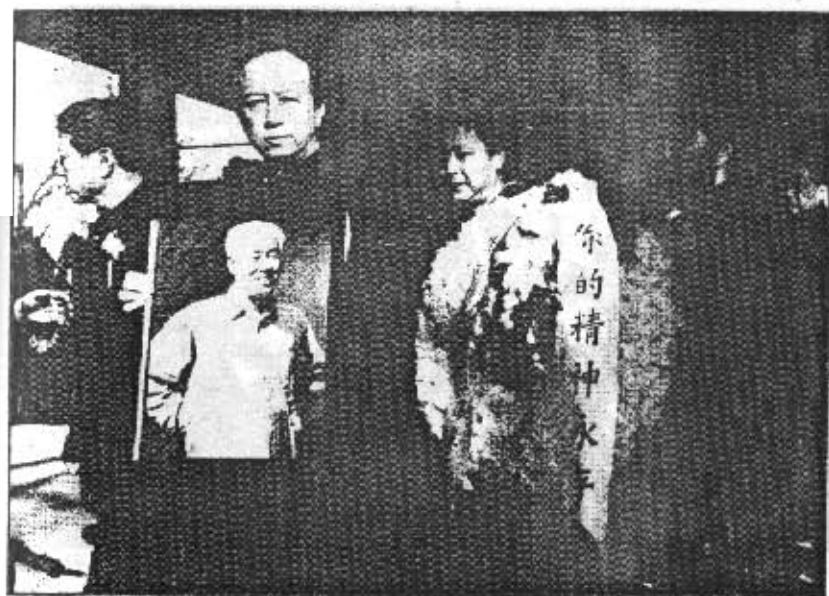
宗鳳鳴(中)2006年1月16日趙家靈堂前悼念趙紫陽。左是趙紫陽女兒王雁南。



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逝世後，李銳前往趙家致祭，與趙子女合影。左起：姚監復、王雁南、趙四軍、宗鳳鳴、趙二軍、李銳、王志華。



2005年1月8日，鮑彤夫婦到趙家弔唁被武力阻止。是日下午鮑彤女兒鮑朝代表父母到趙家祭拜。左起：趙大軍、王雁南、王斗斗、汪健莉、李娟娟、趙二軍、鮑朋、鮑朋丈夫賈林、趙五軍。



2005年1月29日趙紫陽遺體告別式上的趙家兒女。



趙紫陽的孫輩在趙紫陽靈前。



趙紫陽軟禁在家十六年。家中書房。



2005年1月29日，趙紫陽遺體告別式在北京八寶山舉行，趙的後人在趙的遺體前，後方是趙家堅持掛出的挽幛：倡民主堅守良知家人為你驕傲，今西去終獲自由風範永存人間。支持你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能做你的兒女是我們畢生的榮幸。

李銳 序

(一)

《趙紫陽談話錄1991—2004》這部書稿終於要出版了，可喜可賀。宗鳳鳴同志囑我為此書作序，當是義不容辭事。

我是湖南人，紫陽是河南人，都在湘豫兩省之間的武漢讀過書。我比他大兩三歲，我在武漢大學時，他在武昌高級中學。「一二·九」運動時，我參加武漢秘密學聯活動，他的同班同學密加凡和孫士祥同我關係密切。1980年，他到國務院工作，我們才常見面。

八十年代紫陽在位時，我同他有過兩次重要接觸^①。一次是在1982年談三峽問題。他是比較贊成我的看法的，曾將我寫的《對水利工作的意見》批轉給當時召開的水利工作會議，作為會議一號文件。

再一次是在1987年談鄧力群問題。我告訴他有人正活動譴鄧力群當總書記，並談了我對此事此人的看法，隨後又寫了一封致「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的信。紫陽很快就將此信轉呈鄧小平。鄧也很快就作出「撤銷鄧力群的一切職務」的批示。前後僅三四天時間。

紫陽被軟禁後，我同他有過三次直接接觸，兩次是在他的家裏，一次是在他的病房裏。

在紫陽家裏的這兩次接觸，一次是我單獨去的，一次是我同宗鳳鳴一起去的^②。我們談了許許多多問題。

記得當時自己曾建議紫陽寫回憶錄，把他的重要經歷尤其是「六四」經歷寫出來，給後人留下真實的歷史。他是當代中國許多重要歷

^① 關於我與紫陽這兩次接觸的詳情，參見拙文：《懷念同趙紫陽的交往》，載《開放》雜誌2006年第4期。

^② 關於我們兩人同紫陽的這次見面，參見本書第45章第二節。

史事件的當事人，他要是不說，後人就有可能弄不大清楚這些重要歷史事件。紫陽說，他會考慮我這個建議的。後來，他專門托宗鳳鳴轉告我，要我放心，他至少會把有關「六四」的材料留下來，把他所經歷的和所知道的有關「六四」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後人。

還記得當時紫陽對吳江誤寫他的一件事耿耿於懷。吳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一書中，說趙紫陽曾於1984年給鄧小平和陳雲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告胡耀邦的狀。紫陽同我說，當時的確給鄧小平和陳雲寫了一封信，但信的內容是談其他的事，而不是告耀邦的狀；幸好還留下這封信的底稿，送你一份複印件。紫陽還說，自己處於被軟禁狀態，無法站出來說明情況，辨析真偽，曾希望吳江能夠做一個更正說明；可是，吳置之不理，令他十分傷感。我聽了他的這番說明，看了他的那封原信，覺得他講的是實情。

在紫陽病房裏的那次見面，是我與老伴一起去的。由於老伴的堅持，我們在門口磨了半個小時，才被允許入內探視。見面後，我首先代表許多老同志向紫陽問好，希望他多加保養。在隨後的談話中，我們談到了兩本書，一本是宗鳳鳴寫的《理想：信念·追求》，一本是楊繼繩寫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這兩本書都談到了紫陽，談到了他所提出的中國改革路綫和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紫陽很關心這兩位作者的處境，生怕這兩位作者因替他說話而受到連累。我告訴他，這兩位作者所在單位的領導都找他們談話了，查問他們為什麼要出這兩本書；不過，他們目前都還能正常生活。紫陽說：「那我就放心了。」

這是我同紫陽的最後一次見面。他在十餘天後就去世了，我可能是他最後見到的一位老同志了。

在這個黨的歷任領導人中，趙紫陽是很難得的一位。他能夠吸取這個黨的歷史教訓，還能夠吸收西方的一些好東西，尊重人類社會發展的普世規律，竭力要把中國帶到正確的道路上去。

他主張中國不僅要搞經濟發展，還要搞民主與法治建設，並因此而同鄧小平發生分歧。這一分歧集中地表現在當代中國改革究竟包括

不包括政治改革這一問題上。

鄧小平只贊成搞經濟改革，不允許搞政治改革，主張在強化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場經濟。結果搞出來的只能是腐敗叢生的市場經濟，或說是權貴肆行的資本主義，其間充斥著大量的權錢交易現象和社會不公正現象，並因此而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如幹群矛盾、貧富矛盾、城鄉矛盾，等等。如今這些社會矛盾仍在發展，有可能孕育成各種社會危機。

趙紫陽則主張不僅要搞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走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相結合的道路。

他決意要改變這個黨的由個人說了算的體制，力主擴大黨的民主，變集中制原則為民主制原則。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內不設總書記的職務，採取中央常委輪流坐莊的方式，以防止個人專權。

他還決意要改變這個黨在這個國家裏壟斷一切（包括壟斷人的一切權利）的狀況，力主擴大社會民主，變一黨專政國家為民主法治國家。他主張要實行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直接選舉村、鄉、縣、市級領導幹部，差額選舉省級和省以上級領導幹部；真正做到黨政分開，國務院各部委不設黨組，黨委不設對口部門；同時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利，實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給人們以言論自由。

紫陽還積極反「左」。1983年，他與耀邦聯手制止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搞起的「消除精神污染」鬧劇，使得這場左派復辟活動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戛然而止。

1987年，耀邦被逼辭職，左派再次反撲，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狂潮。紫陽及時發表「5·13」講話，堅決阻止這一狂潮的蔓延，隨即拆掉鄧力群的「左廟」即「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更名《紅旗》雜誌為《求是》雜誌。

1989年，耀邦去世，學潮驟起。紫陽堅持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處理這一突發事件，主張和平對話，反對軍事戒嚴，不惜為此而去棄權位，並失去自由，遭受漫長無期的軟禁，直到去世。

在我們這個黨的歷史上，接連出現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任總書記，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說前者是這個黨的「良心」，後者是這個黨的「大腦」。

這兩任總書記都積極推進改革事業，並且都主張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此問題上超越了鄧小平，並也因此觸怒了鄧小平，引發了歷史悲劇。

不過，這兩任總書記也有些區別。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耀邦走得要早些，紫陽則走得要這些。如為淡化黨的領導而要取消國家機關黨組。在個人政治結局上，耀邦最終做了違心檢查，紫陽則拒絕做出違心檢查，並為此付出失去自由的代價。

我曾當面問過耀邦為什麼要做那個檢查。他答道，我還要顧及這個家。他是擔心因自己的問題而連累家人。

後來紫陽也面臨當年耀邦曾面臨的問題，也要考慮自己所做出的決定有可能連累家人的問題。為此，他召開了家庭會議，徵求家人意見。家人都表示支持他，無怨無悔。

紫陽也就沒有許多後顧之憂了，於是做出反對戒嚴和拒絕檢討的決定。他的這個決定是一個了不起的決定：

一是為堅持真理而準備犧牲自己的決定——他當時已做好了要坐牢的準備；

二是改寫了中共黨內政治生活史的決定——他是中共建國後第一位拒絕做檢討的下台總書記，也是中共建黨後繼陳獨秀後第二位拒絕做檢討的下台總書記。

總之，紫陽做出這個決定，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

(二)

受宗鳳鳴委託，我看過這本書的初稿。後又受宗鳳鳴和趙紫陽家人的委託，我又看過這本書的二稿。我每次看稿都看得比較用心，記得看第二稿前前後後看了很長時間，看得視力模糊。

我看得比較用心就是考慮到，由於紫陽本人沒有留下回憶錄，而

其他人也不可能在這長達十幾年時間裏頻頻與他作傾心交談並作詳細記錄；因此，宗鳳鳴這本書就具有了填補空白的意義。

這本書真實地記錄了紫陽在軟禁中的許多次談話，許多次有關這個黨、這個國家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談話，尤其是有關當代中國改革問題的談話。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這本書，紫陽的許多重要思想就不會保存下來，至少不會保存得像這本書所記述得那樣清晰。

當然，這部書稿所記述的，只能說是紫陽的一些重要思想，還不能說是紫陽的所有重要思想。

不過，這部本書稿從總體上看，還是非常珍貴的。可以這麼說，這部書稿最突出的價值，就在於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續地記述了趙紫陽在被軟禁十幾年間的上百次談話，從而真實地再現了他在這一時期的思想軌跡。

(三)

在同宗鳳鳴多年接觸中，我能感到他是一個非常樸實的人，很謙虛，也很實在。

我們許多老同志還都認為他是一個非常仗義的人，能夠為探視被軟禁的老戰友，而敢以「氣功師」的名義去闖戒備森嚴的趙家門衛，居然闖關成功。

也正因此，他在這十幾年中，事實上成了我們這些老同志與趙紫陽之間的聯絡員。一方面，將我們所瞭解的情況以及我們對時局的看法帶進去告訴紫陽；另一方面，又將紫陽的反饋意見帶出來告訴我們。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十幾年中，認真地記下了他同紫陽的許多次談話，並把這些談話集結整理成了我們眼前所看到的這本書。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在前文已說過，趙紫陽反對戒嚴和拒絕檢討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我在此處還要說，宗鳳鳴寫出這本書，不僅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而且是對趙紫陽個人及其歷史負責。所以，我們這些老同志都為紫陽交了這樣一個俠義老友而感到

慶幸。

總之，宗老寫出這本書是很不容易的。他不是偶爾地記下了紫陽的某幾次談話，而是持續十多年地記下了紫陽的上百次談話。另外，他也并不是寫文章出身的，也沒有做過記者，只是到了晚年才開始寫書，並且一寫就寫很重要的書，其難度可想而知。為此，我們應當向宗老致敬。

聽說有關部門已經找宗老談過話，查問他寫這本書的事，不知會查問出什麼結果來。我想時代已經進步了，總要講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吧。最後，我這個已九十歲的老頭祝他這個快九十歲的老頭，高高興興地寫書，平平安安地出書。

鮑彤 序

(一)

我和宗先生見面雖然不多，相識已二十年。一九八六年前後，紫陽夫人梁伯琪大姐告訴我，航空學院的黨委書記宗鳳鳴退下來了，熱心改革，願意義務勞動。體改委如果有甚麼調查研究之類的工作，可不可以請他參加？安志文知道了，很高興，聘請他兼任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研究員。

後來我有機會和宗老見過一次面，聽他談在濮陽油田所作的調查。他主張在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同時，不應忽視社區居民和地方財政的利益。宗老所追求的，是全社會受益，我至今記得他的感嘆：濮陽地區是抗日根據地，五十年了，群眾很窮很苦；許多國營大企業過去與民爭利，今後應該主動關心群眾的利益；油田越替群眾著想，群眾也就越會愛護油田。那天他給我的印象是，熱心於改革，熱心於社會公益，是一位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主義者。

「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有過兩次波瀾壯闊的大普及，或者說，大異化。第一次，它被毛澤東界定為「共產黨領導一切+階級鬥爭+消滅私有制」，使「社會主義」得以成為官府和鬥爭愛好者們共同勇於實踐的信條。第二次，它被鄧小平界定為「共產黨領導一切+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是硬道理+先富起來」，使「社會主義」得以成為為權力和金錢愛好者們皆大歡喜的現實。經過這樣兩次大普及之後，仍然熱心於以全社會為本位，不忘無勢無錢的勞苦大眾，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在中國越來越少了。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二)

後來我沒有機會和宗老見面，重逢竟在我坐牢以後。

我家客人歷來不多，偶爾，一九八五年一天晚上，突如其來鄧小平的一位女兒光臨，說，科委在開全國科技工作會議，請她父親後天去講話。她父親說，你們給我起草一個稿子。寫得好，我就講；寫不好，我不講。雖然離開科委已經五年，禁不住小平女兒幾句「十萬火急」。我被動員到豐台一個招待所裡加了個夜班。第二天她告訴我，小平看了稿子，說，「好，我明天講」。這就是《鄧選》中那篇《改革科技體制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的由來。不過，閒話還是少說，言歸正傳。

話說多少年來，不速之客，屈指可數。我坐牢後，慰問者反而絡繹不絕。過去在反右中挨批，文革中挨鬥。那些時候，連本機關的同事也迫於形勢，必須和我「拉開距離，劃清界限」。這一次，是「坐牢」，當「刑事犯」，性質之嚴重可知，而且在全黨全國「大清查」的形勢下，卻引來了好些相識和不相識的賓客。宗老就是其中一位。

他比我年長，心臟弱，從航空學院趕到木樨地，路相當長。但八年如一日，堅持每隔幾個月必來探問。宗老就是這樣古道熱腸。蔣宗曹探一次監，就向我傳達一次「誰誰誰問你好」，「誰誰誰要你保重」。這使我感動。「世道」變了，獨夫民賊不可能永遠操縱人心，心中油然泛起了這樣一個句子：「舊雨新知入夢來」。

(三)

知道我被判徒刑七年，應於一九九六年五月期滿。他屆時來看我，卻撲了空。因為中共中央在指令法院判我七年有期徒刑之後，猶如癡足，決定再一次超越法律，再一次用警車前呼後擁地把我押進西山腳下一個職工宿舍大院，再一次把我囚禁在解放軍全天候密集守護的圍牆裡。不管怎麼樣，又過了一年，一九九七年四月底，我終於回家了。在中共中央統一領導下，我全家也被同步掃地出門，從木樨地掃到了八寶山。宗老又趕到八寶山來看我。幸好，八寶山用於監視和控制的

各種現代化裝置來不及緊急配套運行，土法上馬的設施如鐵欄桿、大鐵門、小鐵門、崗亭等也還沒有裝，二十四小時站崗放哨的人員尚未配齊。因此僥倖得很，宗老居然進了門，上了樓。

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我於是知道，紫陽被中共中央非法軟禁，友好故舊隔離殆絕。這些年來，唯獨宗鳳鳴以「氣功師」的身份，尚能出入富強胡同。每見，趙必談。談後，宗必追記。幾年中，談了許多次，追記了許多篇，已經匯成了一個集子。宗把這個集子送給紫陽，紫陽自己沒有過目。說，將來讓鮑彤去斟酌吧。宗這次來，就是和我商量這件事，希望我「修改修改」。

但是鮑彤不能受命。兩位老者之間的談話需要保持歷史原樣。何況鮑彤的身份早已變了，不再是鄧小平女兒為起草她父親講話而晝夜光顧的鮑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議決鮑彤是反革命一個。倘若這個反革命居然和被視為頭號政敵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有甚麼「聯繫」，中共中央的新領導人會在何種心態支配下作出何種反應？紫陽將進一步蒙受何種傷害？當時我用了一句不是客套的話答覆這位長者：「我不能修改。」這使宗老失望，但我沒有別的選擇。

(四)

紫陽去年逝世，再也沒有人能加害於他。於是宗老準備出書，並囑轉提出要我寫序。這，我當然義不容辭。

紫陽說過「斟酌」，大致因為他不想「藏之名山」。追記的公佈，肯定會受到廣泛關注，這位前總理、前總書記已被軟禁十七年，他曾經為人民工作了那麼多，付出了那麼多，大家自然希望知道這位改革老人的晚年。何況這本集子追記了兩位老人的談話，跟由旁人的捉刀、由「作者」諳熟而後背誦之的那些「台詞匯編」，不可同日而語。如果允許讀者自由選擇，我深信，想讀這本書的人一定比自願買《江澤民文選》的人多得多，盡管據說三卷江選已經印得汗牛充棟，崛起成為當今中國（也許還是全世界）銷量第一。

出版趙紫陽談話集的合法性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正同出版《江澤

民文集》的合法性絕對沒有問題一樣。只要中國的憲法是真憲法，只要中國人的出版自由是真自由，只要中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真平等，公民宗鳳鳴的出版自由應該和公民江澤民的出版自由一個樣。

趙紫陽掌握的馬克思主義不比任何中國人少，包括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內，其他等而下之的名人更不在話下。我這樣說是以鄧小平自己的名言為根據的。請翻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6頁，鄧小平說，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據我所知，黨的歷屆大會報告人所作的報告，當得起被鄧小平譽為「一個字都不能動」的，只此一篇，別無其他；而十三大的報告人正是趙紫陽。這就是趙紫陽在鄧小平心目中的地位。

宗鳳鳴先生告訴我，紫陽說他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完成鄧小平同志開創的（或托付的）政治體制改革」（大意如此），從措辭上，也可以看出紫陽的襟懷和風格。鄧小平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雙重關係，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殺者。著重指出政治改革曾經得到鄧小平的支持，符合當初的實況，也有利於爭取更多的人參加進來。六四以後，中共高層對政治改革普遍存在著一種恐懼症。前總書記像一位慈祥的長者，教育那些談虎色變的人說：年輕人，用不著害怕，政治體制改革不是洪水猛獸，那是小平同志親自提出用來救民救國救黨的好事情哪！

趙紫陽和鄧小平之間存在著爭論。鄧小平認為，不鎮壓群眾的共產黨一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趙紫陽認為，鎮壓群眾的共產黨一定不是中國人民需要的共產黨。趙紫陽向鄧小平說不，說的是真理，靠的是勇氣。十多年了，新的領導人總是說，十三屆四中全會已經就趙鄧之爭作出了正確的結論，不能變。這種色厲內荏的話，我看連說這話的人自己，如果還有良心，也不會相信。中共中央一九八九年的決定，同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的決定、一九五九年的決定、一九六六年的決定……以及其他一切決定一樣，都沒有不受時間檢驗的特權，都應該由後人自由自在去進行審查和判斷。

中國除了憲法，還有書報審查機構。書報審查機構的地位看起來

比憲法低得多，但擁有的權力比憲法不知道大多少倍。在中國，書報審查機構有權和憲法對著幹，有權規定哪些觀點禁止傳播，哪些事件不准報導，哪些人的名字不得在書刊上出現……。比方說，談到香港回歸的歷史，只准提英國方面的簽署人撒切爾夫人，不准提中國自己的簽署人趙紫陽。這就洩漏了一個超級秘密，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名字，已經被本國當前的書報審查機構列在黑名單之中。因此，目前在中國大陸出版趙紫陽談話錄，存在著憲法無法克服的困難。好在除了大陸，還有香港。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港人反惡法太示威業已昭告全世界；港人治港必須兌現！一國兩制是鄧小平親口一再再而三提出的莊嚴保證，書報審查機構想公然抵賴，恐怕也難。所以，當宗鳳鳴在大陸不能找到憲法所保證的自由時，在香港能！我慶幸此書終於得以在香港出版。我的心情和一切關心中國進步的人一樣：希望先睹為快！

【附言：寫到這裡，聽說國務院發佈了加強對境外媒體管理的新規定。我不知道有關部門將就此作出何種解釋，也不知道它將依靠甚麼手段去實施。不過，我想，不應該影響這本書從香港傳入大陸。趙紫陽直到去世，一直是共產黨的黨員，中共中央主動在他的遺體上覆蓋了鐮刀斧頭的黨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書報審查機構不應該責備本黨中央去查禁本黨黨員趙紫陽的書。我也不相信書報檢查官精通無中生有的魔術，居然能從偉大的公民趙紫陽的談話中找出甚麼查禁的理由來。】

敢於求真務實

是一種高尚

史德

杜潤生

二〇〇二年一月

杜潤生為宗鳳鳴記錄趙紫陽談話的題詞：
「敢於求真務實是一種高尚史德」

宗鳳鳴自序

趙紫陽因「六四」事件而下台了！「六四」慘案不僅是當代中國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國際上的一個大事件！它不僅對東歐巨變、蘇聯解體起了推動作用，產生了所謂「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危險」的恐懼，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轉折；而且使我國在經濟上受到國際上的制裁，蒙受巨大損失。更重要的是，它動搖了國內人們的政治信念，產生了「信仰危機」，從而使共產黨的組織走向渙散！

人們在議論說：連北洋軍閥袁世凱、國民黨蔣介石都不敢做的事，共產黨卻做了。「六四」運動原本是青年學生、廣大人民自發的反腐败、反社會上不正之風的一種愛國民主運動。但是，當局居然出動幾十萬大軍，用機槍坦克，以所謂「反革命暴亂」予以鎮壓！真是舉世罕見。當時，領導層在處理這一事件時，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是以李鵬為代表，根據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的報告，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活動」，要予以鎮壓；一是以趙紫陽為代表，主張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和民主法治的方針下，採取對話來解決，反對戒嚴、反對出兵鎮壓。趙紫陽因提出不同意見而被定為「支持動亂」、「分裂黨」，予以軟禁並進行專案審查。

對趙紫陽經過三年多的審查，於十四大前夕才向他宣佈「審查結束」；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結論不變。趙紫陽要求將審查結果和事實材料予以公佈，卻始終不予理睬。只有「帽子」，沒有事實，不能讓人心服。人們在議論說：哪有不根據事實作結論的？不可理解！哪有因提出不同意見就治罪的？不可思議！哪有總書記反黨的？不可想像！據我所知，審查結果是「查無實據」，所以上述兩個結論都不成立。而事實上直到現在也沒查出究竟是哪些人進行了「有組織

有計劃的反革命活動」，當局始終沒有予以澄清與交代。人們自然有理由說：這是強加給廣大青年學生與人民的，是「莫須有」罪名。

趙紫陽在「六四」問題上的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寧可總書記「寶座」不要，甘受「囹圄」，也要堅持正義，堅持實事求是，主持公道。正如香港評論所說：在六四事件上，趙紫陽才真正表現出「政治家的風度」，「使他的形象變得更為高大」，「為後人樹立了榜樣，使人們欣賞敬佩他的風骨」。但這是要有「巨大的道德勇氣」的，是「冒了極大的風險，甚至有死於非命的可能」。

在1989年批判他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在嚴峻的遭受批判的政治氣氛中，趙紫陽仍然高舉民主的旗幟說：「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而且，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他還說：「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的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趙紫陽不但在經濟上全力推進改革開放，而且在政治上也突破了鄧小平的僵化立場成為中共內部推進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

不但如此，趙紫陽還堅持真理不動搖，認為是正義的就是要堅持下去，認為是正確的就是不能檢討，那怕坐牢也罷，軟禁也罷，表現出「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氣概！趙紫陽雖在「囹圄」中，仍在中共十五大召開前夕，致函主席團和全體代表，聲明將六四學生運動「定性反革命暴亂，是沒有根據的」，要求重新評價「六四」，提出「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的建議；但對他自己個人的蒙冤受屈卻隻字未提，坦然地為這個震驚世界的事件爭取公道；對此事可能招致什麼樣的後果，繼續置之度外，以堅持正義為己任。有人說，趙紫陽在黨內創造了「趙紫陽模式」，展示了真理和信仰的價值，認為中共黨內從彭德懷到劉少奇，從鄧小平到胡耀邦，過去被批判的所作所為都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但他們卻被迫一再認「錯」、認「罪」，致使黨內長期是非不分，盲目馴服，唯上是從；趙紫陽則改變了這種錯誤的傳統。

因此，我認為趙紫陽是代表了實行黨內民主改革的一面旗幟。不管他今後處在什麼位置，軟禁也好，復出也好，甚至坐牢也罷，他的這面旗幟是光輝的，他的形象是高尚的。他與萬里在農村實行的「包產到戶」的改革，使廣大農民從人民公社的被奴役狀態下解放出來；他在中共十三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走上正確的發展軌道，他的這些歷史功績將始終銘記在人們的心中。原中共中央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杜潤生說：像趙紫陽這樣從舊的意識形態、從舊的制度模式框框走出來，既要經濟開放、又要政治開放的國家領導人是很少有的。我相信趙紫陽在當代中國的歷史地位是誰也抹煞不了的。

當我得知趙紫陽被解除黨的總書記職務之後，作為他的老戰友，我當即打電話表示慰問。我深知，他做了多年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是國際上的一位風雲人物，一下被免職、被軟禁，其思想壓力是相當大的，精神上會非常痛苦。我對趙紫陽的關心和同情，不僅來自過去戰爭年代生死與共所凝結成的革命情誼，更多的是出自於他對「六四」事件的主張和正義性。

我是搞學生運動出身的，自然對廣大青年學生反腐敗、反社會上不正之風的「愛國民主」壯舉抱有極大的同情。我反對出兵鎮壓，對趙紫陽在學運期間提出的解決問題的主張是無比贊同的。

由於我對鎮壓青年學生極度傷感，簡直使我對自己終身為之奮鬥的理想信仰有所破滅。「人民軍隊鎮壓人民」，開進幾十萬大軍，用坦克、機槍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這是中外歷史前所未有的，這是歷史的大悲劇。我很想瞭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決策，我也更想瞭解趙紫陽為什麼在那樣嚴峻甚至有坐牢危險時刻卻要獨樹一幟，要在那萬炮齊轟的批鬥會上，硬是不檢討而大破共產黨的先例，這個決心又是怎樣下定的。因此就向趙紫陽提出去他那裏見見面。但那時，他正處在審查期間，被嚴密監視，我們是很有顧慮的，怕惹出麻煩來，因此未能如願。但我還是設法通過他的家屬，與他不斷地保持著聯繫。這

中間趙健民（原山東省人民政府主席）也通過家屬作些情況交流，直到1991年的夏天，他才同意我以氣功師名義去他那裏。因而，才能經常接觸和面談。粗粗計算截止到2004年10月，我們之間交談上百次之多（有些談話未記述在本書內）。主要我聽他講，根據他所提問題，有時作點敘述（為說明問題）、提問；我與他是從溝通情況、交換看法出發，不屬於記者訪談性質，都是漫談式。所以記述中有的內容前後有重複。為保持其原貌，重複之處我都保留下來，請讀者見諒。我感到每次所談問題，他一般都作過深入思考。根據世界潮流，以使中國走向現代文明國家為出發點，中國方方面面的改革、政策、走向，仿佛在他的腦海裏都有個藍圖。每次談後，我都作了追記。追記中，對趙紫陽本人的講話、別人的轉述、我個人的理解、看法，也都作了嚴格的區分；現逐次整理出來，以供有興趣者審察。

遺憾的是，我的採訪追記有過間斷。由於趙紫陽向十五大寫了前述那封信，提了那麼個建議，隨即又被加大懲罰治罪，「不准外人進入會客」。因而我與他之間的談話也就暫被中止。不久後，我還是用這個「氣功師」身份，有幸使談話得以恢復。但所談內容有所不同，側重也有所改變。這些談話我便作為「續篇」加以整理歸納。其中，2001年的談話由於內容相近，故做了綜合敘述。

我相信歷史終會還歷史真面目，終不會為人們所扭曲，所控制！

出版前言

趙紫陽（1919—2005），中共建國後第二代政治家。於文革之後進入中央領導層，先後出任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國社會空前的轉型期的領導人。在任十年，推行「改革開放」路線，奠定今日中國經濟崛起的基礎。趙紫陽的政治生涯在一九八九年驟然結束。在當年的北京學運及六四事件中，他一反共產黨的傳統，站在學生一邊，反對武力鎮壓而被黨內元老派罷黜。那年他七十歲。

在其後長達十六年的晚境中，趙紫陽遭到嚴厲的軟禁，被剝奪一位公民和黨員應有的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直至病逝。在此期間，趙紫陽對他的經歷、國家和黨的歷史、政策乃至意識形態，作了深刻的回顧與反省。這些反思的成果，透過他的一位同鄉和摯友宗鳳鳴先生記錄下來，宗鳳鳴比趙紫陽小三個月，他們在日本入侵的少年時代，投身中共革命，長期在中原地區共同工作。一九四九年後，宗轉入科技部門，曾任航空航天大學黨委領導，從國家體改委顧問職位離休。對八九學運和趙紫陽命運的同情，使他成為趙軟禁中的常客。他以「氣功師」的名義，從一九九一年起，至二〇〇四年，探望趙紫陽上百次。兩位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殘酷鬥爭的老戰友，在北京富強胡同的院子裏，解除心障，探討真理。每次談話由宗鳳鳴記錄整理。

回憶錄作為知名的從政者向歷史告別的一份交待，在封閉的極權體制中，尚未形成慣例。共產黨的領袖們，在位時緊張得天天吃安眠藥，自然無暇顧及；即使下台或退休後，也囿於主客觀的種種局限，

很難提筆著書。蘇共在斯大林去世後失勢的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都沒有寫回憶錄，赫魯曉夫在西方出版的口述回憶錄，生前也不敢認帳。中共情況更為嚴峻，不僅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一代巨頭，沒有留下任何正式的遺言，毛後鄧小平、陳雲、彭真等強人，也都沒有留下可稱為回憶錄的文字。其他大量的「革命回憶錄」都由官方寫手製作，經審批而後出版，史料價值微乎其微。趙紫陽在軟禁中有意記下若干往事，不只一個人建議他寫回憶錄，他也曾向當局要求提供有關他任職期間的（非機密）檔案資料，以備參考，但遭到拒絕。因此，宗鳳鳴整理的談話錄，就成為回憶錄的一種替代方式。

這本談話記錄顯示趙紫陽內心自省的深度和廣度。八十年代激烈的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特別是趙和鄧小平、胡耀邦的三角關係，是書中多次闡述的話題。趙對傳說紛紜的一系列事件提供證詞，進而交待自己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的角色。這是研究八十年代中國真相的一份具權威性的材料。在對中共體制的歷史回顧中，趙紫陽是毛時代以來，第一個毫不含糊地批判專政教條的中共領袖。他認為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最有威望的領袖來實現的論斷，只會導致個人專政與專制制度。不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民主與法治便沒有希望。但是，趙的一切判斷更多的是來自數十年的政治實踐，尤其在經濟領域，他對中外管理體制的熟悉與研究，處處可見。他主張政策的依據只能是實效和民意，而不是理論，更不是什麼終極的目標。他在軟禁中坦承，他已從過去「經濟的改革者，政治的保守者」開始轉變。趙紫陽晚年的世界觀，顯然已經很大程度地從中共正統轉向認同當代普世的價值標準，推崇民主、法治、人權，還政於民。對中共數十年的苛政，他有痛心的懺悔：「我們欠老百姓的太多了。」基於對國情的憂慮，他不贊成政治上激進的西方化。

宗鳳鳴不僅是趙紫陽談話的記錄者，也是趙與外部世界的聯絡者，他不斷地給趙提供最新的各種資訊，並聽取趙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

趙對軟禁期間國內外重大事件及知名人物，包括中共各屆領導人的直率看法。趙紫陽一改身居高位時的謹言慎行，平靜而有條不紊地侃侃而談，經驗與睿智、膽略與習慣的話語分寸交織。這是歷史提供的一個僅存的空間，讓中共權力鏈接上，一個將永遠消失的世代——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有使命感也有國際觀的一代得以表露他們被扼殺的抱負。

對於出版者而言，這三十萬字的書稿記錄的趙紫陽，不僅是不計權力得失堅持獨立思想不屈服的前總書記，還是一位身陷囹圄、打破沉默，敢於背叛傳統的言者。出版這部談話錄對於言禁森嚴的中共體制更有突破意義，也為趙紫陽生平增添一段傳奇。

宗鳳鳴先生為了書稿的嚴肅性，以十餘年不懈的努力，處理素材，一稿再稿，終於成書。期間，書稿曾交予趙紫陽審閱，徵求過多位趙生前好友、同事的意見，獲得深切的支持。趙紫陽去世後，出版談話錄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致國內外廣泛關注和期待，甚至在香港出現風波，中共當局更是力圖阻撓談話錄的出版。

本書是著作者宗鳳鳴先生授權的最後修訂的完整版本，前四十七篇，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至一九九七年九月的諸次談話記錄。「續篇」是談話因趙上書中共十五大而中斷數月後，一九九八年五月重開，至二〇〇四年十月（即趙臨終前兩個多月）的三十四篇記錄。書中穿插數篇私下安排的對趙的訪問記，大部分都是首次正式發表。

全鐘 2007年1月9日 香港

1

1991年7月10日

一、「這是自我選擇」

1989年「六四」趙紫陽被軟禁後，這是我第一次見他，大概我也是他的第一位客人。當晚，找到富強胡同六號他的住所時，這裏是靜悄悄的，路上行人也少，紅彤彤的兩扇大門緊閉著，門旁牆壁上標誌有「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的字樣。我走上前按了幾下門鈴，開門後，就見一群戰士驟然間一窩蜂地向我湧來，如臨大敵似的。我很泰然，聲明我是氣功師，是約定好的，門衛向我要身份證，我說沒有帶。經傳呼後，就讓我進去了，也沒登記。

見到趙紫陽後，他忙著給我搬了一張籐椅，讓我坐在院子裏。他行動敏捷，毫不顯老態。他夫人梁伯琪隨即送來幾塊西瓜，趙聲稱：就在這裏坐吧！談話方便些，擔心屋裏安裝有什麼東西（意指竊聽器）。就是這樣，梁伯琪還在院子內不停地東張西望，看看是否會有人錄影。神態顯得有些緊張。這是個三進院的四合院，前院是警衛人員和秘書的辦公室和住房，中院是他的書房，後院是他住所，與他二老同住的只有他們的一個女兒、女婿及一個外孫。這裏原是胡耀邦的住處。

開始時我說：許多老熟人、老同志都希望你保重好身體。他機敏地說：這可能有兩個意思：一是關心我，關心我的身體；二是希望我還能出來工作。我隨即說：雖然失掉了總書記的職位，但卻得到了人心。當然，這不只是我的看法，一般輿論認為你的威信形象，比「六四」以前在全國人民心裏不是低了而是高了。

他首先說：沒有把鄧小平^①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貫徹下來，深感

^① 鄧小平（1904—1997），四川人，1983—1990年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遺憾。此時他神情中隱約露出一種由衷的傷感。這大概是一個追求事業上成功的人，而事業卻突然夭折所特有的心態吧。

他說：我個人這個結局全是自己的選擇，正如鄧小平與一位國外學者所言：「趙紫陽是自我暴露」。這跟胡耀邦完全不同，胡那時是被弄得搞不下去了，迫不得已，不得不提出辭呈，完全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我這次的這個自我選擇，又是全家開了會都同意的了。

他又說：當時擺在我面前的有三種情況可供選擇：一是說服鄧改變「4·26社論」，改變學生運動的「動亂」定性；二是要滑頭稱病，當兩面派，但我身體很好，說不過去，再說以後也不好辦，還會批我反自由化不力；三是目前這個選擇。

我隨即追問：是什麼原因促使你下決心做這樣選擇的？你當時是怎樣考慮的？

趙紫陽慷慨地說：「我不願在歷史上留下一筆賬」。

我聽了之後就思索：寧願不要總書記寶座，甘受圈套，也不能使自己在歷史上欠下一筆賬。這大概是有歷史責任感的人的一種共同心態，也是一個政治家的人格和風骨吧！據趙身邊的人李樹橋說：趙紫陽在「六四」事件發生前，曾一再聲稱：從歷史上看，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記得趙健民^①也對我說過，趙紫陽向他談了「寧願自己總書記不幹，也不做歷史罪人」。當時，趙健民也向趙紫陽說：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能做「違心的檢討」。

他又風趣地說：我過去的職務夠高了，國家總理也做了，總書記也做了，還想做什麼呢？認為目前這個結果對自己是適宜的。相反，保留任何一個職務都不好幹；不管分配什麼我也都不願幹了。

據我所知，原來黨中央決定，仍保留他的中央委員，但他在批判他的會議上作了申辯發言，於是又臨時決定，「中央委員」也被撤銷。

接著，趙紫陽又深有感觸地說：中國保守勢力大，又是「老人政治」，改革難度大。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是有矛盾的，使改革深

入不下去。這主要涉及權力的再分配問題，這就關係到黨自己改革自己、革自己的命的問題。

我理解，這是把改革提到最本質的問題上來談，也正是改革深入不下去的根本原因所在。改革，既然是權力再分配，而無產階級專政的體制制度又是權力不能分享，這就涉及黨的自我更新、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更新這些基本制度上來了。因此，我認為趙紫陽這個思考其意義是很深遠的。^①

二、關於兩個過渡的觀點

趙紫陽說：通過這一時期的觀察與思考，自己形成了這樣一個概念，即兩個過渡的觀點，一個是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殖民地國家獨立後，風起雲湧地都嚮往社會主義，而且建立了社會主義陣營。再一個是冷戰結束後，又出現了社會主義的過渡，尤其在東歐首先開始了，這個過渡不可能是完全資本主義型的，因為廣大人民不會接受它，但也不是現在模式型的現實社會主義，很可能是社會主義後社會。但這個社會主義後社會是什麼模式，他沒有說明。

我理解趙紫陽根據世界潮流，在這裏提出了社會主義制度必須進行自我更新；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存在不下去的。

他接著說：在這個過渡期，會有大動盪，會出現大的變化，會出現歷史人物。但這個變化不是由我們這一代人所能擔當的，只有下一代來擔當。現在東歐及蘇聯（說話當時蘇聯還未瓦解）已納入到國際社會新秩序中去了，東歐的現實社會主義是失敗了；當然列寧是了不得的人物，他不但在俄國領導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開闢了人類社會歷史的新紀元；而且在連綿不斷的內戰中，人民處在饑寒交迫

^① 作者注：據《國際內參》刊載：在西歐，法共在1996年的29大上提出了「新共產主義」主張。法共在70年代中期提出「法國色彩的社會主義」，即民主的多元化的自治管理的社會主義道路。1976年法共22大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並在政權形式上提出「自治管理」的主張，到1994年也不再把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指導原則，而代之以民主運行原則。

^① 趙健民（1912—），山東人，曾任雲南省委書記，1968年被謫入獄，1978年平反任三機部副部長。

的困難情況下，還領導俄國打退了國外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與包圍，在那非常嚴峻的形勢下堅持和保衛了社會主義，這需要有非凡的勇氣、魄力和毅力。

趙紫陽稱讚俄羅斯民族，他說：俄羅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有自豪感，地域遼闊，資源豐富，將來發展是會了不得的；在二次大戰中，又是反法西斯的主角，如不是由斯大林領導下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人類社會可能會進入一個黑暗時期。

趙紫陽問我：人們對戈爾巴喬夫^①有什麼看法。我說據我所知有完全不同的兩種看法：一是認為他是叛徒，瓦解了東歐社會主義，是罪人；二是認為他的「新思維」結束了冷戰，從而使人類走出了「誤區」。我是同意後一種說法的。

我又說，當然，戈爾巴喬夫在「新思維」指導下，在改革的道路和方式方法上，過急過猛有失誤，給東歐和蘇聯造成了混亂，確實令人遺憾，但客觀公正地說，他還是在維護社會主義，只不過是要革新它而已。

趙紫陽對我這個觀點沒有表態，只是稱讚了戈爾巴喬夫有效地擺脫了保守勢力及共產黨組織的阻撓，而成立了在總統和政府直接領導下的一個委員會，來進行改革。

當我談到現在一般青年嚮往資本主義，提出這樣的觀點：如果由國民黨用三民主義來治理中國，中國也不至於落後到這一步，台灣不就是證明嗎。趙紫陽表示，國民黨「肯定是治理不了中國的」。

趙紫陽說：二次大戰後，國民黨蔣介石^②仍然堅持走老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政獨裁，這是由於他所代表的階級利益、階級基礎所決定的，也是違背世界潮流的。國民黨蔣介石到台灣後，所代表的階級利益，階級基礎起了變化，不那麼直接了；再加上痛定

① 戈爾巴喬夫(1931—)，1985—1991年任蘇共總書記，1990—1991年任蘇聯總統，199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② 蔣介石(1887—1975)，浙江人，1948—1972年五次任中華民國總統。

思痛，又有生存危機感，從而作了反思，進行了改革，並且有美國幫助等這些特殊條件，才變化發展起來的。

以上趙紫陽的談話，使我感到，他是從國際形勢的發展、世界潮流的角度來觀察思考問題的。我也認為政治現代化、民主化乃是世界的潮流。在此我簡述了當代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①在《第三次——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中提出的：從十六、七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世界有荷蘭、英、法、美、意、俄、德、日等二十幾個國家，由專制政體轉向民主政體，是為第一次民主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即1945年至1965年，以葡萄牙為首的三十幾個國家轉為民主政體，是為第二次民主潮流；目前這次，即從1974年開始到現在，蘇聯、東歐及亞洲，又有三十餘個國家轉為民主政體，則可稱為第三次民主潮流。應該說，專制政體國家只剩為數不多的幾個孤島了。

最後，趙紫陽還談到鄧的兩個觀點，他說：經我和鄧小平打了八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那就是他認定了的問題不會改變，因此對「六四」他不可能改變，他的悲劇也成了定局，在社會主義制度方面，鄧小平對所有制看得比較輕，對採取什麼所有制形式並不在意。他主要是著眼於生產力。

在談到改革問題時，趙紫陽說：看來，只搞市場經濟不行，還得解決所有制關係。在談到他的個人問題時，趙紫陽說：給我送來了二十幾條意見，我駁回二十一條，只剩下幾條沒有駁斥。這些材料中有關於美國情報局「經費」問題，以及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問題，都簡直是胡扯。對此，我給鄧寫了兩個報告，鄧批示對趙批判到此為止。我現在只要求快弄痛快處理，反對拖下去。

這些問題都沒有展開，我也沒有再提問，這次談話就此結束了。

記得在我和趙紫陽這次見面之前，楊得志^②總參謀長曾對我說：「六四」事件後，批趙紫陽的會議他參加了，氣氛很緊張。他說：趙

① 亨廷頓(S. Huntington)，1950年哈佛大學博士，1962年任哈佛終身教授。

② 楊得志(1911—1994)湖南人，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長，上將。

紫陽一定很痛苦。我領會楊總長的意思是：趙紫陽是受了委屈的。楊總長還對我說：由張愛萍、葉飛率頭，蕭克、李聚奎、陳再道、宋時輪和我七個上將當時上書中央不要出兵^①。他說：我這一份還未修改好，就已上報了。（據我所知，就是喬石、楊尚昆，原來也是不主張出兵動武的，只是因鄧小平決定了，喬、楊二人才改變了態度。）但這次我見到趙紫陽後，看到他談笑如常，我沒感到他有痛苦的神態和表現，後來我見了與趙紫陽常來往的趙健民談到這一情況時，他說：一個政治家麼，應該是這個風度。

三、趙紫陽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申辯詞

當晚，趙紫陽留我吃晚飯。飯後，他問我，是否看到他在四中全會的發言，我說，沒有；只聽說控制很嚴格，開始各省、市都不發。後來，各省提出意見：黨的總書記下台，他的聲音也聽不到，感到回去不好交代；各省才發了一份。據說後來又收回了。

趙紫陽隨即將他保存的一份交我閱讀。現轉錄，全文如下：

【趙紫陽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②

我的發言

趙紫陽

1989年6月23日

這次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將對我的問題做出組織處理，我歡迎同志們對我進行批評。這些年來，我的工作有不少缺點、錯誤、失誤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負了黨、人民和老同志的期望。現在我想僅

^① 據六四檔案網載，1989年5月22日有直升機向天安門廣場散發傳單，稱七將軍：楊得志、張愛萍、葉飛、陳再道、蕭克、宋時輪、李聚奎表態，反對軍隊進城。

^② 趙紫陽這份發言稿2001年1月7日由香港人權民運中心公開發佈，時間誤為「1989年6月22日」。

就我所犯錯誤的一些事實做些說明和進行自我批評。

我先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的一些事實以及我當時的思想情況。

四月中旬以來，學生遊行越發展越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怎樣才能使事態儘快平息下來。我講過，對於學生不按法律規定進行申請，就上街遊行示威，我們歷來是不贊成的，對惡謀絕食更不贊成。我一再呼籲要在民主和法律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我還講過，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遊行，學校領導人和黨組織還是應當積極進行說服勸阻工作，儘可能引導學生通過正常管道用其他方式表達意見。我的這個態度一直是很明確的。

但是，我也看到這次學潮有兩個很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學生提出了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這些要求同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我們不能拒絕；二是參加遊行的人和支持他們的人非常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這種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態，必須首先著眼於多數，把多數人的主流肯定下來。廣大學生要求改革、反對腐敗的熱情是可貴的，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時還需要接受群眾的合理意見，採取積極的整改措施。這樣使多數人的情緒緩和下來，使多數群眾理解、支持黨和政府的做法，然後對少數壞人的問題才好解決。

與當時這個想法相聯繫，我還覺得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有個問題，就是沒有肯定多數人的主流，而是從整體上做了一個多數人難以接受的籠統的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極少數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混水摸魚，肯定是有的。但是幾十萬人的行為，只用少數人的操縱是很難完全解釋得通的。學生們認為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是給他們戴上了一頂帽子，情緒變得激烈起來。因此，我當時主張對社論做些改變，鬆一鬆口。我的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會議上講過，只在這個範圍內同少數中央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我當時考慮，我的這個想法對不對是一個問題；在黨的會議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的這個想法無論如何是可以在常委會上提出來的，提一提是不應該有什麼問題的。當然後來大家也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講話的口氣、提法實際上也逐步在變，也都講了一些肯定廣大學生愛國熱情的話。我覺得如果一開始就把這些話寫在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裏，而不是做一個整體的敵我矛盾的定性，多數人可能不會那麼激怒，再加上我們的其他工作，事態可能不致鬧得那麼大。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總之，那時我是想把廣大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很多同情者的行為，與極少數人企圖利用學潮混水摸魚，製造事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行為嚴格區別開來；避免把整個學潮籠統地做一個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著重採取疏導的方針，避免激化矛盾，儘快平息事態。我的不同意見的主要之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另外說明一下，我沒有反對過用「動亂」這個詞。我認為動亂只是指學潮規模和對社會秩序的影響程度而言，並不說明性質，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敵對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會上已講過這點。

二

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的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對，哪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麼分歧，至少沒有什麼大的分歧。成千上萬的學生聚在天安門廣場，大家的心情確實相當緊張和焦慮，我當時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絕大多數人是出於對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對我們工作不滿，想借題發揮；少數人反對黨和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我說，黨中央在治喪，學生們也要悼念，我們不好不允許他們悼念。因此，我主張，除對打、砸、搶、燒、衝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應當採取緩和手段。我記得當時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在追悼會前，

唯一的一件事是四月十九日夜，李鵬同志給我打電話，說學生在衝新華門，怎麼還不採取措施？我說喬石同志在第一線，準備了各種預案，他會隨機處置的。隨後我打電話告訴了喬石同志。我記憶中就是這麼一次。其他沒有聽到常委中間有什麼不同意見。

二、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1）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要讓他們復課。（2）對學生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管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3）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衝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李鵬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事後聽說，李鵬同志將這三條意見報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我離京訪問朝鮮，李鵬同志在車站送行時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

三、四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我是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在朝鮮看到小平同志談話和常委會議紀要電傳的（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並未電傳過去）。我當即覆電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我理解，小平同志決策的總精神是要穩定，不要動亂。這一點，對我們國家太重要了！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應該竭盡全力來做到這一點。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志的審閱。送審時，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根據這些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處改動。在我記憶中只有兩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位提出加上反精神污染的意見。我當時考慮，稿子上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已有了較充分的闡述，而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概念，指的就是否定四個堅持。因為意思是一樣的，不加也可以。另外，從技術上考慮，整個稿子是正面講紀念「五四」的，兩位同志的意見插到哪裡都覺得文字上有些不太順，因此就沒有吸收。我們歷來討論修改稿子，都不能把個

人的每信意見完全吸收進去。

五、我五月四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都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講話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當時沒有覺得有什麼矛盾。因為在我訪朝尚未回國之前，李鵬同志批發的《人民日報》的第二篇社論（四月二十九日），調子已經緩和了。後來在國務院授權舉行的對話會上，發言人也明確表示第一篇社論（四月二十六日）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反復肯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學生是好的，學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決的。我五月四日的講話，特別注意到了這些情況，與上面的調子大體保持了一致。另外有些話（如反對動亂的問題）我在五月三日的講話中已經講了不少，覺得可以不用重複了。我這次講話的新內容只有兩點：一是我分析了群眾對黨和政府又滿意又不滿意的狀況。我仍然認為這種分析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二是我提出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我想今後遇到這些問題，仍然應該爭取在這個軌道上去解決。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還可以。後來，同志們批評我的講話未經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來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就在第二天（五月五日），李鵬同志會見亞銀年會代表的講話，也沒有經過常委討論，其調子也和我講的差不多。

儘管有以上這些情況，但我的這篇講話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測，這是我事先沒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慮到這些情況，當時可以不講這篇話。

六、關於五月八日的常委會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會。四月二十七日大遊行後，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難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

方面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真正在做出努力，事態也許會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靜下來以後，也許比較容易取得統一意見。因此，我在這兩次會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報告清理公司的情況，公佈高級幹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歲（或七十五歲）以下領導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組織專門委員會對涉及高幹及其家屬的舉報案件進行獨立調查（萬里同志考慮得比我周到，他建議由人大成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定新聞法和遊行示威法等等。我的這些建議，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後還準備再討論，並沒有正式做出決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並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匯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關於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我從朝鮮回來後，聽說小平同志四月二十五日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廣泛傳達後，社會上引起很多議論，說「常委向小平同志匯報不符合組織原則」，還有一些更難聽的話。我覺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

在戈爾巴喬夫來訪的前兩天，我與工人和工會幹部座談對話時，會上也有人提出這類問題，當時我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作了說明，效果很好。他們說我們過去不瞭解，現在知道了就好了（喬石、胡啟立、閻明復等同志均在場）。在此之前，陳希同同志就針對人們有關「垂簾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工作的同志們做

了解釋，說明了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有關決定的情況，效果也是好的，陳希同同志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常委會上還通報過這個情況。因此，我就考慮，如果通過公開報導，把這一情況讓群眾知道，對減少議論可能會有幫助。我當時向戈爾巴喬夫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有意識的沒有講可以召集會議，和由他拍板的話）；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樣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小平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關於五月十六日夜間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五月四日我同李鵬同志談了我對這篇社論的意見，李鵬同志表示反對。因此，我覺得，要重新考慮是很難很難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可考慮先繞開這個難題，對性質問題淡化，逐步轉彎子。當時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慮同戈爾巴喬夫會晤的事，我們不便打擾，就把這個意見告訴了在小平同志處工作的同志，也以個別交換意見的方式分別在幾位常委同志中談過，想把這個彎子慢慢地轉過來。但是到了五月十三日，幾百名學生宣佈絕食，其中一條主要的要求，就是改變那篇社論的定性。我感到事態十分嚴重，這個問題已無法繞開。因此才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會上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我認為，社論主要是根據四月二十四日常委會精神寫的，小平同志的話是聽了李鵬同志主持的常委

會的匯報後說的。小平同志的一貫態度是全力支持常委的工作，只要是常委集體做出的決定，他歷來都是支持的。所以，責任應該由我們承擔起來。我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會上還表示，我已從朝鮮打回電報贊同小平同志的決策，所以我對四月二十六日社論也應該負責。當時我只是提出這個問題請常委考慮，不要求作出決定，同時時間已晚，沒有談下去。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志批評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五月四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並作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個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後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的擔心的。會後，我再三考慮，很怕因為我的認識水準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貫徹執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衝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志知道後，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眾中起激化作用，並說常委內部還是能夠繼續共事的。我反復考慮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覺得他的話是正確的。在當前的局勢下，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為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給小平同志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意見，並打電話給尚昆同志，請他再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許的，身為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時產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關於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三天後，我就準備去看望他們，後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學生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黨內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鵬同志去廣場勸說絕食學生的呼籲像雪片一樣的傳來，人民群眾也對我們

遲遲不出來做工作強烈不滿。有些同志說，周總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眾中去了。我覺得我們如果再不出來，將無論如何無法向人民交代。儘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為學生們已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麼呢？在我們看望之後，當天絕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並於當晚九時宣佈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面起了多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看完學生回來後，我已覺得自己的病情加劇。

十一、關於我沒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開的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佈的。我的請假信是在接到開會通知之前發出的。請病假在先，接到開會通知在後。我開始是眩暈、頭痛、站立不穩，入夜後心臟病發作。實情就是這樣，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期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就知道了。

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要設法緩和同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在同多數人的矛盾尚未緩解的情況下，採取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將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想法也可能是「一廂情願」，不那麼現實。即使當時對「四·二六」社論的定性作了鬆動，也不一定就能緩解矛盾，可能又節外生枝，提出新的難題，最後矛盾激化仍然無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那些想法，當然就成為多餘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願意結合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三

關於經濟工作的缺點、失誤及其責任問題，小平同志講過，李鵬同志也講過。

我的態度是，從我到國務院工作之後，直到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前，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應該主要由我來負責。1989年李鵬同志向人代會的報告，在政治局會議討論之前，曾專門送給我徵求意見。由於報告初稿中講到失誤原因時，連續用了幾個「多年來」，我建議對過去幾年來的問題，要採取分析態度。如預算內的基本建設規模，85年後已經得到了控制，沒有控制住的是計畫外部分；籠統地說改革急於求成，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李鵬同志聽後說，那就集中講88年的問題，作為本屆政府的年度工作報告，可以不講過去幾年的問題。我聽後未表異議。有的同志批評我不讓李鵬同志在報告中講過去幾年的失誤，把過去幾年的失誤推到李鵬同志頭上，我要說明，沒有這回事，我也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1987年以前，我國的經濟狀況總的是好的，是充滿活力的。這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幾年來，經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有不少的缺點和失誤。作為在第一線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我對這些失誤應當負責。基本建設規模年年壓，但是年年控制不住。對計畫外基建和過快增長的消費基金，一直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控制辦法。農業問題，小平同志、陳雲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過，但是直到去年農業會議之前，我們長時間沒有採取比較得力的措施。這些失誤，責任在我。

1988年以前，我國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當然也積累了一些可能加劇通貨膨脹的因素。去年發生明顯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是，由於對當前情況估計過於樂觀，在物價已經開始不穩的情況下，又準備加快物價改革步伐，並公開宣傳物價改革，宣傳放開物價，引起人們的恐慌，造成了群眾對物價上漲的強烈心理預期。這個問題，凡是搞商品經濟的國家都非常重視，而我們當時不大懂得。人們對物價的心理預期過高，我們又未有及時提高存款利息，解決儲蓄保

值問題，因而就發生了搶購，尤其嚴重的是造成了儲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銀行的錢少了，被迫多發票子。著重講清1988年發生的這些事情，是為了正確分析出現問題的原因，並沒有任何推卸責任的意思。因為1988年的這個失誤，也應當由我來負主要責任。

這裏順便說一下，李鵬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報告中批評我不加分析、不講條件地鼓吹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自己「創收」。這與事實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專門打電話給江澤民同志，要上海糾正黨政機關建立公司搞創收的問題。報告中還批評我「一再宣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腐敗現象「不可避免」。我不記得在哪裡講過這樣的話。自從我去年初在廣東提出「黨政機關要廉潔」以來，我開始認識到制止腐敗，解決廉潔問題的重要。從那時以後，我對防止腐敗和廉政問題講過不少次話。我講過，從許多國家的經驗看，在發展商品經濟的初期，容易發生腐敗現象。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當而且可以把腐敗現象限制在最低程度，提出「經濟要繁榮，黨政機關要廉潔」。當然，如何防止腐敗，保持廉潔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雖然書記處會議專門研究過，還開過一些座談會，也總結過一些地區的經驗，但至今還沒有能夠找到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敗現象的整套辦法，如果要講責任，也要由我來負。

四

同志們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對我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我想就此向大家講一講我的思想情況。

開放以來，懷疑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企圖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識份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師、青年學生中間確實有所滋長。這次學潮問題鬧得這麼大，同這種思潮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抓得不夠有力，收效不大，放鬆了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這些問題都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責任。

我經常在考慮這個問題，覺得很不簡單，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

反對這種思潮？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加強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這方面我過去也是經常強調的，特別是今年以來，我在加強黨的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形勢教育，加強理論研究等方面，都講過一些話。我還根據小平同志的多次講話精神，提出要堅持兩手抓，即一手抓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一手抓加強思想和政治領域的工作。當然，總的來說，還抓得很不夠，特別是很不落實。正像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樣，一手硬，一手軟。對此，我要負主要責任。

在這期間，我感到比較複雜的一個問題，就是怎樣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常聽到一些反映，只用原來的辦法進行教育，效果往往不顯著，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這方面想得較多，但是並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同時，我還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夠的，要在人們思想上解決社會主義優越，還是資本主義優越的問題，鏟根結底，還得靠人們從自己的實踐中切實感受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就必須把我們的改革搞好，把適合我們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很好地發展起來。1987年4月以後，小平同志多次講過這樣意思的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長期鬥爭，也是一個長期的教育過程，不能搞運動，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以實踐去說服那些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我非常贊成小平同志的這些觀點。

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互相影響。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須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越來越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當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進行下去，而且會產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我原來曾想，只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人們的生活水準得到提高，人民就會滿意，社會就會安定。但後來發現，情況不完全是這樣。人民

的生活水準、文化水準提高以後，政治參與意識、民主意識都會增強。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與法制建設跟不上，社會仍然不安定。去年12月我在軍隊的會議上說過，許多國家的情況都說明經濟的發展常常並不能自動地帶來人們的滿足、滿意和社會的安定。我覺得，這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必須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思想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建設必須跟上。在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當然國際上確有一股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他們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權的旗號，應當注意到這中間的複雜情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許多社會問題完全用原來的辦法很難解決了。在我國，堅持共產黨領導，不搞西方多黨制，這條基本原則絲毫不能動搖。但一黨領導必須能夠解決民主的問題，能夠解決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消極的、不健康的，以至某些腐敗現象的有監督的問題，一黨領導才能增強生命力。因此我想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的問題。例如，要加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發揮人民的作用，加強與改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完善並改進選舉制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用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規範言論自由，允許經過合法申請和批准的遊行，等等。總之，要使人民切實感受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夠享受到真實而切實的民主和自由。這樣，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增強對人民的吸引力、凝聚力，它的優越性才能更加顯示出來。因此，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必須適應在民主和法制的條件下進行工作和生活，實行民主，意見紛紜，表面上是有些「亂」。但是，有了在民主法制範圍內的正常的小「麻煩」，就可以避免大亂。國家才能長久安。這中間還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就是要把正當的民主要求與行使正當的民主權利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區別開來。我們不允許打着民主的旗號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我們在反對資產階級自

化的時候也不妨發揚民主。這就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劃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終這也要在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把兩者很好地統一起來。今後，黨的領導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現在積極領導人民進行民主和法制建設上，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真正的法治國家。而且，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得，我們黨早要走上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因為我看到，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社會矛盾相當尖銳，黨的地位已經大為削弱的時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難控制。我想，我們應當在黨的領導地位相對鞏固的時候，主動地去搞民主建設。這樣就可以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發展一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當然即使這樣做，在民主和法治建設過程中，仍然會有一些痛苦、磨擦，甚至震盪，但這絕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發生危機，在我們黨經過一番自我調整、自我完善，更加適應新時代要求以後，將會以嶄新的面貌，朝氣蓬勃地率領全國人民前進。我主觀上認為，這是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著想。多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我是積極的，大膽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謹慎態度。我也曾自稱是「經濟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來，我思想上有了變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各種矛盾也會日趨尖銳。我的這個想法，影響著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觀察和處理。我覺得，在今天黨的會議上，我應該講明這些心裏話，向同志們交心。很可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希望同志們批評幫助！

五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撤銷我的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責，我有保留意見。

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

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

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四月二十三日到底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校繼續紛紛復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這至少可以說明，我那次講話並沒有引起學潮升級。五月十九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因為我請病假沒能參加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以後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動？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黨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作分裂黨的。

領導人之間，在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麼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那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如李鵬同志報告中指責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責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具體措詞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把我因病請假而未能出席五月十九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

另外，把一些單位說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團」，因此這些單位有人上街遊行演說，似乎與我有什麼關係。我要說明，並不

存在什麼「智囊」和「智囊團」的事。我在國務院工作時，有時就一些經濟理論問題找人座談。參加座談的人常常來自許多單位，有時也有這些單位的人。此外我和這些單位並沒有其他什麼聯繫。這些單位更不直接歸我來管，他們有自己的隸屬關係。把他們說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實，也會不必要地使這些單位背上包袱。

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的處理意見進行申辯的權利，《黨章》第一章第四條中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作出鑒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我今天就著重對這兩個指責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2

1991年10月9日

一、兩個奇特的現象

這次見面握手後，趙紫陽首先說：我經過這段時間的思考，發覺有兩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未能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開花結果；卻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根了。他說：目前，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社會主義成分比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還多。

聽了趙紫陽的這個判斷，我講述了原人民日報總編輯、全國人常委會胡績偉^①從美國訪問回來寫的考察記，內稱：在社會福利方面美國對殘疾人、老年人的關懷和服務，都是令人羨慕的。……全國有街道、商店、公園、車站等公共場所，都有輪椅通道，國家真是得花錢……對於老年人的照顧比殘疾人還要好；在公共場所，只要收費的，老人自然受到優待，只要在買票時說明即可，不必檢查身分證……好些社區的老人中心，還備有幾乎等於免費的午餐，七十六歲的作家戈揚^②就經常到那裏去吃五角錢一頓的午餐。考察記還介紹說：美國人一半以上是信教的，主要是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這裏的教會，提倡人們注意道德品行修養，作一個高尚文明的人、棄惡行善的人、扶貧救弱的人、樂善好施的人、熱心公益事業和各種社會福利業的人；教會設置的福利站、醫院、體育和文娛活動場所，遍佈全城市，頗受人們的歡迎；教會福利站還熱心扶助中、小學，勸導人把多餘的衣物捐給福利站，福利站又為此專門辦了廉價商店，賣了錢再捐給中、小學校，教會學校還辦義務演出，是專門資助外國留學的。

^① 胡績偉（1916—），四川人。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全國人大常委。

^② 戈揚（1916—），女，曾任《新觀察》雜誌主編，1989年流亡英國。

我又說：就是在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如瑞典、挪威、芬蘭等也都在實行上述這些政策，尤其是一些福利措施，使人人生活得到滿足，認為生活「趨同」了；人們都在共同享受現代文明的幸福。參觀回來的人說：「人家那裏的社會主義成分比咱們這裏多」。

在此，我之所以作以上敘述，是要說明趙紫陽的這個觀察是符合事實的。同時也可說明，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條件下產生的這一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正確性。另一方面，我認為現實的社會主義所以受挫、失敗，是因為違背了社會發展的規律；不是在充分發展生產力的條件下，來發展社會主義因素。

趙紫陽接著說：現實的社會主義試驗是失敗了，但馬克思的光輝思想是無與倫比的，至今社會中的許多問題的發展、變化，仍遵循他設想的原則，而我們過去實踐的社會主義乃是畸型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是不符合的。如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社會設想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並不是建立一個專制政體。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提出：「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趙紫陽又說：如對土地實行國有化問題，列寧^③開始也是不同意的；如對政治體制與黨的組織原則實行民主政治還是集中政治也是有不同意見的；在斯大林^④時期，對農村實行集體化更是有嚴重分歧的，首先布哈林^⑤主張：要通過市場的辦法進行集體化，反對斯大林通過強迫的辦法，對農民實行剝奪的辦法。斯大林還採取驅逐富農到少數民族地區的办法來實行集體化，對生產力破壞極大，結果死了很多人。凡是持不同意見，斯大林就以「右傾機會

^③ 列寧（1870—1924），蘇共（布爾什維克）和蘇聯創始人。

^④ 斯大林（1879—1953），前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⑤ 布哈林（1888—1938）蘇聯理論家、經濟學家，曾任蘇共政治局委員、真理報主編。1938年大清洗運動中，被處決，1988年恢復名譽。

主義分子」、「反對派」、「間諜」、「人民的敵人」的罪名予以處決，亂殺人造成千百萬人的冤假錯案。斯大林採取高壓的辦法來推行社會主義，教訓是慘重的，代價太高，失掉人心。所以戈爾巴喬夫說：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是「痛苦的教訓」，葉利欽^①則認為是「一場災難」，就是在中國也是如此。毛主席^②為了進行農業社會主義理想的實驗，發動大躍進，推行人民公社，也死了一些人。

我說：「彭德懷^③由於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不同意見，正確地、實事求是地給主席寫了一封信，反映了一些實際情況，卻惹出了大禍。把彭德懷寄給毛主席個人的信批為意見書，繼而又把意見書上升為向黨的總路線進攻的有計畫、有組織、有目的的綱領。隨後，又「違反實事求是的原則清算歷史，新老賬一齊算」，說彭德懷一貫是反毛主席的，企圖陰謀篡黨。這樣，又提到反黨反社會主義上來了，由於彭德懷出訪過蘇聯、東歐，有人曾借此又說彭裏通外國，最後又提到了和國際反動勢力遙相呼應，搞大合唱。」

趙紫陽這時就此插了一句話：「毛主席的錯誤，毛主席自己說才行，別人說就不行。」

趙紫陽又接著說：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在發達國家，而都是在發展中國家發生，主要是由於這些國家社會矛盾集中而又突出，無論中國和俄國等國均如此。而共產黨挺身而出、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依靠嚴密的組織與非凡的勇氣和靈活的戰略戰術取得了革命勝利，奪取了政權；奪取政權以及以後為鞏固政權，都需要採取高度的集權和集中，否則，在那嚴峻的政治鬥爭形勢下，既不能取得政權，也不能維持政權。所以，在這種條件下這種高度的集權和集中，也是歷史的必然。

① 葉利欽（1931—），曾任蘇共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長，1991—1999年任俄羅斯聯邦總統。

② 毛澤東（1893—1976），湖南人。1943—1976任中共中央主席，1949—1959任國家主席。

③ 彭德懷（1898—1974），湖南人，中共元帥，曾任國防部長，中共政治局委員。1959年被毛澤東定為反黨份子，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恢復名譽。

趙紫陽接著又說：無論在蘇聯或中國，過去在長期執政中，實行的封閉極權統治比國民黨還厲害，可以說，人民什麼自由都沒有。過去由於社會矛盾突出，在革命時期人民還可接受，但在和平時期，再採取高壓的政策，人民是不會接受的，也不應當。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定了一個模式（意指計畫經濟、公有制、專政體制），固定死了，且成了禁區，而資本主義國家始終是在競爭中自我調節，不斷更新發展，使資本主義國家不但日益現代化，而且又包含有許多社會主義成分，比社會主義國家還多。

但他又說：在發展中國家由於社會矛盾多，沒有一定的集中，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沒有強有力的權威來領導，難以進行社會改革；在這些國家不宜實行多黨制，否則會造成混亂，改革也難以推行。

他又舉例說：如日本、新加坡、台灣、香港（當然，香港是港督，代表英國女王統治）等開始是在一黨制領導下，經濟的發展也是有成效的。實行一黨制，但要給人民以權力，實行言論、結社、出版自由，實行監督，保障人權。他說：人權和民主是兩回事，香港是殖民地，不實行民主選舉，但給人民以自由，可以批評政府和任何人。

他說：只有形成了所謂中產階級。有了大批企業家，有了大量的經營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和各類專家，這樣，才可以穩定，才能實行多黨制，否則，兩極對立的社會是穩定不了的。我說：有些發展中國家如南非，不是也在實行多黨制，經濟也在發展嗎？

他說：發達國家各階級是經過了彼此多次的廝殺，搞你死我活的鬥爭。但為了不同歸於盡，經過這個痛苦的階段後，彼此開始妥協，才實行了多黨制。

他說：蘇聯「十月革命」後形成的斯大林模式乃是東方亞細亞方式（即封建專制統治）的復辟。〔我認為，這是他對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實踐所作的一個本質總結。〕

他說：蘇聯帝國很難規避瓦解，如同一次世界大戰奧匈帝國的瓦解和二次世界大戰各帝國主義殖民地的瓦解一樣。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原是根據蘇聯和希特勒德國的秘密協

定被蘇聯吞併的，東歐諸國政權也是蘇聯出兵強加的。不過，俄羅斯這個民族卻是有作為的民族。

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趙紫陽說：市場和所有制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只搞市場不行，還得解決所有制關係。不改變所有制，市場競爭難以形成。西方國家的國有經濟有的所以能辦好，是因為有個市場競爭與私人經濟的對立，就是說，有個面對市場、面對私人經濟爭生存的動力機制。中國的國有經濟就不是這樣，只能負盈不能負虧；所以對國有制企業非動大手術不可。

他說：長期來堅持社會主義的標誌是公有制，且成為不得存疑的禁區。這個框框不突破，改革是沒有出路的。就是搞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股份制，同樣也不行；這同公有制沒有大的差別，如果實行股份制，也必須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私人經濟才行。除少數基礎企業、公用事業，都應該讓給民營。

他說：只有改變國有制，政府才能不干預企業，才能政企分開，才能避免權錢交易，才能解決腐敗問題；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企業才能成為市場的主體。所以，改變所有制是根本的。所有制未改變，在國營企業還處在壟斷地位的情況下，如果完全放開價格，只能損害消費者，而且也是危險的。目前改革深入不下去，改革的難度就在所有制問題上。

在此趙紫陽感慨地說到：他自己思想上未解決的幾個問題：

一是，又要改革，又要保持禁區，難呀！

一是，又要提高經濟效益，發揮積極性，又要保持就業搞穩定，難呀！

一是，在「老人政治」控制下，要尊老，又要改變老人舊的政治思維模式，難呀！

趙紫陽又說：黨的干預控制不改變，進行改革確實難。但如果沒有凝聚力也難。他說：在中國，我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都說

不行，引起各省委書記的反對，阻力很大，只能提「加強改善黨的領導」。在蘇聯，戈爾巴喬夫是採取黨靠邊站的辦法，就是在總統下設一個委員會並採取選舉的辦法直接領導改革。

他說：蘇聯在改革上，一個是赫魯曉夫^①突破了斯大林的個人迷信；一個是葉利欽突破了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葉利欽是個人物，但也有兩種可能性。趙認為改革是有一定風險的。戈爾巴喬夫老搞平衡，不敢承擔責任，這是不行的。

我理解趙在這裏提出葉利欽有兩個前途，一是改革成功，二是蘇聯保守勢力大，有復辟的可能，從而導致改革失敗。我認為：在這裏趙紫陽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其意義是重大的。如果說1942年延安整風毛澤東提出：改造我們的學習，是針對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以斯大林為代表的共產國際教條主義為背景的話，那麼，這次趙紫陽提出要「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針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黨的領導制度的自我更新。這從吳國光^②著《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的內容即可說明。在戈爾巴喬夫回憶同趙紫陽會面的文章中說，趙紫陽曾向他提問：「一黨政體能不能行得通？（即一黨制能不能保證民主的發揚？在一黨制條件下能不能對負面現象進行有效監督？能不能同黨政機關裏的營私舞弊現象進行鬥爭？）這段話也可說明趙紫陽要進行政治改革的前瞻思想。

接下來，趙紫陽又談到現在世界經濟走向一體化，跨國公司的發展，將使人們對國家主權概念，甚至民族觀念產生變化。

隨即我談了這幾年經過自己觀察思考而形成的幾點看法：不管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只要能增加人類社會財富就是好主義；不管這制度那制度，只要能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就是好制度；不管這種意識形態那種意識形態，只要能促進人類社會進步，就是有意義的。

^① 赫魯曉夫（1894—1971），1953—1964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958—1964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② 吳國光（1957—），1986年任中共中央政研室研究員，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講座教授，1997年7月出版《趙紫陽與政治改革》。

意識形態。這就是要擺脫舊的意識形態的束縛。他問我：你這個觀念是怎樣變化的？

我說：在全球市場化、世界經濟一體化、特別是走向資訊化的今天，已經是國內市場國際化，國際市場國內化了；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是處在新的經濟革命時期；自由、民主、科學、法治已成為人類進步的普世規律；人類社會的發展已超出國家的民族的與地域的界限；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現，生態環境的破壞，人類生存的利益已提到第一位；需要有全球意識，不能再有「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鬥爭。

他又問我：你這個新觀念又是怎樣變化來的？

我說：現在世界上各地區、各民族，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是走向大融合時期，人類社會的新紀元要到來，不應再以什麼主義為終極目標，因為人類社會始終在運動著，發展前進著，和其他事物一樣是無止境的，一切都在變化著，哪有終極目的呢？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在自我揚棄和發展變化；過去正是設計了一個終極目的，又上升為意識形態，而不擇手段地去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才導致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多次大災難。

我說：我過去可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從少年起就追求建立一個理想的新社會，也有為這個理想而奮鬥終身的人生觀，即使犧牲都在所不惜；但現實的社會使我不滿現狀，我開始反思，尤其「六四」事件對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鎮壓，人民軍隊鎮壓人民，使我感到不可思議。大概由於我也是參加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出身，「六四」鎮壓使我頓然心灰意冷，對理想有所幻滅；再加上新世界潮流的影響和新思潮的出現，又使我眼界擴大，認為現在應該拯救全人類，人類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尤其是我瞭解到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有「趨同」現象，可以有多種途徑走向現代化，實現現代文明，因此我要跳出舊的意識形態的束縛。

最後，我向他建議，希望他也能研究些問題，他一生的經歷是豐富的，要把這些寶貴的材料記錄下來。對此，他回應說：我有消極情

緒，一生為之奮鬥的理想目標也不願改變，這些歷史問題後代都會有人來清理的，因為有志於此的大有人在。再說，我現在既不能看檔案，就連我自己過去的講話，公開的和不開的材料拿來參考一下都不給，又不能約人來進行討論，互相啟發，好多新看法、新觀點是在相互啟發、相互爭論中出現的，所以不好研究。

我說：這確是實際問題。

3

1992年1月12日

一、社會進步新指標的探討

今天見面說了幾句閒話後，趙紫陽首先說：今後對社會進步的指標是否可以生態環境即生活品質，文化水準即人的素質，生活水準即富裕程度，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城鄉差別、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人均收入、社會公平等為指標，不以社會制度如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為界線來作為先進與否的指標。社會類型是否可以劃分為發達的社會、欠發達的社會和發展中的社會，或後工業化的社會、工業化的社會、和欠工業化的社會。今後國家的類型是否以生產力水準來劃分，即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國家，中度發展的國家，與低發展的國家。

他的這個思考很符合我的觀點，我聽了後感觸頗多。這樣，以發展生產力水準為標誌，以如何推動社會進步為指標，來促進人類社會文明發展，來達到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走向共同富裕的目的；這就不再囿於意識形態的主義、制度鬥爭；這有利於把人類社會的發展納入正確的發展軌道，可以把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都納入到走向人類現代文明的潮流。

他的這個思想和觀點，與孔子的要走向「世界大同」的思想；馬克思的要解放全人類的思想；孫中山宣導的「天下為公」的思想；康有為^①《大同書》中某些想法是否也是一脈相承呢？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我說了：我非常贊成、非常欣賞你的這個提法。

趙紫陽接著說：現代社會的發展，越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影響就越小，這些國家的人民越不願意起來鬧革命推翻這個社

^① 康有為（1858—1927），廣東人。清末思想家，維新運動領袖，戊戌變法失敗後成為保皇派。

1992年1月12日

會制度。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是很大的，在今後十年內變化將會更大，資本主義將來究竟是什麼樣子，確實看不清，他的看法是「研究跟不上變化快」。

我說：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實現形式發生了變化，由於股份制的出現，「私人資本」變成了「社會資本」的形態，股份的所有者，已不再僅僅是個人，而主要是各大公司和各種基金會組織，即變為社會管理了。由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二次分配和國家干預，為工人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並實行失業、醫療和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盡可能滿足工人的物質利益；對學齡兒童實行免費教育，對多子女家庭和老人也有照顧。這些國家人民確實被這些福利措施征服了，生活比較得到了滿足，他們認為人們的生活「趨同」了，都在共同享受現代化文明、社會的幸福和工業繁榮的好處；那裏的人民認為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一致了，形成了「共同體」，都願依附這個社會有機體，願意維護並支持這個社會制度。有人說，工人被「同化」了；看來號召起來革命，打碎這個國家機器是困難的。

我又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也變化了，由於實行「反壟斷法」，「公平競爭法」、「扶植中小企業」的發展，特別是科技的進步，機器人的採用，電腦的出現，資訊時代的到來，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使知識者階層、經營者階層、服務性職工大大發展起來，擴大起來，組合成為強大的中間階層，成為社會的中堅；而資本家和無產者隊伍的人數相對地在縮小；所謂白領工人在增加、藍領工人在不斷地減少；這是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現象。

趙紫陽插話說：資本主義的這些變化，是馬克思列寧都沒有預見到的，同樣，馬克思^②沒有預見到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可走向現代文明，他只設想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這一條途徑進入現代文明。趙紫

^② 馬克思（1818—1883），德國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

陽又說：但我們不能過多地責備前人。一個人再偉大，也不能不受所處時代的限制。馬克思的觀點，確有烏托邦成分，如取消貨幣，沒有商品，那麼如何推動社會進步呢？而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確又與列寧對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分析不一樣，即使是當時人們對列寧的分析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趙紫陽認為馬克思對資本原始積累的野蠻性的分析，還是正確的。他強調說，中國如果實行私有化，也必然出現原始積累，這是人民很難接受的。

在談到社會主義制度時，趙紫陽說：社會主義理想是好的，但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卻不成功；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無例外地走到了反面，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統治人民，違背了馬克思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究竟社會主義理想通過什麼途徑來實現，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趙紫陽認為：社會主義理想與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一回事，與社會主義道路也不是一回事。

我說：根據這個區分，我認為社會主義理想是美好的，但過去實行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而現實的社會主義模式、制度又是失敗的。

談到社會主義體制改革時，趙紫陽說：在改革問題上蘇聯和中國走的道路是不同的（指中國是從體制外開始，蘇聯是在體制內開始）。他說關於社會主義的改革既不能回到原來的體制上去，也不能是資本主義的，今後可能是「後社會主義」即「混合經濟」的社會類型，但模式將是多式多樣，如同現在的資本主義國家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不同發展形式，有的是社會黨、社民黨執政，有的是其他黨派執政或聯合執政，如這次蘇聯也不排除葉利欽不成功，共產黨再執政，但共產黨仍按老一套模式去執政已不可能了；同時，統一的蘇聯共產黨的再建也已不可能了。

在談到蘇聯瓦解時，趙紫陽說：蘇聯所以被瓦解主要是民族分裂主義，這是戈爾巴喬夫所沒有預料到的。這些民族主義情緒利用「公開性」、「民主性」抬起頭來；而戈爾巴喬夫卻沒有採取先承認波羅的海三國，再鎮住其他共和國不准搞獨立。既想要搞統一，卻以調和

態度搞「主權國家聯盟」，這是不行的，也是辦不到的。

趙紫陽強調說：目前的獨聯體比主權國家聯盟好。對於蘇聯的瓦解，美國布熱津斯基著①的《大失敗》一書也早有預見，作過論述。但戈爾巴喬夫卻成功地解決了黨的控制制度，所謂障礙機制問題，他採取讓黨靠邊站，即總統下設委員會，直接領導改革與選舉的辦法，但他卻沒有解決好新的一套控制辦法，結果引起混亂，但蘇聯未發生內戰，雖然物價放開、物價暴漲引起不滿，也沒有發生大的震盪，這說明蘇聯人民的素質是好的。

趙紫陽認為：俄羅斯今後仍然會成為超級大國，一是資源豐富，地域遼闊；二是扔掉了意識形態和軍備競賽的包袱；三是人民素質高，有民族精神，所謂「俄羅斯是不可戰勝的」這種民族自豪感。但俄羅斯還會有餘震，民族糾紛、內部矛盾還會繼續發生。

二、鄧小平的特殊作用

趙紫陽說：中國的改革由於存在鄧小平的特殊作用，使得既堅持黨的控制，即所謂黨的領導不准動搖；又堅持改革開放，從而使改革開放走到了目前這個地步。但在中國，改革的阻力是非常之大的。我只是提出要改造政治思想工作，黨內輿論就大嘩，得罪了省與企業的好多黨委書記這些既得利益者。如果是鄧先走〔去世〕，剩下的一些老人對改革再進行反復，完全是可能的。但他們將不是以反改革的名義，而是以「反對和平演變」，借反腐敗的名義；提出「腐敗是由改革造成的」來打擊改革派。

我對趙說：舊的正統意識形態是根深蒂固的，束縛著人們的思想；舊的體制在嚴密控制人的生活行為；歷次的政治運動又整得人們不敢越雷池一步，心有餘悸；如沒有鄧小平的權威，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很難想像的。我又說：鄧小平這條路線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里程碑意義的。如果說毛主席的路線使革命取得了勝利，建立了新中國，但沒有解決

① 布熱津斯基（Z. Brzezinski 1928—），波蘭裔美國學者，卡特政府國家安全顧問，《大失敗》（又譯《大失控與大混亂》）中文版1994年出版。

貧困問題；而鄧小平的這條路線，使中國人民走向富裕，有了希望。當然他的改革開放政策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矛盾的。

此外，在談到中國革命接班人的問題時，趙紫陽說：這個問題始終未得到解決，所謂領導核心、新的領導核心，只能在鬥爭中、在風浪中形成，才能解決，靠人為地封授、自封是不行的。目前所提第三代領導核心是不確切的，乃是過渡期，只要老人在，還都是老人執政。趙紫陽舉例說：自己雖是總書記，只不過是秘書長，即使一個老人走了〔去世〕，其他老人在，還是老人在掌握，就是老人下台了也照樣。這是由中國的歷史條件決定的。不管如何強調集體領導，總得有一個起主導作用的、說話算數的，也是實際所要求的。

在談到社會上的腐敗問題時，趙紫陽說：這是制度的產物。目前中國一半是市場經濟，一半是計畫體制，必然產生腐敗官倒；政府管得越多，腐敗就越厲害，經濟效益也越低。同樣，黨的領導控制也是由制度所決定。黨的領導控制愈多，黨政就愈難以分開；黨政愈不分，民主法治就愈建立不起來。

在談到大中型企業時，趙紫陽說：對大中型企業不從根本上開刀〔意指所有制關係〕是不行的。中外合資是個辦法，股份制也是個辦法。既然允許外國人合資，為什麼不可以允許中國私人資本加入呢。對大中型企業只改變經營機制不行，要動大手術。這就需要安排就業人員，就會增加社會負擔。如果為了穩定，不敢動，怕擔風險，怕引起社會振盪，那就難辦，而且會貽誤時機。

談到「六四」問題時，我說：當局在淡化，社論寫法有讓步。

趙紫陽說：當時，鄧只要能說句話，如：「看來，實際情況並不像北京市委報告的那樣嚴重。」只要有鄧這一句話，我就可以解決問題。因為學生後來已疲憊不堪，要求有個台階下，主要是怕以後算賬。趙紫陽又說：現在對我是不殺不放；怕我自由了，擴大了影響，對當政者不利；「十四大」也未必給解決；世界上有個首腦基金會，是退下來的各國首腦組織的，曾邀請我去參加，我也沒有表態。

當我談到有些老同志希望你寫下東西，或錄下音來，然後叫別人整理出時，趙說：至於寫作，牽動大，沒有人來交鋒，也無法搞研究。

最後，涉及三峽工程時，我說：很明顯，有不同的兩種意見，而且堅持主張不上的人數不少，李銳^①就是個代表。毛澤東在世時，他也是這樣堅持的。趙紫陽說：如果我在台上，是要留給後人去處理的，因為涉及好多未知因素，難以預料。

這次談話就此結束。

飯後，趙紫陽寫了個便條，介紹我去杜潤生^②那裏溝通交流一下情況。過去他對此事是不同意的，大概是因他正處在被審查之中，怕出現麻煩。杜潤生是人們公認的經濟理論權威。他原是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負責人，對農村的改革發展立有汗馬功勞。遵照趙紫陽的意見，不久，我去拜訪了杜潤生。他說：對趙紫陽的問題立案審查的結果，專案小組只聲稱沒「新問題」而結束了。所有材料都奉連不上定性為「支持動亂」、「分裂黨」；對趙的處理，看來是根據政治需要來定了。既放不得，也反不得，又殺不得。尤其是反趙反不得，上下已取得共識。杜又說：趙紫陽到中央工作八年來，思想變化很大，真是個人才，並歎息地對我說：「太可惜了」！

杜潤生認為目前中國的改革、經濟的發展，是在反復曲折中，在被動狀態下進行的，是下邊推動著上邊。以穩定為出發點，就不可能有大的作為。計畫經濟這一套不行了，市場經濟這一套又不大力搞，怎麼能行！公有制這個模式是不行，國有企業逐步被挖空，出現所謂「空殼現象」，這只能是培養特權階層。國外蘇東國家在搞私有化。

杜潤生說：在蘇聯，改革這條路沒走通，乾脆原來的一套都不要了，完全按西方的那一套來辦；不談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只要能發展

① 李銳（1917—），湖南人，曾任毛澤東秘書、水電總局局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② 杜潤生（1913—），山西人，中共農業問題專家，曾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經濟就行，這樣，就擺脫了意識形態的包袱，又扔掉了軍備競賽的包袱；以後可能會發展得更快。在中國，目前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中國內部面臨國有企業的虧損，今後社會主義的發展也可能出現幾種類型，如同資本主義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型、政府主導型等。

關於民主問題，杜說：這是個實踐問題，需要在實踐中來逐步培養提高人們的民主意識、民主習慣；不能強調國情，不能搞國民黨的那種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來訓教人們。^①

西方搞多黨政治實行競爭、互相監督，能推動社會進步，可以達到對選民負責。杜最後頗有感歎地說：我們這一套制度，公有制培養特權腐敗，領導層官僚化。群眾被捆著，還殘留人身依附。這怎能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必須改革。

4

1992年4月12日

一、落後國家革命勝利後不能實行社會主義

今天趙紫陽首先說：在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搞革命，只能由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來領導，這類型國家資產階級軟弱，不能勝任，俄國和中國即可說明這個問題。這就保證了革命勝利後，能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但這些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由於經濟、文化條件的制約，不能夠實行社會主義，只能進行社會主義的準備，或者叫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即準備階段，也可稱為新民主主義階段。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所闡述的：中國不是多了一個資本主義，而是多了一個帝國主義、一個官僚資本主義、一個封建主義；也就是說必須發展商品、市場經濟，而商品、市場經濟的發展又是個漫長的階段。

而如何建立社會主義，怎樣才能進入社會主義？趙紫陽作了這樣的提問。他接著說：這是一個漫長的漸進的自然的演變過程。過去我們人為地先制訂一個模式，去發揮主觀能动性，按主觀意志的框框去做的作法，只能使社會主義變形，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社會主義。說到這裏他隨即起身在書櫃上拿出一本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①，給我讀了一段：

「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恩格斯也指出：「對實行社會佔有一切生產資料」，這種佔有在

^① 作者注：趙紫陽提出訓政時期，來啟發民智有道理。

^① 馬克思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所作序言，1859年發表，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之一。

實現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

趙紫陽接著說：過去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完全違背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不是根據經濟的發展、生產力的水準，而是依靠發動群眾，用政治鬥爭手段來推進社會主義，這就必然強調意識形態鬥爭，大力開展階級鬥爭，實行領袖獨裁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嚴格的組織紀律，採取高壓的手段甚至鎮壓的辦法，其嚴重後果是，變成畸型的社會主義，成為人民的對立面。

我說：採用這種高壓的辦法來推進社會主義，代價是昂貴的，也是歷史的悲劇。由於有不同意見，在蘇聯被斯大林以「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派」、「間諜」、「人民的公敵」這些罪名處死，造成千百萬人的冤假錯案。

我又說：在中國因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也有千百萬人，乃至彭德懷、劉少奇也因此而被迫害致死了。

我還說：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後，我曾去家鄉作過瞭解。那時土地入大隊，人人吃大鍋飯，鍋裏全是稀米湯、白菜湯；人餓得都走不動路，下地幹活懶洋洋，大都躺在地上根本不幹活，又都不積肥，草比苗還高。老百姓說，如再不實行新辦法〔指分田到戶〕，再過兩年，人都得餓死。再加上那時候市場封閉，求生無路，城市沒有戶口進城討飯也無門，只能在家活活餓死，真是人間慘劇。那幾年全國究竟餓死多少人，誰也說不清。總之，人民公社所帶來的災難，所造成的貧困和對生產力的破壞，實在令人可怕。而毛澤東卻自認為，他自己在中國找到了工、農、兵、商、學一體化的，亦工亦農、又文又武的人民公社，是通往共產主義的大道，是一個偉大創造。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在中國解決了。於是毅然決然地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進行試驗，以實現他的農業社會主義理想。

最後，我非常感歎地說：對人民採取這樣專政高壓實為迫害的辦法，簡直是犯罪，不是人民背叛了社會主義，而是獨裁者領導的現實

的社會主義背叛了人民。這樣的社會主義自然要瓦解。

趙紫陽繼續說：「急於求成」這是革命者的通病。馬克思預測革命將在歐洲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馬克思首先把目標矚目於英國，後又把目標轉向法國。因為法國1848年爆發了革命，1871年巴黎工人又舉行起義，但法國巴黎公社只存在七十二天，就被鎮壓下去了。此後，馬克思、恩格斯又把注意力集中於德國，後又轉向意大利。但他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在此，趙紫陽引證了恩格斯^①的一段話。恩格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曾自省說：歷史表明我們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並分析說：「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情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方式的程度，資本主義還具有很大的擴張能力，而工人階級自身還沒有成熟到足以實現社會改造，並進行政治統治的程度。」

趙紫陽說：即使在「十月革命」後，列寧也是寄希望於歐洲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認為資本主義已進入了垂死的階段。斯大林更認為資本主義已進入總危機即總崩潰的時期。他領導共產國際號召要向世界革命進軍，命令各國共產黨都要服從這一路線，凡不按這個意志行動的，被認為是「修正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叛徒，並採取打擊社會民主黨和一些中間勢力的政策。當然，為了應付戰爭，蘇聯在當時資本主義包圍、十四個帝國主義干涉的嚴峻鬥爭形勢下，只能採取高度集中的一體化的體制，用專政的手段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趙紫陽又繼續說：毫無疑問，人類社會始終要向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而社會主義的理想原則也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要求的；社會主義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但要逐漸地代替，這只能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生產力的水準來決定，而不能依照幻想的模式來人為地強制地推行。他說：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股份制的出現，就是資本主義所有

^① 恩格斯（1820—1895），德國學者，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

制的變化，而中間階層的出現，資本家和無產者隊伍的相對縮小，白領工人在增加，藍領工人在減少，就是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變化。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二次分配和國家干預，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強制執行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事業，就是資本主義國家職能的變化；即使在政治上，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向民主化發展。這說明，資本主義在發生演變，而且是在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談到這裏，趙紫陽舉例說：為了適應新的技術革命，現代資本主義又有新的變化，如採用輪流制，就是十幾個人在一台設備上輪流裝配汽車，這就消除了領導人員與工人之間的界線、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界線。他非常稱讚千家駒^①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在發生演變，社會主義也要演變（意指實行市場經濟），演變就是進步，因此，不能反對和平演變。

趙紫陽最後說：東歐、蘇聯社會主義的瓦解，是斯大林模式的失敗，導致公有制的崩潰。過去我國也是超越階段，公有化走「過了頭」，改革就是把「過」了頭的地方糾正過來。這樣，從思想上明確起來，認識統一了，改革的阻力就會小些，改革的進程也就可能順利些。

二、對鄧南巡講話^②的一些看法

談到鄧的這次南巡講話時，趙紫陽先讓我談談自己的看法。我說這是不得已，是改革出現了曲折，改革形勢發生了逆轉。「六四」後，姚依林^③在國務院一次會議上聲稱：要跳出兩個圈子，一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設計的改革圈子；一是趙紫陽的改革圈子。當時人們就議論：難道趙紫陽執行的不是鄧小平設計的改革路線嗎？胡喬木^④發

表論文說：「改革開放以來，兩個總書記都犯了錯誤」，這就是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路線有問題。鄧力群^⑤聲言「要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點了趙紫陽的名。他們宣稱：「天安門事件」就是一場階級鬥爭，中國社會已是兩極分化，產生了階級，要搞階級鬥爭，天安門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是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結果。江澤民^⑥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提出要大力反和平演變，這就是要恢復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鬥爭。江澤民強調有兩種改革觀，說在改革問題上首先要問姓「資」姓「社」，這就是要把改革捆住手腳，使其不敢邁步。

我又說：「六四」風波之後，又「將當時經過理論界論證了的，黨的十三大正式通過的關於「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化取向的指導方針，改回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就是要使國家繼續納入到計劃經濟的軌道上去。姚依林說：實行市場經濟，地方要分權，中央不能集中統一領導，也難以實現黨的領導；提出改革差不多了，現在要治「亂」治「散」。這就是要向地方收權，向企業收權，實行集中領導；在經濟政策上他們強調集體經濟，要削弱個體經濟；喧嚷什麼個體瓦解了集體，鄉鎮企業瓦解了國營企業。江澤民提出對違法的個體戶，要整得他們傾家蕩產。在幹部問題上更是以「六四」劃線，整頓各級領導班子。

這樣中國的改革開放顯然要出現倒退逆轉的局面。這種逆轉的情況，就是在今年召開的體改委研究會上也表現出來了，如廣東省經濟學家王琢^⑦就提出強調階級鬥爭，當受到會議阻止時，曾很不服氣地對我說：現在有沒有階級鬥爭？我說：還存在著階級鬥爭，但正如四川社會科學院林凌^⑧所說，目前在大會上提出來，不利於研究問題，不利於各種觀點的爭鳴。我又繼續說：我的看法是中國的政局，顯然

① 家駒（1909—2001），浙江人，經濟學家曾任社科院顧問，政協常委，民盟副主席。

② 鄧小平辭去所有職務後，1992年春，考察中國南方，發表一系列講話，批評懷疑改革開放的保守論調，由此形成「鄧小平理論」。

③ 姚依林（1917—1994），安徽人。曾任商業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政治局常委。

④ 胡喬木（1912—1992），江蘇人，中共理論家，曾任毛澤東秘書、社科院院長、新華社社長。

⑤ 鄧力群（1915—），湖南人，中共宣傳家，曾任社科院副院長、中宣部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2006年出版回憶錄《十二個春秋》。

⑥ 江澤民（1926—），江蘇人，1989—2002年任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⑦ 王琢，經濟學者，著有《中國經濟模式論》等書。

⑧ 林凌，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區域經濟論叢》主編。

是由陳雲①、李鵬②、姚依林在掌握，江澤民是在順著這個形勢走，鄧的講話不一定聽進去。鄧為了挽救這個局面，再加上外部東南亞四小龍經濟增長的壓力，不得不挺身而出作了南巡講話。

在談到南巡講話內容時，我在國家體改委聽到傳言：鄧批評了姚依林，鄧說你那一套不行，鄧還聲言十三大趙紫陽的政治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鄧在武漢接見當地軍政領導人時說，給北京捎個信，誰不搞改革，誰下台。鄧在南方又指出，1984年—1988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好的，肯定那五年間「我國財富有了巨額的增加，整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台階」，「那五年間的加速發展，趙紫陽功勞不小，這是我的評價」。鄧還說：導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不能把原因簡單地歸為外部的和平演變，或出了什麼個別的人物，有些理論家、政治家卻借此引出教訓，認為當前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矛盾比任何時候都更「鮮明」、「激烈」、「尖銳」，企圖把「反和平演變」提到最突出的地位，取代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這不僅僅是對基本路線的干擾，而是要改變這條路線了。如果一味熱衷於糾纏姓「資」姓「社」，結果只能把富裕、民主、自由這些好東西送給資本主義，使社會主義只剩下貧窮、落後、愚昧。

我向趙說：近一段時間人們在傳說，鄧對中央領導班子有第二道防線的考慮，對現在的領導班子將會有個說法了，對趙紫陽的復出也議論起來；並論證說：毛主席當年曾讓鄧小平幾上幾下，鄧小平為什麼不可對趙紫陽也這樣呢？

趙紫陽說：鄧的南巡講話是一個宣言書，同時也是為了最後改變一下自己在「六四」事件後的形象。至於領導班子問題，鄧是無力解決了。所謂「第二道防線」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問題不能一個人

說了算，一定要經過醞釀；如果外傳出去，那就亂套啦。

對目前的領導班子，趙紫陽也聲言不知誰是改革派。他分析說：目前李鵬是實力派，江實際上是聽李的。因為他剛來北京，是按李的意見辦事。而喬石和李是有矛盾的，但喬還是有見解的，而他有些圓滑不敢擔責任，李瑞環③有點耍小聰明，在天津工作，只是抓了市政建設；在經濟上，尤其是在企業方面沒有搞什麼。至於胡錦濤④大概認為自己資歷淺，有些人云亦云。萬里⑤還是有能力來搞改革的，如果他不擔任人大委員長，而接國家主席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談到這裏，我插話說：原體改委副主任、經濟學家童大林⑥曾對我說：現在中央這個領導班子，看不出誰是改革派，哪一個是搞改革的。

趙接著說：即便今後的改革開放出現困難的情況，鄧也不能像毛主席那樣重新啟用我。一則，鄧定性的「六四」問題，肯定他不會改變；而我自己也不會檢查。在檢討反省問題上，自己的信條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二則，鄧也沒有毛主席那樣的威望，他自己也不能一人作主，還必須同其他老人商量。三則，當年毛主席和鄧小平之間沒有恩恩怨怨的問題，而「六四」問題最後實際上形成了我與鄧小平的對立，再說我與戈爾巴喬夫會見時的講話引起了鄧的猜疑。紫陽頗有感激地說：今後只要求能活動自由。

趙又說：鄧在政治上堅決把住，是不會開放的。香港有人聲稱：在民主問題上不能和鄧小平去爭，只能在經濟改革開放方面來發表自己的見解。這個評論確是很實際的，鄧的這次南巡講話，地方的積極性會高起來，尤其沿海一億多人的地區，可能發展得更快。這樣，和四小龍結合起來，就形成經濟區，五年以後就可能達到高的經濟水準。

① 陳雲（1905—1995），上海人，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顧委主任。

② 李鵬（1928—），四川人，曾任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③ 李瑞環（1934—），天津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

④ 胡錦濤（1942—），安徽人，2002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003年任國家主席，2004年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⑤ 萬里（1916—），山東人，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人大委員長。

⑥ 童大林（1918—），福建人，經濟學家，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體改委副主任、經政研究會副會長。

有人提出了「大中華經濟圈」。總之，將來的發展會是很可觀的。當然這樣西部地區發展會慢些，但是東部發展起來了，就會促進西部的發展，用東部的資金、技術、人才向西部推進，不會像某些人擔心的那樣，一定會造成與內地矛盾的加大。

趙紫陽認為，沿海地區大發展是不可阻擋的趨勢；鄧的南巡講話給地方一個武器來對付中央，來壓中央，如果中央拿不出措施來，就會被動；如果也不反思，就會反到自己頭上來。當然如果經濟發生了膨脹，目標也會轉向鄧，再壓到鄧的頭上。趙說：不管如何，沿海地區今後按市場格局大發展是無疑問的。

談到大中型企業，接著他說：大中型企業不改造是沒有出路的。國有企業只有在有競爭的市場環境下才能有活力，今後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化，也必須使私人佔有一定的股份，至於中小型的國有企業，則要大量地採取轉型轉制的辦法。

在我轉交李銳所著《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①一書時，我談到書中提出毛主席是實行農業社會主義理想這一分析，趙紫陽很是稱讚。對體改委毛民先所寫關於馬克思的一篇論文，有關現實的社會主義並不是馬克思原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論述，趙認為是有價值的，要我予以轉告。

趙紫陽說：所謂改革的理論，就是落後的國家革命勝利後，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家是走「過了頭」，必須退回來。這就是對現有制度要進行改革，使其適應現有的生產力水準，也就是為社會主義作準備條件，或者說只能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趙說：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發展資本主義，來增加社會主義成分，來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也就是毛主席所論述的新民主主義論。這就是改革的理論，對此，毛主席已有精闢的論述，由於毛主席過早地結束了新民主主義階段，超越階段地實行社會主義，欲速則不達，也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這需要從思想上重新理順過來。

所謂超越階段，趙紫陽是指公有化程度太高了。他說：過去的一切做法把人統死了，公社及各單位對一個人什麼都管，什麼都包下來，生、老、病、死，什麼都進行干涉，包括一個人的家庭生活、私人生活等，結果越管越多，越包越重，路也越走越行不通。

趙說：本來，毛主席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模式是不滿意的，尤其是中央集權過多，對地方和企業統得過死、管得過多，壓制了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要進行改革，實行權力下放。但過去由於只是在權力的劃分上來做文章。結果陷入一放就亂，一亂又收，一收又死的怪圈。這種改革沒有行通。後來，毛主席就發動「文化大革命」，徹底打碎

5

1992年7月5日

一、改革的理論與中國改革的特色

這次我先提出問題。我說：據我所接觸的理論界人士認為，中國的改革沒有理論，只是摸著石頭過河。不知你怎樣看法？中國改革的特色是什麼？也請你談一談。

趙紫陽說：所謂改革的理論，就是落後的國家革命勝利後，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家是走「過了頭」，必須退回來。這就是對現有制度要進行改革，使其適應現有的生產力水準，也就是為社會主義作準備條件，或者說只能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趙說：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發展資本主義，來增加社會主義成分，來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也就是毛主席所論述的新民主主義論。這就是改革的理論，對此，毛主席已有精闢的論述，由於毛主席過早地結束了新民主主義階段，超越階段地實行社會主義，欲速則不達，也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這需要從思想上重新理順過來。

所謂超越階段，趙紫陽是指公有化程度太高了。他說：過去的一切做法把人統死了，公社及各單位對一個人什麼都管，什麼都包下來，生、老、病、死，什麼都進行干涉，包括一個人的家庭生活、私人生活等，結果越管越多，越包越重，路也越走越行不通。

趙說：本來，毛主席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模式是不滿意的，尤其是中央集權過多，對地方和企業統得過死、管得過多，壓制了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要進行改革，實行權力下放。但過去由於只是在權力的劃分上來做文章。結果陷入一放就亂，一亂又收，一收又死的怪圈。這種改革沒有行通。後來，毛主席就發動「文化大革命」，徹底打碎

^① 李銳著《毛澤東早年與晚年》，1992年初版，貴州人民出版社。

這個國家的官僚機構；實行工、農、兵、學、商一體化的，亦工亦農，又文又武的人民公社，認為這樣可以恢復馬克思本來意義上的「自由人聯合體」，是通往共產主義的大道。結果又陷入了農業社會主義的烏托邦。

在談到中國改革的特色時，趙紫陽說：就是發展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成分，這一塊首先搞「活」了，這是中國改革的特色。這與蘇聯走的道路不同，他們只是在體制內兜圈子，轉來轉去始終難以「活」起來。

趙紫陽說：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使農民有了經營自主權，這就把公社化的體制衝垮了。同時，也形成了廣闊的農村市場。在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在城市安排待業青年，發展集體企業以及「三資」企業和個體戶，並使它們率先形成市場的生長點，這就把國有企業「一統天下」的局面打破了。另外，對體制內的大中型企業實行價格雙軌制，即計畫外的允許進入市場，使體制外的所有企業可以得到原料、材料，否則，這部分企業是發展不起來的，而體制內的企業也可得到額外利潤，再加上「放權」、「讓利」，更能增加收入。談到這裏，趙紫陽強調說，有經濟學者提出：「管住貨幣，放開價格。」主張價格改革一步到位，這是書呆子作法，殊不知在國有企業占壟斷地位的情況下，受害的還是廣大人民。

趙繼續說：這樣，無論是城市，或是鄉村，就能形成市場，從而也便於把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他一再向我說明，市場發育不了，沒有市場競爭機制，國營企業是改造不了的。他說：如果單從體制內來搞改革，困難和阻力都是很大的。蘇聯的改革，困境就在於此，無論「休克療法」^①或是「摸著石頭過河」^②，都很難。而關鍵則在於必須理順所有制關係，明確產權關係，這是最根本的。

接著我談了社會上的一些議論。我說目前的改革所以深入不下去，

① 休克療法，俄羅斯90年代推行的激進改革戰略，以自由化、私有化為主體，由總理蓋達澤主持。

② 摸著石頭過河，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的表達漸進改革思路的中國南方俗語。

問題就在於：一提發展私人經濟，有人就認為是復辟資本主義；一提股份制，有人就認為是私有化，就是要改變社會主義制度；一強調要引進外資，有人就認為是走向殖民地化。這就捆住了人們的手腳。

我引證了一段國外專家的評論，認為中國目前實行的政策自相矛盾。他們說：中國一方面反對自由化、私有化；一方面又在實行自由化、私有化。

我說，實際上，以國家所有制形成的公有制，無論在蘇聯、東歐或中國，都出現了官僚階層所有制，他們憑藉對物的分配管理權，進行對人的統治。所謂全民所有是「虛」的，而官僚階層的佔有才是「實」的。談到這裏，我引證了馬克思關於所有制理論的一句話。馬克思正確指出：「所有制是指全部生產資料的佔有，但它的本質歸根到底是對人的勞動的佔有，」「把勞動者和土地一起佔有，就是奴隸制……佔有土地並通過土地租佃占有勞動力，就是封建制，……佔有廠房並通過交換占有勞動力，就是資本主義雇傭制……。」我說：馬克思的這一原理，也適合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公有制。這時，「公有制」實際上變成了官僚階層所有制，勞動者不佔有生產資料，同樣不得不要受奴役。

趙紫陽插話說：是不是不引證馬克思的話作依據。你這樣引證，別人也可那樣來引證。接著我說，我非常贊同中央黨校教授、經濟學家王珏^①的觀點，他認為所謂共同富裕，必須有財產，有財產支配權；不能支配財產，就不能叫共同富裕。

趙紫陽又插話說：馬克思並不反對個人佔有，只是反對個人壟斷。對此，我說我曾查閱了馬克思原著，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可見，我們過去在執行上是出了偏差。

二、最末料及的誤解：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① 王珏，經濟學家，中共中央黨校特約教授、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會員。

我說：安志文^①（原體改委副主任、趙紫陽時期的財經領導小組成員，此時為中國體改研究會會長）讓我轉告你，在對你的問題立案審查結束後，希望見到老同志時不談「六四」問題，以免引出麻煩，因為你的觀點大家都清楚，人民也都清楚。我也轉達了安聽到的傳說，說你要做第二張學良^②。安說，中國大陸的體制和台灣不同，張學良可以和舊友照常往來，在大陸就不行，誰這樣來往誰就會被認為是不和當政者站在一邊了。安並說：現在萬里、楊尚昆^③也是什麼事也沒有幹。

趙紫陽說：安志文同志的看法有道理，就是對我的問題審查結束了，無論給什麼榮譽職務我也不會幹，重要的職務他們也不會給，而且對我的結論也不會改變。既然這樣，何必呢？如果當時在「六四」問題上不表態，跟著走，也會保留原來職務的。

接著，趙又說：我對「六四」的表態沒有什麼可後悔的；在後代人看起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在「六四」這樣大的是非面前，總還是有人站出來，不是糊裏糊塗都跟著走。對撤銷我的一切職務，我都不在乎。

但是他以沉重的心情繼續說道：我最未料及的是，在「鄧」的問題上，我對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本來完全出於好意，完全為了維護他，一心一意地在挽回他的形象，但結果卻被猜疑，造成誤會。這種情況後來一直難以挽回扭轉，這是我心中甚為痛惜的。

趙紫陽又說：我之所以向戈爾巴喬夫通報，說我們中央常委有個決定，即遇到重大問題，還需鄧小平同志掌舵。這是因為，他們把鄧小平抬了出來，天安門的群眾已把矛頭直接對著鄧小平了。

我去朝鮮後的第二天晚上，北京市委李錫銘^④、陳希同提出要向

中央常委匯報。在李鵬主持下，常委開會聽取了匯報，李、陳把情況說得很嚴重。正如人們說的，他們特意謊報軍情。

趙紫陽說：我去朝鮮以前北京市委對我講，他們也認為學潮實際在平息。當然，他們後來在常委會上講的那些情況不是沒有，但他們把情況說得太嚴重了。李鵬據此總結說：「這次學潮是有領導、有組織、有綱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動」。

他們去鄧那裏匯報，鄧聽李鵬一講，覺得問題嚴重，就發表了「4·25講話」，給學生運動定了性，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於是，李鵬立即通知各單位傳達，北京市開了幾千人的大會傳達，接著又發表「4·26社論」，從而引發了4月27日十幾萬人針對社論、針對鄧小平的大遊行，這就把事情鬧大了。李鵬等人也認為「4·26社論」搞壞了。而鄧小平對李鵬把「4·25講話」捅出去，確實也很不高興。

趙紫陽說：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解脫鄧小平，為了扭轉人們對他的看法，和維護他的威望，我才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紫陽也解釋說，在對戈的談話中並沒有一切都由鄧小平拍板的話，我還說了「鄧小平同志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談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由鄧小平來決定的印象的。

我認為趙紫陽這個用心是好的，確實是為了維護鄧小平，這是無可懷疑的。趙紫陽對鄧小平用心良苦，可以說是赤膽忠心，但效果卻適得其反。以我看，趙大概沒有意識到，天安門學潮的發生，除了反腐敗、反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外，實際上，也是反對老人政治，對胡耀邦的下台與猝死表示不滿和同情；而他和戈氏的講話卻給人以鄧小平是在「垂簾聽政」的感覺，以至出現「打倒鄧小平」，「打倒新獨裁者」等激進口號，這是鄧所難以忍受的。本來，鄧小平正如他自己所說：「是一個甩手掌櫃」，「不擅權」。趙紫陽對我說：「他既要當家而又不問具體事；不是重大問題，他不講話，但到關鍵時刻，他講的話都得聽」。鄧也是搞權威政治的，他曾聲稱中國只能有一個婆婆，

① 安志文（1919—），陝西人。中國體改研究會名譽會長，曾任六機部部長、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趙紫陽為組長）。

② 張學良（1901—2001），遼寧人。張作霖之子，東北軍司令，1936年冬，聯共抗日，發動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返南京後遭蔣軟禁。1990年恢復自由，1995年辭居美國夏威夷。

③ 楊尚昆（1907—1998），四川人，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家主席。

④ 李錫銘（1926—），河北人，曾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意指自己說了算。但他又標榜自己向來「不擅權」，表白自己是開明的。因此，鄧是最忌諱別人說他「垂簾聽政」的，而趙紫陽同戈氏的談話，在鄧小平看來，正是捅了他的心窩。這就使鄧與趙的關係走向破裂。

趙又說：「鄧是非常注重自己形象的。他在天安門上看到群眾舉起橫幅標語『小平你好』，是非常高興的」。

三、「六四」鎮壓不是迫不得已

趙紫陽說：「六四」問題不是不可以用對話平息的。當時有三個機會可以用對話來解決：

一是胡耀邦^①的靈柩送到八寶山後，採用對話說服，不要激化矛盾。學生集會悼念胡耀邦，我主張不要干涉學生的悼念活動，因為學生的悼念要求不能說不好；他們在外面悼念，我們在人民大會堂裏面悼念，開追悼會。追悼會開完後，耀邦的靈柩已順利送到八寶山，可以說學生沒有理由再鬧了。經過各方面說服動員進行復課，事件是可以平息的。事實上，在我去朝鮮之前，事態也是向緩和方向發展的，是在向平息方面變化。

在此我插話說：人們抱怨你，當時不該去朝鮮訪問^②。

趙隨即說：如果預定的訪問日期改變，國際輿論就會認為國內局勢是嚴重的，政局不穩；何況當時國內形勢是緩和的，我覺得不會出大問題，可以走，才放心去朝鮮了。關於當時學潮問題，我去訪問朝鮮前沒有明顯的爭論，當時提的方針包括不激化矛盾的方針，鄧是同意的；李鵬內心可能有想法，我去朝鮮前他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在李鵬送我到火車站時，問我有什麼交待的沒有。我說：就這麼幾條，一是不激化矛盾，不要動武；二是耀邦追悼會結束了，要恢復正常

秩序，要復課；三是對打、砸、搶、燒者例外。李鵬也沒有講不同意見。回去後，他把我的意見向鄧匯報了，鄧說：就照紫陽的意見辦吧。我去朝鮮後的第二天晚上，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提出要向常委匯報，聲稱情況嚴重。常委會聽了北京市委的匯報，正是人們所說的匯報軍情，把很多事情集中起來，說學生要搞全國性的大串聯，要求建立組織，說大勢不好。我去朝鮮以前在北京，他們不跟我講，也同意學潮實際在平息的判斷。他們在常委會上卻又把情況說得特別嚴重。李鵬主持會議，他作總結：「是有領導、有組織、有綱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動」。第二天他們去鄧那裏匯報，鄧一向對學生鬧事遊行反感，他聽李鵬一講，覺得問題嚴重，就發表了這樣的斷語：「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一場動亂，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從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這個「4·25講話」，給學生運動定性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李鵬立即通知各單位傳達，接著又發表「4·26社論」即「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這就引起4月27日十幾萬人的大遊行，把矛盾激化了。

二是，五月初我從朝鮮回來後在亞洲銀行會上的講話，提出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被學生接受，各方面反映是好的，各校已開始恢復上課。

趙說：我從朝鮮回來後情況已很不好辦，有小平同志的講話，又發表了社論；說結論是鄧定的不能動，學生方面則要求收回社論，怕秋後算賬。而李鵬和北京市委堅持「4·26」社論不能退。他們包圍我，聲稱一定要守住社論不能改。在這樣僵持的局面下，只有採取逐步緩和、逐步淡化的辦法，不再去提「4·26」社論。為了轉移視線，根據社會上的輿論焦點，我提出了反特權。我向中央表示先調查我的子女^③，如有問題，就接受國法處理，如涉及我本人，也一樣。再就

① 胡耀邦（1915—1989），湖南人，多年領導其貴州工作，1980—1987年任中共總書記。逝世後引發八九學潮。

② 趙紫陽訪問朝鮮（北韓），時間是1989年4月23日至4月30日。

③ 作者注：當時，社會上曾流傳其子趙大軍劉吉彩電一事，後經中央紀委查證，乃是誤傳、誤導。趙紫陽提出將調查結論在一定範圍予以公佈，李鵬堅決不同意，怕引起連鎖反應。

是反特權要從中央做起，從中央常委做起；取消中央常委的特供〔中央副總理以上幹部享受廉價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歲數大的老人可以考慮緩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專機、專列〔專用火車〕警衛制度。幾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輕車簡從。

另外，在5月4日接見亞洲銀行會代表時，我發表了學生和政府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八字方針下解決問題的講話，主張通過民主和法治的辦法來解決問題。這個講話反映是好的，北京七所大學復課了，當時報紙上也作了報導；這時如果繼續對話，加緊做工作，形勢也會好轉的。

但是，紫陽說，這時何東昌^①卻在各大學黨委書記會上放言說，趙紫陽的講話和「4·26社論」精神是不一致的，他的有些講話是他個人意見。這實際上是否定了我在亞洲銀行會上的講話。一個教委副主任，竟這樣大膽地否定我的講話，這一定是有背景的。何東昌的講話傳達下去，致使人們普遍認為趙紫陽的講話不代表中央。

由此學生就愈發有顧慮，要求對「4·26社論」有個說法，而那邊一些人則堅持「4·26社論」不能退，並還收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鄧那裏送，還發表一些刺激學生情緒的話，搞兩面挑。而我和學生也沒有聯繫，兩面都不買我的賬，我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學生這邊愈要求對「4·26社論」有說法，對政府施加壓力，鄧的那邊決心也愈來愈大；學生鬧得愈厲害，李鵬、北京市委對鄧小平的影響也就愈來愈大，這就形成了僵局。李鵬還將我的軍，說：「你主張不激化矛盾的緩和辦法，沒有效果嘛，和學生對話，對一次，學生鬧一次。」

三是，當時我深切感到只要鄧小平能說一句話：「現在看來學生問題並沒有原來說的那麼嚴重」，剩下的工作由我來作，我來承擔社論問題的責任。我認為經過多方共同努力，形勢還是有可能緩和下來的。

^① 何東昌（1923—），浙江人，曾任清華大學中共黨委書記、教育部長、國家教委副主任。

趙紫陽認為雖然事情僵到這樣地步，也不一定非動武不可。他說，搞軍管，勢必發生衝突，一衝突就要流血；他擔心那樣會引發工人大罷工。這時再用上綱上線，想把群眾壓下去就不靈了；用權威人士壓也不靈；只有在「4·26社論」上退一點，修改社論乃是不可繞過的焦點。當時事態已拖得很久了，學生也疲了，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已經不多了，北京的學生都回去了，留在廣場的多數是外地學生。退一點給他們一個台階下，免除秋後算帳之憂，事情是可以好轉的。

我當時插話說：我曾去天安門廣場看過，學生確實疲憊了，人數不多。那時，人們都在說：如果上下齊動員，通令各校領導人一律負責把本校的學生動員回去，並允諾事後不予追究，那麼剩下少數人，此時再配合員警，實施強制疏散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趙紫陽打斷我的話說，他不同意動用員警，因為那樣做會激怒廣大群眾。

接著說：為了緩和鬆動，爭取退一點，於是我請許家屯^②來，從中作些疏通工作。我對許說：現在主要問題是爭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還要徵求常委的意見，請你幫助一下。（據許家屯回憶說：當時楊尚昆聲言，我去同老鄧子（鄧小平）講，但老鄧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以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去。楊尚昆還對許說，你告訴趙紫陽，讓他先這樣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

趙說：5月16日，上午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下午我會見。晚上開常委會，在常委會上我正式提出對「4·26社論」要有個說法，定性不恰當，要改。雖然我沒有看過這個社論，但我可以承擔責任，改「4·26社論」不能涉及鄧小平，小平同志只要說一句話：「現在看來，學生的問題並不像原來說的那麼嚴重」，這就行。

這時，我又插話說：在我聽到的黨內傳達是，你在朝鮮時給你發去「4·26」社論電報，你對社論是同意的了，但回來後你又變了。

^② 許家屯（1916—），江蘇人，曾任中央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90年出走英國，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

趙說：我在朝鮮時發給我的電報是鄧小平的「4·25講話」，館給我看了，我也表了態，同意小平同志關於穩定局勢的講話。因為是內部講話，我不能不同意。但我沒想到他們把小平這個講話公開來，更沒想到會公開發表「4·26社論」。在朝鮮時我沒有看到這社論，根本沒有發給我。

他說：導致「六四」問題，根本是社論引出空前規模的群眾抗議。在悼念胡耀邦期間，有很多學生沒有上街遊行，「4·26社論」把批中間學生也調動起來了。

紫陽說：就在這天晚上我提出要修改社論，並聲稱，自己雖然看到這個社論，自己也要承擔責任。李鵬說：如果改，你我都將會下台。趙反駁說：情況不是那樣嚴重。李鵬說：沒有必要讓你承擔責任。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就這樣我和李鵬發生了爭論。李鵬又說，「4·26社論」是鄧的講話。我說：不是，是常委會定了調，向鄧匯報才有這個講話；是定性在前，講話在後。李鵬接著又說：你在朝鮮的電報中說，同意制止動亂。我說：動亂這個詞是中性的，騷亂、暴亂、風波都是講規模，沒有講性質。小平講動亂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什麼樣的動亂。動亂有人民內部矛盾，也有敵我矛盾，問題就出在「反黨反社會主義」這個定性上。

紫陽說：第二天，5月17日在鄧家開的常委會上發生爭論時，我也是這樣說的。

談到這裏，趙對我說：看來李鵬可能有私心。我說，在體改委有關內部傳言，有人是在搞陰謀。

趙接著說：5月16日晚與李鵬爭論後的第二天，我給鄧寫信要求面談。鄧通知了幾個人，有李鵬、姚依林、胡啟立^①、喬石^②、楊尚昆和我。我們去了鄧家。本來是我要求談話，他通知了這麼多人，

然不是聽取我的意見，但我還是重申了我的意見。姚依林、李鵬說：學生動亂不能制止，是趙紫陽在亞洲銀行會上的講話引起的，這個講話使學生感到中央出了兩個聲音，就這樣，居然在會上突然向我發難，看來他們是預先開了會的。會上談到要實行軍管，搞軍管我擔心會出現嚴重情況，我很難執行。在這最後關頭，如我贊成軍管，總書記還可以當下去，我反對軍管就要下台。是繼續當總書記，對學生採取強硬方針，還是下台，我選擇了後者。說到這裏，趙紫陽沉默了一下，接著又鄭重地說：不贊成軍管和不當總書記，我是連在一起考慮的。從鄧家開會回來後，我就寫了辭職信。胡啟立也反對軍管；喬石原來不贊成軍管，在這個會上也贊成了；楊尚昆原來反對軍管，後來也贊成；最堅決的是李鵬、姚依林。

趙說：其實，在軍管問題上，這幾個人的態度是無所謂的；就是他們五個人都不贊成，也會實行軍管的。而在鄧家開會之前，我的意見是多數，我、啟立、喬石、尚昆都是一致的。

對趙紫陽寧可總書記「寶座」不要，也要堅持正義性的談話，我聽了之後，確實從內心欽佩，從中我也領悟到，對「六四」問題採用對話不是不可以解決問題；李鵬聲稱所謂開槍是「迫不得已」，只不過是事後為自己找遁詞作解脫罷了。安志文說：事情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把情況估計嚴重了，認為一退讓就會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一發而不可收拾，中國政治格局就一定要發生變化。總之，元老們仍沿用過去的思維模式和階級鬥爭為綱的意識形態觀點，以為社會上發生風波，就認為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黨內一遇有不同意見和看法，就認為黨內鬥爭是黨外鬥爭、階級鬥爭的反映，所謂黨外問題反映在黨內，是黨內一些領導縱容和支持的結果。

我還向趙轉述：當天安門前的學生遭槍殺的消息傳出後，一個素不相識的學生開口就對我說：「共產黨完蛋啦！」人們都在傷感地議論：對一些赤手空拳的學生，哪有用坦克、機槍來鎮壓的；認為這樣連北洋軍閥、國民黨蔣介石都不敢做的事，共產黨卻做出來啦！我所在學校的一位老教授，從校大門外幾里長的路上，一直哭到家；學校附

① 胡啟立（1929—），陝西人。1987—1989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六四事件後任電力工業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② 喬石（1924—），浙江人。中共十三大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1998年退休。

近北醫三院的一位大夫告訴我說：當時醫院門口堆滿了傷患，大多是青年學生，也有解放軍戰士，搶救不知從哪一個傷患開始，只能挑最嚴重的動手術。人們都是目瞪口呆，面對此景此情，實感悲慘。有一位住院的教師講了句「血要血來還」，隨後就由便衣員警跟蹤去病房把他押送上了軍車；第二天家屬來醫院看望，已不知下落了。這位大夫對我說：由於定性是反革命暴亂，傷病員怕作「反革命分子」論處，有的腸子手術還未完，就被親友私自接走隱蔽起來了，這樣出院結果那還不是只有死！有人說「學生是無私的，實在可憐」，「六四」鎮壓後，在體改委召開的司局長會議上，好多人都流了眼淚，不管別人如何，反正，我是參加了學校對死難學生——一位研究生的追悼會，並對其家屬捐了款。這大概就叫「我行我素」。在「六四」後進行組織清理時，我堅持自己的看法，認為參加「追悼會」、「捐款」不是錯誤！我堅持「六四」事件不是反革命暴亂，而是學潮。我的思想是，不管如何處理我，正義是要堅持的。

最後我說，「六四」表面上是鎮壓下去了，但人們評論說它卻把黨心民心失掉了，對黨的信仰垮了，黨的組織渙散了。在國際上引起的震驚和消極影響也是很大的。

我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個大悲劇，這是歷史的定論。人們在議論：這個歷史的癥結終究要解開，不管今後是熱處理，還是冷處理，歷史終歸要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我的看法是誰能高舉這個旗幟誰能得人心。

最後，趙紫陽還談到今後想辦一個基金會，會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為社會為國家辦些公益事業。也談到或者會寫回憶錄。趙說：這兩個任務都很重，也很艱巨，要做就一定要做好，但都很費力。根據自己的精力，看來只能做一個，表示希望我幫助他考慮一下。

談話結束後，臨走時，趙紫陽還含笑著對我說：老宗，從這幾次見面談話，你可以看到，雖然我沒有工作，但我的腦子並沒有閒著。

6

1992年9月5日

一、毛澤東與鄧小平晚年歷史的相似性

首先，我談了安志文對解決「六四」問題的看法，安認為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安說：

1、東歐巨變，蘇聯瓦解，更增強了鄧自己對處理這一問題的堅定性；認為只有採取這一手段才能穩住局勢。

2、對趙紫陽的問題，幾位老人沒有人出來說話的，而且意見是一致的：都怕引起風波，引起不穩定，影響了大局。

3、李鵬不用說了，江澤民也是「六四」上台的，人們評論，他們是「六四」事件的受益者；他們不會解決趙的問題，而且是阻撓解決的。

4、鄧的性格一貫就是這樣的，只要是他定的問題，他不會改變。鄧這次在首綱的講話，對新領導班子雖然也作了批評，但聲稱不對外發表，說是對這個領導班子要幫助，這說明鄧還是支持這個班子的。

安又說：這次十四大開會，已向各代表團打了招呼作了佈置：關於趙紫陽的問題不討論也不列入議程，趙紫陽的問題原是中央全會定的，這次會上不討論，肯定也不會改變，但給趙紫陽以有限度的自由還是可能的。

趙紫陽聽了之後，完全同意安志文的這個分析，認為是符合實際的，也完全符合自己所考慮的。接著又分析說：現在人們一般對鄧的期望高了，估計也高了。如認為鄧對領導班子還有第二道防線，還有二手準備。

我插話說：人們常拿鄧小平做比喻，不是先被毛澤東打下台來，後來又復出了嗎？為什麼鄧小平對趙紫陽不可以這樣辦呢？

趙接著說：實際是鄧在人事安排上迴旋餘地也不大了，如同毛主席晚年一樣。當時毛不敢用四人幫，由於四人幫不得人心，那樣會使中國大亂；當然，更不敢用鄧，因為那樣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同時，也不能用周總理^①，這是由於周總理同毛的主張不一致。因此，只能用華國鋒^②來維持，實行過渡。至於自己去世後，政局如何，他就管不了了。現在鄧小平同樣，既不敢用鄧力群這些人，這樣會把改革開放事業翻過來，更不用胡耀邦、趙紫陽，因為觀點不同，他們已為鄧小平等老人所不能容。同時，也不能用楊尚昆、萬里，因為他們與鄧的主張不同，特別是對新領導班子看法有分歧。

在此，我又插話說：楊尚昆在軍委擴大會上的講話中，聲稱有的人公開反對改革開放路線。譬如，把引進外國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都當成姓「資」……這還有什麼開放政策呢？有的認為現在應該講以階級鬥爭為綱，「六四」是階級鬥爭的最大反映，社會上反對黨的政策的人，也是階級異己分子，所以要重新提以「階級鬥爭」為綱；要在全國搞大運動，搞大鳴大放。那不是又回到「文化大革命」嗎？有的對三資企業問題說成是多一個三資企業，就多一份資本主義，多一個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陣地。收集起來，真是嚇死人。他們甚至對毛澤東講的資產階級在黨內也說成是對的。楊尚昆又說：還有「和平演變」問題，在報紙上天天談和平演變，搞得我們什麼事情都要反對和平演變，比改革開放還重要了。

我說：楊尚昆這些講話，既是針對「六四」後發生的逆轉形勢，江李體制向左轉，偏離了改革開放路線；更是針對江澤民1991年在黨校的一次講話說的，江聲稱：「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要大力反「和平演變」。

接著我又說：楊白冰也提出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口號來，

這針對性更強了。

趙紫陽含著笑說：這個口號的提出，是太露骨了。

趙紫陽又說：楊尚昆對江〔澤民〕是有不同看法的，萬里對李鵬也有看法。萬里是主張搞民主的，萬里出國前，大概是5月3日，我到萬里家和他長談了一次，談得比較好。我主要向他講了學生的事怎麼看。我說，現在開放搞了這麼多年了，外面什麼東西學生都有印象，學生們覺得什麼話都可以說。老一代的思維方式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學生說我們不好，就認為是要顛覆我們。這樣一來，本來不是對抗性的就搞成對抗性了。有的人把學生的話收集起來，往這兒送，往那兒送。往鄧那裏送，說矛頭指向鄧了，把鄧激怒了。我說：這事沒有什麼了不起，採取對話疏導的方式可以緩和下來。我說時代變了，思維方式也要變；不能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來看待學生的言論，否則就不能理解學生，把問題看得太嚴重。萬里同意我的這些看法。

趙繼續說道：鄧小平如同毛主席一樣，毛主席說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對第一件事毛主席說反對的人不多，對第二件事就不敢說了。同樣，鄧小平也是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改革開放，人們都是贊成的；第二件事就是「六四」。這是他最大的隱憂，也是他神經最敏感的事。而江澤民是「六四」上台的，人們稱之為是「受益者」；李鵬則是因「六四」地位才得到鞏固的。因此，他們決不會翻「六四」的案，並且是要大力阻撓「六四」事件的解決的。

正因為是這樣，趙紫陽說：鄧小平雖對目前的新領導班子不滿意，但是考慮來考慮去，大概是為了「六四」問題，認為目前這個班子還是不動為好。同時，也正因為「六四」問題，怕自己身後楊尚昆做太上皇，顧慮對「六四」會發生變化，才對楊、萬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有些事情根本不找他們兩個談，而是直接找江、李。據稱還捎信給萬里：以後不要逞英雄。有些事情鄧小平則是聽自己孩子的。

① 周恩來（1898—1976），江蘇人。1949—1976年連任四屆國務院總理。歷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等職。

② 華國鋒（1921—），山西人。1976年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1980年冬卸任。

這和毛主席晚年極相似。

二、鄧明確提出要趙接軍委主席

我說：人們在議論說，毛主席過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批評了江青^①，接著鄧小平組織了對江青的批判；其實毛主席對江青是信任的，認為鄧是靠不住的，結果導致了鄧小平的下台。那麼，這次鄧的南巡講話對新領導班子的批評，是否也是考驗楊尚昆，將來可能要當太上皇而靠不住呢？

趙紫陽只是笑了笑。

我談到：我聽到的消息：因楊白冰^②進不進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問題，楊尚昆跟江澤民在常委會上公開進行了爭論。江澤民沒辦法最後只好說：楊白冰不進常委是鄧定的。

接著我又談到，如果鄧走了，人們對中國政局的一些議論：有的說江李壓不住台；有的說還可以穩定幾年沒問題，但以後就不敢說了；還有的說搞不好會發生變亂。青年人則認為共產主義思想是瓦解了，沒有吸引力；今後各省自治傾向大，適合自己的就聽，不適合就會不聽，各幹各的。現在各地方都在說：中央何必管這麼多！給你納稅就行啦。也有的說：實行地方自治有什麼不好呢？

趙紫陽說：企業和各地方省、市有了自主權必然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即政治上的自主權。

我又轉達了安志文的一點看法。安認為：如果重新評價「六四」，那說明鄧小平錯了，鄧自己打擊自己；實際上形成鄧與趙處在互相對立的狀態了，「六四」問題把趙與鄧有機地聯在一起了。鄧小平就是那樣性格的人，看來趙紫陽當時不應提出與鄧相左的意見來。

趙紫陽說：我作為總書記，必須有明確的態度，這是我的歷史責

任所在。當然，那時跟著走，也會保護一批人，但以後不好辦，必然還會以反自由化不力而受批判，也不會有好下場。如果那樣下台還不如這樣下台。相比之下得失權衡還是這樣好，我不後悔！安志文的分析是正確的，「六四」問題最後實際形成我與鄧的對立，「六四」事件把我與鄧有機地聯在一起了。

在此我插話說：你與江、李也是因「六四」而聯在一起的，也處在對立狀態。正如安志文所說：有你的合法性，就沒有他們的合法性。

另外，我也轉述了1988年物價闖關時，就發生過「倒趙」之說，繼而有趙紫陽要下台的傳聞，不知是否屬實。

趙紫陽說：中國的政治就是這樣，工作上一出現點波動，就有人在起哄。那時可能有人在向我射箭，但我並沒有理睬，我只知道在我去朝鮮之前和鄧有一次談話，他曾明確地提出軍委主席這一職務要我擔起來，他不再擔任了。我當時也明確地說明：現在改革任務很重，為了穩定局勢還是你繼續擔任一個時期好，談話都是實實在在的。我看不出鄧小平有什麼其他考慮。而且過去合作都是很好的，只要我提出來的問題，他一點頭同意，我就幹起來，工作都是很順利、合得來的。沒有發生什麼分歧。分歧就是在「六四」問題上。這是焦點。

三、在四川工作時曾鑽研過經濟學

我說，在你剛到北京任總理時，我曾聽到傳達你的一次講話，說解決中國的貧窮問題，只能靠把商品經濟發展起來才能解決。當時，我不懂，在那計劃經濟體制一統天下的局面下，對這句話我也摸不著頭腦。在以後改革的進程中，你一再強調並聲稱：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使農民有了經營自主權，十億農民就是廣闊的大市場；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城市安排待業青年發展集體企業，以及三資企業和個體戶，這就大面積地開放了體制外經濟的市場。這樣，無論在農村或城市，就能形成市場，從而便於把國營企業也推向市場。你並且一再說明，發育不了市場，沒有市場競爭機制，國營企業是改造不了的。我問他，

① 江青（1914—1991），山東人。毛澤東之妻，1969年任中共政治局委員，1976年被捕，1981年判處死刑，1984年保外就醫，1991年自殺身亡。

② 楊白冰（1920—），四川人，曾任解放軍總政主任，軍委秘書長，上將，中共政治局委員，1992年被追辭去軍職。

你這種以發育市場、發展商品經濟來進行改革的思路是怎麼形成的？

我又說，人們的公論是：中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是總設計師，當然你是總施工師了。在你任職期間，我國的財富有了巨額的增加，整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台階。鄧小平也評價你「功勞不小」，使改革開放也走上了一個正確的發展道路，得到全國經濟理論界的普遍讚揚與全國人民的擁護。你這個經濟思想從哪裡來的？你沒有上過大學學經濟，但掌握經濟工卻能得心應手。

趙紫陽只是含笑地說：我在四川工作那段時間鑽研了一下經濟學^①，看了些有關經濟發展方面的書。聯繫過去考慮一些經濟方面的問題，願意幹些實事，跟上世界的潮流。

接著我說，這次十四大已經確定將提出「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來，這乃是一個突破。從1978年開始迴避「市場」這個詞，繼而發展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後又發展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最後發展成「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但「六四」事件後又退回到「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直到這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才得以確立。這就最終擺脫了計畫經濟體制的束縛了。

趙說，他聽到的情況，原定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這也是江澤民所主張；但在常委討論時，喬石等提出市場經濟怎樣去計畫呢？感到說不通，才把有計劃的幾個字刪掉。

我說，在你執政時，企業實行的是廠長負責制，學校實行的是校長負責制，這樣，行政領導起中心作用。江澤民上台後，又強化企業的黨委領導，提出政治思想工作的核心作用，就造成了混亂。人們在議論：兩心（廠長、書記）不同心，結果是無心。

接著，我根據自己親身的體驗，發表了以下的議論：過去我們正是把工廠當作政治上的統治基地，「文化大革命」時，是作為專政基地來看待的。一個職工如果是離開單位或被開除，簡直就沒法生活，

沒有生存的餘地，使你不得不服從，不得不從命，逼得你只能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或者把大部分精力用於對上搞好人際關係，去搞「關係學」。

在工人那裏，由於有鐵飯碗的「保障」，人的惰性發展，不求進取：上班懶洋洋，出工不出力；下班喜洋洋，拼命幹私活。所謂「共產黨是我的爹，工廠是我的媽，工廠有啥我有啥」；損公肥私，大家都騎在工廠身上坐吃山空。我所接觸到的工廠領導人，往往是寧使生產受損失，甚至貸款，也要滿足工人的生活福利要求，以取得工人的支持和讚揚。這就使工廠去吃銀行的大鍋飯，貸款越多，負債也越來越重，形成惡性循環。……對上述種種問題，我在工廠工作期間就深有感受，感到在工廠越來越困難，始終走不出一條路來。

也因此，後來我爭取到了國家體改委研究會工作，使我有機會參加一些學術會議，並和國內外專家學者接觸。經過學習和反思，使我認識到，現在是世界上各地區、各民族，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在走向大融合時期，是世界經濟走向一體化的時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你，在互相依賴、互相依存中共同發展。因此，我們這一套辦法是不行的，我們應該跳出舊的意識形態束縛和舊的社會主義模式，來看待世界的新變化。

我就是這樣將個人的親身體會和認識，向趙紫陽作了一番敘述。雖然我與趙紫陽的談話，只是對某些理論性問題的探討，並不涉及其他，但紫陽仍把我領到另一個小房子裏去交談，而他的夫人梁伯琪，則是在門外小心地觀察有無偵察性的照相取景。由此可見他們的謹慎心態了。

^① 趙紫陽1975年10月至1980年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因77、78兩年糧食增產，蜀中大治，民間傳出「要吃糧，找紫陽」的佳話。

7

1992年10月11日

一、喬石代表中央向趙紫陽宣布三條處理

開始時我轉述了安志文的兩點看法：

一是對鮑彤^①問題的處理。安說：原來對鮑彤是不起訴的，現在卻加重了，判七年徒刑，是很重的。這就是，上邊對「六四」問題的態度是不能改動的。同時表明對趙紫陽的問題也是不會變的。

二是希望你淡化一下對你的兩個結論。安說：希望你與老同志談話時迴避一下「六四」問題，以防被抓住口實，限制個人今後活動的範圍。安又說：李鵬這個人很厲害，又「抓權」，又結幫拉夥。（李鵬曾對我說過：李鵬這個人「想置趙紫陽於死地」；並說這個人報復心也很強。）

安志文還說：對「六四」這個問題，全國人民都很清楚，對趙紫陽的觀點，人民也都清楚，都是心照不宣的；根本用不著申述，將來會慢慢地水到渠成得到解決。

我談完之後，趙紫陽接著就說：前天喬石、宋平、李鐵映、丁關根^②來了，向我宣佈：

一、審查結束；

二、兩個結論不變和過去一樣；

① 鮑彤（1933—），浙江人。曾任趙紫陽政治秘書、中共政改研究室主任。1989年5月底被捕，1992年判刑七年，刑滿出獄後，被軟禁家中。

② 宋平（1917—），山東人。曾任甘肅建委主任，1989年任中共政治局常委。1992年推薦胡錦濤為江澤民接班人。

李鐵映（1936—），湖南人。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體改委主任、社科院院長。

丁關根（1929—），江蘇人。曾任國台辦主任、中共統戰部長，1992—2001年任中宣部長。

三、恢復自由。

還談了要我顧全大局、遵守紀律等語。還提出希望我十四大期間不外出。不要接見記者，而行動（自由）也要一步步來。喬石說，這主要考慮是為了穩定。這是鄭和常委決定的。

趙紫陽說，這都是喬石講的，只談了幾分鐘，看起來他們談話、行動很拘謹。當時我也談了三點意見：

一、保留意見，四中全會如此，現在仍然如此。

二、這次不爭論、不申辯。

三、將結論事實及審查結果，在適當範圍內公佈，向人民及個人作個交代。

趙還表示：三年多來實際對我是軟禁，不能出去打球（高爾夫球），也算是一大損失。並說：我十四大期間可以不外出，不接待記者，但記者來找，我沒辦法。

趙紫陽說：在來之前，據說：他們把情況估計嚴重了些，認為宣佈對趙紫陽審查結束後，如果記者都去，並作為頭條新聞報導，影響並沖淡十四大怎麼辦？如果趙紫陽本人要出來走上天安門，引起群眾性的轟動怎麼辦？如果趙紫陽堅持己見，形成了僵局如何辦？

趙說：我這個態度表示，他們向政治局傳達後，表示了滿意。但對我要求公佈審查結果始終未答復。

我說：領導層的出發點是力求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六四」問題是最敏感的問題，最怕引起波瀾，而你的行動又最容易引起波動，所以對你的行為表現也就十分注意。

對趙紫陽所謂恢復自由，後來我才知道，就是可以去郊區公園，但市內繁華地區不能去；可以去內地城市，但沿海地方不能去；還有不能接見記者，尤其是外國記者。實際是人們所說的有限度的自由。這種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是違背憲法的。據說曾反映到江澤民那裏，江聲稱：這是為了進行保衛，為了安全。

據我所知，有一次趙紫陽要到養蜂夾道胡同（即中央部長級娛樂場所）去打檯球，經請示不准許，趙硬是步行到養蜂夾道胡同去了。

後來規定，每星期的休息日，也就是人們都不去的時候才准趙紫陽去這個地方。同時規定，趙紫陽去的時間，均是在人員散去之後的暫短時間內。

此時趙又頗帶幽默地對我說：只戴帽子，沒有事實，就處理人，真是一大發明。

我說，我聽到的組織傳達說：對趙紫陽的問題處理是定性準確，實事求是。趙很氣憤地說：簡直是胡說。

接著，我把北京市高級法院對鮑彤的一份終審裁定書，交給了趙紫陽。裁定書說：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1992年)中刑字第1582號刑事判決，認定鮑彤犯洩露國家重要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判決宣告後，鮑彤不服，以其沒有犯洩露國家重要機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

本院「認為……原審對鮑彤的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式合法，處予維持。鮑彤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予駁回」。

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本裁定為終審裁定。①

趙紫陽說：這個判決書是矛盾百出，審判鮑彤時連證人都不讓出庭。

趙又說：「六四」以後，沒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為我在國外有影響，不能像鮑彤那樣秘密審判。鮑彤有什麼事？查來查去什麼事也沒有。說他反革命煽動和洩露國家機密，什麼機密？起訴書上說，有人問他：「趙是不是不行了？」他回答：「一個星期以後就知道」。這也算洩密？就連這件事鮑彤也都說沒有。說他反革命煽動：一是譏

諷了朱琳①出國時丟了一個假項鍊緊張得了不得，引出笑話；二是議論了戒嚴。反革命宣傳和洩密兩個罪就隨便給加上了。

趙繼續說：本來搞鮑彤是為了搞我的問題，以為我和學生私通，還通過鮑彤跟外國人私通，結果什麼也沒有。他們查索羅斯基金會②，索羅斯是匈牙利人，是個大富翁，他出資支持體改委研究所的工作；他有沒有美國中央情報局背景，我不知道。對這個人，公安部和安全部看法不一致：公安部認為他有這個背景；安全部認為沒有這個背景，他是安全部的客人。公安部1987年7月給我寫了一封信，說索是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支持波蘭團結工會，我比較慎重，把公安部的信批給了安志文，讓體改所和這個基金會脫鉤。趙強調說：無論怎樣，這件事都涉及不到我。

我插話說：我在體改委聽說，索羅斯曾向中國政府質問，索羅斯基金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何關係？請拿出你們的證據來。安志文對我說：鮑彤是個冤案，但又解決不了。

趙紫陽接著說：鮑彤的事，是先入為主。李鵬對鄧說過鮑彤是壞人，說我是受了鮑彤的影響。

最後，趙氣憤地說：總之，對鮑彤這兩個罪名都不能成立，他們是應負歷史責任的。對我，這樣壓下去，也會越來越被動的。

二、鄧小平的「模糊政治學」

人們對趙紫陽的問題都是很關切的，對以王任重為首的趙紫陽專案小組，經過幾年的審查，結果如何？都想瞭解究竟。但只是在幹部中流傳說：「查無實據」，卻始終沒公佈過，黨內也未作過傳達，都是悶在葫蘆裏，誰也「不知情」。

① 朱琳，上海人，前總理李鵬夫人，神華集團（能源）大股東。

② 索羅斯基金會，由金融家索羅斯（George Soros 1930—）1979年創辦開放社會基金會始，總部紐約，逐步在歐亞非數十個國家建立分會，宗旨推動民主開放價值觀。1989年中共保守派指控索羅斯基金會被中情局操縱，攻擊趙紫陽通過陳一諮勾結索羅斯，企圖顛覆中共政權。後索羅斯作出澄清。

① 作者注：事實是，鮑彤在1989年5月28日是以通知參加政治局常委開會名義被送進秦城監獄的；直到1992年1月才發佈逮捕證。

我聽了趙紫陽所說，喬石代表鄧和中央常委向趙宣佈的所謂三條，更令人糊裏糊塗。我認為這簡直是在捉弄人，哪像一個政黨對人的處理所持的鄭重態度呢！

有老同志知道了我去趙紫陽那裏，就想通過我瞭解一下，對趙的審查結果是怎樣宣佈的？

趙健民和杜星垣^①約我去他們那裏一談。他倆說：這樣只談結論不變，不說事實；只說明審查結束，不宜佈問題；更不說明究竟趙紫陽有問題還是沒有問題，也沒有個明確交代；就是行動自由也不作個說明，是什麼樣的行動自由。這算是怎麼一回事呢？都表示納悶。

杜星垣說：對一個總書記就這樣不清不白的宣佈了事，太不像話！不過杜又說：他們沒有事實，也拿不出事實來；十四大要召開了，又不得不作個交代。只能如此，也不必將他們的軍。

趙健民說：這是鄧在耍政治手腕，在耍權術，到北京後，我也很少和鄧接觸。

杜星垣又說：對國外留學生有反政府行為的，還聲明不作追究並來去自由，對趙紫陽更不應該這樣限制了。杜認為鄧定了恢復趙紫陽的自由，第一線的當政者大概沒辦法，給趙紫陽以有限度的自由，來繼續壓趙。

杜潤生說：對趙紫陽實行這種不三不四的對待，乃是缺乏真理的表現，是虛弱的表現。

安志文說：這只是給予了有限度的自由。

我看到香港報刊的評論說：這是「鄧小平的模糊政治學」。

問題的關鍵是所謂「定性準確」。趙紫陽「支持動亂」、「分裂黨」，但趙紫陽到底是怎樣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到現在也未拿出材料來予以公佈，只有「帽子」沒有「事實」，不能讓人信服。其實真正的問題只是，趙紫陽提出，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和民主法治的軌道上來解決問題，不同意戒嚴出兵。提出個不同意見就加以治

罪，這在黨章黨紀上是史無前例的，也是違反黨章黨紀的。

人們在議論說：哪有因提出不同意見就治罪的？不可思議！哪有不根據事實就來作結論的？不可理解！事實則是，到現在也沒有查出，究竟是哪些人對「六四」事件進行了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反革命活動；凡此種種，皆沒有作個澄清。自然人們有理由說，這是主觀的臆斷，是對廣大青年學生強加的罪名，是莫須有。

此外，我順便談了安志文關於趙想辦基金會的看法。安志文認為，與經濟改革無關的基金會組織，一般意義不大，而組織上如果不同意也不好辦。應該看一看再說。安說，過去世界銀行駐華代表林重耕曾提出，要在中國成立中國體改研究院，趙紫陽曾批示同意，但李鵬不同意。現在〔「六四」後〕林重耕還想以趙紫陽的名義來搞。

關於改革問題，安志文說，對於價格放開，現在認識一致了，可以向市場經濟推進了；就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大鍋飯」不好辦，企業的社會負擔也重，企業經營機制很難轉換，對工人失業又怕引起不穩定，而且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都關聯到國民經濟的整個體制問題，改變都很難。這跟鄉鎮企業改革是不同的。總之，國有大中型企業還沒有走出一條路來。

趙紫陽說：改革開放與政治上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有矛盾的。抓了這一方面，必然影響那一方面。

^① 杜星垣，80年代國務院秘書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1992年11月6日

一、趙紫陽：沒有想到會被軟禁

趙紫陽說：關於我的問題，他們早在半年內在內部都已查清。本來去年就說要結案的。但有的老人卻說：現在才平靜，而眼下又去處理趙紫陽的結案問題，那不是又會引起風波來嗎？就這樣又拖下去了。

關於鮑彤的問題，趙說：大概是喬石表了個態度，由公安部、司法部、監察部共同打了個報告給中央，說明不夠起訴條件。對這個報告中央常委都已圈閱，並沒有提出不同意見來。後來，這個報告又轉到鄧小平那裏，據說對這個報告，鄧看也沒有看，就說：為什麼不判刑呢？鮑彤是個壞人麼！就這樣，對鮑彤判了七年徒刑。

趙紫陽又說：在「六四」問題上，我只是提出了不同的處理方法和意見，就對我加以治罪，實行軟禁，限制我的自由，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談到這裏，趙紫陽有些氣憤地說，這是違背憲法的。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到一定時候，我要訴諸於社會。

他的夫人梁伯琪有一次也對我說：總書記不讓幹，就不幹唄！甘願讓位，沒想到這樣子來治罪於人！我看到梁伯琪的神態，很是傷感。我當時只能以同情的眼光向她作些表示，其他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我感歎的是，人治的國家，專制的政體，就是這個樣。法形同虛設，是擺樣子的；對總書記尚且如此，對一般人民就更不用說了。實際上完全是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統治的需要和利益關係來定問題。是以言來代法的。不但如此，而且在這種政治體制下，其政治氣氛也是如李瑞環在一次講話中所指出的：「往往是誰在台上，什麼都是對的」，也就是說大家都是捧的；「但一下台，又什麼都不對了」。

1992年11月6日

僅如此，我認為甚至還把一些錯誤向下台人身上推，對其歷史功績更是一字不能提。更有甚者，還似是而非地在進行所謂「揭露批判」；當然也有為討好領導，為表現自己而進行趁火打劫的；而被批判者卻沒有任何申辯的自由，弄得是非界線不清，這就把社會風氣搞壞了。還有，雖然公開聲稱不涉及子女及親屬，實際上「六四」事件後，趙紫陽在總參工作的女婿被調離，且始終未再分配工作。據我所知，這件事先是由遲浩田提出，經江澤民批准執行的。趙在醫院工作的一個親屬，本應該晉升的竟也被排斥在外。這不是典型的以人劃線嗎，完全是搞封建式株連，哪裡是現代文明呢！

趙繼續說，我還有一個沒想到：就是全國人民寄予我以這樣大的信任與厚望。

我隨即說：「六四」事件後，你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不是低了而是高了。並順便談了我自己親身經歷的幾件事：

一是，有一次我去一家照相館取和趙紫陽合影的相片，對方看到了是趙紫陽的照片，當即說：洗趙紫陽的相，不要錢，他是好人。

一是，有一個來訪的中青年，在我處看到了趙紫陽的相片，就馬上激動起來，並流下了眼淚。

一是，一次我去海南島參加國家體改委研究會的年會，有個氣功師得知我與趙紫陽相識，馬上走到我面前向我說：一定代他問趙紫陽好，並說，他非常敬佩趙紫陽。會結束後，我在飛機場餐廳吃飯候機時，一個華僑得知到我與趙紫陽相識，便當即買了筐芒果送我，並要我轉告趙紫陽，他想邀請趙去西安自己開辦的公司參觀指導。就這樣，我的身價好像也被提高了似的。

一是，山東萊陽一家鄉鎮企業家，見了我一再聲稱：沒有趙紫陽，就沒有我們鄉鎮企業，一定要我轉告趙紫陽，他想去看望趙紫陽。北京四川飯店總經理也要我轉告：趙紫陽給四川做了不少好事，他要以最好的飯菜，宴請款待趙紫陽全家去吃飯。但你現在受限制，不自由，不能赴宴。眾所周知，四川人民早就流傳「要吃糧，找紫陽」。

再是，我在香港的一個親屬孫書玲在我家看到趙紫陽的相片，得

知我同趙紫陽熟悉就要我予以引見，聲言：她全家都敬仰趙紫陽，尤其她愛人，是個外國人，在中國工作學習過，提起趙紫陽他更是五體投地，敬佩得不得了。後來我把趙紫陽送我的一瓶龍泉酒轉送了她，她聲稱一定好好保存，並在家中展覽起來。隨後不久，她從香港寄來一首詩：

龍泉玉液趙君贈

鳴兄惜飲賜書玲；

識韓念切酒意濃，①

乞見引階誨書玲。

我也曾將我經歷的這些事同杜潤生談過，他說：這是全國人民的民心所向問題，是對正義與真理的表達。

記得哲學家王若水曾對我說過：如果實行全國人民直接選舉，人們肯定是選趙紫陽，而不是李鵬。這大概是客觀的結論吧。

我認為，不管趙紫陽今後處在什麼位置，軟禁也好，復出也好，甚至坐牢也罷，他的形象、旗幟始終會存在著。在此，我引證一下《潛龍八動》一書作者開顯②的一段評論：「趙紫陽不但在經濟上全力推進改革開放，而且在政治上也突破了鄧小平的僵硬立場，成為中共內部推進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在經濟方面，趙紫陽是鄧小平改革路線的先鋒，是中共內部市場經濟最新銳的代表。」「趙紫陽在黨內也創造新的趙紫陽模式，展示了真理和信仰的價值，展示了個性的價值」。認為中共黨內「從彭德懷到劉少奇，從鄧小平到胡耀邦……這幾位領導人當時的所作所為，都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卻一再認「錯」認「罪」，「這就極大地助長了黨內是非不分、盲目主義、唯上是從的弊端」，「趙紫陽改變了這種錯誤的傳統」，「但他冒了極大的風險」，「甚至有身死非命的可能」。

① 識韓，李白詩「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識荊，識韓，即指仰慕初識的人。

② 開顯，《潛龍八動——中國未來十年政局》作者之署名。該書由台北世新傳播學院1996年出版，香港開放雜誌社代銷。

的確，趙紫陽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破了例」的！需有非凡的勇氣！趙紫陽認為是正確的，就堅持不動搖；認為是正義的，就勇於堅持，不怕丟烏紗帽；為正義而不要「寶座」，甘受圈圍而不懼！據我所知，趙紫陽自己是作了坐牢準備的。在他寫完那篇對四中全會的答辯詞，交身邊的人看完後，說及是否會進監獄的問題，都作了考慮。為了「真理和信仰的價值」，寧願犧牲自己的一切！

正如香港寒山碧③著書評論趙紫陽所說的：「在『六四』事件上，趙紫陽才算是真正表現出一個政治家的風度，使他的形象更為高大，為後人樹立了榜樣，使人讚賞敬佩他的風骨。」正如唐朝高適④的詩句云：「性靈出萬象，風骨超常倫」，這恰是很適合於趙紫陽的一個寫照。

從更根本來說，我以為，這乃是趙紫陽終身所抱的理念精神的大發揚。

二、鄧小平的悲劇

趙紫陽說：鄧的最大隱憂是「六四」，這是他考慮的首要問題。對領導班子的安排也是從此出發。由於楊尚昆和萬里對新領導班子的看法與鄧自己不一致，顧慮以後會發生反復，進而怕影響「六四」問題。因此鄧與楊尚昆、萬里關係疏遠了，據說，他們都不能見到鄧，根本與鄧說不上話了。讓楊、萬二人靠邊站了。不然萬里從人大委員長下來，去就任國家主席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趙說：鄧從來是不接電話的。鄧晚年生活，他的秘書王瑞林⑤起很大作用。王瑞林與遲浩田⑥的關係好，但同楊尚昆的關係是疏遠的。為了使軍隊聽新領導班子指揮，只能用劉華清和張震。至於能否掌握

③ 寒山碧，香港作家韓文甫之筆名。著作有《鄧小平評傳》、《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等，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小組主席（2005—2007）。

④ 高適（700—765），唐朝詩人，以邊塞詩著稱。

⑤ 王瑞林（1930—），山東人。曾任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總政副主任、上將、中宣部委員。

⑥ 遲浩田（1929—），山東人。曾任中共國防部長、軍委副主席、上將。

住局勢，這些也不再加以考慮了。

趙還說：鄧的指導方針是，經濟上無論怎樣改革都行，什麼樣的所有制形式都無所謂，但黨的領導權力決不能放。就是說，只能單純地進行經濟改革，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絕對地不能動搖，這是鄧的絕對定律。

我說：這就是共產黨定要實行集權制，權力是不能分享的。鄧小平大概是接受蘇聯瓦解的教訓，認為正是由於戈爾巴喬夫宣導民主化、公開化，實行政治改革，才導致了蘇聯社會主義的瓦解。因此，政治上必須實行集中。鄧小平大概也借鑒於中國歷史上的教訓，認為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生「權力真空」，那麼中國一定會出現大的內亂，像清帝退位後的軍閥混戰局面那樣。

我說，現在不少人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是自相矛盾的。人們說，鄧小平在1980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了反對「高度集權」，反對「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反對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反對「革命隊伍內的家長制作風」。但他卻讓薄一波^①捎話給陳雲說：「只能有一個婆婆」。1986年底，他以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和軍委主席的名義，把總書記胡耀邦整下台；1989年，他又以中央軍委會主席的名義，把第二個總書記拉下馬，並把自己的第三個接班人又封為「核心」，實行高度集權。這樣，他自己反對的東西，自己揀回來了。他反對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反對毛澤東當「太上皇」，但又把自己擺上了「太上皇」的位置，實行「垂簾聽政」。對兩個總書記的不同意見，況且是正確的意見，也不能相容，一一予以罷黜。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如太平天國的洪秀全，一方面宣稱：「天父」、「天兄」、「天下一家」，一方面太平天國領袖們又爭權奪利、互相殘殺；一方面宣稱：「平等」、「平均」、「天下皆兄弟」，一方面又制訂等級森嚴的特權制度，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形成新的王朝。結果是，要推翻別個皇帝，自己又

當了皇帝，所謂「六道輪回」又回到了原點。現在大家都明白了，這主要是中國幾千年來封建專制意識形態根深蒂固，如不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薰陶，不經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洗禮，誰處在這個位置上也都會一樣。而鄧小平自然也不能例外。當然，如果思想不僵化，從推動人類社會進步出發，適應時代潮流，情況也會另一樣。人們公認胡耀邦、趙紫陽就是這後一代表人物。

趙紫陽最後說，鄧基本是被自己制定的「四項基本原則」束縛住了自己，而不能解脫出來，這也是他的悲劇。

我的看法，從根本來說，鄧小平認定威權政治思想，主張個人說了算，自然抱有個人專政的意識形態色彩。

據李銳談：鄧曾對江澤民交代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這就充分說明了鄧的意識形態。具有這種意識形態是推行不了民主政治的。

最後，我還轉達了童大林（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經濟學家）的意見，他說：趙紫陽今後是否可以獨立的個人身份對外活動，如同基辛格、撒切爾夫人^②那樣的國際人物，從國際上來影響國內。

趙紫陽說：他們不可能讓我外出活動，怕擴大我的影響。同時，在國際上活動，個人也不一定適應。他認為自己今後有三條路可以考慮：

- 一是寫回憶，特別是最近十年的。
- 二是搞點研究，但在國內難發表，只按國內觀點也沒啥意思。要研究出點東西也不容易，也是很費勁的。
- 三是兩者都搞，但怕精力不行，來不及。這些都是需要費很大勁的。

可見，趙紫陽雖身在「囹圄」，又至晚年，但還願有所作為。至於對時局，正如他自己所宣稱的是：「只觀潮而不弄潮」。

^① 薄一波（1908—），山西人，文革後任副總理，經政委副主任、中顧委副主任，中共「八老」之一。

^②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1923—），美國外交家，曾任尼克松、福特政府國務卿，促成美中反蘇聯盟主角之一。

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1925—），1979—1990年任英國首相（保守黨）。

9

1992年12月24日

一、人才流動利於實現人的價值

趙紫陽首先從「走穴」談起。他說，在舊社會，那時成立戲班子進行演戲，是以名角為中心或以名演員的名義來成立；其他演員甘當配角，並由名角來安排，人們也沒有意見。大家都認為沒有名演員戲就演不成，都得散夥，沒有飯吃。所以每個人都甘願當配角，工資多少也甘願受制約，也不攀比。如果認為這裏不合適，發揮不出自己的才能，就自動「走穴」，到另一個地方去。但新中國成立後，體制改變了，一切都由行政領導人來安排，誰演什麼，誰不演什麼，必須服從分配。名演員也不得干預，人才的作用難以合理發揮。至於工資，同樣也是行政等級平均分配。在漲工資提級時，不提誰，誰也不幹，鬧意見。如同國家搞工資改革一樣，科技人員上去了，機關幹部工資低也得提；而工廠、企業是生產第一線不提也不行。這樣，形成輪番提，結果工資改革幾次都失敗了。

我說：不只工資改革，就是機構改革幾次也是失敗的。機構改革變成換個名義安排幹部提高級別，安排私人拉幫結夥的場所。結果，機構愈改愈臃腫，人員愈減愈多。

趙繼續說，這樣一切都採用行政干預、行政手段安排人員的做法，「人才」的價值實現不了。目前進行體制改革，實行人員流動，有才能的人辭職「下海」了，或被聘請到其他單位去。表面看來是有些亂，實際上，只有這樣，「人才」的價值才能得以實現。這如同過去兩種體制、兩種價格的改革一樣，表面也是亂。現在看來，正是在改革中首先發展了體制外的各種經濟成分，同時在體制內，對國營企業實行了計畫內與計畫外兩種價格，使體制外的各經濟成分得到了原料、材

料，而得以發展。國營企業也由於有了計畫外的自銷產品而得到額外收入才「活」起來。從而發育了市場，使經濟繁榮起來。

趙還說：這樣一來，市場機制形成了，有了競爭；再加上人員流動，就可以打破「易地做官」、由行政安排人員的做法；實行競爭上崗，從而實現「人才」的價值。

據我瞭解，趙紫陽是很重視人才的。這是他個人的一個特色。

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所在

趙紫陽強調說：中國體制的改革，如果單從體制內來進行改革，那困難和阻力都是很大的，無論休克療法或摸著石頭過河都很困難。問題在於國有企業是大一統的格局，沒有競爭，沒有市場機制是很難改革的；而國有企業本身又是企業辦社會，負擔太重，沒有效益，很難去進行改革。因此，出路在於發展體制外的經濟成分，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形成市場經濟機制，把國營企業推向市場；市場經濟越發展，越有利於國營企業的改造。從而說明，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成分的發展，既可解決就業，又能增加稅收，解決財政困難，同時也繁榮了經濟。

趙說，總之，不發展體制外的經濟成分形成市場競爭機制，國營企業是改造不了的。這是中國體制改革成功的經驗之一。當然也不放棄國營企業內部的逐步改革，如放權、讓利、擴大企業自主權等。過去自己對中國的體制改革，首先從發展體制外經濟成分，實行計畫內與計畫外兩種價格的作法，是被迫的，缺乏理性自覺。現在回頭看來，這恰恰是中國體制改革成功的所在。如果單純從體制內去改革，肯定不會成功，又會拖下去；而越拖下去，就越是人心慌慌，必定會使生產下降，發生通貨膨脹，結果只能發生動亂，改革也會以失敗告終。原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道路就是如此。

在我提到國營企業內部進行改革，現在採用股份制時，趙說，問題是採用什麼樣性質的股份制。如果是國有性質的股份制，互相滲股去進行經營，再加上市場經濟競爭機制不能形成，那麼情況就會同國

營企業原本的狀況差不到那裏去；如果是出售股票形成股份，又會生效益低，人們買不買股票的問題；如俄羅斯葉利欽採取發股票的法，使群眾獲得股份，人們往往會認為來的是意外之財，根本不予惜而會隨便花掉。現在的情況是，國有企業一與外資合資就活了。是什麼問題呢？那就是，政府不能再干預企業了，企業也不能再辦會了。國家只管企業工資增長指標，政府只管徵稅，其他一切均由企業獨立自主地去經營。這樣，企業經營機制自然就轉換了。

也基於此，趙紫陽認為，中國私人企業或個體企業也可以採取這個辦法去和國有企業合資經營。趙明確說：既然允許外國人可以這樣辦，為什麼不可以允許中國人也這樣辦呢？這就是對國營企業採用間接辦法，不失為我國國營企業改革的一條道路。

10

1993年1月4日

一、在市場經濟帶動下矛盾暴露了

趙紫陽首先給我讀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①中的一段話：「對於現在社會制度的不合理與不公平，和對於理想變成了荒唐，幸福變成了痛苦的日益覺醒的認識，不過是一種標誌，……」

趙說，這種舊社會的不合理、不公平，不能訴之於道義和倫理。他又引恩格斯的話說：「因此，階級的劃分，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也只是對於一定時代和一定社會條件而言，它以生產不足為根據，它將為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

趙說，原來馬克思設想「公有制」實行後，人民群眾會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不再受奴役，可以發揮出極大的積極性；同時國家又實行計畫管理可以有效地配備利用資源，從而提高經濟效率，可以顯示出比資本主義更多的優越性。但是實踐的結果並非如此。

趙認為，公有制必須在充分發展的私有經濟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機制作用下，才能發揮經濟效率。為此，對於公有制企業，除公用基礎產業、國防、宇航等有關國家安全的少數產業外，其他大量的國有制企業，要採取合資、股份化、租賃、出售、兼併、破產等方式予以徹底改造；並把國有制企業推向市場。現在，在市場經濟的帶動下，所有的矛盾都暴露出來了：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國營企業。由於原來國有企業不是經濟單位，而是社會單位，是企業辦社會（各機關單位也是辦社會），對所屬人員的生、老、病、死及其子女就業都要包下來。因此企業沒有效益，改造起來困難很大，尤其是人員的安排問題。這幾千

^①《反杜林論》，恩格斯全面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1978年在德國出版。

萬工人的再就業，就是最大的社會問題，容易引發社會動盪。

他說：其次，是農業問題。由小農經濟轉向農業產業化，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是很艱巨的工程。過去幾年發生的通貨膨脹，就是由於農副產品供應不上。所以鄧小平曾警告說，中國的經濟如果出問題，就出在農業問題上。再加上中國農業基礎薄弱，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很大。

再次，由於市場經濟的實行，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存，外資的引進，個體經濟、私人經濟的發展，股份化的推行，公司制的發展，法人經濟的存在，於是各種經濟利益集團出現了。這種經濟基礎的變化，要求決策分散化，民主化，這跟上層建築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產生矛盾，客觀上必然要求政治上的開放，只採取控制辦法是不行的。

他還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與人的機遇不同，沿海地區與內地的機遇也不同，從而發生收入差距拉大，尤其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權錢交易，已使政府這個機體產生腐敗，引起社會廣大群眾的普遍不滿。

他最後說：以上這種種矛盾的積累，如不緩解，容易引起社會性的危機。

二、複雜麻煩問題簡單化處理

趙紫陽說，有些複雜而又麻煩的問題，採取簡單化的辦法，就圓滿地解決了。例如，農業生產問題。過去人民公社時期，鄉村幹部一年四季催收、催種，並要安排好種子、肥料、農藥，還有群眾的吃、燒、穿、用等；每天還要敲鑼打鼓帶領群眾上山下地，以及完成上級佈置的各項任務，忙個不停。可以說，鄉村幹部辛苦極了。結果，土地產量卻越來越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更是越來越低。改為「承包制」後，鄉村幹部只管公用事業，如水利、修路和計畫生育與催交公糧等，而且也只是分配一下數字，其他什麼也不用管了；但土地產量反而上去了，群眾的積極性也提高了。又如，小商品生產問題。過去省、地、縣各級政府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日用百貨小商品的需要，年年開會，

搞調查研究，作計畫，安排項目，分原料，搞協作，進行生產，並實行行政性調撥分配，各級政府幹部工作人員都費很大勁，但每年都滿足不了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的需要，群眾非常有意見。後來採取「放開」的辦法，允許個體、私人進行生產，進行經營，允許群眾去市場進行購買、交換；政府只管維護市場秩序、防止假冒產品、進行徵稅，其他什麼都不用管。結果是社會上什麼日用百貨小商品都有了，市場繁榮，群眾滿意了。

趙又說，就是過去在革命戰爭年代，在農村建設根據地時，也有類似的問題。開始農村是在封建勢力統治下，對我們實行封鎖；村政權都是為上層代表人物豪紳所掌握，對我們進行刁難，不給糧款；而基層群眾沒有覺悟，不敢接近依靠我們；外加日本鬼子的連續掃蕩進攻。所以，那時我們在農村吃、穿都很困難，要糧沒糧，要錢沒錢，更不用說對兵員的補充了，簡直是難以立足。後來，發動群眾先實行減租減息，又實行土地改革，給農民以土地，同群眾建立了魚水關係，形成了命運共同體，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要糧有糧，要錢給錢，要人有人了。

因此，趙紫陽說：對一直困擾我們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也應採取這種類似辦法，那就是：明確產權關係，自主經營，實行自負盈虧後，情況一定也會起大的變化。問題是目前國有大中型企業辦社會，負擔太重，虧損又嚴重，拖的時間越長，包袱越重。

我插話說：國有企業不但虧損嚴重，而且國有資產的流失相當嚴重，負債率也嚴重。現在一些國有企業靠國有資產過活，先是吃流動資金，後來吃貸款，致使國有企業負債率越來越高，已引起社會上的強烈不滿。

趙接著說：國有企業的改革，首先碰到的是對多餘人員的安排問題。在越南，是採取對每個失業工人按每個工人的工資和工齡一次性發給幾年補償金的辦法，給他們作本錢，讓個人到市場、社會上去搞經營活動，自謀職業，政府就不管了。至於中國，將來採取什麼措施，看當局的決策吧。不過，中國由於農業結構的變化，從農村轉移出來

的剩餘勞動力會更多，這都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據我理解，趙紫陽在這裏談的所謂「簡單化處理」，是讓群眾有「自主權」。凡是群眾自己的事，都由群眾自己去當家，去管理。事實上，這類事真正交群眾自己去辦，一般都能得到比較圓滿的解決。因為，這樣可以把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到最高度。如果由政府 and 幹部人員去當家包辦處理，把群眾視為附屬物，當作可擺弄的棋子；那一定是辦不好，也包不了。而且還會把事情搞得複雜化，並引出麻煩來。

我說：回想過去革命戰爭年代，在根據地我任中共縣委書記時，感到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無論人、財、物都有很大的自主權，上級黨組織只是進行方針政策的領導；在上級精神指導下，人們在具體工作中都發揮出了極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但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建設時期，我任大型企業廠長時，感到情況完全不同了。無論人、財、物、產、供、銷，都是由上級各行政部門統一安排，所有規章制度也是由上級部門制訂，如同千條鎖鏈一樣把你捆綁起來，只能這樣去滑，不准越軌一步，把工廠企業完全當作行政的附屬物，致使工廠越來越萎縮。我原所在的瀋陽航空發動機廠，原是航空部的一張王牌，後來據聞航空部主要領導人曾聲稱：這個廠將來不得不以瓦解告終。因此，我對趙紫陽談的以上各點，是深有感觸的。

11

1993年4月3日

一、老人領導：中國政治領導的特色

趙紫陽說：看來，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是需要有強人、有權威的人來領導。這是由於中國地域這樣遼闊廣大，發展又極不平衡，經濟、文化發展又這樣落後所決定的；從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來看也歷來如此。目前中國實行的是「老人政治」，由元老來領導，這是中國過去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是他們領導取得了革命勝利，建立了新中國，自然還要由他們來領導。這是誰也代替不了的事。如同歷代封建帝王那樣，是自己打下了天下自己坐，以後也自然應當是由自己的家族來進行統治，別人是不能分享的。總而言之，如同一個家庭是由家長創業置的家產，自然應由家長來當家，這都是中國的政治特色。

我插話說：據我所知，中央顧問委員會^①開會討論時，都不同意取消「顧委會」，認為這樣一來，這些老同志連開會提意見的地方也沒有了，因此要求至少要保留一個顧問小組。總之，他們都堅決不同意完全取消掉「顧委會」。當時是薄一波在主持會議，沒有辦法收場，不得已而把鄧小平亮出來了，說：這個決定是鄧定的。這樣一來，會上都鴉雀無聲，誰也不再提意見了。

趙說：這在外國是不會這樣的，這就是中國特色。

我聲稱：中國這樣自上而下臣服於強人，臣服於權威的國民性，所謂中國特色也是有社會經濟基礎的。由於中國是長期的農業社會，自然經濟、個體農業，農民的個體經濟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極為脆弱，造成貧困、饑餓，他們不相信自己能解救自己，把希望寄託於「開明」

^① 中顧委，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共1982年為解決老幹部退休問題而設立的過渡性機構，1992年撤銷。

君主、「清官」或強人、權威，普遍存在著依賴心理。自古以來還長期受儒家學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套倫理觀念的影響，再加上共產黨多年來一直強調個人一定要服從組織，下級要服從上級，要聽黨的話，要做順從的工具。實際上不讓提不同意見，空前地強化了依附觀念，因此人民群眾哪還有自主意識呢？都是以強人、權威的意志為意志。實際上乃是奴隸性、奴才性的繼續發展。

趙又說，鄧小平這個強人、權威一旦走了，從歷史看，一般來說，領導層是要起變化的。趙分析這有三種可能：一是，再有一個強人權威出現。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沒有這個歷史條件，再說，現在是民主潮流，人們一提權威、個人統治就反感，思想上根本不接受。二是，發生動亂。由於實行市場經濟和社會進行轉型，引發出許多社會矛盾，積累起來容易形成共振、發生動亂。這是人們所不願意看到的。首先，全國人民思穩怕亂。其次，根據國際國內形勢分析，這種可能性也不大。不過若干年後，中國農業會發生危機。由於基本建設，每年有四百萬畝土地被佔，而人口卻在迅速增加；農民期望值又高，地區懸殊、城鄉差別又在拉大，再加上負擔重，收入減少，因此，會發生荒蕪土地，嚮往城市，形成大量農民外流湧向城市的局面。三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與地方各省、市委協，實行分權，擴大地方自治權，這個可能性比較大。

趙說：道理很簡單，由於實行了市場經濟，呈現經濟多元化，出現不同的利益集團，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要求政治上的開放，企圖再照原來的辦法進行統治是控制不了的。例如農民已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制，一家一戶進行生產，走向市場了，你還能控制住嗎？

趙又說：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今後固然不適應，但西方的議會民主，多黨政治輪流執政的辦法，也不一定很好，也不是理想的制度。他停頓、思索了一下後繼續說：在一黨制領導下，應開放輿論，開放報禁，實行言論自由，進行公開監督。香港是殖民地統治，政治上是集中的，權力是不能分享的，但人民是自由的，報紙是開放的，可以公開批評任何領導人，也可以進行遊行示威，對政府及領導人予以制

約監督。

我理解趙紫陽的想法，共產黨執政定要實行民主的開明政治。

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與事實不符

趙紫陽說：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紀，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私人佔有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的發展會使兩極分化日趨嚴重從而敲響資本主義的喪鐘，但二十世紀的事實是，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出現物質產品的匱乏，相反是物質產品極大的豐富；也沒有形成工人階級的日益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相反人民生活水準普遍提高，出現了龐大的中間階層，藍領工人減少，白領工人增多，歷史事實的發展同馬克思的分析並不相符。因此，這說明私有制也能使物質產品豐富，人民生活水準提高；這說明私有制也能發展生產力，推動社會進步，實現社會文明，並且也能使資本主義各國一定程度協調起來，共同發展，走向繁榮。歐洲聯盟的成立，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相繼出現，即可證實。

在此，我插話說：從我國改革以來的經濟增長看，也主要來自非國有經濟成分的發展，每年都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長。

趙繼續說：私有制也能為社會帶來繁榮，這是馬克思所沒能預見到的，但這卻是資本主義的實踐所證明了的事實。而東歐的巨變，蘇聯的瓦解，實際上又是公有制的失敗。所以，「公有」、「私有」的劃分，不能作為社會主義形態與資本主義形態的標誌了，但這目前還是「禁區」。

我說：過去關於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經過多年的爭論和理論界的探討，認識到計畫與市場都是手段，並不是姓「資」姓「社」的標誌；現在理論界又提出了所有制主要是手段，生產力才是目的的論點，公有制也不再被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標誌了。

12

1993年4月28日

一、必須解決所有制問題

趙紫陽說：對國有企業的改造，採取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股份制解決不了問題，因為都是公有制，跟過去差不多。只要自負盈虧這個問題不解決，只解決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也是空的，這就必須解決所有制問題。他認為採取國有民營的方式、租賃的方式以及中外合資，來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以及中外合資比較合適；當然其他方式如承包、出售和股份化，以及劃小核算單位、進行獨立核算等辦法也可以採用。但不管怎樣，都必須把國有企業都推向市場，都去自負盈虧。

我的體會是：趙紫陽之所以一再強調對國有企業非動大手術不可，非解決所有制、明確產權關係不可，是基於他的一個明確認識，即：國有制在東歐、蘇聯都是失敗的；中國過去搞的公有化程度也是超過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準，必須退回來，實行徹底的改造。搞市場經濟必須明確產權關係。

二、斯大林、毛澤東的悲劇在於沒有資本主義補課

趙紫陽說：經過東歐、蘇聯和中國進行半個多世紀的那種社會主義實踐說明，在落後的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取得革命勝利後，不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必須補資本主義這一課。他認為：在這些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條件並不具備，更談不到成熟；硬要去建立社會主義，必然會畸形發展，使社會主義變形。因為是入為地要推行，廣大群眾並不同意，採取消極怠工，甚至反對；這就必然採取強迫手段，實行高壓政策，甚至不惜用鎮壓的辦法，這自然要強調專政、強化統治，搞個人獨裁和製造個人迷信；同時對不同政見者予以批鬥或鎮壓，而

1993年4月28日

斯大林和毛主席個人也就是這樣走向了悲劇。他認為，無論在蘇聯採取強迫實行的農業集體化，或在中國採用權威力實行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其對生產力的破壞都是很大的；死人也是極多的！所以戈爾巴喬夫說：在蘇聯進行社會主義的試驗是個「慘痛的教訓」，葉利欽則說是「一場災難」。這都是由於沒有補資本主義這一課所造成的。

趙又說：造成這種嚴重的後果，不能簡單地認為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過錯，也不能簡單地歸咎於封建帝王思想的遺毒，而實際是硬要推行「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理想所致。因此，看來第二國際^①的理論是比較實際的。那就是資本主義愈發展，社會生產力愈提高，物質產品愈豐富，亦即社會愈富足，社會主義的實施就愈容易，愈穩妥。那就是資本主義愈發展，社會主義的成分就愈多，即所謂「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這實際上也是馬克思的原理。那就是社會主義必須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條件下才能產生，相反，第三國際^②的理論則是「烏托邦」。

趙紫陽還說：必須恢復馬克思這一原理，必須補資本主義這一課，這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但這卻成了禁區。如果這樣提出問題，有被極「左」派反撲的危險，稱之為復辟資本主義。為此，應明確地說：這一原理不恢復，就難以真理服人。

聽到趙的這段分析，我感到很深刻，這大概是他根據蘇聯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與中國四十多年的實踐的沉痛教訓，對照馬克思的原理，為了挽救社會主義，而發出的一个呼聲，也說明他是擺脫了國際教條主義束縛的，有理論自負的勇氣。

總之，據我瞭解趙紫陽的觀點，就是現階段在中國要實行新民主主義，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條件有節制地發展資本主義。

^① 第二國際，即「社會黨國際」，1889年成立，主張實行社會民主主義。一次世界大戰時第二國際已名存實亡，社會黨國際則仍是當今最大的國際政黨聯盟，2004年成員達168個。

^② 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1919年在列寧指示下成立，總部設於莫斯科，中共是其支部（國民黨曾申請加入，被拒）。1943年於二次世界大戰中宣佈解散。

三、走漸進的改革道路效果好，讚揚安志文

趙紫陽說：中國的改革走漸進過渡的道路，效果是好的，是成功的；實行價格雙軌制是不可避免的，所謂放開價格、緊縮貨幣、一步到位的改革道路是不行的。因為市場機制還未形成，沒有競爭，國有企業還處在壟斷地位，放開價格只能使通貨膨脹，發生社會振盪，吃虧的還是廣大人民；只有放開計畫外的、控制計畫內的，採取雙軌制，才能避免大的震盪。這如同在地區上放開沿海、控制內地是一樣的，首先實行發展沿海戰略，然後再向內地逐步推進。否則，全面放開會造成混亂，甚至不可收拾。

趙又說：當然實行雙軌制，有人會利用計畫外與計畫內的差價來鑽空子，產生腐敗，這只能是付出的代價，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從亂中求治。

談到這裏，他又對比說：蘇聯改革的失敗，一是首先從政治改革開始，而不是從經濟改革開始，政治上一亂，就不可收拾；二是採取了休克療法，就是完全放開價格一步到位，使通貨膨脹起來，人民遭受很大痛苦，代價很大。

我插話說：中國的改革走漸進的道路，沒有發生大的震盪，也得益於安志文這個參謀。經我這些年在體改委參加活動，同安志文交談接觸來看，感到他的思想很實際、很實事求是、也很穩妥；他既不作目標規劃，也不做模式設計，更不提激進主張；給我的印象是摸著石頭過河，其做法是先易後難，從干擾最小、比較容易突破的地方進行城市改革試點，選擇湖北沙市和江蘇常州市，來打擦邊球；在領導掌握上，又是從企業要有自主權，強調權力下放開始，以發揮基層的積極性，這就改變了過去單純行政性作法，避免了過去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老路。在步驟上，又是從企業，從群眾要求最直接最迫切的利益出發，所謂：放權、讓利、鬆綁。政策上首先實行對非國有經濟，對個體、集體、私人經濟，合資企業和特區予以優惠照顧，來培養商品經濟的根基和立足點；在方式上，採取群眾容易接受，也最容易顯示實惠的承包制開始。又加上國家在調控方面實行價格雙軌制，實行

「調」、「放」、「管」相結合的政策。

就這樣，使中國的改革走上了比較穩妥漸進的道路。

趙紫陽隨即說：安志文是一個處理問題很謹慎的人，他的話是比較可靠的。採取這種漸進逐步過渡的辦法，可以把市場發育起來。在此，他又重複強調只有放開計畫外的，才能使個體經濟、私人經濟、鄉鎮企業和三資企業得到原料、材料、能源，使體制外的這一部分得到發展，擴大起來，形成市場經濟機制，才便於把國有企業推向市場，同時，對體制內的這一部分，也實行放權讓利承包辦法，使其也有點自主權，也提高積極性，也活起來。

最後，趙興奮地說：這樣一來，經濟增長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又避免了混亂。

13

1993年5月6日

1、關於甚麼是社會主義

趙紫陽說：關於甚麼是社會主義問題，不應從原則概念出發，不能以邏輯思維推理所構成的目標模式作為定義，而應從經濟的歷史的實際發展出發；也就是說，不能從人們的頭腦中「理性」地來構建模式。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究竟是甚麼樣子，確實誰也說不清。過去把社會主義定為就是計畫經濟，經過實踐證明計畫經濟體制這條路走不通；過去曾把按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尺度，結果是從來沒有兌現過，事實上也無法兌現；過去一直也是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標誌，結果是實行公有制的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高投入低效益，生產力發展或則遠不如理想或則帶來許多問題。實踐證明實行「公有制」的結果是失敗了。所以說，社會主義不能預先設定甚麼框框、甚麼目標模式，而應從如何發展生產力出發。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只有把社會生產力順當地發展起來，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才能表現其旺盛的生命力。社會主義的標誌只能是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

因此，趙又明確地說：如果改變所有制，實行私有化，如同實行市場經濟那樣，都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社會進步有利；應該說，也可實行私有化，來發展資本主義。這也沒有甚麼可怕的。即便明確地說就是要補資本主義這一課，也沒有甚麼可以責難的。

趙還說：現在實行市場經濟，可以說已為大家所公認，並列入了憲法。但這只是突破了一半。因為這裏邊還有姓「資」姓「社」的問題。有人還會說。你們實行的是姓「資」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姓「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而還存在「左」派反攻倒退的潛在

危險。〔此時他又不無遺憾地說〕再加上現在領導層還一再強調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前提條件。但在這個條件下生產力卻發展不起來。〔他歸納似地說〕歸根到底，這還是所有制這個禁區不能突破。〔他強調〕應該說不管是甚麼所有制，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利，都可採用，不能回避這一點，要突破這個禁區。

〔在此，我體會到趙紫陽的思維方式是著重實踐的，不拘泥於理性的思考。因此，我引證伯恩斯坦^①有一段話：「對於一種以發展思想為基礎的社會學說，不可能有甚麼終極目的」，「人類社會是處在不斷發展過程中的，根據這個學說可以有大的方針路線和目標，但不能有最終目的。也不應從頭腦裏先驗地虛構出來，而必須從運動的實際鬥爭本身出發形成起來的。」這是有道理的。〕

〔我的理論水準導致〕我說：過去我們正是設計了一個「終極目的」，資本主義國家說它們的是最好的目標模式，社會主義者認為自己的是最好的模式，法西斯主義則說他們的國家社會主義是最好的目標模式，從而彼此不擇手段地去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導致了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幾次大災難。其實，人們是不能為社會設計甚麼模式的。我是非常贊同哈耶克^②所著的《通往奴役之路》^③一書中提出的論點，即社會歷史是人所創造，但人不能去設計。現在人們逐漸認識了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乃是一種希望，只能作為對理想信念的追求，不能作為目標模式。

二、無產階級專政的由來

趙紫陽又繼續說：至於建立社會主義問題，看來在經濟落後的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取得革命勝利後的主要任務，是如何發展生產力

①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德國人，第二國際右派領袖，批判馬克思革命專政學說，被馬列正統派斥為修正主義。

②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1889—1992），英國經濟學家，主張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與凱恩斯主義。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獎。194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指出計畫經濟必然導致極權主義。

的問題。也就是說，甚麼辦法對發展生產力有利，就採取甚麼辦法，不應從以建立一個甚麼樣的目標模式的制度出發，但要明確地說明，是向社會主義道路發展，要為建立社會主義創造條件和準備條件。這樣，就可避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所走過的路程給人們所帶來的痛苦和災難；這也修正了我上次談的，關於在落後的國家取得革命勝利後不能建立社會主義的提法，而應是不該過早地建立社會主義。這兩個說法實際上是一致的，不過這個提法更精確些。

趙紫陽又說：過去我們搞社會主義是超越了階段。所謂「改革」，就是要把超越了階段的一些作法都調整過來，這個調整也是根據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中所闡明的原理〔這時趙紫陽給我念了一段馬克思的話〕：「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趙這時頗有感歎地說〕過去我們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所作所為，恰恰是違背了馬克思的這個原理。由於建立社會主義缺乏條件，超越了階段，只是按主觀意志辦事，這自然就要靠行政命令來推行，實行強迫甚至採用鎮壓的辦法；為了順利起見，自然要製造個人迷信，靠「權威」來駕馭局勢；為了統一意志，必須搞輿論一律，不能允許新聞和言論自由；為了穩定，進行統治，當然不能允許有不同政見者存在，實行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更不能允許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這就自然走上了獨裁專政的道路，而且是要使人人都變為「馴服工具」的思想專政道路。

我說：過去我一直迷惑不解，無產階級專政的矛盾為甚麼轉向了人民內部，對人民也實行專政。我現在才初步明白，這是由於條件不具備，而硬要推行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在決策者看來，為了偉大的事業，對這些人進行專政、實行鎮壓是應當的，因為他們不贊成推行新制度，就是反社會主義，我理解在這裏趙紫陽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

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的在演變。這可能也是馬克思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大課題。

14

1993年5月16日

廖季立向趙紫陽談社會主義問題

廖季立^①寫了一篇論文，讓我轉交趙紫陽後，想向趙紫陽當面陳述自己的見解，經趙同意由我陪同作了這次談話。廖按準備好的提綱連續地講了下去。

廖季立說：關於社會主義乃是過渡階段，現在是初級階段，將來可能有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

一、關於所有制問題

社會主義是在舊社會即資本主義基礎上生長出來的。它必然帶有資本主義的痕跡，正如封建主義是在奴隸社會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樣。我們新中國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因此，過去只反資本主義思想而不反封建主義思想是不對的。

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大家所公認了，這就必須有多種經濟成分，從而必須是多種所有制形式；而所有制乃是一種經濟組織形式，根據生產力的水準和發展階段而有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即所有制形式。無論哪種社會制度，所謂單一的純粹的經濟組織形式是不存在的。

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企圖用社會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來代替私有制，而列寧、斯大林是用國有制來突破和代替私人獨佔制。但是，用混合所有制如實行股份制，使產權社會化，那就是說，已經不是簡單的私人資本而是

社會資本了。它已為社會所管理了，它也能突破和代替私人獨佔制。

事實證明，國有制企業效益很差，是失敗的。這從東歐、蘇聯即可說明。過去馬克思提出的要實行「公有制」，乃是一種理想狀態，是邏輯推理的產物。當然，社會最終的發展還應是社會所有制。現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也突破了自己的所有制形式，由於股份制的出現，「私人資本」變成了「社會資本」的形態，股份的主要持有者已不再是個人，而是各大公司和各種基金會組織，並由經營者階層管理，資本主義的產權也變得模糊了。

所以，社會的劃分不應以所有制為標誌，而應以生產力為標誌；社會主義應當是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當然還有共同富裕），也不應以哪種所有制為主體或為優勢來劃分，更不應以先驗的概念模式和定義去強加。

趙紫陽插話說：東歐的巨變，蘇聯的瓦解，就是公有制的失敗。

廖季立繼續說：在中國即使資本主義成分多，私人經濟比重大，而能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也是好的。不能回避這一點，因為政權在我們手裏，怕什麼？還可以通過二次分配來解決共同富裕問題。這樣，既解決了發展生產力問題，又能達到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生活的目的。

二、關於分配問題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然有多種分配形式，而且必然存在不公。這是由客觀的經濟發展水準所決定的，所謂公平分配是相對的。它不只是根據所有制，而且也根據生產力並受生產力發展水準所制約；同時，分配問題主要還是根據經濟效益而來。資本主義是強調經濟效益，缺乏公平分配，致使消費不足、生產萎縮，產生經濟危機。原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強調公平分配，但缺乏經濟效益，形成短缺經濟，總之，都走向了極端。實際上，效益應是第一位的，沒有效益就談不上公平分配；沒有效益的公平分配就是共同貧窮。

過去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在波羅的海沿海諸國，如瑞典、挪威，

^① 廖季立，中共經改初期，官方經濟學界主張商品經濟的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

採用國有民營，實行私人經營，提高了效益；又用國家進行干預，實行二次分配的辦法，來解決公平問題。這個方向和辦法是對頭的。

三、關於市場問題

計畫與市場是雙向調節，都是手段，這已為大家所共識。但應明確的是，市場起基礎作用，是主導的；而計畫是輔導作用。現在我國的情況卻相反，是計畫在起主導的作用、決定的作用。這樣，市場機制就建立不起來。

在我國現在談市場經濟問題，實際是經濟體制問題，就是要從計畫經濟體制轉到市場經濟體制上來。目前制約市場經濟發展的乃是政府行為，是政府過多地干預企業；政府職能不轉變，不削弱，市場經濟就難以發展。過去存在的國有、省有、縣有經濟都是行政的產物，都是政府的附屬物；不實行經濟區域化，不改變產權關係，不採用股份制，只轉換企業經營機制不行。而市場經濟也發展不起來，特別是地區分割，重複建設，這些老問題也解決不了。

一般說來，計畫調節只能解決總量平衡、規畫問題，即市場不能解決的問題。真正調控市場的還是銀行的作用。目前，我國的銀行乃是財政、計委部門的附屬物，都在向銀行「透支」；中央銀行不能起到中央銀行的「獨立」作用，中央銀行與各專業銀行的關係也未理順；而各地銀行又是行政劃分的產物，也是各地政府的附屬物。

看來，市場經濟，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資產階級領導的市場經濟。

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個政治形態問題，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政治即無產階級民主問題，而不是一種體制和制度問題。但在我國卻形成了一種專政體制，這跟馬克思的原理不相符合。

在革命取得勝利後，在剝削階級消滅之後，再搞專政，只能是專無產階級自己的政，來打擊自己的人民。

趙紫陽插話說：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名詞，在東歐、原蘇聯早已放棄。

我也插話說：在法國，法共二十二大於1976年就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1977年放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並在政權形式上提出了「自治管理」的主張。後來廢除了黨的民主集中制。

廖季立繼續說，而我們卻一直堅持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馬克思只是在巴黎公社失敗後的暫短時間內總結出來的，是作為一個經驗教訓提出來的。認為對資產階級沒有實行專政，給了敵人以反撲的機會，致使革命遭到鎮壓而失敗。但在革命勝利取得政權並樹立了優勢後，應是強調民主與法治，來團結社會上各方面的力量，來建立新社會、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如果再強調無產階級專政，那就要把其他階級和社會成分推向對立面來進行打擊。至於社會上的犯罪、犯罪分子，那是任何社會都有的，也是任何社會都發生的普遍現象。只能依法進行懲處，而不能混淆對人民也實行鎮壓。

中國、蘇聯的經濟教訓是：實行所謂民主集中制，實行所謂的民主，實際上都是為了集中；這種集中制原則所稱全黨服從中央，實際上形成了服從一個人，結果是個人說了算，變成了個人專政。

趙插話說：實際形成了領袖專政。

五、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的走向

廖季立說：總的說來，今後社會主義的發展應是一體多式；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是一個固定模式，也不能有一個什麼樣的先驗模式。

趙插話說：社會主義應是實踐的產物，是根據實踐總結出來的；也是一種不斷變化著的社會形態，是在逐漸地完善，不斷地發展著。

廖繼續說：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多式多樣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也應有多樣模式。西德現在認為自己實行的是社會民主主義；第二國際認為自己實行的是民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聲稱自己也是向社會公平、富裕的道路前進，生活比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還好；就是台灣李登輝也宣稱要實行「均富」的目標，世界總的趨勢是，都要在和平競

賽中來提高人民的生活，推動社會朝進步方向發展。

中國的改革過去經過多年的爭論，突破了計畫經濟；改革發展的下一步將是突破公有制。這樣一來，社會主義的標誌是什麼？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確實說不清了。看來，實行公有制固然不行，而以公有制為主體也不行；就是公有制佔優勢也不行；只能佔25%。因為它沒有效益，發展不了生產力，不能走向富裕。

趙插話說，馬克思過去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有兩點估計不足：一是對資本主義容納科學技術的能力；一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動調節的能力。看來，今後社會主義的發展，只能是和平過渡，再搞暴力革命這條路是走不通了。今後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只能依靠非國有經濟成分，必須大量發展非國有經濟成分；中國今後領導層的走向，既不會有戈爾巴喬夫那樣強有力的人物出現，敢於突破舊體制舊框框；也不可能有其他政治勢力出現能與共產黨抗衡，而人民又是思穩怕亂，因此，還是依靠現有領導層中的積極力量來推動社會改革前進。否則，會發生以暴易暴，推翻了一個專政政體，又會來一個新的專政。

廖繼續說，在中國進行改革的過程中，過去是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長期爭論，今後又會輪到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爭論了；這兩者是否能內在的統一？看來，只有採取混合所有制，進而實行社會所有制才能統一。國有制不是社會主義的標誌，因為資本主義也有國有制；私有經濟佔的比重大也不是資本主義，因為中國有共產黨的領導，可以走向共同富裕。應該是哪種所有制能發展社會生產力，就採取哪種所有制，而不問姓「資」姓「社」。現在，也不宜提以公有制為主體，因為公有制實踐證明沒有效益，是失敗了，但可提公有制的領導作用、主導作用；也不宜把私有經濟作為有益的補充，應提是國民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或者說，都是國民經濟的主體，都應當去進行保護和維護，一視同仁地支持其發展。

我補充說：廖老有一次對我說，私人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應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這樣明確，私人經濟就發展不起來。

廖最後說：先進社會的標誌不在所有制，而在效益；沒有經濟效

益的社會制度是沒有生命力的。既然確定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是共同富裕，那麼公有制就不能作為它的標誌，因為大鍋飯沒有效益。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只能是實踐的產物，而不能是先驗的固定的模式，不能是邏輯的產物。

趙紫陽最後也說：自己過去對馬克思的理論學習瞭解很不夠。

廖季立告別時說了，以後再有什麼看法再向你匯報。

國家體改委張昌鳴得知廖季立和趙紫陽有這次談話，曾向我索要，以便作為歷史材料存起來。隨後我就將筆記抄去一份，他們閱後，對我說：廖的這些觀點，是代表體改委一般人的看法。

15

1993年5月31日

一、鄧的政經兩手都是硬的

這次見面，首先我說：去年鄧南巡講話對新領導班子表示了不滿；後來鄧又在首鋼作了公開批評。當時人們在議論鄧對領導班子要作調整了；現在由於李鵬出訪，在法國受到嘲弄，後又有病住院，這次人大開會又遭到反對；而人大喬石、田紀雲^①和政協李瑞環講話，又一再強調民主法治觀點，得到了好評。這樣，鄧是否會進一步考慮人事安排呢？

趙紫陽說：這是不可能的。鄧不會再對新領導班子人事作什麼安排了。接著，趙紫陽以十分堅定的口吻說：根據自己和鄧八年打交道的結果，鄧的脾氣我是瞭解的，凡是他定了的問題，是絕不會改變的。

趙以他自己過去的切身感受，明確地指出：鄧在政治上堅決走的路是黨的領導權要集中，決不能分權，這一點是絲毫不能改變，也絕對不能動搖的。在經濟上可以搞西方市場經濟那一套，大力去進行改革開放，這一點也同樣是不能改變、不能動搖的。〔趙特別強調〕鄧的這兩手都是硬的。誰要是觸動了這兩條，他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香港報紙評論說在政治上〔指要民主〕不要碰他，否則他說一句話：要「反自由化」，這就要被「左」派抓住，被利用來打擊改革勢力。〔趙又頗有些傷感地說〕「六四」事件中，正是當時有些激進的口號、言論被利用，被收集起來，送到鄧那裏，激怒了鄧，才開始進行了鎮壓。

^① 田紀雲（1929—），山東人。80年代任國務院副總理，秘書長，中共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中共十六大退休。

趙把話轉回來又說：同樣，關於對新領導班子鄧要維護江、李體制，這是鄧已定了的問題。雖然對李鵬不滿意，但為了「六四」，也不能再有其他迴旋餘地。既然如此，鄧是不允許有人再有其他意見的，也正因為如此，由於楊尚昆、萬里對江、李有不同看法而下台了；不然萬里從人大委員長下來，任國家主席一職，是完全順理成章的事。

我插話說，據我所知，萬里下來之後，曾對其親近的人鬆了口氣地說：「自己總算是安全著陸了」。

趙說：至於人大、政協，在鄧看來乃是無足輕重的機構。鄧向來沒有把人大當作最高權力機構，只是當作安排人的地方，不能對政府起什麼制約作用。這次會議對於國務院李鵬、人大喬石，他們的權力都沒有什麼加強；相反，由於成立了財經領導小組，由江任組長，對李鵬的權力還是個削弱，使李不能願意怎麼幹就怎麼幹了，正如我當時在任時，鄧叫姚依林通知我任財經領導小組長一職那樣。

趙又說：最近李鵬出國訪問，遭到了嘲弄和反對〔我插話：據說，由於人民遊行示威，李鵬未敢出正門，而是從後門出去的。〕，在國內同樣也遭到反對。特別是這次人大選舉，竟有幾百人不投票，有代表團還公開寫信給中央說，不能讓李鵬再做總理，弄得中央很緊張，恐怕落選，一再派人給各方面做工作。

趙說：這樣，李鵬在國內國外都受到了刺激，而朱鎔基^②出國訪問卻受到歡迎；對比之下，精神不快，恐怕也是李鵬這次致病的原因。正因為李鵬的形象受到了損害，看來江的腰杆就顯得硬了。江這次在南方親自出頭，自己召開六省經濟工作會議，並沒讓國務院人員參加，這是過去沒有過的；過去江對國務院的工作是不敢碰的，因為李鵬是實力派，而現在這個情況變化了，是在李鵬的形象下降後而變化了。

二、指軟禁違反黨章憲法

趙紫陽說：前幾天我提出去養蜂夾道（中央部級幹部娛樂的場所）

^② 朱鎔基（1928—），湖南人。1998—2003年任國務院總理，1993—1998年任中國銀行行長。

打檯球，不讓去。我硬是步行走過去，他們沒辦法。後來他們只同意我每星期的二、四上午去打檯球，而這兩天恰是不開放的時候，沒有人去，這顯然是不讓人接觸我。我提出要去打高爾夫球，也是只准許我去順義這個地方，其他地方如日本那個高爾夫場地不能去；當然還規定不准我去市內繁華地方，但郊區公園可以去。我曾提出要去慕田峪，雖是郊區，也沒有同意。還有這次我在廣西，有個老同志賀亦然曾三次要求見我，就是不准許。後來，我提出來，要同賀亦然見見面，他們沒辦法，才准許賀亦然來了。但他們向賀交代，只准許談十分鐘。當然，這些情況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此時，趙紫陽很生氣地說，因此我給江澤民寫了一封信，指出這對我「軟禁」，並明確提出，這樣限制自由是違反黨章、違反憲法的。至今已兩個星期了，也未作答復，就是不理，我曾提出將自己過去公開的和不公開的一些講話材料提來閱看，以便寫點回憶，也未理睬。

趙又說：過去我曾讓段君毅^①給江澤民傳過話，不能這樣進行控制，這是違犯黨章憲法的。要求自由會客，已至晚年，自己沒有其他想法，只希望晚年精神愉快些。

我插話說：段君毅告訴我，他已把這話轉達給江澤民了。

趙接著說：江澤民大概也派人給段君毅捎了個口信：段老好好休息吧！意思是不要段多管閒事。前些時候也對我傳過話來說，趙不如華（國鋒）克制，聲稱這是中央一位負責人說的，但不讓提名字。

我聽了之後心裏憋氣，這豈不是要讓趙紫陽永遠做一個囚犯？我難以理解為什麼這樣對待趙紫陽。後來，我把這些情況和安志文談了一下，安說：「有趙紫陽的合法性，就沒有江、李的合法性，他們認為趙紫陽是對自己權力地位的威脅，因為他們是「六四」事件的受益者。」這大概是問題的所在，從而我領悟了：一切為了自己的權力。

為了統治的需要，就不會考慮什麼憲法，也不會以事實為根據來處理問題了，人治的國家就是這樣，這大概就是問題的本質所在，也就是專制政體的特徵。法同虛設，公民沒有法律保護，談何人權！

^① 段君毅（1910—2004），山東人，80年代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1991年退休。

16

1993年7月1日

約請于光遠^①談中國改革的理論問題

于光遠是理論權威，在知識界負有眾望。趙紫陽有意約他談談，經我聯繫並陪同他同趙紫陽作了以下談話：

于光遠說，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來看，在原始社會，人是沒有財產觀念的，將來人類社會的人也應是沒有財產觀念的。這中間，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各個社會歷史發展階段，都是「公有和私有」並存的社會，所以「公有制」並不是區別社會的標誌。馬克思原來的設想也不是公有制（或國有制），而是社會所有制。馬克思原來也沒有提出過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只是提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和更高的階段；而兩個階段的提出，所謂共產主義階段是高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是初級階段，乃是列寧。

于又說，關於共產主義階段，所謂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其中，「各取所需」的譯文實有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浪漫的濃厚色彩。〔這時于光遠頗表歉意和自我譴責地說〕這乃是翻譯的失誤。可是現在人們已公認為公式，難以糾正。按馬克思原來的意思是說：社會根據各個人的能力，得到他所作出的貢獻，〔社會〕根據各個人的需要給於他〔一份回報〕，以滿足個人的所需。

于繼續說：就是社會主義階段，也是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過程的產物，絕不能是以先驗的公式固定下來，進而形成僵化的意識形態並為其所左右。

趙紫陽插話說：對社會主義現行制度與社會主義道路應加以區分；

^① 于光遠（1915—），上海人，曾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經濟學家。

1993年7月1日

過去由先驗的公式所形成的僵化的制度，特別是公有制，實行的是使公有化程度超過了生產力的水準，並使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從而造成了貧困，使我們離社會主義越來越遠了，也就是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

于光遠接著說：我們研究問題應把基本因素與非基本因素分開。如研究化學，基本元素就是原子分子論，而其他則是混合物；在經濟學上基本因素就是公有與私有，其主要因素應是混合經濟，即股份制經濟。純粹的單純的元素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同樣，在任何社會，即過去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單純的「私有」或「公有」也不存在。

于又分析說：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社會主義因素會越來越多，私人比例和成分會越來越小，又加上遺產稅的徵收，特別是各種社會團體、各種基金會，股份成份會越來越增大；資產的經營也主要靠企業家了。這樣一來，財產關係就變得模糊了。

在談到向社會主義過渡時，光遠說：馬克思原來提的暴力革命論，乃是不得已的手段，並不是普遍要採取的唯一形式；向社會主義過渡應是有多種形式。

趙紫陽插話說：馬克思原來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爆發，而不是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爆發；但客觀的發展卻是在落後的國家，無產階級首先取得了政權。（這時趙在語氣上又鄭重地說）這些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本應當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根據自己的國情來發展生產力；但卻超越了階段，實行公有化。結果，欲速不達而崩潰瓦解。從中國十多年的改革來看，經濟的增長也都是從私有經濟發展起來的，而國有經濟則證明是缺乏效益，提高不了生產力。

于光遠繼續說：蘇聯的瓦解應該說也是必然的。它的那一套體制，無論經濟體制或政治體制，都是僵化的，不符合時代潮流，也經不起新的科學技術潮流的衝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對國際形勢的

分析認為：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資本主義那時是受到了挫折，大有社會主義席捲天下之勢，但資本主義從失利中取得了教訓，進行自我調整，恢復了生機，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卻缺乏調整機制，而是主觀意志的任意性在起作用，結果進入困境，走向崩潰。

說到這裏，于又滿懷信心地說：雖然社會主義遭到了挫折，但社會總是向進步、合理的方向發展。馬克思作為一個學者，他的思維邏輯是嚴密的，他的歷史唯物論是科學的。嚴重的問題乃是教育幹部，使他們從舊的意識形態中解脫出來。

于最後頗有風趣地聲稱：自己仍是一個死不悔改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提出社會主義公式應是：

社會所有制+市場經濟+按勞分配，走向共同富裕。

趙紫陽說，過去中國的改革沒有明確提出改革的理論，改革者好像不那麼理直氣壯；而反改革的人卻利用舊的論點進行折騰，致使改革有反復。現在的問題應是，要突破所有制理論。〔說到此趙表現得興致勃勃〕蘇聯垮了，中國是一個大國，改革又進行了這麼多年，完全可能並且有資格提出一套有關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來。其他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卻不行。「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走向共同富裕。」這確是一個很大的課題。趙紫陽向于光遠明確地提了出來。

談話就這樣結束了。趙懷著很尊敬的神情，送于老出大門上了車。

17

1993年9月9日

一、對國有企業非動大手術不可

我去外地參觀了幾個地方，回到北京後，向趙紫陽作了幾點情況反映。

我說：從下邊情況來看，在農業方面，實行承包制，確實是成功的；後來又發展實行雙層經營制，發展多種經營，最近又提出，實行農工貿一體化。這條路看來，是很正確的。在商業上，實行櫃檯承包，採取租賃辦法。這樣，劃小單位，分散自主經營，既能發揮積極性，又可以安排城市和外地大量人員，又能增加稅收，效果也是好的。對供銷社，有的地方採用股份合作的辦法，就不再虧損了，看來也是一條路。

趙紫陽插話問：最近商業部門提出的連鎖商店，經營效益如何？對此，我不知情，回答不出來。

我繼續說：關於鄉鎮企業的發展，過去一般都是在鄉政府主導下，予以優先的人、財、物大力支持，發展起來的；沿海地方更是靠優越的地理條件，用出賣、租賃土地搞房地產發展起來的。同樣，城市的集體企業，也是為解決本單位職工子女（待業青年）就業的壓力，用本機關（企業）的優越條件大力支持，發展起來的，對經濟的發展確實都起了巨大作用，也作出了很大貢獻。但無論鄉鎮企業或城市集體企業，發展到今天，效益皆呈下降趨勢。究其原因，根子在於小鍋飯不改造也不行；採取承包制，實際是只負盈不負虧，也不行。看來，只有走股份合作制的道路，明確產權關係才行。現在各地都在照此進行，發展很快；有的國營小企業採取租賃辦法，也就是國有民營，也是一條路。

我最後說：最困難的還是國有企業，還沒有走出一條路來。

趙說：國有中小企業應走國有民營這條路，採取股份制及租賃、兼併、破產等辦法，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可採用中外合資的嫁接辦法。（對此長歎）總之，對國有企業非動大手術不可。

我的看法是：究竟如何動大手術，採用什麼樣的手術，這又是一大課題，難點是人員的安排問題。

二、國外的評論

我向趙紫陽轉述了國外的評論。我說：我最近看了國外有關中國的一篇評論，認為共產主義陣營是不可能再恢復起來了。蘇聯瓦解後，俄羅斯今後的發展只能是民族主義國家，或者是動亂紛起，形成法西斯式的專制，但卻不可能再恢復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了。中國也不是社會主義了，在變，也資本主義化了。他們分析認為，過去，無論中國和蘇聯，都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和為人民服務的牌子，實際上，都是實行專制獨裁的統治，都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復辟。

他們評論說：中國共產黨過去抓住了反封建的旗幟，給農民以土地；抓住了民族救亡的旗幟進行抗日鬥爭；又抓住了反蔣介石的獨裁旗幟，要實行人民民主。中國共產黨就這樣爭得了民心，把各階層廣大人民爭取到自己這一方面來，從而取得革命勝利，建立了新中國。但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共產黨卻一直在走下坡路。

他們還分析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當時應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因為那時的潮流是和平發展，是進行經濟建設。日本和德國等許多國家都是抓住這個機遇發展起來的。當時美國的戰略，原是打算放棄台灣，對中國進行援助計畫，如同對西歐採取馬歇爾計畫一樣實行經援，復興中國。但中國共產黨卻採取了一邊倒方針，倒向蘇聯，並參加了朝鮮戰爭，致使美國的這一計畫告吹。中國也失去了一次發展的機遇。

他們認為，繼而中國共產黨又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不斷，進行自我消耗，中國共產黨自己把國民經

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他們的結語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過去在中國玩的是政治統治魔術。

最後，我又附帶談了一下人們對中越戰爭的看法。認為鄧小平發動的對越作戰是一個錯誤，也是他的一個悲劇，所謂要「教訓教訓越南」，乃是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

對我以上所談，趙紫陽均未表態，只是靜聽。

18

1993年10月7日

一、趙紫陽的獨步藥方

我去杜潤生那裏閒談，曾談到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①寫了一本書，其中寫到「趙紫陽的獨步藥方」。我從這裏開始向趙復述起來。

我說：張五常提出的所謂「趙紫陽的獨步藥方」，是指趙把最佳的社會主義與最佳的資本主義匯合起來了，這個匯合點，就是趙紫陽的獨步藥方。其要點有：

一是在農村實行承包制，把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收益權分離。就是說，土地還是公有，但使用權、收益權歸農民私有，後來又發展為有轉讓權。

二是在國有企業實行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資產雖仍為國有，但企業可以自主經營。就是說，可以採用私人經濟那一套辦法經營，所謂「國有民營」。

三是允許私人企業與三資企業發展，廢除國營企業的壟斷，實行自由平等、公正的競爭，發揮市場經濟的活力。

四是提出沿海發展戰略，大力開展對外貿易，所謂兩頭在外，放開價格與進出口管制，向世界市場進軍。

五是改革銀行制度，銀行進行宏觀調控，以貨幣量來控制通貨膨脹。

張五常寫道：這樣，既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並保留著社會主義的形象，又有私人經濟、私人經營的動力，並發揮著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活力，從而把中國國民經濟推向快速發展的軌道。

^① 張五常（1935—），香港經濟學家，推崇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與產權理論，曾任香港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2003年涉嫌逃稅，被美國政府通緝。

張五常論證道，徹底的承包制就是私有制。在這裏，所有權在經濟上並不重要，可歸國家所有，重要的是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所謂私有產權必須包括三個條件：一是私有的使用權，二是私有的收益權，三是自由的轉讓權。這三個條件，在中國的承包制中都已體現出來，所以，徹底的完整的承包制就是私有制，這已為上述私有產權三個界定條件所確定。因此，中國的資產實行國有或社會所有，也同樣能推行私有產權制度。

張五常又寫道：根據高斯定理，市場經濟是在私有產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為它可以產生動力，出高的經濟效益，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對公有制可以起死回生的作用。

所以，張五常的結論是：社會主義中國，可以而且應該實行市場經濟。

張五常還認為，今後，為了避免承包制發生承而不包，只負盈不負虧的現象，國有資產可採取適當貶值的辦法，政府並對企業資產評估出一個淨產值。只要企業能按期向政府上交一個按低利率計算出的資產淨產值，政府只收回應收回的利息額，其他的政府可什麼也不管了，由企業自主經營。同樣，在農村，可將土地當作農民的私產，批給農民，實行百分之十的稅率制，廢除其他一切上交及所有攤派，放開價格，農產品實行市場化，由農民獨立自主地去經營，並保證農民的收益權不受侵犯。

趙紫陽對以上敘述只是靜聽，沒作什麼表示。

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趙紫陽說，前幾天去醫院，碰見呂東^①（原國家經委主任），讓他給朱鎔基捎了個口信：不管採取什麼形式的分稅制，都不要影響沿海發展戰略，目前那裏是中國最大的機遇。

^① 呂東（1915—2002），遼寧人。曾任冶金部長、三機部部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

趙又說，實行分稅制，中央把錢集中起來，這樣一來，各省都會向中央伸手。如果你撒芝麻鹽似地都去分一點，結果會什麼大事也辦不成。很明顯，即使引來外資，也還需要有配套資金來搞基礎設施。搞平均的結果，經濟都上不去。

我插話說：這次實行分稅制，中央與地方發生了矛盾。安志文告我說，十年內廣東將少收 200 億元。後來採取了妥協辦法，就是按 1993 年的支出返回地方一部分。

這時，趙用比較肯定的口吻說：最好讓各省自治，就是讓各省根據自己的人力、物力、財力各自去發展，那就會形成窮省有窮辦法，富省有富辦法，各省根據自己的能力條件去發展。這樣，就不攀比了，都會眼睛向內，發掘自己內部的潛力，或許經濟都會發展很快。趙舉例說，西歐諸國之所以能發展起來，就是靠各國是分散的，都是獨立的各自去發展；如果形成統一的國家，過去就可能發展不了這麼快。關於這一點，毛主席在世時也曾講過。同樣，美國之所以發展得快，也是靠聯邦自治，各聯邦都實行自治，根據自己的能力並發揮自己的潛力去發展。就是東方四小龍^①的興起也如此。如果台灣、香港，在中國大一統的體制管制下，可能也不會騰飛起來。

聽了這些談論之後，引起我沉思的是，趙紫陽雖身在「囹圄」，卻仍關懷著沿海經濟的發展，這不只是因為沿海戰略是他提出的，也是出於一種歷史的責任感。因為中國人口多、底子薄、資源少，要想把國家經濟發展起來，必須大量引進外資，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必須大力開展對外貿易，包括所謂「兩頭在外」的來料加工。無論戰後的日本和德國還是後來的亞洲四小龍，都是爭取了這樣的條件才發展起來的。同時，也必須抓住目前新的技術革命潮流的有利時機，可謂「機遇」不可失。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由於清朝政府的誤國，失去了機遇，使國家依舊愚昧落後，處於被列強瓜分的危險境地。第

^① 亞洲四小龍，指香港、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它們在上世紀 60—70 年代，利用外資、技術和本地密集勞力，遠致經濟高速發展，成為亞洲經濟的龍頭。

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新的工業技術革命時期，由於毛澤東晚年錯誤發動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又失掉了機遇，使國家經濟處在崩潰的邊緣，人民受苦受難。在目前資訊革命時代，趙紫陽認為這次機遇無論如何不能再失掉，這次可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了。

19

1993年10月18日

一、主張改國有制為企業所有制

趙紫陽首先說：是否考慮可以把國有制改為企業所有制，因為企業所有制，同樣也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這樣，由企業租賃者去自主經營；同時，也可以將國有資產用分期付款的辦法、借貸的辦法分給職工每人一份。

趙說：只有產權明確了，才能發展市場經濟；沒有明確的產權關係，市場經濟是發展不起來的。企業的自負盈虧與自主經營，又是相互的，若不能自主經營，企業就實現不了自負盈虧。但是〔趙強調〕自主經營與產權關係又是聯繫著的。沒有明確的產權關係是難以自主經營的。至於對國有資產的評估，也應從戰略方面來看，企業與職工多得一點關係也不大。

趙一貫主張，對國有企業的改造要實行國有民營的辦法，採取租賃的辦法，就是允許按私人經營那一套辦法去自主地進行管理。他不大贊成都是國有資產的股份制，認為那樣同國營企業差不了哪去。他曾說，如果實行股份制，私人經濟至少要佔三分之一。他的思路是，只有在私人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形成了市場機制，才能把國營企業推向市場，也才能對國營企業進行改造；既然要把國有企業推向市場，就必須使企業行使自主經營權，這就需要實行企業所有制。

我認為趙紫陽這樣提出問題是從發展市場經濟出發的。現有的國有企業，實際為各級政府部門所有並主管。政企如不可能分開，企業也就不能實現自主經營，自然也不自負盈虧，從而企業在市場上的主體作用難以形成，市場經濟就難以發展。

看來，趙提出的企業所有制這個觀點，與已故經濟學家蔣一葦「企

1993年10月18日

業本位論」匯合起來了。

趙以前也曾對我說過：在國外，國有企業也有搞得好的，那是在私有經濟佔優勢與市場經濟機制推動下才能做到的。

二、會見蔡德誠表心跡，家庭會議反戒嚴

《科技導報》常務副社長、副主編蔡德誠^①早想同趙紫陽見一次面，經我聯繫同意後，由我帶領見了面，作了以下談話：

蔡德誠說，首先大家都很敬仰你，希望你保重身體，健康長壽。接著說：現在新領導班子強調兩種改革觀，就是在改革問題上首先要問姓「資」姓「社」，這就把改革捆住了。新領導班子上台後，曾以「六四」劃線，清理幹部隊伍，這就把改革勢力打下去了。過去確定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向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方針改變了，回到了「計畫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就又轉回到計畫經濟體制軌道上去。在經濟政策上強調集體削弱個體，公然說對個體戶要整它個「傾家蕩產」；突出強調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就是意在要限制非國有經濟發展了。總之，「六四」後中國的改革出現了逆轉倒退的趨勢，這是違背潮流、違背人心的。最近雖有鄧的南巡講話有所轉機，但這個折騰損失是很大的，又加上國際上的經濟制裁，中國有失掉大好發展機遇的危險。

蔡德誠歎息地說，如果中國這次難逢的發展機遇再失掉，經濟發展不起來，各種矛盾會接踵而來，人們擔心要發生變亂。這是人們都不願看到的。如果真的發生變亂，只有你趙紫陽才能收拾這個局面。因為你是眾望所歸，民心所向，這是黨內黨外，上下一致的共識。

趙紫陽插話說：如果出現變化，即使有人打出我的旗幟，我也不幹，自己已是過氣的人物了，人老了。

蔡說，不是你幹不幹的問題，而是形勢要把你推上去，恐怕身不由己。〔蔡又強調〕尤其一旦中國強人鄧小平走後，會更增加變亂的

^① 蔡德誠，《科技導報》副主編、教授、高級工程師、研究科聖方法論。

危險性。總之，中國不能亂，不能大亂。否則，收拾不住，中國要倒退幾十年。

趙說，如果鄧在走之前能留句話，對「六四」問題能鬆動一下，由後人的情來處理，就不會再讓「左」派的一些人來利用「六四」來搞傾軋，這樣就不至於使政局陷於混亂。

蔡說，現在的新領導強調穩定，一切為了穩定；實際是一切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而進行控制。這樣，只從維護自己的權力出發，而不是從應有的歷史使命感、責任感出發，就不會有什麼戰略眼光和大的政治氣魄，也就不會有大的作為，來推動社會進步。

在此，蔡德誠用一個事實作了說明。蔡說，鄧小平去世後，我在一次學術討論會議上曾和江澤民的智囊人物劉吉有過一次對話。我說鄧小平執政高舉了改革開放的旗幟，把中國推向世界市場經濟體系，從而為自己樹立了一個里程碑；現在江澤民有機會高舉政治改革的旗幟，建立民主政治，從而也可能為自己樹立一個里程碑。劉吉當即打斷我的發言，回答說，蔡主編，你這話是半夜雞叫，時候不到，半夜吵人，擾人。會下他又對我說，如果搞民主改革，那就會跟蘇聯戈爾巴喬夫一樣，我們這些人都得下台，都得去掃大街、看大門，實行民主政治那是兒子輩孫子輩的事。

我插話說，安志文告訴我，現在國外很稱讚孫中山^①，認為他稱得起是真正以「天下為公」的偉人；也稱讚蔣經國^②，認為蔣經國英明，也是個了不得的人物，把權力不傳給蔣家後代，而交給了李登輝，同時也使台灣的經濟騰飛了。

趙紫陽說，蔣經國的英明，除了這兩點以外，對內還順乎世界潮流，開放了黨禁，實行了新聞言論自由；又順乎民心，打通了與大陸探親，並平反了「2·28事件」，對死難者進行了撫恤。

我繼續說，安志文還同我談及他在與外國專家的接觸中感到，他們並不多考慮這主義、那制度，而是多考慮如何發展經濟促使社會進步，如何使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互補融為一體，互相融合起來。安還說，單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也搞不好，今後的潮流是民主化，專制是搞不下去的。

蔡德誠繼續說，據江澤民手下的人說，江的心態是，既然共產黨把權交給了我，我在任職期間，不能把共產黨的權丟掉；至於以後我就管不著了。江在上海工作期間常向下面人說，我們這些人能幹什麼？還不是「腳踏西瓜皮，溜到哪裡算哪裡」。宗插話說：這種心態就是機會主義的。對此，蔡又感情強烈地說，像這樣缺乏政治目標，沒有政治抱負，缺乏歷史使命感、責任感的人，只能是個過渡人物，幹不了大事，在他手下問題會越積越多、越拖越大。在社會矛盾激化時，領導層內部也不能統一，進而分裂，這是規律。

趙紫陽說，正由於地位不穩，新領導班子也會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外界的壓力，當然情況嚴重時，也不排除以平反「六四」為旗幟來緩和矛盾，鞏固自己地位這種可能。

蔡德誠在會見中還說，他很欽佩趙紫陽在巨大壓力下拒不檢討，堅持正義的人格和氣魄。趙對此回應說，我拒不檢討，一方面是我始終認為自己當時的態度、方針是正確的。另一方面也是歷史發展到了今天，使我有可能拒不檢討。胡耀邦那時就沒有這個歷史條件。

我的看法是，蔡德誠這次之所以求見趙紫陽，是出於對趙的敬佩心情，認為趙對處理「六四」事件提出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和民主法治」的主張是正確的，卻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對待，而內心感到不平；對趙寧受囹圄被軟禁，也要堅持正義的崇高精神表示欽佩。因此，蔡在會見的最後對趙說：歷史是公正的，不管怎樣，「六四」終會平反的，這是全國人民的心聲。你的高尚形象、歷史地位是被確定了的，這也是人們的共識。

趙紫陽還說：在我去開關於「六四」問題會的前一天，我是開了家庭會議的，全家一致同意我的主張，就是反對戒嚴、反對出兵。這

① 孫中山（1866—1925），廣東人。辛亥革命成功後，任中國國民黨總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② 蔣經國（1910—1988），浙江人。蔣介石長子，曾任中華民國六、七任總統（1978—1988）。

樣，被解除總書記職務是意料中的事。我把反對戒嚴與自己的不再擔任總書記職務，是連在一起來考慮的，全家人也都願意承擔這個後果。就是沒想到會這樣被軟禁。

最後，趙頗有風趣地說：「君歡勝於民心」啊！民心雖如此，但沒有鄧發話，「六四」問題一時是解決不了的。

20

1993年12月14日

回顧中國近代史，評毛的烏托邦社會主義

趙紫陽這次是從中國近百年史談起；他說，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以基督教教義為基礎，以拜上帝為名，自己設計製造了一個所謂「天國」，廢除私有制，取消商業，實行平均主義，結果行不通，一方面宣傳「天父」「天兄」「天下一家」，實行「平等」；一方面又制訂了森嚴的等級制度，形成新的王朝，脫離了群眾，以失敗告終。

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則是走了君主立憲的道路，那就是，你當你的太上皇，我來承包，搞好了功勞是你的，搞糟了可拿我問罪。由於清王朝是一個極端集權、高度集中的專制國家，權力是不准分享的，哪怕是小小的觸動也是不允許的。結果，維新派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害，康有為、梁啟超亡命海外，以失敗而告終。

孫中山鑒於改良道路走不通，為了振興中華，為了完成歷史賦予自己的使命，毅然決然地走上革命的道路。那就是發動革命，以武裝暴力來推翻封建專制王朝，奪取政權。所以說，「暴力革命」不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發明。

趙紫陽又說：孫中山開始也是學習西方歐美那一套，要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現代化，走西方的道路。他對外依賴帝國主義，對內依靠軍閥勢力，結果是，封建軍閥與帝國主義相互勾結，尤其是袁世凱的復辟帝制活動，使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敗。從失敗中，孫中山醒悟到按西方道路去進行革命走不通，這為西方資本帝國主義所不容；又醒悟到利用舊軍隊改造舊體制靠不住；而革命黨內部又發生分化變質成為新官僚，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孫中山從俄國「十月革命」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逐步走上聯俄、容共、

扶助農工並「以俄為師」的新革命道路；並按列寧的原則來改造黨。所以，在中國是孫中山先引進馬列主義，後來使蔣介石領導北伐取得了勝利，統一了中國。

趙繼續說，由於國民黨及其軍隊成員的階級基礎，他們跟封建地主階級及西方資本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民族資產階級大多數又是由官僚買辦、地主階級轉化而來；他們害怕農民的反封建鬥爭，不可能給農民土地；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引誘下，對廣大人民群眾實行了專政。由於中國共產黨給農民以土地，這就把廣大農民爭取過來了；又高舉民主的旗幟，這就把廣大民主力量團結起來了；從而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蔣介石國民黨則敗退台灣。

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及西方資本主義的封鎖，根據當時的格局，中國只能倒向蘇聯，實行「一邊倒」的政策路線，這就扭轉了新民主主義的方向，引進了蘇聯這一套高度集中的專政體制，來建設社會主義，這就使中國在不成熟的條件下進入了社會主義。

趙認為：在中國，過去引進馬列主義都不是為了要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為了「復興中華」、「救亡圖存」；後來，引進蘇聯這種高度集中的體制，是為了首先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搞軍事工業，是為了富國強民，也不是為了要實現社會主義；就是毛主席在中國實行的所謂亦工亦農又文又武，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的人民公社制度，也只是為了實現他的烏托邦農業社會主義理想。

趙進一步分析說：毛主席基本上奉行的是中國的傳統思想，即農業社會主義的極樂世界，他非常讚賞中國歷史上的五斗米教，吃飯不要錢，即漢代張天師那樣的管吃、管住所謂「量腹取足」，隨去隨來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主張一切從「公」，這從革命戰爭年代所實行的軍事共產主義的供給制，和在建設年代還想恢復供給制的想法，以及「五七」指示和人民公社即可看出。這同孔子的大同世界、康有為的「大同書」以及孫中山的「天下為公」思想都是一脈相承的。他對外來主義也是採取實用主義態度，為他這個烏托邦理想服務的。毛主席

也是反對蘇聯這一套官僚體制的，視之為吸人血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是深惡痛絕的。

趙說，因為是烏托邦，沒有條件，不可能實現，於是就靠高壓強制的辦法，靠權威的辦法，靠製造個人迷信的辦法，甚至不惜打碎國家機構，並拿起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武器，來對付人民內部乃至黨內部持不同意見者，甚至採取了專政鎮壓的手段來推行。結果，把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也以失敗而告終。

談到這裏，趙同意廖季立的看法，無產階級在國內已樹立優勢後，不能再強調「專政」，這樣只能是專了人民的政。當然，在革命時期沒有這一套嚴密的高度集權制，也不能取得革命勝利；就是在建設開始時期，〔趙著重地說了〕如果實行西方民主政治，搞多黨制那一套，社會也不能穩定。因為發展中國家社會矛盾多，也不能順利地進行經濟建設，南美諸國就是例子。

趙紫陽最後說：總之，在落後國家取得革命勝利後，首先是發展商品經濟，大力發展生產力。在中國農村由於聯產承包制的推行，使人民公社瓦解了；在城市由於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使計畫經濟體制解體了；股份制的實行，使公有制經濟轉換了。今後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多元化的出現，高度集中的專制政體必然支持不下去，必須改變舊體制，結束一黨專政的政體，實行現代民主政治。

21

1994年1月2號

一、評毛澤東思想：要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

趙紫陽說：毛主席他從思想上來劃分階級，發動反「右派」鬥爭，迫害廣大知識份子，使幾十萬知識份子家破人亡。他號召大躍進，動員近億人上山毀林，大煉鋼鐵，造成生態破壞，給後代留下無可估量的後患。他大辦人民公社，對廣大農民實行奴隸般的控制，嚴重破壞了農業生產，破壞了生產力，造成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現在看來，確實極其荒唐，毛主席好像是亂來。不過，實際上他有自己的理想、理論和指導路線。

趙從中國革命的歷史探討了毛主席的這個思想。他說，中國的革命同西方不同。十九世紀大戰後，西方的工人階級因受資本主義的殘酷壓迫剝削，尤其受原始資本積累的殘酷迫害，才團結起來進行階級鬥爭，搞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則是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有亡國滅種的危險，為了救亡圖存、救國救民，才團結起來進行民主革命的。正因為這樣，中國人民才接受了馬列主義。孫中山為了救國救民，復興中華，開始時是引進西方模式，按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一套來救中國，由於此路走不通，才又引進蘇聯模式，按列寧主義這一套革命組織原則進行革命，從而取得了北伐革命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又把馬列主義民族化，改換蘇維埃的旗幟，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所必須，從而爭取了全國人民，並同國民黨聯合在一起，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繼而共產黨又高舉和平民主、反封建的旗幟，團結了全國人民，並給農民以土地，進一步爭取了農民，從而打敗了蔣介石國民黨，建立了新中國。

趙紫陽說：革命勝利後，毛主席首先要解決的是民族獨立問題。

1994年1月2日

因為如果沒有強大的國防武裝力量便不能獨立，因此必須發展重工業，大力發展國防工業，不惜犧牲農民利益，甚至剝奪農民來發展軍事工業，使中國經濟走向畸形發展的道路。毛主席當時並不是要解決如何提高人民生活的問題，而是走的強兵強國的路線。

趙紫陽認為，後來毛主席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是要向世界革命進軍，也是為了跟蘇聯比高低，有爭當世界革命領袖的欲望。所謂毛澤東思想是繼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的第三個里程碑的說法，即可說明這一點。但他並不贊成蘇聯斯大林的那一套模式。

我插話說：李銳的看法，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勝利後的最大問題，是沒有去進行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趙說毛主席是要繼續革命、不斷革命；而不是要使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搞經濟建設。當然，毛也是一直在尋找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的新民主主義道路未走下去，繼而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後又要走人民公社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道路。

趙繼續分析說，毛主席提出要建設的社會主義，並不是馬克思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即建立在大工業基礎上的以工業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而是要建立由「農民坐天下」的社會主義，即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天國。從他在戰爭時期所實行的一套供給制，從他提出的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的人民公社制度，從他對軍隊發出的又文又武要兼作多樣任務、角色的指示等，就可以得到說明。

我插話說：這大概就是民粹主義吧！

趙以比較肯定的口吻說，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農民的平均思想，在毛主席的思想裏是根深蒂固的。他是從「農民打天下」，「農民坐天下」出發的。正因為如此，他反對特權，對官僚階層是深惡痛絕的，稱之為吸人血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他要建立農業社會主義，於是走向了烏托邦。凡是反對和不贊成他這個理想抱負的，都被認為是修正主義，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而必須不斷地搞群眾運動，予以專政，甚至採用強制手段，不惜用高壓的辦法，提出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執行起來，實際就是用秦始皇的鎮壓手段來推行這個

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這就走上了如同國民黨一樣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道路。

趙最後說：不能單純地認為毛主席是帝王思想，以封建主義來反封建主義，自己想做一個開明君主；不能簡單地認為毛主席怕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才發動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整下去，猶如王若水對毛主席所作的心理分析那樣；也不能認為毛主席因林彪謀害他的「五七一」工程而使自己神魂顛倒發生了心理上的變異。實際上是因客觀沒有條件，而硬要去實行自己的理想抱負，而形成的悲劇。

二、鄧小平理論：搞經濟、黨領導、不爭論

我首先說，現在人們都在議論鄧小平理論，成為熱門話題，究竟什麼是鄧小平理論呢？

趙紫陽說，鄧小平的觀點是，只要把經濟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提高了，其他一切都好辦，什麼矛盾也可化解，否則，一切都談不上。至於是什麼所有制，在鄧小平看來，都無所謂。那就是「私有」、「公有」均無不可。關於發展經濟採取什麼手段，鄧小平認為計畫與市場都是手段，都可採用，正如他所說的：資本主義也有計畫，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不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區別的標誌。鄧小平的再一個觀點是：為了發展經濟，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否則一切無從談起；為了穩定，必須實行政治集中，加強黨的領導。在鄧小平看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非亂不可。因此，他認為黨的領導是絕對不准動搖的。鄧小平還有一個觀點，就是不搞爭論，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可以徹底地搞，怎麼搞都行；但不要搞爭論。他認為爭論起來，耽誤了時間，什麼也搞不起來。（趙談到這裏語重心長地說）事實上，一爭論，就認為發展的都是資本主義，人們的思想也要亂，經濟建設也會搞不下去。所以鄧小平提出不搞爭論，再糊塗十年。^①

^① 不爭論，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中提出的原則：「不讓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

我說：鄧小平的理論也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來發展資本主義，就是要對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更新。因為傳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沒有效益，是失敗的，計畫經濟道路又行不通，按勞分配的原則也從未實現過，養了懶漢。這樣的社會主義模式，自然應被淘汰，必須實行更新。對社會主義新的定義是公平與效率，其本質是發展社會生產力。而「私有」能產生動力，市場能提高效率，那麼自然要採用資本主義方式來發展經濟，但又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這就保證能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鄧小平所提出的「糊塗」說法，也是有道理的，因為社會正如同其他事物一樣，一切都在發展變化著；哪能有固定模式呢！人類社會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該是什麼形態就是什麼形態；不能人為地去設計模式。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被衝破了，正如鄧小平所說：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誰說得清」？就是資本主義也在發生演變，所以先糊塗一下，觀察和等待發展的結果。這也是科學的思維，也應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內容，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可稱之為「模糊論」，如同模糊數學一樣。

三、關於第二防線問題

此外，我說：人們還一再議論新領導班子是過渡性的，認為鄧小平可能有第二防線的準備。

趙紫陽肯定地說，這是不可能的。既是鄧定了的班子，他自己就要全力支持它。如果進行第二防線的安排，絕不能只對一個人講，也必須對有關人員講。那樣，領導層就會瓦解，那就亂了。

趙又強調說，鄧再也沒有迴旋餘地，再不可能有其他選擇了。過去對胡耀邦的問題，鄧聲稱自己是瞎了眼睛；鄧對我的問題，再也不能這樣說了。鄧在同楊振寧談話時說：趙紫陽在四川二年多，群眾就有飯吃了。依我說：這話說得過分了；實際是在表明他選擇我是對的。後來是趙紫陽個人變了，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叫自我暴露」，是趙紫陽個人的問題，不是他自己選擇得不對。

我插話說，趙健民告訴我，鄧到北京工作後，在搞權術，搞平衡，

也和他很少接近，並認為鄧對華國鋒的處理也過分。李銳對我說，鄧和毛一樣性格，也是搞個人獨裁；也有人說鄧還是提倡民主的，如他在1980年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強調「反對權力過分集中」「黨的一元化領導變成了個人領導」，「權力不受限制，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等。今天談起來，都認為抓住了黨和國家的要害問題。

趙紫陽說，那時鄧小平主要是對華國鋒，跟華國鋒作鬥爭。現在新領導班子李鵬的勢力位置在下降；丁關根在演毛遠新^①的角色〔指在毛主席時期〕。丁此人有些圓滑，從來不露聲色。現在大概又有人給江出主意要抓軍隊；江每到一地都去看望部隊，並給軍隊提級加薪。今年春節江是在遲浩田處過的。

趙紫陽最後說：總之，只要是鄧定了的問題，鄧自己是不會回頭的，如對鮑彤的問題，是他定的，材料也沒有看，一句話：是壞人麼，為什麼不可以判刑！只要鄧在，對鮑的問題誰也不會提，也不會有反映，表示不同意見。〔趙歎氣地說〕既然要整你〔指鮑彤〕，〔你鮑彤〕只有拿出意志來，進行〔自保健康〕比賽，不要自己折磨自己；有病就要求到醫院去治療或爭取保外就醫。

^① 毛遠新（1941—），毛澤東侄兒。文革中毛的親信，文革後判17年徒刑。1993年釋放，2001年退休。

22

1994年1月17日

一、改革處在膠著狀態

我說，現在國營企業進行的經營機制轉換也很困難，首先遇到的是多餘人員的安置問題，而企業辦社會問題，一時也難解決。許多地方企業據稱有百分之六、七十資不抵債，企業經營機制也轉換不動。而要維持生產就必須貸款，這又是無底洞；生產產品不適銷對路，質次價高，倉庫積壓，又是惡性循環。許多企業發不出工資，形成大的社會問題。國有企業不能自負盈虧，投資體制、財政體制也改不了。現在又是多項改革出台，全面緊張。如果出現通貨膨脹將會引發社會問題，第一次通貨膨脹，胡耀邦倒了；第二次通貨膨脹，出現高速增長引發了「六四」，趙紫陽倒了。

趙紫陽說：目前的改革是處在僵持膠著狀態，始終是在進進退退、收收放放的迴圈中進行。這是由這個新領導班子不敢擔風險造成的，一遇到有點風浪就退就收。老人們一說要發展，馬上就放又進。這跟過去我與老人的關係不一樣，那時，一般只要是我提出來，老人同意了（一般都同意），我就幹起來了。現在新領導班子，看來，是生怕老人再提什麼新意見，感到非常緊張，感到難以應付，始終處在被動狀態。

趙說：在我看來，目前拿出來的改革方案及措施，首先不是領導上拿出來的主意和想法，而是下邊一些人拼湊出來，是各方面妥協綜合出來的。由於各方面都要照顧到，實際操作上就難以推進。例如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分離，商業銀行如何發揮政策性作用，各分行在地方政府制約下，自己如何自主經營？都不好辦，不好操作。又如，目前實行的分稅制，各地方都要為自己的收入作打算。稅收權是在地

方行使，而中央各分支機構又受地方政府制約，自己的系統又沒有建立起來，也有可能收不起來。所以，我認為不宜過早搞分稅制。

趙接著說，目前糧價放開，農民產生惜銷看漲現象，國家也可能收購不上來，發生糧食危機。尤其是腐敗嚴重，已深入機體。〔在這裏趙自己在解釋〕過去認為腐敗是由不正之風和以權謀私造成的；現在看來，乃是制度的產物。我插話說：腐敗來源於集權，因為沒有透明度，不允許公開進行輿論監督；權力又不受制約，利用公有制條件，進行權錢交易，當然要產生腐敗。這大概就是你所指的高度集權的專政制度的產物吧！安志文認為國家機關、學校、軍隊搞創收，是引發腐敗的根本所在。

趙繼續說，再加上社會治安不好，有的地方匪警一家、內外勾結，導致群眾極為不滿。有的幹部則是有權就抓、有錢就撈、挖公家，造成人心渙散。這些問題拖下去，積累起來會形成共震，擔心會出問題。〔趙強調〕這都是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不同步造成的。

我說：有的學者如胡績偉提出走中國特色的民主改革道路。胡對我說，像「六四」那樣靠群眾自發遊行示威，要求民主實行政治改革的方式已過時了，今後應走政治改革寓於經濟改革的路。就是說，要結合經濟改革來進行，如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有了經營自主權，這就是實行了民主；在城市發展個體經濟、私人經濟獨立自主地進行經營，把公有制，國家大一統的控制衝破了，也是實行了民主；再是採取漸進的方式自下而上地來進行，就是說，由經濟到政治，從鄉村自治、民主選舉開始，由下而上逐步推進。一些敏感的問題如聯邦制、一黨專政、政治多元化等先不要碰它。胡績偉還說：至於領導層沒有權威，那是好事，它就獨裁不起來了；甚至領導層發生腐敗也是好事，早晚會被打倒。

趙紫陽認為，這樣的改革思路不能轉上民主政治。

二、趙紫陽改革開放的三個觀點

趙紫陽說，一、改革開放就是要扭轉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使之

向和平的方向發展。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及冷戰，給人類帶來了很大的災難，得到了慘痛的教訓，現在人們覺醒了。當然，戰爭有時也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不過，將來如果發生大戰將是核戰爭，將是人類社會的毀滅，所謂既無勝利者也沒有戰敗者。正因為這樣，各國才逐步聯合，建立利益共同體，攜起手來共同發展；和平與發展的理性才佔了上風，成為當代世界潮流。

趙說，二、改革開放就是要將國家納入現代世界文明和世界市場經濟體系中去。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世界經濟越來越走向一體化，這已為人們所共識；尤其科學技術的發展，資訊時代的到來，多媒體的傳播，出現了資訊高速公路，使人類社會面貌為之一新。各國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已超越國界走向全球，給人們的生活、工作、學習都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趙強調〕如果中國再閉關自守，再抱殘守缺，不利用現代文明，不納入世界經濟體系和民主潮流中去，那就會發生「球籍」問題，確是「死路一條」。

趙說，三、改革開放就是高舉民主旗幟，要實行民主政治，結束無產階級專政。過去我曾同萬里交談過，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制，農民都自主經營了，你還能管住嗎？沒有新辦法管理能行嗎？城市商品經濟發展了，多種經濟成分實行了，人們自己獨立經營了，單位、機關還能管住嗎？必須有適應這種變化的新辦法，那就是民主與法治。再說，現在是開放時期，各種思潮蜂擁而入，使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產生多元化，自然會產生反映這樣多元化的不同觀點，再搞大一統的觀念是不行了。

趙說，關於我對實行民主的看法，在四中全會批判我的會議上，我作了表達。當時是姚依林主持會議，不大同意我發言，只給了我十五分鐘的時間，我按稿子念了二十分鐘，最近香港雜誌刊載了，但有關民主的章節給刪掉了一些，美國出版的刊物刊載的比較全。那時保密很厲害，我的發言不讓傳達。省市提了意見，聲稱聽不到趙紫陽的聲音，就來傳達處理趙紫陽的問題，不好說話。這才勉強把我的這個發言印發給各省市一份，據說，後來又收回了。這次國外不知怎麼得

到的，是怎麼傳出去的？這對我來說可能還是一個疑點呢〔此時趙紫陽顯得很風趣〕。

為此，在這裏附帶引證一下趙紫陽在1989年十三屆四中全會批判他的會議上他的一段發言：「在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時代的潮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因此我想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治等新辦法去解決新的問題……而且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

趙當時還說：「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

從以上可看出趙紫陽是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高度，要把中國納入世界文明、世界經濟體系中去；使中國走上現代化，使中國轉向現代民主政治。這給了我很大啟示。確實，實行民主政治是當今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任何國家都概莫能外。在東方，無論台灣地區或南韓，都已由專制政體轉向議會民主、多黨制，實行自由選舉的現代民主政體了；同樣，印度也如此；就是緬甸、巴基斯坦的軍人政府，也都聲稱要還政於民，要實行民主政治。蘇聯瓦解、東歐巨變後，也都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無例外地都走向了實行民主選舉、議會民主、多黨政治的道路；就是俄羅斯共產黨，現在也公開宣佈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承認議會民主和多黨制。另外，在南非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也同樣實行了民主政體。

23

1994年4月12日

一、人權與民主不是一回事

我首先說，安志文認為那些民運分子在國外越吹捧你，對你越糟糕、越不利；他並說這些人成不了什麼氣候，分成幾派在鬧分裂，還爭當領袖。他們在國外遭冷遇，寫文章也是為了謀生，回來的也都下海了。據我所知，如陳一諮^①，當時在體改委研究所時就想進中央委員，沒有提名，還有情緒。熟悉他的人也是這個看法。

趙紫陽說，這些年輕人一般都存在這個問題。不過他們提出的民主改革，要求實行民主，也是代表今後的發展方向，是順乎潮流的。

我繼續說，據我瞭解，現在中央對這些不同政見者（所謂異議人士）是採取捉捉放放的策略。就是一有活動，就抓住一點把柄拘留起來，特別北京召開什麼國際會議或國外有重要人物來進行國事訪問時，就把他們監送外地，並給以優厚免費待遇。對有些人，如死難者家屬丁子霖^②，則是便衣員警站崗，不讓出門，外人也不准進入，採取隔離政策。近鄰則說：這樣一來也沒有小偷了，不怕溜門撬鎖了。但人們也在說，這樣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是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對曾經被監禁後又被釋放出來的異議人士，如陳子明、魏京生^③等便是這樣，當地派出所和公安局二十四小時在家門口值班看守。

① 陳一諮（1940—），六四事件前，任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1989年被中共通緝，流亡美國。1990年組織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② 丁子霖（1936—），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獨子被六四戒嚴部隊槍殺。

③ 魏京生（1950—），北京人。1979年因在民刊上批評鄧小平獨裁而被捕，判刑15年，1993年假釋，1994年再被判14年，1997年保外就醫赴美，繼續從事民主運動。

趙插話說，現在國際上已達成人權的普遍性原則的共識，公民的權利必須受到保護。這是每個人都應當有的權利。每個公民的活動只要符合憲法，什麼罪也是定不了的，是不能定罪的。〔趙強調〕所以，人權與民主不是一回事。

我繼續說，據稱曾慶紅^①提出，對這些異議人士，要儘量放其出國，切斷其與國內的聯繫，減少他們的能量；且得到了中央常委的同意。看來，這是當政者對不同政見者的又一策略，並把這些人當作和美國進行政治交易的籌碼；同時也給自己在國際上樹立一個開明的形象。

老實說，談到這些人的遭遇，我心裏是很不平靜的，內心裏好像憋著一口氣。他們僅僅因為反腐敗，要求實行民主改革，就遭到逮捕鎮壓。死的死了，活著的有的被囚禁，有的被單位革職、被學校開除，生活無著，弄得家破人亡，被整得這樣悲慘，我實在為他們鳴不平。可能由於我是學生運動出身，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也是冒了被「殺頭」的危險去搞「救亡」運動的。我對學生愛國行動有一種天然的同情感，所以「六四」事件後，我毅然決然地參加了死難者的追悼會，並對其家屬捐了款；後來，我聽到這些參加學運的人被開除被革職，流離失所，生活無著以及死難者家屬生活困難等情況，我是流了眼淚的（就是現在，我在寫這個追記時，寫到這裏也是流淚不止），並暗自下了決心，不管自己生活如何，也要積點錢給以接濟。在我得知國外有的基金會對死難者家屬有點救濟時，我心裏才得到點安慰。

這些內心活動，我並沒有向趙紫陽談出來，只是悶在自己心裏。

趙紫陽還向我說，中國人沒有納稅人的觀念。

我說，也沒有人權觀念。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種君、臣、父、子，倫常禮教形成人的依附性、奴隸性；再加上黨強調的「馴服工具論」，使人的個人價值、個人自主權、個性的

^① 曾慶紅（1939—），江西人。1998年任中辦主任，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

發揮統統被扼殺。

雖然人權目前已成為普遍性原則，公民的權利必須受到保護，但在中國先是不承認人權，認為是資產階級口號；繼而雖承認人權，但又強調與西方講的人權觀點不同；後才又認可人權的普遍性原則，但也不一定打算執行。其所以如此，我認為是人權與專政是對立的，專政不容納人權。北京有個員警親口對我說：我們根本不講人權的，說誰誰就抓誰，還定有指標，完不成就得下崗。

趙紫陽說：人權與民主不是一回事。如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人民有權可以批評任何領導人。

二、改革有險情

我說，對於經濟形勢到底應該怎麼看，體改委有同志告訴我，現在的改革，上邊也推不動，除分稅制在進行外，其他改革都動不起來，問題在於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轉換不動。有人悲觀地歎氣說，沒治啦！老人再也沒有能力來推動改革啦！新的領導班子也沒有新招。下邊也推不動，就連北京市的陳希同據稱也在說推不動。山東諸城市委書記陳光對國有小型企業採取拍賣的辦法，賣了二百多個，引起轟動。人們都稱他是陳賣光。後來據說他又到另一個新地方當官，因賣不掉，乾脆又採取了送的辦法。人們又稱他為陳送光。事實是，如果不送不賣，照樣維持下去要發工資，地方財政背不了這個包袱，銀行貸款又是資不抵債，也是無底洞。矛盾積累起來，會越積累越大，如果物價又控制不住，人們在議論說這樣下去「必亂」。

趙紫陽插話說：現在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不發票子，貨幣不增加，物價也上漲；而不發票子，企業運轉不了，三角債也解決不了；如果放鬆貨幣，那又會前功盡棄。

我繼續說，江澤民大概感到局勢不穩，最近警告大家要有「憂患意識」；並大力擴充武裝員警部隊，予以現代化裝備，要求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中；同時，控制輿論。有人說，對新聞的控制比「四人幫」時還厲害，大家對丁關根很反感。每到大的節日或敏感的日子，

如「六四」，內部都動員起來嚴陣以待，如臨大敵。我的一個外甥女在亮馬河大廈工作，對我說，共產黨辦了什麼虧心事啦！每逢「六四」這樣驚慌得不得了。

趙紫陽最後說：「改革有險情」，江澤民有局勢不穩定的心態。在他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下，對改革就難以推行了。如為了穩定，對國有大中型企業，貸款也要發工資；為了使工人不失業，貸款也要繼續生產，使產品積壓。這樣，商業銀行自負盈虧的改革難以進行，財政改革更不用說了，企業的經營機制自然也轉換不了。這樣拖下去，當然矛盾越積累越大。這就又必須到處消除不穩定因素來實行控制，用「消防隊」來撲火。

24

1994年6月7日

一、趙紫陽的聯邦自治思想

趙紫陽說，沿海地區進行改革十五年以來，有一半時間是在被壓制著，耽誤了良好的發展時機。我在位時有一次，那就是1984—1985年〔指當時對投資膨脹、經濟過熱引發物價上漲實行調控〕。以後就是三年治理整頓；接著，又是實行國家宏觀調控。實在太可惜！

趙強調說，沿海地區原料靠進口，產品外銷，資金是引進來的；再發展，再高速度，再過熱，也沒有什麼危險。在這些地區，應該放手，放開讓其去發展；香港、台灣等地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如果採取國家統起來、管起來的辦法，必然都發展不起來，都要被堵死，那只能還是一齊窮困，一統起來，內地就要學比，就要重複建設，必然產生過熱，自然引起通貨膨脹。這樣，就要壓速度，實際上是壓沿海。沿海地區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被壓下去了。例如，中國西藏與沿海地區的經濟可以說要差一個世紀，地區之間太不平衡了，能以一樣的速度發展嗎？又如，鄉鎮企業，西部與沿海一樣發展能行嗎？那一定是粗製濫造、重複建設，而資金人才等一大堆問題又來了。所以，應該各地區根據自己的條件去發展，那就是，窮省用窮辦法，富省用富辦法，這樣也就不學比了。再如，對西藏，中央政府可乾脆不管西藏的經濟，只管軍事、外交和國防，其他不干預，由他們自己獨立地去發展，即實行聯邦制。像美國搞聯邦那樣才能發展起來。當然我這個主張可能會受到一些人的指責。

我聽後認為，趙紫陽提出聯邦自治的觀點是很可貴的，也是馬克思的主張。我的看法，一切民族糾紛、地方矛盾，都是由於不能行使自治權造成的。我們目前實行領導人的委任制、任命制，都是違背自

治原則的。我曾詢問過曾在內蒙古工作的人員：過去蒙古族有那麼大的威力，橫跨歐亞大陸；現在怎麼會無聲無息無所作為了呢？他們答：現有中央政府都把他們的事包辦了，一包辦就產生依附性，積極性就發揮不出來，反而會喪失。這大概合乎邏輯。當然，另一方面由於沒有自治權，也產生磨擦。

至於微觀上的問題，趙紫陽說，根本的是要建立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私人經濟，來形成市場運行機制，把國營企業投入到市場機制中去運行。如果仍是以國有經濟為主體，仍採用黨組織任命企業領導人，那是不可能轉上市場經濟機制的。

我說，據稱，現有國營企業領導人對提出現代企業制度根本不感興趣。安志文的看法是，產權不明確，市場經濟機制形不成時，企業領導人當然會這樣。

趙紫陽說：這當然是根本問題。

我又說，關於如何搞市場經濟，有人提出三點：首先解決所有制問題，即產權問題。有一種新的產權理論說，既不以私人來控制物，也不以國家來控制物，而是以法人為中心來控制物。其次是如何管理市場經濟，有三種類型：德國的工人參與制約型；日本的政府主導型；美國的自由經濟市場型。再次是要實行意識形態的優化組合，形成穩定的社會價值形態。在中國，目前應提倡市場文化與中國文化相結合。

二、改革形勢可能逆轉，三種可能性

我談到現在「左」派還積極活動。童大林說現在經濟工作處在「不死不活」狀態，這樣會積累矛盾，人們在議論改革形勢有逆轉的可能。杜潤生認為如果改革逆轉，國際潮流也不允許，那樣外資就進不來，經濟就難以發展。

趙紫陽說：社會主義這個詞伸縮性很大，這些「左」派並不會打著反市場經濟的大旗，而會打著社會主義方向、公有制的牌子，提出反腐敗、反對兩極分化，要求實行國家干預、進行調控，走向共同富裕的口號，其結果，使經濟發展不起來，發生後退。

趙轉過話頭又說，或是打著穩定的旗號來壓發展，來削減項目，抑制經濟的發展，這也會使經濟發展不起來；這就會積累矛盾，使改革處在膠著狀態，使企業經營機制轉換不了；還有人是以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為名來限制產權重組。再加上政治改革又不同步，在專制政體下，自然會使矛盾激化。這樣，「左」派抬頭把改革推向逆轉是完全可以可能的。〔趙又強調〕由於企業經營機制轉換不了，富餘人員又無法安排，對國企產權改革下不了決心；為了不失業，還得投資維持生產，這樣產品積壓，又會發生滯脹，矛盾就會越積累越大。而領導上又拿不出新的對策來。另外，現有多數老幹部、老職工、離退休人員對現狀是不滿意的。所以，〔「左」派〕使改革形勢逆轉也是有基礎的。

我插話說，安志文的看法是，如果老同志中的「左」派出來掌握局勢必亂，因為他們會開倒車。

趙繼續說，我對形勢的分析有三種可能：一是維持現狀；二是發生變亂；三是向民主化方向發展。過去認為維持一段下去完全是可能的，現在看來「左」派反撲的可能很大，如果形勢逆轉，那麼專政統治的政策就要執行，自然對我本人的管制也就更嚴，甚至外出時發生車禍也未可知。反正，我是在他們手心中掌握著。

三、點評喬石、李瑞環、朱鎔基、萬里

我說，安志文的看法，目前就是鄧後時代，鄧已把新領導班子安排好了。新領導班子也是舉的鄧的理論旗幟：沒有路線之爭。鄧在「六四」事件前後有個轉折。在「六四」前，他接受毛的教訓，不搞一長制，對胡耀邦、趙紫陽都沒有提過「核心」；「六四」後，他又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怕亂，對江澤民提出了「核心」定位。安說這當然是他自己的體會。安志文又說，由於現在世界經濟不景氣，正處在結構大調整中，生產過剩；中國的經濟又發展這樣快。國外都看准了中國這個大市場，經濟界現在對中國說好話的不少，「六四」被淡化，許多人願意到中國來投資，逼得克林頓也不得不把貿易同人權

脫鉤。在國內，只要經濟不發生大的問題，上層領導也不會出現問題，而地方也沒有敢向中央出頭挑戰的，也沒有不服從的。老同志裏邊也沒有人能站出來，楊家在軍隊中沒人支持，對萬里老同志也不支持他。所以，新領導班子在鄧走後，穩定一個時期沒問題。

我又說，但童大林的看法是，在新領導班子中，看不出誰是改革派。

趙說，無論江或其他人都不是真正的改革者。喬石，不敢擔風險，什麼事都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這樣不行；不過喬石還是能看出問題、有見解的。李瑞環，則是搞小恩小惠，在搞小聰明；在天津他也只是在市政建設上搞了些東西，在企業、在經濟上沒有什麼表現。朱鎔基，搞經濟還是可以的，開始是我推薦去上海的，當時江澤民還不大同意，是我將了江澤民一軍，我說聽說朱鎔基去你們那裏工作，你們不大同意是不是這樣。江澤民說沒有，沒有。我說既然這樣那就定啦！是這樣朱才去了上海的。看來朱鎔基是強調控制這一套辦法的，還是計劃經濟思想體系。

趙紫陽略加思考後又說，新領導班子這些人，都不是抱有什麼理想抱負的，不存在為貫徹一條什麼樣的原則而有不同路線之爭，而只是在維護權位上會有分歧，這樣的一個領導狀態容易發生權位之爭；也很容易接受逆轉形勢的政策；由於他們是採取功利主義觀點處理問題，只能是被潮流、被形勢推動著走；如何對維護自己的權位有利，就怎麼走；而且彼此也不能共患難，在大的危機到來時，既會結成聯盟，也會發生分化；但在一般情況下，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也會統一，採取對策共同應付局勢。

趙最後說：同意安志文的想法，即便鄧走後，大的變亂、「左」派大的反復也不至於有；會穩定一個時期的。說到萬里，趙說：在鄧走後，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25

1994年7月14日

談同胡耀邦的關係

我說，人們在懷念胡、趙體制，認為你們兩個如果團結得好，中國不至於發生這麼大的轉折。有人說，你最後踢了胡耀邦一腳！趙紫陽說：我和耀邦在改革問題上基本是一致的，是相互支持的；在經濟發展上有分歧，主要是工作意見問題。那就是在發展速度與發展指標上，一個主張快一點，一個主張要留有餘地。

趙說，我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關於經濟工作的十大方針，到十二大前耀邦組織起草的報告卻搞了另一套方針。因為不切合實際，首先引起胡喬木、姚依林的非議和反對。胡喬木提出十二大的報告，應在十一大會議精神的基礎上修改、補充、提高。這樣一來，十二大的起草報告就搞不下去了。胡喬木、姚依林就反映到鄧那裏，鄧提出，經濟工作按趙紫陽的意見來寫，因此胡耀邦有氣。以後，耀邦就撇開國務院，以書記處的名義，直接向各部委和省市聽匯報定指標，如在雲南、河北保定市定了發展指標後，這些地方還是向國務院要錢要物。

趙又說，為了緩解這個矛盾，我是採取了由國務院各部門向書記處匯報的形式，來溝通情況，並請鄧、陳元老也參加；來說明國民經濟發展指標為什麼訂到6%，而實際是7.9%。這樣，留有餘地、超額完成，能更好地激發群眾的積極性。在這個情況下，有一次，陳雲突然針對耀邦一段時間內對經濟工作的講話談了十條（也可能是九條）批評意見，如耀邦說過財政赤字是假的不可怕，陳雲聲稱財政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又如耀邦對第一個五年計劃談過看法，有異議，這也刺激了陳雲。看來，陳雲是憋了一肚子氣向耀邦發了出來，這時鄧小

平沒有思想準備，顯得也被動。

趙接著說：問題是陳雲批評胡耀邦的這九條意見是否傳達？如果傳達，那麼耀邦就很難工作下去；不傳達，又是對陳的不尊重。胡喬木當時在會上且點火說：經濟工作的不同意見，對地方影響很大，要不要找各省來打個招呼。鄧說，你們商量一下吧。事後，我曾說過，書記處可以準備，但要由耀邦來定、來講。事過沒幾天，鄧力群在他管轄的兩個宣傳口工作會議上，把陳雲批耀邦的講話捅出去了。胡啟立找到我說了此事。我立即打電話問怎麼回事，我說，要立即收回，不要擴散，這是違反紀律的，並責備了鄧力群。這一情況，後來胡啟立也告知了耀邦，那時我在天津。

我從天津回來後，耀邦第一次到我家裏來，我倆曾促膝談心。我當時明確地向耀邦說：咱倆是同舟共濟，咱倆主要是經濟工作上的分歧；耀邦說：鄧和他談了話，到十三大鄧要退出常委，也退出顧委會主任，由耀邦幹；耀邦下一屆不當總書記，這樣安排後，你〔指趙〕當總書記。趙紫陽說：在這個年齡段的（60-70歲）只有你〔指胡〕當總書記最合適，再沒有第二個人；咱倆是一個年齡扛扛的人；哪有你下來，我幹的道理。反正我是堅決不幹，你如果實在不幹，就讓胡啟立來接。趙又說：以後是否可以不設總書記，由常委輪流主持。耀邦對我這個意見很稱讚。當時我倆談得很好，耀邦興高采烈地回去了。對他自己不幹總書記，擔任顧委會主任，相當於鄧的角色，耀邦並不介意。只是後來，啟立曾慌慌忙忙地到我這裏來說過：你們都下來，我們年輕的來幹那能行？並說耀邦對我說的「同舟共濟」很高興。後來，鄧又確定那個會議不開了，陳雲的講話也不傳達；但鄧又定了一條，今後經濟工作方針通過財經領導小組來制定，並叫我和耀邦去鄧家裏共同談了一次。以後由張勁夫^①在一個會議上作了宣佈。自此之

^① 張勁夫（1914—），安徽人。曾任中科院黨組書記、副院長，文革後任國務委員。

後，耀邦也不好再插手經濟工作，我們之間的分歧也就解決了。這是1982—1983年的事，但是「左」派可能利用這個分歧。

對此，我向趙說，曾看到胡耀邦前任秘書林牧^①回憶寫道：（八六年底八七年初）趙紫陽曾向耀邦打電話說：我勸你先別忙著幹別的，還是馬上找小平同志談一下，向他承認錯誤，檢討一下自己工作中的錯誤，爭取主動為好。趙紫陽當時更提醒說，再拖幾天就晚了，你還是儘快向小平同志認個錯，越快越好。外界有些人誇大耀邦和紫陽之間的矛盾。其實，他們兩個人的不同，只是考慮問題的側重點不同，一個著重從政治上考慮問題，一個著重從經濟上考慮問題；性格不同，一個執著一些，一個靈活一些，但在價值取向和治國方略上，他們是殊途同歸的，在災難臨頭時，他們是互相關心、互相提醒的。

趙紫陽繼續說，在1984年訪歐前夕，黑龍江省陳俊生有一個報告，提出了一個關於國家「長治久安」的極為重要的問題，使我聯想到應建立國家的正常的領導制度。於是我給鄧寫了一封信，並抄送陳雲。對這封信外人都不知道，只是在1987年批評耀邦的生活會議上我提過一句，也沒有具體說明，從而有人認為我寫信告過胡耀邦的狀。幸虧，這封信的底子秘書還保存著，交给了我〔指趙自己〕。

在此，趙紫陽對我說：已把這個底子抄了一份送交給李昭（胡耀邦夫人），主要說明並不是像外面傳的那樣，對胡落井下石。現在再給你〔指宗〕一份；如果我家被抄，你那裏還存有底子，可以澄清事實。（這時趙紫陽隨即將信的複製件交給我），該信的原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龍江省陳俊生^②同志建議一件，請閱。

^① 林牧（1927—2006），陝西人。曾任陝西省委副秘書長，西北大學黨委書記，兩度入獄，勞改，後因反對六四鎮壓，第三次被中共開除黨籍。

^② 陳俊生（1927—2002），黑龍江人。曾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國務院秘書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雖然他提出的辦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卻提出了如何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前，我們各方面的情況都越來越好，而且這種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固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從憲法上考慮，恐怕還不行；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黨的領導體制上著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現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領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已走上正規，當前的確是我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因為這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慮解決這一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的重大問題，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以上建議妥否，請酌。

此致

敬禮

趙紫陽①

1984年5月26日

關於胡耀邦的問題，趙紫陽說，耀邦和老人的關係很深，鄧小平對他的優點缺點都很清楚；鄧曾對我說胡就是好表態、好隨便說話。趙又說：耀邦去日本訪問，一下子邀請了三千名日本青年人到中國來，弄得很被動；鄧對胡這一點很不放心。這次耀邦去朝鮮訪問，鄧特讓楊尚昆跟隨，就是不要耀邦隨便說話，結果他又答應金日成可以派飛行員到中國受訓，可以開中國飛機。耀邦有些好標新立異，好一鳴驚人。趙評論說，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這樣隨便，會出問題的。

① 作者注：從這封信可看出根本沒涉及胡耀邦的事，而胡耀邦的問題是發生在1986年。

我插話說：胡耀邦落實老干部政策，給「右派」摘帽子，落實知識份子政策，是有群眾基礎的。趙紫陽很同意。

趙繼續說，耀邦同老人的分歧基本是自由化問題。早在理論務虛會議時，耀邦跟老人就發生了觀點的分歧，老人認為耀邦對批判理論戰線表現軟弱。反精神污染是鄧提出來的，耀邦又曾幾次表示「提法不科學」，「搞了擴大化」。趙說，我提出經濟領域內不搞反精神污染，耀邦認為這是我對他的支持。我對耀邦說，反精神污染對鄧要有個交待，特別鄧又提出要抓一下，他同意了。但後來耀邦去了新疆，就這樣，反精神污染以不了了之而告吹。這就增大了耀邦同老人之間的分歧，這中間，胡喬木、鄧力群又把耀邦的講話材料和表現一次又一次地往鄧那裏送，更增加了老人與耀邦的裂痕，起了很大的離間作用。而耀邦又不想法去彌補這個裂痕。

趙說：在此期間，我曾給耀邦建議找陳雲談談，耀邦當時同意了，但並不很在意，後來也未這樣做。

趙說，這中間鄧曾讓胡啟立給耀邦傳話：對自由化太軟弱，對自由化採取這樣放任軟弱的態度，是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鄧並說，如果我直接與他談，對耀邦震動太大。後來，鄧又讓喬石給耀邦傳話：「現在外面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鄧很嚴肅地說：「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麼不講？」後來我曾問耀邦：老爺子又打過幾次招呼，你都不表態，怎麼想的？是否要保持一定距離？耀邦隨即說：不是，不是。

關於耀邦下台一事，趙說，鄧認為如果老人將來不在，由胡耀邦來搞，自由化在中國會泛濫，對耀邦的表現越來越失望。鄧在1986年4月找耀邦談話，以年輕化名義讓耀邦接顧委會主任，到十三大時以平穩過渡的方式換下來，這是北戴河會議上已定了的；耀邦並不介意。趙說：這時我看到楊尚昆、薄一波對胡耀邦的態度就不一樣，只是胡啟立向我提出：你們都下來，我們哪能行？隨後由於耀邦與香港記者陸鏗的一次談話，把這件事提前了。趙說，鄧知道這個「談話」材料後，曾對楊尚昆講：「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鄧並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說：「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喬石、啟立也對我說：耀邦同陸鏗的談話太不像樣，陸把他說成開明派，挑撥離間，耀邦沒有批駁，而是迎合態度。接著1986年下半年發生學潮，耀邦認為學生遊行在國外是平常的事。鄧則認為是這幾年反自由化不力的結果，尤其對不及時處理幾個所謂自由化知識份子，指名批評了耀邦，並把這個講話發到各地。這樣一來，耀邦已無法工作，只能提出辭職。喬石說，看來，耀邦的工作變更不能再按正常的方式進行了。就這樣，提前以顧委會名義開生活會的方式，對耀邦進行了批評。趙說：在會上，我既談了耀邦為人寬厚，可以吵架不記仇、好共事的一面；也談了他好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的一面。談到這裏，趙順便說了耀邦和余秋里的關係很好，但在會上余卻對耀邦反戈一擊。

最後，趙紫陽說：我對胡的下台，既沒有落井下石，也沒有為他說話；因為老人都早已定了的，說也沒有用。

談到這裏，我內心始終感到胡、趙沒有團結起來，行動一致，終被「左」派利用，以致先倒胡後倒趙，使改革勢力的代表人物一個個倒下去，感到十分遺憾。因此我說了：如果胡、趙和萬里你們三個一致起來形成胡、趙、萬體制，中國的改革可能是另一個樣，不至發生這樣的轉折。

趙說：可能是那樣。

接著我又說：有人在傳說萬里可能當總理的事，說當時，你不同意，是否如此？

趙說：沒有這回事，根本沒醞釀過萬里當總理這回事。對十三大的人事安排，鄧小平委託七人小組，並直接向他負責。七人小組由薄一波牽頭，在醞釀中央常委名單時，有萬里和田紀雲。姚依林說，萬里如果進常委，國家一旦有事，他就會帶頭起哄。陳雲也反對萬里進常委。鄧同意了萬里不進常委。剩下田紀雲，姚依林又寫了一個報告，說田有什麼問題。這樣，田紀雲也下來了。鄧讓萬里去做人大委員長，

把這個想法告訴了薄一波；七人小組也不贊成。這時，鄧找萬里談話說：你是怎麼搞的，人事關係搞得這麼緊張，趙紫陽任總書記大家都同意。要懂得和稀泥也是政治；鄧要萬里挨門挨戶去登門訪問，做自我批評。

趙紫陽接著說，我確實不願當總書記，我願把經濟改革貫徹下去。耀邦下台後，鄧力群及一批老人反自由化勢頭大得很，如王忍之提出第二次撥亂反正。我責問他：撥誰的亂？反誰的正？撥胡耀邦的亂！？總不能把帳都算到胡耀邦身上吧！我為此還罵了他一次。如果以排山倒海之勢反自由化，那就不得了。在這種形勢下，我代總書記可能好一些，把反自由化控制、調整到改革開放上來，要少傷一些人。後來是我提出，才把胡啟立保下來〔談到這裏趙頗有興致〕，當時我提出胡啟立留任常委，不少人堅決反對，後來又是鄧小平表了態，才定下來。隨後我還把鄧力群的研究室撤了，不讓他管意識形態。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

我最後說，人們在遺憾地抱怨，正是這些激進而幼稚的青年學生，使民主派的兩個代表人物倒了台，使中國的民主進程推遲了廿年。

26

1994年7月30日

民主問題，不能讓黨委書記成為太上皇

在我談到中國應實行政治民主時，趙紫陽說：我對這個問題，在1987年前後是有個變化的。在1987年之前，我基本上是不大關心的。一則自己是在抓經濟改革；二則國務院事務多，比較忙，無暇顧及；同時，自己也不大懂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再則是已有人在抓。在1987年任職總書記以後，我才開始探索。總的來說，我認為黨對政府各部門、各群眾團體干預太多，可以說不管什麼範圍的事都要過問。同樣，對於一個人的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個人的私人生活，黨也要干預。這是不行的。我曾提出對文藝作品要少干預，但也不是不管，而是要提出某個時期的方向來，應提倡什麼？反對什麼？予以明確。至於對某個作品，不要干預；黨委要少介入，只要不犯法就不管。關於這一點，王蒙曾對我說，這是高明決策，表示稱讚。

趙說，這時我的指導思想，一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能變，但黨的領導方式必須改變；二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是一個法治的國家。那時我的一切講話和言行，都是按這兩個指導原則來闡述、來進行的。至於具體言行，在吳國光所著《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中作了記述，再沒有其他具體的要談了。你可找這本書來看。

我看了這本書之後，感到趙紫陽的政治改革，首先是從黨內開始，然後再擴大到社會民主。實行黨內民主要抓兩頭，先從中央和基層民主做起；在社會民主方面，強調公開化原則，要實行民主監督、民主選舉，群眾的事要由群眾來參加管理。政府範圍的事，由政府去處理，黨不要包辦。

關於黨內上層民主，趙提出，中央全會閉會期間代表全會的是中

1994年7月30日

央政治局，政治局才是重大方針政策的決策機構；而中央常委會應是日常工作的決策機構。

我認為，這樣就可以改變例行的中央常委會是一切重大方針政策決策的做法，從而也可以改變把一切權力集中到少數幾個人，以至發展為把權力集中到一個人身上，走向個人專政的弊端。這也應該說是總結了歷史的教訓而提出來的一項重大決策。

趙曾對我說，最複雜的還是人大問題。人大是權力機構，要發揮人大的作用，就發生了一個人大同黨委和政府的關係問題。如果黨對人大的領導是通過黨員，把黨的意志變成法律的話，那就沒有改革了；所有黨員都贊成，人大就沒有作用了；如果黨員離開黨員身份，只從人民代表身份出發自主投票，那就可能又亂套了。

寫到這裏，我聯想到安志文對我說過這麼一句話：中國的憲法規定，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但又在黨的領導下，怎麼能協調呢？這在歷史上也是個怪事。在具體操作上很困難。不過趙紫陽也提出了黨委書記兼人大主任這個辦法，認為這樣權力關係就可以理順了。

關於基層民主，趙提出，要把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群眾的事要盡可能由群眾自己來管理，要實行群眾自治，要保障公民的權利；對公民的權利則實行法律的保障。此前趙也明確地向我說過，因為人民有了文化、有了知識，就不是簡單地要求有飯吃，還要求當主人翁。

趙紫陽提出，每個單位從根本上要搞直接民主，民主選舉是首要的，實行村民自治。城市也可以實行直接選舉；縣長也要搞直接選舉，省要搞差額選舉。沒有選擇的定額選舉，很難說是直接民主。趙說：又讓人家選舉，又讓選不認識的人，這不是搞自我嘲笑嗎？選舉也搞指令性計劃，這怎能是群眾當家作主呢？

趙紫陽提出，一定要服從選舉人的意志，一定要服從選舉的結果，不得用任何辦法強姦民意。趙向我說：過去在根據地內還比較民主，進城以後反而不民主了；過去在根據地搞丟豆選舉，從來都是差額的，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五個候選人背向大家，每人背後放一個碗，選舉人表面上好像每個碗都放一下，實際上只放一個豆。

趙紫陽認為，三權分立不搞，但民主問題不能迴避，這是潮流。要改變家長式的領導，實行人民民主是針對家長式領導的。政治體制有個現代化的問題，人員每到一個單位就有人身依附關係，領導得罪不得，這不行。還有黨的領導太絕對化，每個黨委書記，就是一個絕對權威，一個單位的太上皇。

關於社會民主，趙認為社會多樣化，就是利益集團的分立化。人民要求民主是一個潮流，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

趙紫陽提出，黨務要公開，政務要公開，財務要公開，擴大透明度。要黨政分開。要改變過去處在地下黨封閉狀態下的觀念，改變被敵人封鎖包圍狀態下的觀念。今後要開放，對內、對外都要開放，實行民主監督，實行民主的原則、公開的原則，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

趙紫陽提出，選幹部要按政績的原則，有了政績群眾才承認，今後選舉產生的幹部實行任期制，非選舉產生的實行公務員管理。今後大學畢業生當幹部，要經過考試或先進入行政學院學習，這樣有利於消滅派性，有利於公開平等的機會。趙不贊成找第二梯隊、找接班人的作法，這不能衝破關係網和垂簾聽政。過去皇帝打了天下還要搞科舉，科舉就是文官制度。

趙紫陽提出，對社會要實行協商對話，要有對工、農、知識份子對話的管道。群眾要有出氣孔，這樣可能會麻煩些，但不至於出了事情而不可收拾。

趙紫陽提出，對新聞要進行改革，要實行輿論監督。定要實行言論自由，可以批評各級領導人。沒有自下而上的監督不行，沒有制約必腐敗，失掉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必然腐敗。

趙紫陽說，我們還沒有找到辦法，防止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主宰。目前龐大的機構是由於體制上的政企不分，黨政不分，因人設事所造成；癥結在於部門分工太細，專業部門要合併，綜合部門要加強，

裁減重複機構。首先黨內不設分管行政的書記、常委，不設對口部，政府系統不設黨組。這樣，可使黨非權力化，非行政化，避免官僚化和腐敗。企業不設黨的專職機構，黨的政治思想工作應結合生產經營和管理來進行；企業要推行廠長負責制，工會起監督作用。雖然不能罷免廠長，但可以投不信任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學校實行校長負責制，要教育家治校；把政治思想工作寓於教學中，不搞專職隊伍。

關於改革的理論，趙紫陽說，目前搞改革的人有點腰不直，氣不壯；有人認為現在沒有改革的理論，這是不對的。趙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改革的理論。這是根據中國國情、生產力水準低下提出的。如果說黨的「七大」找到了中國革命的理論，那麼「十三」大就是找到了中國建設的理論。正因為中國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才要發展商品經濟，才要實行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來發展生產力，發展市場經濟。由於社會經濟的多元化，出現利益集團的多元化，就必須同步進行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改革。

〔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也就是關於中國建設的理論，原已由趙紫陽向十三大提出，並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作了明確的闡述，這是歷史事實。而趙紫陽的名字卻在今天的有關文件中不見了，給人印象好像這一理論為江澤民所提出。〕

趙紫陽提出，改革是社會的轉型，是由自然經濟、產品經濟向商品、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涉及到人們的利益與權力的變更。過去產品經濟限制了人們的才能，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沒有活力，但社會穩定，現在商品、市場經濟時代，給了機遇，又帶來了風險。但由於機遇的不平等或不公平，人們在心理上產生了不平衡，使社會容易發生不穩定。

正因為有險情，趙紫陽又明確地提出，必須在改革中求穩定，在發展中求穩定；必須使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配套進行。要穩定不是不要民主，也不能以反自由化來壓制民主，而是要使我們的民主走上一條有秩序的法治化的軌道。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狀態下，

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去解決問題，那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新秩序，使我們國家成為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才能使社會穩定，長治久安。

我理解趙紫陽的目標是要使中國成為一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這大概也一直是他的理念。這次談話臨別時，趙紫陽最後向我談了要過「民主關」的問題。他說，這是潮流，不能回避。黨要學會進行民主與法治的領導問題，提出了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問題。他說，像目前這樣一切都由你〔這個黨〕來教訓我、教育我、改造我，形成嚴重的逆反心理是不行的。

有一次趙紫陽還對我說，初級階段的理論，從十三大報告提出已十年了，現在雖然又強調起來，卻沒有新的補充和發展，這也是憾事。

27

1994年8月7日

高度集權的體制需要有強人政治來推行

首先我說，這次四中全會的中心議題是黨的建設。但其基本精神則是全黨服從中央，目的是實行集中，就是權力又要集中到中央，強調這是大局；要保證上下一致，強調維護中央的權威。人們在議論說，這就是要樹立江澤民的權威，為鄧後作準備。

我說，現在當政者主要是在抓穩定，穩定高於一切。為此，一手抓新聞管制，實行審批制度，認為有負面影響的一概不准刊載。人們在議論，現在甚至比「四人幫」時期控制得還嚴。一手抓武警，大量擴充武警部隊，進行現代化裝備，其數量據說為正規部隊的三分之一。人們議論這不成了警察國家？搞種種換火隊，目的就是要將一切所謂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中。

我又說，在經濟上中心是制止通貨膨脹。據說，江澤民要求朱鎔基千方百計把通貨膨脹壓下去。為此，實行了糧、棉、油控制，有的實行專營。杜潤生說，下一步就是控制石油、煤炭。這樣，控制面越來越廣，計畫體制就是這樣的邏輯發展形成的，成為大計畫小市場，形成所謂「烏籠」經濟。這樣也就造成了部門壟斷。人們在議論這為官僚機構所歡迎，便於進行權錢交易。

趙插話說，不瞭解朱鎔基的宏觀調控的涵義是什麼？跟計畫體制應如何區別？這次通貨膨脹又是怎麼形成的，是需求拉動？是成本推動？還是農產品影響？不清楚。而農產品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一方面銀行儲蓄增加，一方面又通貨膨脹，這究竟又是怎麼回事？是否有滯脹現象發展？

趙說，怎樣才能管好貨幣？究竟需要多少貨幣？不清楚。對這一點改革前後是不同的，現在是多種經濟成分，人們手中持有的貨幣多了。貨幣不只是交換手段，也是投資手段了。股票、債券、房地產業務的開展，貨幣需求量增加。管貨幣與管貸款是兩回事，只管貨幣指標而不管貸款，結果三角債解決不了。

我接著說，目前在改革進程中，擔心國有資產流失放在首位，又限制股份制改造的進行，又限制拍賣。這樣，企業機制轉換不了，又壓了改革。實際上，國有資產天天在流失，每天約有成億元。據稱朱鎔基不主張搞股票、房地產和集資，並進行嚴格控制；也不主張搞小城鎮，怕發生民工潮鬧事，把農民仍捆在農村。人們在議論，這是在採取統制經濟的做法，為了穩定，控制是第一位的。

趙說，允許破產也還是破銀行的產；不允許拍賣還是意識形態問題，怕失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趙強調〕只有縮小國家所有制，才能提高經濟效率，才能制止通貨膨脹，才能增加收入支援農業，才能搞基礎建設。同時也只有使人們的收入增加，才能承受住通貨膨脹的壓力。

趙說，即便鄧走後，中國的局勢也是會穩定的。因為人心思定，不至於發生大的變化，還是會進行「和平演變」的發展。但目前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不同步，是要積累矛盾的，尤其是產生的腐敗無法解決。〔趙又強調〕目前中國這個高度集權的體制，乃是一個由強有力的權威人物來推行的體制。今後的發展或者是這個體制適應形勢而逐步演變，增強人大、政協的實際制衡作用〔談到這裏，趙說人大和政協說軟也很軟，說硬也能很硬〕；或者是出現強有力的權威人物來適應這個體制，但趙又說，沒有突變就出現不了這樣的歷史人物。

28

1994年10月6日

一、鄧是主張個人權威政治的

同趙紫陽談到鄧的問題時，我首先說，現在有人說鄧小平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提出改革開放的路線，把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之林，從而開闢了使中國走向繁榮富裕的軌道。還把這個貢獻比喻為孫中山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比喻為毛主席打倒蔣介石，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還認為，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由正統的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嚴密控制下的國家，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權威來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很難想像的。

趙紫陽說，是的，對中國的改革開放，鄧起了特殊作用。但是，鄧在政治領導上是不贊成西方那一套議會民主、三權鼎立的，認為那樣爭論起來沒完沒了，浪費時間。鄧主張集中，實行權威政治，認為這樣決策快、效率高。鄧甚至是不主張開常委會的，有時陳雲提出要開常委會，我將此意見轉告了，鄧卻說，兩個聾子都聽不見，開什麼會！

趙說，陳要開會是想有個說話的地方。有一次他責怪我為什麼還不開會。我回答說：我只是大秘書長一個。你和鄧商量好了就開。陳聽後說：啊！大秘書長一個！趙又順便說到，鄧曾叫薄一波給陳雲捎話：這個黨只能有一個婆婆。意思是只有他說了算。總之，鄧是搞個人權威，個人說了算，反對議論來議論去。同樣，向他作匯報也必須簡單明確，鄧是反對囉嗦的。

我說，有人稱你是贊成新權威主義的，是否這樣？

趙說，據說是吳稼祥提出的新權威主義，但我不知道新權威主義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也不認識吳稼祥。我只聽說，台灣有個教授曾對幾個青年說，你們應該瞭解一下台灣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台灣如果沒有強人政治，穩定一個時期，使經濟得到發展，台灣就沒有今天的民主。後來我去鄧小平那裏，曾提到有一種新權威主義說法，就是政治強人穩定形勢、發展經濟。鄧說他就是這個主張，但是不必用這個提法。

趙又說，對這個問題，我既沒有表示贊成，也沒有表示反對，我只是感到也有道理。因為在落後國家、發展中國家矛盾多，需要有權威人物來推動。

我說，在革命戰爭年代是需要有權威，需要有強有力的權威人物來推動。那時不但對領袖，就是對各級領導幹部也都是在樹立他們的個人威信。在發展中國家進行改革，看來也需要有權威人物來推動；但不能因此而不去進行政治方面的改革，尤其現在又是處在新的民主潮流時期。

趙說，對這一點我思想上有個變化。過去我是主張政治上不要急急忙忙搞改革；現在我認為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要配合起來。搞市場經濟了，還搞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矛盾很多，這不行。西方的政治哲學與東方的政治哲學不一樣，西方倫理是建築在人無完人、人「性惡」方面，必須實行制衡，所謂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強調法治，予以制約。東方倫理是建築在人可以是完人、人性「善」的一面，所謂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寄託於聖人、清官來治理。

在談到新領導班子時，我說：人們仍常議論，鄧小平曾三進三出，三次被打下去，後來又復出；趙紫陽是否也會復出呢？始終存有這種心理上的願望。

趙說：那是不可能的事，是幻想。事實的發展也證明自己過去的分析完全正確。鄧不可能再有什麼第二手準備了。當然鄧對第三代領導是不滿意的，從鄧這次南巡講話即可說明，尤其在首鋼的講話更可說明問題；而鄧考慮來考慮去，還是以維護現有領導班子為好。所以，鄧在首鋼的講話不讓發，要維護現領導。這基本上還是從維護「六四」

出發的。因此，鄧是不可能再作出什麼其他人事的重新安排。

二、地方自治權，聯邦或邦聯有道理

我說，這次朱鎔基實行的宏觀調控、銀行從緊的貨幣政策，使大中型企業也發生了困難，中小企業更不用說。據稱鄉鎮企業垮了幾十萬個，各省、市反映意見很大，認為強調宏觀調控、強調集中，影響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特別採取整齊劃一的作法，也影響了沿海地區的發展。這就使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加大。^①

趙說，關於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都曾有過教訓，周天子是採取封侯的辦法，讓各地諸侯獨立自主地去發展，從而調動了積極性，各地的經濟發展都很快；但卻出現了各地諸侯尾大不掉、各自為王的格局，致使周王室最終瓦解。為接受這一歷史教訓，自秦漢以來，一直強調集中，強調集權，改分封制為郡縣制，實行大權獨攬，並一再設法削弱地方權力，從而加大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結果一次又一次地發生地方背叛中央，改朝換代。這似乎是有規律性的。

趙又強調說，當然自古以來人民群眾同統治階級的矛盾是基本的，但多數是被統治階級內部勢力所利用，或是保守勢力，或是革新勢力，或是宗教、少數民族勢力。由於各種矛盾因素發展起來，終致變亂，從而發生朝代的更替。

我說，如這次蘇聯的瓦解，人們常議論說民族問題是重要因素。實質上也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因過多地剝奪了地方自主權，不給少數民族自治權造成的。

我又說，看來接受這些歷史的教訓，如何給地方以一定範圍的自主權，實行自治，確實是十分必要的。所謂聯邦或邦聯是有道理的，這不失為一種維持國家穩定的好形式。

① 宏觀調控，中國政府以行政手段調節過熱的市場經濟，以平衡整體計畫之需要，在1993、1996、2004年推行過三次。

29

1995年4月11日

1、美國專家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報告

我說：我3月27日在李銳那裏遇到一個從香港來的客人王紀寬，他說美國曾集中了二、三十位專家，專門研究了中國問題，寫了一個研究報告，影響很大；開始控制很嚴，後來發到了各大公司和企業集團。

我介紹說，該報告聲稱，毛澤東犯了一個戰略性錯誤，就是出兵朝鮮。那時，美國打算與中國進行和好，認為中國毛澤東是民粹主義，與蘇聯沙皇帝國主義向世界推進、有野心不同。美國同中國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因此打算拋掉蔣介石和台灣，並貸款給中國來恢復經濟。由於中國出兵朝鮮，使情況完全變了。

該報告這樣論述：鄧小平和毛澤東不一樣，採取實用主義的發展經濟的路線，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納入世界經濟發展體系，推向正確的經濟發展軌道。這是一大貢獻。鄧小平的問題是將胡耀邦、趙紫陽兩個總書記趕下台，這是個戰略錯誤。還有，經濟上開放，政治上集中，並堅持共產黨的一黨政體不動搖，這是矛盾的。

該報告分析說：對人們議論的所謂趙紫陽復出是不可能的，論據是中國政治領導的格局已定。

趙紫陽插話說：形勢是這樣，同意這個分析。

我又介紹說，對鄧後的分析，該報告認為有三種可能。一是江李都下，年輕一代上來。二是江在李下，李鵬一直是灰溜溜的，沒有意氣奮發的形態。三是領導班子作內部調整，就是將喬石、李鵬調整出來。

對於領導班子這個問題，我說，國內傳說楊尚昆曾向鄧提出了幾

1995年4月11日

條意見。一是江李都下，二是江留李下，三是保留顧問或成立顧問小組由自己擔任。最後鄧定下來，還是江李體制不變。據稱鄧還向萬里捎口信以後不要充英雄。大概意指不要干預新領導班子的工作。又傳說：江調吳邦國來北京，是為安排總理人選作準備；而朱鎔基可能會失勢，江是不支持他的。

趙說：朱鎔基應該在上海繼續再工作一段時間，打打基礎。鄧認為朱懂經濟，由於鄧的意見，才調到中央。如果鄧不在，朱也可能站不住。

二、實行市場經濟，就不能實行公有制與一黨專政

我說，過去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黨的學說，吹捧成是世界上最完善、最正確、最偉大的理論和學說，鼓吹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而把資本主義宣稱是垂死的、腐朽的、滅絕人性的一種制度，要打它個落花流水，要埋葬它。這種絕對化的觀點，既不符合歷史發展的事實，也違反唯物論辯證法。

我又說，馬克思設想在新的社會不要市場，取消商品，取消貨幣，否認市場經濟的力量。十月革命後，蘇聯用行政的強制的辦法來推行社會主義，結果是四處碰壁走進了死胡同，最後以瓦解告終。在中國，毛澤東則認為意識形態的力量大，要把資本主義斬草除根；硬要用意識形態的力量、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推行他的農業社會主義理想，結果給中國人民造成無比的大災難，也以失敗而告終。

趙紫陽說：現在看來，市場經濟已經發展得比較系統；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公有制與一黨專政。

趙強調，市場經濟必須有產權約束，在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沒有效益，誰也不會去進行重複建設，誰也不去搞豪華賓館和高樓大廈。在那裏的市場經濟，有社會輿論進行公開監督，有法律制約。而社會主義國家則不行，既沒有產權約束，又沒有社會輿論的公開監督。改革開放以後，把公有制當成一塊大肥肉，發展成為個人資本，實際變成了官僚階層所有，利用手中的權力大撈一把。企業再困難、再虧損，

也得吃喝、買豪華臥車、蓋房子，進行揮霍。尤其在上層，暴露出來是比較大的。高幹子弟有的利用內部關係、內部資訊發了財；有的把非法佔據的錢存入國外銀行，去搞個人享受。群眾極為不滿。在下邊的工作人員中，很多人則拼命搞行賄受賄，進行權錢交易，甚至「買官」，再把錢搜刮回來，更為群眾所痛恨。個體戶，不少人拼命在製造假冒偽劣產品撈錢，靠坑害群眾，發不義之財。種種不良行為和腐敗之風泛濫之廣，實為歷史所罕見！

趙又說，這種腐敗現象，在印度、緬甸也很厲害。這就容易發展成為畸形的市場經濟。

我說，南韓和台灣開始也是專制政體，但經濟也發展起來了，就是新加坡、香港也不是民主政治，經濟也騰飛了。

趙說，他們那裏都是私有制，有產權的約束，財產不能隨便被侵佔。但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台灣地區和南朝鮮最終還是演變過渡到民主政體，新加坡和香港地區雖不是民主政治，但實行的都是法治，社會上的行為準則都是依法行事。尤其是香港，人民是自由的，可以監督政府，可以公開地批評任何領導人。但在中國卻不行，實行輿論一律。〔不過，趙又明確地說〕都在演變麼！資本主義在演變，社會主義也在演變。希望中國也能自我演變，不要發生變亂，因為中國再也經不起折騰了。

趙繼續說：中國既然已走向市場經濟，就只能按市場經濟這條道路走下去，這不隨人們的意志而轉移。我們對西方在市場經濟推動下發展起來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觀，過去沒有引進過來，只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加上了東方封建專制主義的政體。就是原蘇聯那一套體制、制度也是如此。所謂亞細亞式的專制主義政體，這都不是馬克思主義原來意義上的東西。

趙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百年爭論的問題，以比較肯定的口吻說，看來，所謂「中學為體」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因為它容納不了市場經濟。過去陳獨秀、胡適是主張全盤西化的；香港有學者提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不無道理。

我插話說，現在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否也是「中學為體」的翻板呢？

趙說：也可以這樣看。西方的議會政治還是比較成熟的，應視為一種好形式；國會可以制約總統；議員又受選民制約。無論總統或議員，你不代表人民說話，就不選你。

三、經濟上不能烏托邦，政治上也不能烏托邦

趙紫陽說：過去毛主席在中國搞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是幻想。同樣，在民主問題上，也不能不切合實際，不根據經濟的發展，不考慮人民的素質，一下子就實行議會民主政治，這也是幻想。趙認為沒有一定的經濟發展，不形成中間階層，一下子就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中國就可能出現一千個政黨，是要亂的。人民素質不提高，亂了更可怕，會發生以暴易暴，出現獨裁政治，如同緬甸那樣。

趙又說：中國從計劃經濟產品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現代化經濟，要尋找些過渡形式。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應視為是民主化的一種發展；企業實現自主經營，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也是一種民主化。又如，人大的差額選舉也是一種民主化。代表可以自主地投棄權票，來表達自己的意願；你票少了，你就沒有權威了，這也是在培養人們的民主意識。

趙紫陽明確地說：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意識傳統一下子扭轉是不可能的。因此，出現專政也是必然的。中國沒有經受過資本主義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洗禮，根本缺乏自由民主意識，怎麼能不產生專政制度呢？像天津禹作敏^①這樣的事件不可避免；正如中國目前社會經濟要發展還必須發展資本主義是一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插話說：這也同公有制一樣，必然形成官僚階層所有制；也如同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權錢交易，形成了特權階層一樣，也是不可避免的。

^① 禹作敏（1929—1999），天津靜海縣大邱莊農工商公司董事長，80年代發展鄉鎮企業致富，聞名中外，1993年因私設公堂等罪名，判刑20年，1999年在醫院自殺身亡。

趙紫陽最後說：正是因為中國社會是這樣的一種客觀現實情況，所以中國的民主政治改革應以漸進的方式來推行，不能幻想一步到位。

1991年7月10日

30

1995年5月1日

一、批評列寧的領袖專政理論

趙紫陽首先同我談了這樣一個問題，他說，按列寧的建黨原則，黨是代表人民的；但在我國的實踐中，一些黨組織負責人，卻自以為「我」就是代表黨，反對「我」就是反「黨」、反「人民」。趙紫陽明確說，這種意識形態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

我理解，在這裏趙紫陽提出了又一個重大課題，就是意識形態的更新問題，要進行改革。

我說，過去在社會上和黨內形成了這樣一個行為慣例，無論黨內、黨外都不敢向領導提意見；尤其在反「右派」、反「右傾」以後，更不敢發表不同意見，特別是對各級黨的主要領導人的缺點錯誤不敢實事求是地說真話，更不用說公開批評和監督了。人們怕被戴上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的帽子，只點頭，不敢說不。領導人則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尤其是第一把手說什麼就是什麼，形成第一把手說了才算數的局面。例如，趙健民曾對我說，國家副主席王震^①的孩子犯了法，被抓去，王震大聲吼叫：不管什麼犯法不犯法，先給我放了再說。這是典型的僅憑某一個領導人的一句話，說抓誰就抓誰，說放誰就放誰的例子。仿佛領導者個人有天然的立法權、司法權，什麼憲法呀，法律呀，都不在話下。往往他的一句話就是法，形成政治特權，這就形成了最高領導人乃至各級領導人個人專政。

趙紫陽又說，這種情形在革命戰爭時期是難免的，有時也是允許

^① 王震（1908-1993），湖南人，解放軍上將，曾任副總長、國務院副總理，國家副主席。支持武力鎮壓八九學運。

的；但在今天就不應該了。形成這種意識形態的來源，還是淵源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馬克思雖然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但這套「領導人就是黨」的學說是由列寧所創立的，並不是馬克思。乃列寧在回答第二國際共產黨提出的，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問題時說：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不言而喻，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是由無產階級有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而共產黨又是由最有知識、最有智慧、最有威信的領導集體和領袖來領導的。演變為我就是黨，我就是代表人民，我就是代表社會主義；反對我，就是反黨，就是反人民，就是反社會主義。從而使主要領導人及領袖走向個人專政。趙紫陽明確地說：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治建設就難以實現。

我認為，過去我們所接受的革命教育、思想改造，培養的就是這種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形態。這就是提出了關於意識形態的改革問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在革命時期，是鎮壓敵人的武器，是為對付敵人而創立；但在革命勝利後，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只能變為鎮壓人民的手段。從蘇聯斯大林的亂殺人，中國的反「右派」反「右傾」及「文化大革命」使千百萬人民遭受迫害，就可說明這個問題。對這種無產階級專政形態演變的研究，也是一大課題。

二、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有個新的突破

趙紫陽說，中國的改革，經過曲折的過程，總算走上了市場經濟的軌道；這就使中國社會的發展到了一個新的轉機，即市場經濟的不可逆轉性的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必須實行政治上的開放。趙認為只有鄧小平這個權威再來個新的突破，才能把中國推向民主，使之向現代化方面發展。但由於鄧的「四個堅持」，由於鄧自己不能從「四個堅持」中解脫出來，這就使中國社會的這個轉機不能比較順利地實現，

並使經濟的發展處在困難和矛盾中。而中國若沒有這樣一個人來扭轉，這自然會由於政治上不開放而帶來矛盾的積累，並向壞的方面發展，從而又引起當局對意識形態的嚴加控制，對各種新聞報紙進一步壟斷，對異議人士嚴加防範。因此，中國政治上的逆轉可能性也充分存在。

三、當今的腐敗是制度的產物

趙紫陽說：自己過去認為腐敗是由人的素質不行，或用人不當，以及社會風氣不好造成的。其實不然，腐敗的產生乃是制度的產物，由於是公有制，沒有產權約束，由於是集權，權力不受制約，由於沒有公開監督，形成了體制性的腐敗。所謂「領導帶頭，層層分配，人人下水，個個沾光」。這是災難性的。

趙又說，西方的科學、民主、自由的價值觀，過去我們沒有樹立起來；而我們黨過去在革命戰爭年代所形成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講奉獻的價值觀，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壞而不起作用了。現在流行的價值觀實際上是一切為了撈錢，又有了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這個機遇。因此腐敗之風在現行體制下就很快蔓延起來。

趙認為，所謂跟世界資本主義接軌，在另一方面實際上也發生了外國人用錢買權來行賄，使中國政府產生腐敗；而我國又沒有民主，沒有實行公開的輿論監督，這樣就無法克服，也無法制止。中國不少企業家，又是有了錢就吃喝、享受，進行揮霍，而不是用於再生產。他們既沒資本主義初期企業家那種創業冒險精神，也沒有資本主義後期企業家那種敬業獻身求發展的勁頭，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又不摸底，怕說不定那天政策又會變化。人們存有這種心態，也影響到中國的經濟難以順利發展。

我插話說，安志文的看法是，中國的改革，目前已形成利益機制，都在追求效益，但沒有形成企業家，這是失敗；主要涉及體制，是國家任命幹部，難以出現人才，也難以造就人才，也就是說，中國現在有企業，但沒有企業家。

此外，趙紫陽還給我談了鄧小平夫人卓琳為孩子〔次子〕經濟案

件自殺一事。他是聽陳士渠的夫人說的。據稱是吃了安眠藥後被搶救。

我說我也聽安志文告訴我：確有此事。

趙紫陽說：安志文的話一般說都是比較實在，所以這事很有可能。這是向當政者的示威。

我說：據稱江澤民去南方時曾去江西共青城晉謁了胡耀邦墓。

趙紫陽說：我聽說，春節過年時，江澤民也去了胡耀邦夫人李昭那裏，並向胡耀邦像行了禮。

31

1995年5月27日

一、中國不能出現權力真空

在談到對鄧後形勢的分析時，趙紫陽認為可能出現不滿現狀的潮流。趙說，「左派」會以反腐敗、貧富不均、兩極分化等名義來反對改革；老工人、老幹部有不滿情緒，會以社會風氣不好、治安不好等懷舊心態表現出來；改革者則認為改革不徹底，裹足不前，在政治上又嚴加控制、進行輿論封鎖，而表現不滿，但這是弱音。當政者會對「左派」表示某種迎合，但不積極表態，仍打著鄧的旗幟進行專政，而這樣下去，卻要積累矛盾，到一定氣候會發生社會危機。到那時，上層可能出現分化，會湧現出新人物來。

趙又明確地說，但是，中國不能出現權力真空，共產黨不能瓦解；那樣，中國就要出現混亂局面，這是誰也不願意看到的。中國需要共產黨。否則中國會出現動亂，中國就要倒退。雖然外國不希望中國強大，但也不願意中國亂，就是王丹、柴玲^①這些民運分子也在反思，認為過去太激進了。

趙又回顧歷史說：正因為清朝末年在中國出現了「權力真空」，使中國發生了多年的軍閥混戰，把中國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造成歷史的悲劇。

我說，正因為這個歷史的悲劇，人們就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反思和

^① 王丹（1969—），吉林人。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1989年北京學運領袖之一，遭通緝，1990年被捕，判刑四年，假釋後，又判刑十六年。1998年保外就醫，放逐美國。入讀哈佛大學，2005年為加州大學訪問學者。
柴玲（1966—），山東人。北師大碩士研究生，1989年北京學運領袖之一，被通緝，1990年逃出中國，經法國赴美國，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現任電腦公司總裁。

歷史假設：如認為中國當時如不進行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而實行君主立憲，中國的發展也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日本明治維新不是證明嗎？袁世凱如果不稱帝而實行憲政共和，中國的局面也可能會好得多。如果日本侵佔東北後，不再進攻華北，中日兩國不至於俱傷，遭受如此大的戰爭浩劫。如果蔣介石不過高估計自己，不發動內戰，共產黨也統一不了中國，蔣也不致於敗逃台灣。

在此，趙紫陽明確地說，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反封建鬥爭，給農民以土地，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統一了中國。正是由於推翻封建制度，給了農民以土地，把農民發動起來了，同蔣介石國民黨形成了嚴重的階級對抗，使農民的命運同共產黨的命運緊緊聯在一起，只有打倒蔣介石才有活路。而蔣介石後來正是認識了這一點，接受了這個教訓，才在台灣實行土地改革，並取得了成功。李登輝這個人對大陸並不感興趣，只關心台灣的地位和獨立。

二、關於黨的自我更新

我說，現在一般青年人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失敗了，認為蘇聯共產黨都解散了，還談什麼共產主義，也不信仰共產主義；而且也不提這主義那主義、這個意識形態那個意識形態，認為那是冷戰的產物；今後就按市場經濟的發展，該是什麼樣的社會就是什麼社會。總之，他們對政治淡漠了，只關心自己今後的生活怎麼樣。

趙紫陽聽了之後，思索了一下說，應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同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體制和制度分開。

趙認為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學說是光輝的，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指明方向，開闢了新紀元。其理論至今仍無與倫比，仍對許多國家、民族產生積極的深刻的影響。當然在新的時代面前，馬克思主義需要發展；而列寧式的建黨原則以及蘇聯模式的黨的體制，則需要改造。因此他提出了以下問題：

1、改集中性原則為民主性原則。關於黨的民主集中制，他說，過去執行的實際是集中制。所謂民主只是手段，只不過是為了集中，

是為集中服務的。他曾提出，不設總書記，採取中央常委輪流坐莊，並改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一切重大方針政策作出決策的例行作法，強調政治局集體才具有對一切重大方針作出決策的權力。這不但擴大了黨內上層民主，更重要的是為了避免把權力集中到一個人身上，走上個人專政的道路。

2、改內定性模式為公開性模式。他提出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尤其在選用幹部上，首先從村、鄉、縣、市等基層開始，實行直接選舉，就是要尊重選民的意志，不搞內定這種「黑箱作業」，不搞指令性選舉，不搞等額選舉，不能讓群眾選自己不認識的人。

3、改變黨的工作的權力化、行政化傾向，實行社會民主。趙說，那就要群眾的事由群眾自己來參與管理。政府的事由政府去辦，並建立對社會各界協商對話的管道，黨內不應設分管行政的書記、常委，不設對口部，撤銷黨組。基層不設黨的專職幹部。工礦企業強調工會的監督作用，是工人自治的形式。農村要實行村民自治。

4、改變輿論一律，實行公開監督。趙說，沒有社會輿論的公開監督，不給人民以言論自由，不實行自下而上的監督，不給權力以制約，就不能防止黨和政府權力的腐敗，人民的公民權利也不能得到保障。為此必須增加透明度，實行公開化，給人民以知情權；改變過去的封鎖封閉狀態。對人民採取封閉、封鎖的做法，是一種愚民政策。

5、改造黨的政治思想工作。他說，這裏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是針對舊的意識形態、「左」的思潮，用鄧小平改革開放理論來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走上建設的正確道路。

我理解，趙紫陽提出改造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其意義如同延安整風時提出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樣。那時是針對王明的教條主義路線，經過全黨的學習，統一了思想，進一步明確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從而走向勝利。現在是應當拋棄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鬥爭路線，去進行經濟建設。

一個政黨的生命力就在於適應新的時代潮流，不斷地實行自我更新，以增強自身的活力；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正是這樣進行了改組，

實行「容共」，走與農工相結合的道路，才有北伐勝利，統一了中國。如果原蘇聯能進行黨的民主改革實行更新，可能不至於瓦解。因此趙紫陽提出要改造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實行黨的民主改革，實行自我更新，使之成為現代化政黨，意義是深遠的。

我說，人們在議論新領導班子只是搞穩定，一切從穩定出發，這對改革會有不小的消極影響作用。同時，人們也在評論，新領導人是從維護權力出發搞權力平衡，這就難以從戰略觀點提出問題來，因此，在目前的新時期，希望你在這方面有所研究。

趙紫陽說：自己已是局外人，一個人難以有所作為；人們對我有這個期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問題到時自然會有人出來進行研究。

32

1995年7月8日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體制的發展

我曾把青年作家章詒華的著作《人類的第二次宣言》^①轉給趙紫陽。他看了之後，今天對我說，我同意章詒華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發展有「趨同」的看法。

接著，趙又說，迄今為止，相對而言，當前世界上資本主義制度還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社會制度。雖然它存在有各種弊端，但它有活力。這主要是它能在批判中實行「自我調節」。許多學者也都稱，這個制度有毛病，卻能在批判中最後找出前進的辦法來。例如，資本主義在1929年爆發了全世界範圍的經濟大危機，後來採取凱恩斯主義^②，實行國家干預，恢復了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又如，為了社會穩定，實行過多的福利政策，影響了經濟的發展，也正在進行克服和糾正，使資本主義進入了所謂有組織或者說受國家調控的現代市場經濟新階段。

我插話說，資本主義制度越批判，越發展，越有生命力；而社會主義過去老吹捧自己最先進、最優越、最完善，不讓別人批判，一提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點錯誤，就認為是攻擊社會主義，是反社會主義，反黨，反人民。經濟學家顧准^③曾說：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到滅亡也沒有受批判，我認為蘇聯直至瓦解也是這樣。

趙說，資本主義二百年來就是這樣在批判中逐步建立、完善，來

① 章詒華著《人類的第二次宣言》（一、二卷）1993年，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52萬字，屬「馬克思主義研究」叢書。

② 凱恩斯主義，凱恩斯（John Keynes 1883—1946），英國經濟學家，主張國家干預以補自由市場經濟之不足，被稱為西方戰後繁榮之父。

③ 顧准（1915—1974），上海人，經濟學家，曾任中國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倡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文革被批鬥，妻子自殺，遺留文集、日記、自述，獲知識界高度評價。

適應社會發展的；而我們社會主義各個國家卻發展成了專制政體，這並不是馬克思原來的本意。馬克思是追求人的全面發展，是要建立勞動者的自由聯合體，並不是建立一個專制的政體。誠然，馬克思說過一句話，在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這乃是指一個不長的過渡期。而我們卻把這個專政變成專制政體，並實行全面專政，還要長久地堅持下去。

趙又分析說，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列寧在俄國革命勝利後，國內四處發生了資產階級反革命暴亂，要進行革命保衛戰爭；國外則有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包圍和封鎖。在那極端苛刻困難的條件下，必須集中全國的一切人力、物力、財力，必須實行高度的集權和集中，才能打破國內外敵人的一切包圍和進攻，從而建立了專制體制。斯大林由於要跟資本主義進行對抗，又用強制高壓的辦法來推行社會主義，更進一步地強化了專制制度。看來，無產階級專政的體制的發展，也有它客觀必然性。

趙又回頭來談中國，在中國，孫中山推翻清朝的封建專制後，也是要實行民主共和議會政治的；但由於軍閥勢力的反叛、復辟，國民黨內部人員的腐敗倒戈，黨員分化變質成了新官僚，孫中山領導的幾次革命起義，如「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又遭失敗，才不得不「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成立黃埔軍校，採取集中制，實行以黨治國，以黨治軍。這也是孫中山與黃興當時爭論得不可開交的焦點所在，而到後來也發展成為蔣介石的一黨專政，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政體；但孫中山還是提出了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時期，其目標還是為了要實行民主政治，還政於民。

在此，趙聯繫到我黨說，我們連這個分階段的目標也沒有，只是一味地強化無產階級專政，實行一黨專制政體。〔他幽默地說〕如果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標榜要實行專制政體，恐怕知識份子一般不會回應，不會參加到我們這方面來。但他又說，在資本主義大危機的三十年代，共產主義是很時髦的，知識份子是很嚮往的，共產主義是很吃香的。

我插話說，大概毛澤東也是為了實現農業社會主義理想，而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對凡是不贊成或反對這一觀點的人，都視之為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和反動分子，應當消除打倒，應當實行專政，從而使自己走上了全面專政的道路。

趙接著說，過去清朝時期洋務派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百年來爭論的問題，就是不管怎樣學習西方，這個專制政體不能觸動。趙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就是，黨的專制政體也不能動。看來這也不行，因為它容納不了市場經濟。對此，趙說，他很欣賞李澤厚提出的觀點，應當是以「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來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的東西。

趙明確地說，所謂要實行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實行西方的一套。但他又說，目前要實行西方的多黨政治、議會民主也不行。可中國現在的一黨專制政體也專政不下去，因為黨的高度集權的政體是靠權威來推動，目前這樣的權威沒有了；何況世界又處在民主的新潮流。他又舉例來說，據稱江澤民同田紀雲有次談話說，你在南方講話反對我。田說，我有記錄在，你看，是否反對你？趙說，這說明是在鬥法，反正你也抓不住我，這同毛主席時期完全不一樣，說明目前沒有權威人物。

趙又分析說，中國今後領導層的發展，也可能會出現幾套馬車，但中國在領導上應強調人大、政協的作用，實現一定的制衡；實行地方自治，發揮工會、婦女團體等社會組織和民主黨派的作用，形成各自利益的代表，在人大、政協通過各自的利益代表來進行制約。經過這樣的過渡，下一步實行民主政治、建立民主政體是比較現實的。趙認為經過這樣演變，而逐步走上民主政治是比較穩妥可行的。

趙又以肯定的口吻說，無論如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垮，中國不能出現權力真空，中國不能亂。如果亂了，中國會出現軍人專政，會出現獨裁政治。中國是否會亂呢？趙說，據說，江曾問過和江比較親近的人，該人稱，只要能把腐敗、通貨膨脹治下去，中國就亂不了；

否則就會亂。該人又問江，你以為鄧後會反對你的是誰？江答，喬石。趙認為鄧後也可能出現以反腐敗、反社會不公的名義來批鄧，因為各階層都存在對現實不滿的情緒。執政者也可能採取默然態度，改革會更難以深入下去，形成膠著狀態，致使矛盾積累，代價會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有個倒退期。趙又明確地說：即便出現了倒退期，改革開放終究還是會向前發展，就如同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也就不會有以後的順利的改革開放。

此外，我還對他談了有人希望你寫點政論性的文章，如在目前新的發展時期，黨究竟如何進行領導？認為你有資格並能拿出一些新的見解。趙紫陽說，將來自然會有人寫文章、說話的，認為自己即便寫了也不可能發表。

我又談到了新權威主義問題，我說：這個帽子加到你頭上了，認為你是主張新權威主義的。趙說：對這個問題我既未表示反對，也未表示贊成，只是認為還有道理。因為在發展中國家搞改革，矛盾多，需要有權威來推動解決。

33

1995年8月15日

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首先我轉述了安志文對目前改革的一點看法。安認為，國營商業改制還快一些，國營中小企業則差一些；主要是工人的安置問題。至於國營大型企業仍難以啟動，就是改不動；目下又是企業產權問題不講提，股份化只准搞試點，政治改革更是不准動。這樣拖下去，國有企業虧損面越來越大。就是這次中央北戴河會議，也只是討論如何發展經濟，而不是研究如何改革；總之，改革無大動作。

安志文說，看來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外合資是一條路；中小型國有企業，則是走兼併、拍賣、租賃這條路，租賃就是國有民營；農村鄉鎮集體企業則是走股份合作之路。至於國有大型企業，國家則計畫組成幾百個大的企業集團，並組建投資公司，使之成為借貸關係，不知這個作法發展前景如何？安認為早改革早主動，否則越拖下去，國有資產流失越厲害；而且各地對國有企業這個包袱也背不起，地方財政支持不了，所以各地自己都在搞。但在資產評估中，外國人和中國人的確有發了財的。一評估就回扣幾十萬元，變為個人資本；有的單位，如銀行等自己辦企業成立公司，利用手中的權力，利用兩種利率，變成官僚資本〔據杜潤生告訴我說，中央及地方各部門自有資金約有二千億元不存銀行，用來自己經營公司，放高利貸、炒股票、搞房地產；人們甚至議論有五大太子家族在控制。〕可說是腐敗成風。

安志文又說，這樣改革下去，當然國有經濟比重重要下降；這又涉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的標誌問題，被指責為私有化，即所謂姓「公」姓「私」的問題，這也是當前改革議論的焦點。同樣，在中外合資問題上，也遇到控股51%這個焦點，認為這涉及到國家主權，

國家命脈問題，而不敢進行，根本問題還是個意識形態問題。這實際上是觀念要更新的問題。因為按市場規則，都必須明確各自的產權。只有明確了產權的不可侵犯性，才能避免對財產的侵吞與短期行為的發生。

安志文認為改革要有兩個轉變，一是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一是向現代化經濟的轉變。西部地區還有個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的問題。由於東西部地區差距拉大，社會上貧富懸殊加大，人們心理上發生不平衡，這就積聚社會矛盾。而目前的意識形態又沒有凝聚力，缺乏精神支柱，這就增加了改革的艱巨性。

趙紫陽說，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無論過去的治理整頓和現在的宏觀調控，實際上在壓改革，也是倒退；致使改革步履維艱，在走著曲折的道路。但市場經濟改革是不可逆轉的。他說，過去房維中和現在朱鎔基，也還是計畫經濟思想。房維中^①是反對市場的。

趙又說，在改革問題上有兩個兩大塊：一個是體制內與體制外兩大塊。應大力支持發展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成分，這樣，可以吸收就業，可以增加國家財政稅收，還可以繁榮經濟；對體制內的國有企業則要加大力度加快改制，否則，支援也支持不起來，發展又發展不起來。這樣拖下去，越來越困難。另一個是地區上的沿海與內地兩大塊。要大力支持發展沿海地區，因為是兩頭在外（產品與原料），沒有風險。這樣，既可收容失業人員和西部地區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又可以逐步轉移資金和技術去支援西部的發展。因此，不應壓沿海，不應影響沿海鄉鎮企業的發展。趙表示遺憾地說，現在好些地方，卻反其道而行之。應首先使沿海企業及其鄉鎮企業發展起來「活起來」，該死的企業就讓它破產，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

我插話說，有人批評：現在宏觀調控是以計畫經濟為基礎，不是以市場為前提；一味強調要救活國有企業，強調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

這也意味著倒退。

趙幽默地說，當政者明知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堅持不了，口頭還得這樣講；否則，社會主義的旗幟就沒有了。那怎麼能維持呢？不過，中國經濟的發展雖然這樣不死不活，但也可以維持一下，一時既好不了哪去，也壞不了哪去。但這樣狀態是要積累矛盾的。

此外，我說，過去發生過首鋼周北方案件^②，現在又發生了北京市陳希同的案件^③。像這樣大的侵吞公有資產，進行揮霍的事件，正如安志文所指出的，乃是國家這個機體的腐敗。據稱北京市這個案件涉及一百四十餘人，不反腐敗不行；反腐敗又感到會發生危險。

趙紫陽說：關於北京陳希同的案件，聽說不只黨外不公佈，黨內也不公佈；認為那樣一來，共產黨的形象就不行了。

① 周北方（1953—），原北京首鋼總公司助理總經理。1996年被北京中級法院判處受賄行賄罪，處死刑，緩期二年，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② 陳希同（1930—），四川人。六四事件時任北京市長，繼任市委書記，中共政治局委員。1998年因涉貪被判16年徒刑，後保外就醫。

國家發展不要從既定模式出發

我說，現在理論界不少人認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不行了；對資本主義的矛盾和經濟危機的看法錯了；認為社會主義可以取消商品、貨幣，不要市場，否認價值規律等也錯了；看來就剩下歷史唯物主義了。

趙紫陽說：馬克思對社會的發展，只限於他邏輯思維的一條道路，沒有預見到社會的發展還有其他道路，也能促進社會走向現代化；而他設想的這條道路，實踐證明也走不通。他設計的這個模式行不通，應當跳出這個框框。

但是他又說，馬克思的理想是好的，為人們所嚮往。馬克思作為一個學派，他的學說是偉大的，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開闢了新紀元。共產主義又曾兩次席捲了歐洲和大半個世界，其意義是深遠的。

趙紫陽又明確地說：馬克思提出把共產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如同人們的認識一樣是無止境的，不能人為地規定一個終極目標；同時，也不符合他自己所創立的歷史辯證法。同樣，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由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和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所謂循環論，也並不符合社會發展的現實。趙紫陽認為首先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分期問題，到現在也弄不清；中國的社會又一直是分封納稅制，中國的封建社會也多是自耕農，另有佃農和地主莊園，這和西方社會農奴永遠是農奴的等級劃分模式不一樣。

聯繫到目前，趙說，各社會主義國家過去都採取了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和公有制，這種模式實行自我封閉，搞平均主義，自認為

最優越、最先進。體制的僵化使經濟發展停滯難以運轉，而支持不下去。蘇聯、東歐以瓦解而告終，其餘社會主義各國也都在進行市場經濟的改造。而北歐社會民主黨各國執行的是社會福利政策模式，自認為他們的社會制度是優越的，很完美；由於大搞福利措施，結果國家、社會負擔過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同時，也養了懶漢。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自由經濟模式，也在向國家干預方面演變和發展。

我插話說，目前美國克林頓^①提出在經濟發展方面既反對完全自由放任，又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用克林頓自己的話來說，「我們將走第三條道路」。

趙接著說：綜觀有關國家社會發展的歷史，一個主義、一個黨的政體模式，固然要走向專制獨裁的道路；就是實行直接民主這種政體的模式，所謂人民當家作主也要走向無政府，最終也會導致獨裁專政。趙認為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理想的社會制度。他又舉例來說，就拿民主集中制這種組織體制來說吧，實際上執行的都是集中制的作法，領導說了算；所謂群眾意見是由領導來貫徹；而領導意見也是由領導來貫徹，都是集中性的；領導人並不受制約。這跟西方歐美不同，他們國家的領導人受群眾制約，你不代表人民說話，人民就不選你；同時，他也受制於國會，國會通不過，你也不能辦；權力是受制約的。

趙說，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什麼理想的社會模式，也沒有固定的模式，或者說模式都有它的時效性。人們的思想不能為模式所束縛，但不是不要模式和社會制度。因此，他提出，今後社會的發展不應從什麼模式出發，也不宜以什麼主義來劃分，而應從如何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如何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出發，來引導社會的發展。為此，他又設想說，今後國家的類型是否可以以生產力水準來劃分，即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國家，中度發展水準的國家與低度發展水準的國家。社會類型可劃分為：發達的社會、準發達的社會和發展中的社會，或工業化的社會、後工業化的社會和欠工業化的社會。社會進步的指

^① 克林頓 (Bill Clinton 1946-) 1992-2001 年任美國總統。因發展互聯網科技產業，取得經濟繁榮。曾因萊溫斯基桃色案遭彈劾，但控罪在參議院未通過。

標可以用：生態環境，即生存品質；文化水準，即人的素質；生活水準，即富裕程度；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城鄉差別，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人均收入，社會公平等為指標，不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為界線來作為先進與否的指標。

趙最後以肯定的語氣說，計畫和公有制都是手段，不能作為目標模式；人性也不能掛「論」，只按人性的本質去發展就是了。

我說，安志文也有一個看法，對人的觀點也不要分「派」，因為人的思想認識是變化的。

此外，我還談了安告訴我的一些情況。關於楊白冰參加中央常委問題，楊尚昆和江澤民在常委會上爭論得不可開交，江沒辦法，最後把鄧抬出來，聲稱「不參加常委」這是鄧的意見。我說，在楊和江的較量中，江是勝利了。人們議論說，在地方上，上海幫與北京幫的較量中，陳希同就範了；萬里對自己手下的人說「自己總算是安全著陸了」，並聲稱以後什麼事也不願再介入了。看來，鄧後已安排妥當，江的接班已完成；在領導層內部人們議論說，雖然喬石、李瑞環強調法治，說了點人民心裏的話，也只是說說而已，沒有具體行動，起不到制約作用。

我又說，人們談及江，從鄧南巡講話後，總算也跟上來了；認為江對美國對資本主義認識有了變化，不再談反和平演變、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了^①；對非國有經濟成分的態度也有所變化，不像過去那樣對個體經濟要整它個「傾家蕩產」；對「六四」的調子也有所降低；只提「風波」不再提「動亂」這個詞了。看來，這大概是出於形勢所迫。

^① 作者注：但江後來還是多次說過西化、分化、亡我之心不死之類的話。

35

1995年11月4日

一、顧准是個大思想家

人們稱讚的《顧准文集》這本書，我曾送給趙紫陽。今天，趙紫陽首先同我說，顧准是個大思想家。趙紫陽認為在當今理論界還沒有超過顧准的思想水準的。他說，在那個人迷信的時代，在那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和逆境中，顧准這樣鑽研問題，提出問題是真不簡單，他對顧准表示了欽佩的心情，並要我好好看看這本書。

趙紫陽這樣的高度評價顧准，我借此對顧准其人作個介紹，對其觀點作一點敘述。

顧准，上海人，生於1915年7月1日，1927年在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學習，畢業後，在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任練習生，那年才13歲；後，同時在立信會計補習夜校兼講課，那年才16歲；後（1934—1940年）在之江和滬江等幾所大學擔任兼職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變，民族危急時，顧准組織了秘密的馬克思主義小組「進社」，並與黨的週邊組織遠東反帝同盟建立了聯繫。後由於該同盟領導人被捕而失去聯繫，又找到武衛會黨團，建立了聯繫；並在武衛會滬東區委工作。後任總會宣傳部副部長，上海市分會主席；並於1935年2月參加共產黨。武衛會組織被破壞後，顧准就流亡去北平。1935年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掀起抗日救國高潮後不久，顧准回到上海，先後擔任上海職業界黨團書記，江蘇中共省委職委宣傳部長、書記，江蘇省委文委副書記。1940年8月顧准又到蘇南、蘇北抗日根據地；並去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又回到華東，歷任蘇南路東中共特委宣傳部長，工委書記，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山東省工商總局副局長，山東省財政廳長。1949年接管上海後，任上海市財政局長，上海市財

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53年調北京後任司長、副局長；1956年入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

1952年「三反」運動中，顧准無辜受到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1957年和1965年兩次被劃為右派分子。其妻汪璧1968年被迫害致死，死後也未能獲見遺容；其時子女皆小。1974年顧准病危住院時，曾對他弟弟陳敏之歎息道：「這次前門進來，將從後門出去了」；當時很希望看看子女，但在那個把謬誤當作真理，一切都是非顛倒的年代，為了「保全」他的子女，為了不損害他們，最終只能接受「劃清界線」，不求見面。年近九旬的病弱老母，得知兒子受盡苦難已回到北京，想見一面；卻因母親住在顧准妹妹家，其時妹婿乃身居要職，怕由此惹出麻煩，只好忍受了近在咫尺不得一見的痛苦，至死母子未得見面。

妻子含冤屈死，子女因政治原因與父親劃清界線，年近九旬老母咫尺天涯，至死不能一見，所有這一切個人的不幸，對於一個一樣有著七情六慾的人來說，需要作出多大的犧牲才能忍受！

顧准勤奮好學，雖長期處在逆境，並不怨天尤人，處之泰然。他認為歷史總是在前進的，現在比過去總要好一些。他總是銘記居里夫人的一句話：「即使在人類知識寶庫中投進一粒沙子也是偉大的。」他一直用這句話來勉勵自己，克服了精神上、物質上的巨大壓力和困苦。他以圖書館為家，身居斗室不以為苦，每天只帶幾個冷饅頭上北京圖書館，一直到閉館才回去。在常人不能設想的那種孤寂和清貧的環境之下，他孜孜不倦地讀書學習，有時每兩三天看一本書。他將一生全獻身於對真理的追求。遺憾的是，他至死也沒看到自己的冤案平反。

在此，我將我所理解的顧准的幾個觀點，試作以下淺薄說明，如說得不準確，責任在我。

1、馬克思期望社會主義革命，將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首先爆發，這個預言不合乎事實。對資本主義危機之說，像1929年那樣的危機一直沒有再現，似乎今後也不會再現。這主要是英國學者凱恩斯

用「赤字財政」、「公共工程」來對付恐慌，加強了國家對資本主義實行多方面的干預。同時，又有新技術、新產品、新材料，不斷出現，使生產總量不斷增長，成本便宜，使資本主義老是在發展中成長。還有工會的作用，使工人群體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得以保持一定的比例而不下降，這也幫助資本主義解決了消費不足的危機。

2、如果沒有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的衝擊，西方資本主義不會從帝國主義道路上退回來，不見得會在內部產生一股民主福利國家的潮流。看來，互相激盪的兩股力量都在推動歷史的進步，互相滲透、互相激盪都促進它們的前進。

3、西方思想善於批判。增強資本主義生命力的原因，在於他們不限制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相反還在發展批判，越批判越改良，越前進。例如，1929年危機時期，如果下令禁止一切異端思想，沒有凱恩斯主義理論出現，資本主義早就完蛋了。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直到最後也沒有受到過批判，終於滅亡。再如，美國對越南的骯髒戰爭在被批判的最後只好撤退。在西方，政治權威是當然的批判對象，任何既得利益者也都是批判對象。

不承認人類有什麼終極目的，建立一個什麼「至善」的地上王國。因為「至善」達到了，就一切靜止了，沒有衝擊，沒有互相激盪的力量，世界將變成單調可厭。顧准說，如果他生活於其中，一定會自殺。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那麼他就會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斯大林是殘暴的，為了大眾的福利，為了終極目的，而不得不如此辦。承認終極目的，這恰是哲學上的一元主義和政治上的權威主義的根據。如果不承認有什麼終極目的，相信互相激盪著的力量都在促進進步，這在哲學上就是多元主義。事實上，所有一切人類思想，包括所有的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唯理主義、經驗主義，所有一切宗教，都曾經標誌著人類或部分人類所曾處過的階段，都對人類進到目前的狀況作出過積極的貢獻。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動過思想鬥爭，而沒有思想鬥爭分明就沒有進步。

哲學上的多元主義，這是打破孔子的尊卑貴賤的倫常禮教的最有

力武器；唯有如此，國家元首才真正不過是一種服務，是公僕而不是皇帝。

4、哲學上的多元主義，貫徹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義，那就是，可以有各種政治主張存在，有來自各種立場的政治批評，越批評越改善、越進步，而改善的程度是沒有止境的，這就是要允許反對派存在。舉例說：中國如果真有以劉少奇為首的反對派合法存在，「文化大革命」這樣大的災難或許可以避免。（同樣，在蘇聯如果允許托洛斯基①、布哈林反對派的合法存在，蘇聯或許不至瓦解。）他認為：唯有存在一個政治上反對黨的時候，才會有真正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或者說，沒有反對派的存在，就沒有現代民主政治，民主不能靠恩賜，民主是爭得來的。

5、直接民主只能行使於城邦國家，現在沒有城邦國家，都是民族國家；有廣大眾民的國家無法實行直接民主，實行直接民主一定是無政府，也是一句空話。直接民主的口號是人民當家作主，而人民群眾在政治上永遠是消極被動的；不要奢望什麼人民當家作主，這乃是空調的理想，這會淪入借民主之名，實行獨裁的人的擁護者之列。

一個黨一個主義的直接民主也不可能，它一定演化為獨裁；唯其只有一個主義，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中國的專制政體歷史是悠久的，是直接繼承天王精神；中國的傳統思想產生不出科學與民主來，這是中國人身上的歷史重負。中國實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實際上也是權威主義而不是民主主義。所謂民主的方法，說服的方法，就是說服者的意見永遠是正確的；所謂集中起來，歸納起來，也是領導上的結論百份之百正確，往往是「真主意，假商量」。走形式而已！甚至是在愚弄群眾。

通常人們以為在政治上應保留反對派，實行兩黨制，但是兩黨制的實際情況也造成了那些民主主義者的幻滅。因為兩黨制只允許你二

① 托洛茨基（1879-1940），蘇共領袖、革命家、理論家。十月革命領導人之一。1927年被斯大林開除黨籍，驅逐出國，流亡歐美，創立第四國際，1940年遭蘇共特工殺害於墨西哥。

者擇一，好像結婚：候選對像只有兩個，你不要這個，只好要那個；如果兩個都不喜歡，只好打光棍——放棄公民權。何況這兩個黨，往往是換湯不換藥，隨你選那個，唱的還是那出戲。所以這種民主也不過是粉飾門面而已！

既然不要奢求人民當家作主，其他民主又是形式或者是換湯不換藥，那麼，人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力呢？如何防止權力變成壓迫人民的工具呢？唯一行得通的辦法，是使行政權力不得成為獨佔的，是有人在旁邊「覬覦」的；而且這種「覬覦」是合法的，決定「覬覦」者能否達到取而代之的，並不是誰掌握的武裝力量比誰大，是讓人民群眾在競相販賣其政綱的兩個政黨之間有表達其意志的機會，並且以這種意志來決定誰該在台上。

6、唯有立足於科學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種牢靠的民主，顧准認為思想是灌輸的，順應時代潮流的思想，總要通過思想家的頭腦炮製出來，還要形成政派加以傳播，才能形成時代的思潮。多元主義和兩黨制（多黨制）適合這個規律，這樣，不同思想間經過鬥爭，思想本身可以愈來愈深化，而在互相鬥爭的各家思想的爭鳴中，民智可以啟迪，民智的啟迪是科學發達的重要條件，從而使民主意識、民主政治發展越充分。

我之所以對顧准的簡歷和幾個觀點作以上敘述，是因為內心深深感到，像顧准這樣有思想、有真知灼見、有才華的人，就這樣地被埋沒葬送，感到太可惜了，這是中華民族的損失；也是因為像顧准這樣一生處於「艱難坎坷，歷盡折磨」逆境中，還那樣孜孜不倦地摯著於真理的追求，其精神太可貴了；又是因為像顧准這樣妻子離散、含冤至死，連近在咫尺的老母與子女也不得一見，就慘然地離開了人間，實在令人太難過了！我寫到這裏，禁不住潸然淚下。

至此，我才理解到所謂：終極目的建立什麼至善的地上王國，這乃是一元化主義與政治上進行專政獨裁的思想根源，從而也是現實社會主義所有國家形成專政體制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無產階級專政不放棄，民主政治就不能實現

趙紫陽對我說，看來，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不放棄，民主政治難以實現。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雖然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整套理論是由列寧所創立的，並不是馬克思。在這裏趙又重述列寧在回答第二國際關於究竟是共產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問題時說，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列寧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是由無產階級有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來領導的，而共產黨又是由最有知識、最有智慧、最有威信的領導集團和領袖來領導的。

這就是說階級代表群眾，政黨代表階級，領袖代表黨；也就是領袖代表黨、代表人民；誰反對領導，誰就是反黨，反人民。這樣一來，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演變為就是階級專政，就是黨專政，就是領導專政，最後變為領袖專政。根據這個學說，其他黨派都不能代表人民，也不允許代表人民；因此，也不允許其他黨派獨立存在，更不允許其他黨派分享領導權；只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按黨的統一意志和指示去工作，一切服從。趙紫陽明確地說，這也就是列寧的國家學說。

我說，香港大學一位教授聲稱：中國的政治體制是難點，因為難以實行政企分開。中國的所有制是難點，因為這涉及憲法的修改。中國的意識形態也是難點，因為中西文化價值觀不同，難以融合。

趙說，政治改革，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報禁，實行言論、結社自由，進行公開監督。這就會動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甚至有垮台的危險，這是掌權者絕對不能接受的。這種政治改革也是要求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學說，這就自然要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也是不被允許的。這同人權、自由不同，因為人權、自由是可大可小、可放可收的，是我可以賜予你的，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伸縮性。〔趙紫陽又以肯定的口吻說〕所以，政治改革是比較難。今後上層領導仍會嚴加控制，不會放鬆的。因此，胡績偉提出的政治民主

要寓於經濟之中，也是難以實現的；就是有人提出的實行民主從下層開始，也是難以實現的。總之，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學說不放棄，民主政治就不能實現。

我說，市場經濟越發展，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會越大；何況現在全世界正處在民主的潮流之中！

趙說，這正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矛盾所在，即經濟上可以改革開放，而政治上卻要集中統治，不能放鬆。這樣，上層不動，下層的民主改革是難以推進的。

此外，趙又說到，馬克思也有烏托邦思想，他設想社會主義社會以後沒有商品、沒有貨幣、取消市場。那麼，人們的需要如何滿足呢？按需分配物品行得通嗎？而且每個人的需要又是各式各樣，千差萬別。還有，按勞分配如何實現？腦力勞動如何計量？尤其這樣的社會裏矛盾沒有了，那麼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什麼？如果沒有動力，社會的發展就會停滯。

36

1995年11月23日

一、李鵬報復性強，欲置趙於死地

我說，胡績偉建議你要進行鬥爭，不能這樣軟弱下去，不管當政者採納與否都要寫信、寫建議，把這些材料積累起來，到一定時期公佈出來，以顯示自己的形象。

趙紫陽說，胡績偉不瞭解，我是在不自由狀態下，一切都攔在他們的手心裏。如這次我又提出去廣東，可以不去廣州市，只去一些縣，也不同意。在北京市，不讓去繁華地方；在郊區，提出去慕田峪也不讓去。我提出，這樣限制個人自由是違反憲法的，也不符合黨章，也不予答復。提出要求派人來談談，一再督促，也不理睬。過去我也提出要寫點回憶材料，要求把自己公開的、未公開的一些講話材料調來閱看一下，也置之不理。我也曾托段君毅捎話給江澤民：「這樣對待我，是違犯黨章憲法的」，「不要把我當作不穩定因素，你們有什麼矛盾，我可以出面去化解！」也未起什麼作用。對定我為「支持動亂，分裂黨」的材料，要求進行公佈，又未採納。趙又幽默地說，看來，由於我有國際影響，跟鮑彤不同，不然也把我送上法庭了。

趙說，他們是沒道理的。自己打算這次先去蘇州、常州或溫州一帶，並說明自己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第二步準備訴諸人大，訴諸社會。這樣鬧一下，可能要付出代價，對自己管制會更嚴；或者也可能退讓一下。如同去冬去貴州雖然開始不同意你〔指我〕隨同去，但最後還是給你作了去的安排^①。再緩一步看局勢的變化。

^① 作者注：1994年秋，趙紫陽去貴州、四川，曾邀我隨同去；我當時以氣功師的名義什麼都準備好了。後來，中央辦公廳派人來單位，動員我不要去。我聲稱：我是他的家庭保健醫生，責任所在，一定同去，費用可以自付。另一方面，我又感到趙紫陽是處在這樣不自由狀態下，為這點小事引起事端也不好。為此，我向趙紫陽表示：不去吧！算了吧！

1995年11月23日

我說，還是緩一下。並提出是否可以和萬里等談談，求得他們支持，出來說句話。

趙說，萬里曾在會議上提過我和鮑彤。

我說，我曾聽《改革風雲中的萬里》作者張廣友說，萬里曾不滿意地說過鮑彤有啥問題呀！把人家投進監獄。

趙說：關於鮑彤的問題，原來我估計不至於坐這麼長時間的牢，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可能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提前釋放。現在既然只剩幾個月了，就坐到底吧！也不要再提什麼其他要求了。但出來後要謹慎，因為還有兩年沒有公民權，不要被抓住口實。

我說，鮑的愛人過去曾提出過出國探親，公安部不同意。後來，卻又主動找她談話，提出可以給辦出國手續，不知什麼用意？

趙說，想同鮑的愛人談談。趙認為鮑彤是不會出國的。

我說，安志文曾對我說，對鮑判刑太重了。安認為鮑彤是得罪了人〔意指李鵬〕，又對我說，鮑彤是個冤案，但又解決不了。

趙說，過去李鵬曾以指責的口吻向我說：你身邊有壞人〔指鮑彤〕！我說：你說話要負責任。

我說，李銳曾對我說，他瞭解李鵬這個人，心胸狹窄，報復性強，想置趙紫陽於死地。李銳認為，大概是因趙紫陽不同意李鵬任總理結成的仇。人們又在議論並抱怨你說，如果你那時支持萬里任總理，國家的形勢會又一個樣。

趙說：李鵬任總理，是鄧不知從哪裡知道，說李鵬知識面還廣。田紀雲曾在別的場合下說過：李鵬當總理還不如萬里當。但萬里任總理一事，沒有任何其他人提過，也沒有議論過。只是萬里、田紀雲任常委一事沒有通過。在此，趙又重述了這事。田是因為姚依林寫了個報告，說田紀雲有什麼什麼問題而告吹。鄧說，既然田不行，那萬里也就算了（也是姚依林喧嚷說，一旦國家有事，萬里會帶頭起哄。）這樣，中央常委就是五個人了。在鄧提出由萬里出任人大委員長時，一些老同志表示不支持。鄧曾批評萬里說：你怎麼搞的，趙紫陽任總

書記都通過了，你卻沒有通過，你要挨門去拜訪。

我說，人們在議論，對鮑彤的判刑、整鮑彤，就是為了壓趙紫陽，壓趙紫陽就是為了「六四」不得平反。但人們輿論又是「六四」早晚得平反，誰舉起這個旗幟誰得民心！

趙明確地說：對「六四」問題，現在當政者主動提出平反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是「六四」的受益者。否則，他們存在的合法性就沒有了，就是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也是在蔣家下台後才進行平反的。雖然早晚要平反，但是目前的領導層是不會的，而且領導層內部也沒有非要換班子不可的條件。

二、胡績偉一篇論文斥責對趙長期軟禁

最近，我看到胡績偉一篇論文〈黨正確，能把壞事變好事；黨錯誤，能把好事變壞事〉。其中寫到：「尤為甚者，在撤銷趙紫陽一切職務以後，仍然把趙作為打擊對象，長期軟禁，剝奪他起碼的黨員權利和公民權利，這就更加無視法紀了。」「我們國家對於外國的很多前任元首是相當尊重的，經常把他們作為首腦貴賓來接待；為什麼對自己的前任的首腦人物卻一點也不能寬容呢？對他的原有的社會地位毫不尊重，甚至連他們起碼的公民權利也要剝奪；這不是同那些封建王朝的專制君王和斯大林專制暴君一樣嗎？」「我們的元首人物在國際談判中，一再強調對不同政見要寬容，主張和平協商，反對武力解決和武力威懾；可是為什麼對國內問題，對待自己的同胞，就那麼容不得不同政見？就那麼反對協商對話？就那樣進行武裝鎮壓和武力威懾呢？」

我又看到香港《開放》雜誌一篇社論，其中寫到：「趙紫陽不僅有公民權，而且還是中共黨員，當局憑什麼剝奪其自由達八年之久，還不放手？」

我的看法是，豈只是趙紫陽，前任國家主席劉少奇^①，開國元勳，

^① 劉少奇(1898—1969)，湖南人，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政治家、理論家。延安時期起，居中共第二號人物，1959年任國家主席。六十年代起與毛澤東政見分歧，被毛發動文革批鬥、關押致死。1980年平反，恢復名譽。

民族英雄彭德懷元帥，不也是因有不同看法或寫了個十分正確的意見書，就被置於死地含冤而去嗎？對於一般的不同政見者、異議人士受迫害，就更不用說了。

由此，又引起了我的反思。過去我們灑熱血拋頭顱，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反對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實行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統治。現在我們不是又重陷覆轍嗎？這不是推翻了國民黨的專制獨裁政體，又換了另一個專制政體嗎？這不是又回到原點了嗎？聯繫到對「右派」實行的專政和迫害，致使多少人家破人亡。聯繫到人民公社、大躍進時期，對群眾實行的奴隸般的控制而造成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聯繫到「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全國的牛鬼蛇神實行的全面專政，中國遭受的空前大災難，使我強烈地感到，必須儘快結束一黨專制政體，實行民主政治，大力進行政治改革。沒有民主政治，不實行法治的國家，公民的權利是得不到保護的。

所以，我很欣賞趙紫陽提出的，今後國家的類型以生產力水準來劃分，社會的類型以共同認可制定的社會發展進步指標來區分，不再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為界線，來作為先進與否的指標。正如顧准所提出的無論哪種主義，哪種制度，哪類意識形態，都是人類或部分人類所處的某一個階段對人類進步到目前狀況作出過的貢獻！

37

1995年12月14日

一、鄧小平留下一個難題——政經分治

趙紫陽說，一個親戚原是一個大廠的黨委書記，參加了這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昨晚住到這裏，說現在政府腐敗現象很嚴重；國有企業很不景氣，困難重重，工人發不出工資；行政人員也如此；農民因亂攤派負擔重也引起不滿。趙說，再加上舊的意識形態舊的勢力，因此，以鄧力群為代表發表的《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萬言書」，很容易得到上層和下層的同情與支持，而且他們又是從穩定和加強統治出發，也很適合當政者的口味。

我插話說，據稱江澤民對第一份「萬言書」曾表示贊成。「萬言書」分發廣泛，但不署名，以此來擴大影響製造輿論。第一份萬言書主要是把姓「社」與姓「資」，引向「公」與「私」；第二份「萬言書」主要是反和平演變；第三份「萬言書」認為「抓大放小」是私有化。

趙接著說，總之，又要實行市場經濟，搞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把這個難題留給新領導班子。現在的改革沒有一個權威來推動，是下邊推著上邊去搞改革；不是領導上主動地來搞改革。趙說，清朝末年，慈禧^①後來進行的改良，就是由於被動地搞而導致垮台的；如果像光緒那樣主動地改革改良，則情況會好些。至於中國的改革局勢將會如何發展，都在拭目以待，看變化，看鄧後的變化發展。

我說，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的看法是，所謂堅持無產階級

^① 慈禧太后（1835—1908），清朝同治帝生母，以垂簾聽政統治中國48年。晚年曾推行洋務運動，改革新政。

專政，實際就是堅持高度集權的專制政體，就是堅持黨的一黨專政。人們一般議論認為，這樣高度集中的一元化政體，在革命戰爭是必須的，應該說同過去的公有制計畫經濟也是適應的；現在是多元化的時代，無論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都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在這種情勢下，無論哪個國家、哪個社會、哪個政黨，誰企圖搞一元化的政體都是難以持久的。市場經濟的發展，衝破了計畫經濟體制，又衝破了公有制的一統天下，還將會必然地衝破高度集權的專制政體。過去「工業時代」的技術革命潮流，衝垮了清朝的專制政體統治；今天「資訊時代」的技術革命潮流，又使蘇聯的一黨專制政體瓦解。它雖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森嚴的員警保安作後盾，進行著嚴密的控制，還有無孔不入的情報網，卻也經不起新潮流的衝擊。因此，該是結束高度集中的專制政體的時候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顯然是過時了，應當放棄。

至於黨的領導，人們認為那也是歷史條件形成的，我國目前的實際狀況是還沒有哪一個政黨可以代替中共。趙紫陽也說過，中國如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會發生四分五裂。問題是，在目前新的技術革命時期，黨必須進行自我改造，那種我是領導，我就代表黨，反對我就是反黨的領導心態必須拋棄；那種只講個人服從，不講個人權利；只強調保持一致，不講不同意見；不強調自主、創新，假借民主為形式來實行個人專政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必須改變。而黨領導一切、控制一切大一統的思維方式，也必須改造。黨只有自我改造，適應新的時代潮流，才能進行領導。但共產黨也不能搞終身制，我們應當是人民的天下，不能為一黨所私有、所獨佔，其他黨派經過選舉也應該作領導。

關於堅持毛澤東思想，人們常常發問：毛澤東在建設時期的指導思想與實踐是失敗了，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他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已演變為專政人民，是破產了，為什麼還要強調堅持呢？實踐證明，毛澤東在革命時期的主要路線是正確的，符合科學精神，是成功的。對毛澤東這一時期的正確思想當然應當肯定；但建國以來，毛澤東的路線是錯誤的，是失敗的。毛澤東這一時期的思想當然應當

拋棄。

同樣，對鄧小平理論也應當這樣看待。實踐證明，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是正確的，符合科學精神，效果是好的，當然應當高舉；但他的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是矛盾的，是不科學的，也是違背新的技術革命潮流的，是有不良後果的；人們稱之謂：新的「四個凡是」。一方面堅持改革開放，一方面堅持一黨專政體制不能變，國外評論是這種「跛足」的改革路線會走向崩潰，事實正是如此，使中國演變成腐敗的市場經濟，發展成權貴資本主義，兩極分化嚴重，使中國廣大人民又受原始資本積累二遍苦，發出了社會危機。

如果對他們的思想理論，不加以區分，不論在什麼時期，不管產生怎樣的後果，都要堅持、高舉，這無疑又是在製造個人迷信，鼓勵盲從，實質上是在愚民。

二、吳江的書《十年的路》①歪曲事實

吳江寫的一本書《十年的路》，主要是寫胡耀邦的事，其中也涉及到趙紫陽。在寫到胡耀邦下台的原因時，提到學潮的爆發，迫使胡耀邦下台；而學潮的所以爆發，是由於趙紫陽搞政治改革所引發的民主思潮。認為胡耀邦的下台是趙紫陽給鄧小平的一封信起了「關鍵」作用。該書並聲稱：這封信在顧委會召開的批胡的生活會議上，薄一波作了宣讀；還寫到趙紫陽批評了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等。

對此，趙紫陽首先說：吳江寫的這本書涉及到我的幾點，完全不是事實。我是1987年才開始研究搞政治改革，並規定了嚴格的紀律，所有政治改革設計方案絕對不准外傳；而胡耀邦的下台是在1986年。至於我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是事實，但那是在1984年5月26日訪歐前夕，主要是關於國家領導制度問題，根本沒有涉及耀邦的事。這封信我只是在會議上說了一句，內容一點也沒有談；而且除鄧小平、陳雲

外，誰也不知道，沒有外傳。吳江書中說，薄一波曾在會議上作了宣讀，也根本沒有這回事。還有，我根本沒有批評過，也沒有說過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這也不是事實。

趙又歎息地說：我目前處在這樣沒有人身自由的狀態，不能有發言權；吳江卻如此地不顧事實，感到有些難過。趙認為吳江是個學者，又與耀邦相處多年，吳江的書是有影響的，不僅影響國內他周圍的一批人，也影響國外。趙還說了，至於吳江對我如何評價都無所謂，但不能歪曲事實。

我說，于光遠也對我說過，吳江在書中寫到胡耀邦的下台，趙紫陽起了「關鍵」作用，哪可能呢？他認為略為瞭解中國政治的人，都不會這樣看。我又說朱厚澤（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也對我說了，他參加了那次顧委會召開的批胡生活會，趙紫陽沒有說「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這句話，薄一波也沒有宣讀趙紫陽的信。

趙說：為了澄清事實，我也同秦川①談了一下，希望吳的書再版時能作個修正；並加以說明。他答應去香港時，要和吳江面談。據孫長江說，他看了這本書曾與吳江說過，在目前這個形勢下，這樣寫是否合適？吳江還答稱這是事實。我插話說：胡績偉曾對我說過，這樣堅持，不是學者的態度。

我說，無怪乎人們議論說，現在是「擁胡壓趙」，並把傾向趙的人都換了；人們還議論說，因周北方案件涉及鄧質方②，小平夫人曾以自殺向當政者施壓。這事是確實的。還評論中國的三位領導人：胡耀邦的良心，趙紫陽的頭腦，鄧小平的手段。

趙接著說，作為學者，如果有了點名氣，聲明改變自己的看法是很困難的，容易使自己的威望掃地。我已把給鄧小平、陳雲這封信送給了耀邦的夫人李昭，過去是怕被抓住口實「暴露國家秘密」，現在

① 吳江，80年代中央黨校副教育長，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1995年在香港出版《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貶趙諱胡。指趙紫陽參與衝胡。趙在本書中多次予以反駁。

① 秦川（1920—2003），貴州人，前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中國記協第一副主席。

② 鄧質方，（1952—），鄧小平幼子，北大畢業，留美，1993年和周北方等合組「首長四方」，任總裁，周北方出事，為保鄧質方，傳鄧小平妻卓琳曾以自殺要挾中央。

既然已經捅出來了，擴散就擴散吧！

我說，既然如此，有兩個編輯楊繼繩、施濱海，要寫本書聯繫到歷史情況，早就想同你談談，是否一併同他們談一下，澄清一下事實。

趙紫陽表示同意。

最後我也說了，據我接觸的同胡耀邦比較接近的人來看，對吳江的這本書的寫法，並不認同，他們只是懷念胡、趙體制，如果胡、趙體制不變，中國的改革不是目前這個狀況。

38

1995年12月16日

同楊繼繩^①的談話記錄

我按約定的時間，與新華社高級編輯楊繼繩一起走進了趙紫陽的書房，作了三個小時的談話。楊繼繩整理如下：

趙紅光滿面，氣色很好，動作敏捷，看不出老態，不像七十六歲的人。只是頭髮全白了。他記憶力好，思維很嚴密。就我提的問題，他一口氣談了三個小時。

問：中國共產黨歷任總書記下台都是要作檢查的。而您下台沒有作檢查。您能否結合您在「六四」前後的經歷，談談自己的想法？

答：關於「六四」問題，北京的老百姓都很清楚。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發言，主要談我在「六四」前後的經歷，這個發言海外報紙去年發表了，你可能看到了。現在再談，也沒有這個發言詳細、準確。

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講事實過程，講我處理這件事的過程和發生過的爭論。

我去朝鮮訪問前沒有明顯的爭論，當時提的方針，包括不激化矛盾的方針，鄧是同意的。李鵬同志內心可能有想法，但我去朝鮮前也沒有表現出來，爭論出在我從朝鮮回來之後。

我去朝鮮前，學潮是向緩和方面、平息方面變化的。學生其所以集會，主要是悼念胡耀邦。我主張不要干涉學生悼念活動。學生悼念的要求不能說不好。他們在外面悼念，我們在人民大會堂裏面開追悼會。追悼會開完後，耀邦的靈柩順利送到八寶山了。學生沒有理由再

^① 楊繼繩（1940—），湖北人，新華社退休記者，2004年在香港出版《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鬧了。我認為，只要我們以後的工作不犯錯誤，事件可以平息。因為我覺得不會出大問題，可以走了，才放心去朝鮮了。〔宗曾插話說：人們是在抱怨你當時不該去朝鮮。〕趙紫陽隨即說了：如果預定的訪問時間改變了，國際輿論就會認為國內問題嚴重了；何況當時國內形勢又是緩和了。

李鵬送我到火車站，問我有什麼交待沒有。我說，就這麼幾條：一是緬邦追悼會結束了，要恢復正常秩序，要復課；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動武；三是打、砸、搶、燒者例外。李鵬沒有講不同意見。李回去後，他把我的意見向鄧匯報了，鄧說，就照紫陽的意見辦吧。

我去朝鮮後的第二天晚上，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提出要向常委匯報，說情況很嚴重，常委開會聽了北京市委的匯報，正如人們說的，謊報軍情，把很多事情集中起來，說學生要搞全國性的大串聯，要建立組織，大事不好。我去朝鮮以前北京市不跟我講，也同意學潮實際在平息。當然，他們在常委會上講的情況不是沒有，但他們把情況說得太嚴重了。李鵬主持常委會，聽匯報後，他總結學潮，說是有領導、有組織、有綱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動。

第二天，他們去鄧那裏匯報。有李鵬，有楊尚昆。小平一向對學生鬧事反感。如果我去彙報說學潮正在平息，他也會點頭。他聽李鵬一講，就覺得問題嚴重。就發表了「4·25講話」，給學生運動定了性，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李鵬立即通知各單位傳達。北京市開了幾千人的大會傳達。

「4·25講話」後，又發表「4·26社論」。學生容易衝動。就引起了4月27日的大遊行，有十萬人參加。事情就這麼鬧大了。本來通過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漸平息的。

在悼念胡耀邦期間，有很多學生沒有上街，「4·26社論」把這批中間學生也調動起來了。「文革」以後，人們對戴帽子很反感，機關、知識份子都認為不應該這樣扣大帽子。「4·26社論」把大批人推到另一邊。那麼多人聲援，那麼多人擔憂。

「六四」的根本問題是「4·26社論」，引出空前規模的群眾抗

議。

「4·26社論」沒有發給我，在朝鮮時我不知道這個社論。但小平的「4·25講話」發到了朝鮮，使館給我看了，我也表了態，同意小平同志關於穩定局勢的講話。因為這是內部講話。我沒想到他們會公開發社論。到5月17日，我會見戈爾巴喬夫後，常委公開發生分歧。我主張從「4·26社論」退回來。有人說退回來涉及到小平。我說，這個社論我雖然沒有看，但我可以承擔責任。李鵬說，沒有那個必要。

我從朝鮮回來路過瀋陽時，遼寧省委同志說，小平講話傳達後反映不好。當時我想，為什麼要傳達呢？過去有一條，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來。這次為什麼要把小平抬出來呢？對傳達「4·25講話」，鄧本人也不高興，把鄧推到前面去了。

我從朝鮮回來後，他們最怕我不支持「4·26社論」。一定要我表態支持「4·26社論」。

4·27大遊行後，李鵬等也認為「4·26社論」搞壞了。他們沒有想法去緩和，而是認為要堅持下去，要頂住，而是千方百計地證明「4·26社論」是對的。在這一點上，他們當時可能有私心，特別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

「五四」我要發表一篇講話。李鵬、姚依林、宋平、李錫銘都要我在稿子中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句話。我沒有加，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必要再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鄧家的孩子（大概是鄧榕^①）給鮑彤打電話，要求在講話中加上一段小平對青年的關心。因為「4·25講話」公開以後，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講話中加上了這一段。

「4·26」社論各方面反映都不好。我從朝鮮回來後，他們包圍我，影響我，要我堅持「4·26社論」。開始我沒有講話。李鵬到我家談

^① 鄧榕，鄧小平幼女，又名蘇榕、毛毛，曾任人大常委會研究室主任，國際友聯副會長。丈夫賀平，解放軍總參裝備部副部長。

這事。我說要讓學生復課，有問題可以對話。我看了公安部「4·27」遊行的錄影，費孝通^①等四個民主黨派領導人找我。費孝通態度很明朗，說要想法挽回。我找北大和北師大的兩位校長，兩人的態度不一樣，但反映的情況是一樣的：耀邦的事基本平息了，「4·26社論」把學生激怒了。「4·26」社論發出後，學生衝出校門要上街。學校領導和黨團組織出來阻止。因為「4·26社論」態度很強硬，學校怕學生上街後真會發生流血事件，但4·27遊行什麼也沒有發生，學生勝利了。這時學校的領導和黨團組織感到灰溜溜的，感到以後的學生工作更不好做了。

我從朝鮮回來後很不好辦，有小平講話，又發了社論，學生怕秋後算賬，要求收回社論。而李鵬、北京市委堅持「4·26社論」不能退，還拿鄧作牌子，說「4·26」是鄧的話。事實上，是他們定性在前，鄧講話在後。我說，動亂這個詞是中性的，騷亂、動盪、風波，都是講規模，沒有講性質。小平講動亂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什麼樣的動亂。動亂有人民內部矛盾，也有敵我矛盾，問題就出在「反黨反社會主義」這個定性上，在5月17日常委發生爭論時我是這麼說的。

當時常委大多數人認為可以採取逐步緩和、逐步淡化的方法，不再說「4·26社論」了。5月4日，我接見亞銀年會時，就根據這個精神發表了講話。提出通過民主和法治的辦法解決問題，提出學生和政府要冷靜、克制……八個字。這個講話反映很好。北京七所大學復課了（當時報紙有報導）。這又是一次解決問題的機會（第一次機會是耀邦追悼會完畢）。但這時學生還不放心，認為我講的是空話，沒有落到實處。這時如果繼續對話，加緊做工作，形勢就會好轉。

但是，不知有什麼背景，何東昌在各大學黨委書記會上說：「趙紫陽的講話和「4·26社論」的精神是不一致的。他的有些講話是他個人意見。」他實際否定了我的亞銀年會講話。我想這一定是有背景的，他不可能發表這麼大膽的講話。何東昌的講話正符合大學黨政幹部的

口味。因為4·27遊行後，學校黨委灰溜溜的，他們也希望死守「4·26社論」這條線。何東昌講話傳達下去後，人們普遍認為，我的講話不代表中央。

這時，學生要求對「4·26社論」有個說法，而另一些人堅持「4·26社論」不能退。他們還收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鄧那裏送，發表刺激學生情緒的話，兩面挑撥。我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我和學生沒有聯繫。兩面都不買我的帳。學生想要「4·26社論」的結論有個說法，繼續對政府施加壓力。而這邊鄧的決心也越來越大。

李鵬對我說：「你主張不激化矛盾的緩和辦法沒有效果嘛！同學生對話，對一次話學生鬧一次。」他堅持只同學生會對話，不同鬧事的學生對話。我說，同學生會對話等於同自己對話，沒有用。現在另一方是鬧事的學生，要同他們對話。

戈爾巴喬夫訪華，學生佔領了廣場，連舉行歡迎儀式的地方也沒有，大丟面子，也給李鵬他們以口實。我在同工人對話時勸告學生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學生沒聽懂我的話。我這話的意思是，你們鬧得越激烈，有人越高興。

學生鬧得越來越厲害，李鵬和北京市委對小平的影響就越來越大。

就是到了這個地步，也不一定要非動武不可。

戈爾巴喬夫走了以後，我想，事情拖得這麼久了，學生也疲了。廣場上的學生已經不多了，北京的學生都回去了，留在廣場的多是外地學生。如果我們在「4·26社論」上退一點，事情有可能好轉。「4·26社論」不退，學生怕秋後算帳，就很難安定。

學生中有激進分子，在快冷下去的時候，他們搞起了絕食。

我認為，軍管必然導致動武，從「4·26社論」導致4·27大遊行說明，現在用上綱上線想把群眾壓下去是不靈了；用權威人士出來壓也不靈了。既然這兩個都不靈了，又不退讓，搞軍管，勢必發生衝突。一衝突就要流血。當時我還擔心，學生流血會不會造成工人大罷工？當時我沒有想到用幾十萬大軍來嚇住。這只有小平才有這麼大的氣魄。但這對共產黨的形象影響太大了，當時學生不相信解放軍會向

^① 費孝通（1910—2005），江蘇人，留英博士，中國社會學奠基人。歷任中國多所大學教授，社會學會會長，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

他們開槍。這說明我們在群眾中有信譽。1976年「四五」也只是用棍子，用工人糾察隊。北洋軍閥鎮壓學運也只打死十幾個人。「一二九」運動^①蔣介石也沒有敢開槍。我黨歷來沒有這種歷史。所以，學生不相信解放軍會向他們開槍。

開槍是把事態壓下去了。但黨和政府的形象損失太大了。這樣的搞法只有鄧才下得了決心。幾十萬軍隊，調動了好幾個軍區的力量。

我在解放前也鬧過學潮。組織學潮搞無限期罷課最不得人心，是得不到支持的。學生還是要念書的，「五四」前學生已經鬧夠了。他們不會無限期罷課。政府退一步，給學生個台階，就可能平息，用不著動武。

怎麼退？在5月16日晚的常委會上，我說後退我承擔責任。小平只要講這麼一句話：「現在看來，學生的問題並沒有原來說的那麼嚴重」。當時學生遊行的口號中有擁護改革開放，擁護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容。儘管他們有些口號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小平可以接過來，用來緩和矛盾。只要小平講了這麼一句話，剩下的工作由我們來做。

直到最後我還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案。軍管就是流血。確定戒嚴後，我給鄧寫了一封信：我擔心出現更嚴重的後果（我是指工人罷工）。

後來有一種說法，說鎮壓是被迫的，是無奈的。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有多次機會可以不採取流血的辦法，關鍵是我們的措施不對，方針不對。

事後也證明，哪有什麼黑手？哪有什麼組織、領導？真正有組織、有領導就好辦了。他們的領導也是當時產生的，甚至一天換一個。

我當時就說，我們是執政黨，誰能有組織、有領導搞出這麼大的事件來？

說開槍是沒辦法，這是後來講的。一開始是說動亂就要鎮壓。後來才又說鎮壓是不得已而為之，說政府採取了克制態度。誰克制？要不是我從中做工作，早就這麼幹了。李鵬還對外國人說，我們沒有橡

^①一二九運動，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要求政府抗日的遊行示威活動，中共是組織與領導者。部分參與者投奔延安，成為中共骨幹。

皮子彈。

學生中也有激進分子，他們怕學生不鬧，一會搞自由女神，一會搞絕食。

你問對付學生為什麼要調這麼多軍隊，開始軍隊開不進來，後來才越調越多。調少了也怕軍隊發生變化。這時我已經下來了，具體情況不清楚。

5月16日，上午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下午我會見。（談到這裏，宗又插話說，在你和戈談話時，你把鄧小平亮出來了。）趙隨即答說，是的，當時我是說了，我們常委有個決定遇有重大問題，仍請示鄧小平。這是由於當時李鵬已經把鄧小平抬出來了。根據北京市委滙報，李鵬總結說，天安門學生運動是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動；鄧小平據此發表了「4·25講話」，給學生運動定了性，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李鵬立即通知各單位傳達。這就把鄧小平抬出來了，致使天安門群眾指向鄧小平。我為維護鄧小平、解脫鄧小平，才把這個決定公佈於眾。晚上開常委會。在這之前，我已很明確地提出「4·26社論」要討論。這天的常委會上我正式提出對「4·26社論」要有個說法，定性不恰當，要改。雖然我沒有看這個社論，但我可以承擔責任。改「4·26社論」的定性，但無論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說一句話就行：「現在看來學生的問題並不像原來說的那麼嚴重。」

這天晚上我同李鵬發生爭論。他說，沒有必要讓你承擔責任，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他說，「4·26社論」是鄧的講話，我說不是，是常委會定的調，向鄧滙報後才有這個講話。李鵬說，你在朝鮮回的電報中說同意制止動亂。我說，動亂這個詞是中性的。問題不是出在動亂上，而是出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定性上。而這個定性是常委作的。

第二天，我給鄧寫信要求面談。鄧通知了幾個人：李鵬、姚依林、胡啟立、喬石、楊尚昆和我。我們去了鄧家。本來是我要求談話，他

通知了這麼多人，顯然不是聽我的意見。我還是重申了我的意見。姚、李說，學生動亂不能制止，是趙在亞行會議的講話引起的，這個講話使學生感到中央出了兩個聲音。我表示，對我們搞軍管我擔心出現嚴重後果，我很難執行。胡啟立也反對軍管，喬石原來不贊成軍管，在這個會上也贊成了。楊尚昆原來反對軍管，後來也贊成。最堅決的是姚、李。其實，這幾個人的態度無所謂，就是五個人都不贊成也可能實行軍管。在鄧家開會之前，我的意見是多數，我、啟立、喬石、尚昆，都是一致的。在這之前他們和我一起根據這個意見做了很多工作。

現在回答你的問題，我為什麼下台不作檢查？因為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作為總書記，到最後關頭，我贊成軍管，總書記還可以當下去；我反對軍管，就要下台。鄧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繼續當總書記，對學生採取強硬的方針，還是下台？我選擇了後者。這一點我反復想過。不贊成軍管和不當總書記我是一起考慮的。從鄧家開會一回來，我就寫了個辭職信。楊尚昆勸阻我，才收回。他說，你的辭職信一傳出去，就會引起更大的動亂。所以，對下台我並不悶氣。

這件事不像別的，不像過去搞運動作檢討。過去搞運動我作過不少檢討。那時總認為毛主席是對的，自己可能有錯誤。包括文革，我作檢討也是這樣。這一次我不這樣看。當然，這同「文革」後思想解放有關。我覺得自己沒有錯，何必檢討？一檢討就不能說明事實真相。

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勸我不要講話，勸我作幾句檢討，不深刻也行。他們沒有想到我在會有這麼個發言（在政治局擴大會上講的）。他們幾位在這個會上的發言都印發作為中央全會的材料；我的這個發言開始也印了，後來又收回了。原來要給我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我有這個發言，就不保留中央委員了。那一天姚依林主持會，我要講話，他說「不講了吧！」我堅持講。姚讓我講十五分鐘，我事先準備了稿子，20分鐘念完了，我一講話，他們很不高興。開完會我就走了。第二天復會，把我中央委員也沒保留了。關於我的問題組織處理進行投票，我沒舉手。我說：「不當總書記我可以舉手。說我分裂黨，支持動亂我不接受。」

1995年12月16日

在整個動亂期間，小平一直在北京，並不是傳說中他在地。

問：現在海外出版的一些書中，說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這種看法作些說明？

答：這種看法我也聽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銘^①的書和吳江的書。這種看法集中起來有四件事：一是說胡耀邦下台前我告過他的狀；二是說小平要退下來徵求意見，胡耀邦舉雙手贊成，我說離不開小平；三是說胡下台前我批評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說1983年我和陳雲聯合起來搞胡耀邦。現在就人們說的這四件事做些說明。

人們說我寫信告胡的狀。我是寫過一封信（只有一封信），這封信只是一般意義上講黨的領導制度問題，沒有講耀邦的事。（這封信全文見本書141頁）

這中間有個誤會。確定耀邦下台以後，1987年1月，在批評耀邦的生活會上，有人批評耀邦不受約束，好即興發言，對重大問題輕易表態。我也講了這方面的問題。我講了胡為人寬厚，可以吵架不記仇，好共事。但也有弱點，喜歡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你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你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人再好，也會發生變化。斯大林、毛澤東這麼偉大的人物，也出了問題。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好，就很難說了。講到這裏，我說，早在1984年我給鄧寫過一封這樣的信。我沒有說信的內容。有可能別人理解我當時發言的內容就是信的內容。

他在日本訪問，一下子就邀請了三千名日本青年到中國訪問。一回來就忙得一塌糊塗。他到朝鮮訪問答應金日成派飛行員到中國受訓，可以開中國的飛機。小平對他這一點很不放心。

吳江的書中說，薄一波在生活會上念了這封信。實際上沒有念。

^① 阮銘（1931—），江蘇人。政論家，曾是胡耀邦文膽。1988年流亡美國，2002年取得中華民國國籍，2004年陳水扁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當時要念了就不會產生誤會了。

說鄧要退下來胡舉雙手贊成，我不同意他退。事實並不是這樣。

耀邦是否說舉雙手贊成我不知道。因為耀邦下台之前，鄧沒有說他退的問題。

1986年2月，耀邦到我家對我說，小平同他談了話，十三大鄧自己要退出常委，退出顧問委員會主任（沒講退軍委主席），由耀邦幹。耀邦下一屆不當總書記。小平說，我們倆這樣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帶動退下來。耀邦當時是接受的態度。耀邦還說，這樣安排以後，你當總書記。我說：「我雖比你小幾歲，但我們倆是一個年齡杠杠的人（在60—70歲之間），沒有你下台我接的道理，可以讓啟立來接吧。」他說：「讓啟立馬上接還不行。」我說：「能否十三大不設總書記，由常委來輪流主持，輪流值班。」他說：「這個意見好。」

小平沒有同我談他退不退的問題。

我不贊成鄧退出常委，那是胡下台以後的事。1987年夏天，成立七人小組，負責十三大人的人事工作，由薄一波負責。這次小平講，十三大他不做常委（軍委主席還做）。當時我不贊成。理由有二，一是小平還是要管事的（他自己說過），與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內管事。何況在很多老同志還在的情況下，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分量太輕。但我主要的看法是在常委外面管事不如在常委裏面管事。事後也證明了這一點，「六四」就有人說「垂簾聽政」。

〔楊插問：為什麼小平從一開始不自己擔任黨的主席？〕這一點我說不清，只能是猜測。大概是考慮輿論吧。一開始叫華國鋒下台，胡和我都不同意。不管怎樣，華在粉碎「四人幫」時還是立了功的。胡不願接黨的主席。胡說，華在台上並不妨礙我嘛。鄧小平接受胡的意見。陳雲堅決要華下來。當時中國那麼多老同志都在，總書記很難辦事。我代總書記時，陳雲要我開會，小平說不開會。陳雲要開會是要個說話的地方；小平不開會，是他可以直接找我們。我沒有開會，陳雲問我：「為什麼不開會？」我說：「我是大秘書長一個。要開會，你和鄧商量好了再開。」陳雲聽後重複我的話說：「大秘書長一個。」

兩個老人意見不一致，總書記很難當的。李先念還說：趙只聽鄧的，不聽他們的。兩個人難辦了，三個人更難辦了。

1986年還有這麼一個情況。胡訪問歐洲時，多次向記者講十三大老人退不退的問題。我外出訪問時一概不回答這樣的問題。他是總書記迴避不了。是否有人從這裏覺察出我們對鄧下台態度不一致？

胡之下台，不是講鄧退下來引起的。小平的心胸不是那麼狹窄，他氣量還是偉大的嘛。他對胡很瞭解，只是認為胡不夠持重。

關於對學潮的態度問題。1986年鬧學潮時，12月30日，鄧找我們〔還有何東昌等〕開了一個會，講了一篇很嚴厲的話。說這次學潮是長期對自由化放縱的結果。還說，「我講過多次的王若望^①等人的問題為什麼不處理？」當時我插了一句「劉賓雅找了費孝通、錢偉長，商量1987年要開一個會，紀念反右鬥爭三十周年。費、錢覺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沒有搞成。」小平說，費、錢不錯。

我沒有批評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1986年學潮是我和耀邦、啟立三個人一起處理的，沒有分歧。所以，學潮問題我不會批評耀邦。

關於1983年陳雲勸我倒胡的問題，

說1983年陳雲倒胡沒成功。說有三次常委擴大會在經濟問題上我批評耀邦。事實是，1983年3月常委聽財經小組匯報，匯報的中心內容是：「經濟指標不搞那麼高，定低一點，讓下面超額完成，比高指標好處多」。這是我安排匯報給小平聽的。因為此前小平說指標定得太低。這次匯報是對小平這個問題的回答。

那天主要是計委的姚依林和宋平匯報。小平主持。我插話：前幾年我們帶有還帳的性質，所以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減少，這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但長此下去不行，中央財政會過不去。會上沒有爭論。就在這個時候，陳雲拿出講稿，針對胡耀邦一段時間內

^① 王若望（1918—2001），江蘇人，作家，反右、文革受迫害，平反後1987年被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1992年流亡美國。

對經濟工作的講話，提出了十條（也可能是九條）批評意見，如耀邦曾說過，財政赤字不可怕，是假的。陳雲就說：「財政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還有耀邦對第一個五年計畫談過看法，陳雲對他的看法也提出了批評。陳雲批評時，耀邦一句也沒有辯駁，只是承認。看來陳雲是憋了一肚子氣，一吐為快。小平不願意在這個場合下批評耀邦，也不願意爭論。他沒有思想準備，不太高興。說：「今天主要是聽匯報。」

在改革的問題上我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我們的意見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他作了一個報告，講「包」字進城，把農村承包簡單地搬到城裏來。結果商店搞承包，賣家用電器的獎金很多，賣針頭線腦的拿不到獎金。我制止了，我認為城市經濟比農村複雜，要慎重。當時的包字進城和後來的承包制是兩回事。在經濟改革方面我們意見是一致的，但在經濟發展問題上，我們有許多不一致的地方。

我同耀邦在經濟發展中的分歧在陳雲批評他之前，在鄧那裏談了一次話，說清楚了。我主張不要追求速度，他主張提前翻番。這是我們的根本分歧。小平找我、耀邦、喬木一起到他那裏去談了一次話。我說耀邦這些講話行不通，耀邦接受了。小平說：「今後經濟工作由中央財經小組和國務院主要決策和發言，不要政出多門。書記處只管大事。」

胡喬木認為耀邦在1983年那個全面改革的講話全文沒有「四個堅持」。小平說：「這麼重要的講話為什麼沒有四個堅持？這個稿子不能發。」

那天陳雲批評耀邦之後，胡喬木說：經濟工作的不同意見對地方影響很大，要不要找各省同志來打個招呼。」小平說：「你們商量一下吧。」我們定下來開一次會商量一下。事後我在書記處說：「書記處可以準備準備。這件事到底怎麼講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講。」

過了兩天，胡啟立到我那裏去說：「鄧力群在新華社的一個會上把陳雲批耀邦的話捅出去了。」我立即打電話給鄧力群問他有沒有這

回事。他吞吞吐吐。我說：「原來不是說要開個會定一下嗎？會還沒有開怎麼就捅出去了？這是無組織，立即打電話不要擴散！」之後我去天津。家裏來電話說：「給各省打招呼這個會不開了，這是小平定的。」

我從天津回來後，耀邦到我家告訴我：「那個會不開了。」還說，「外面對擴大會很擔心，以為中央要出什麼事了。我並不認為問題很嚴重。」我說：「這些只是經濟工作中的不同意見，不要想得太複雜了。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我只是個助手人才。對意識形態毫無興趣，也不懂。我也不認為喬木和鄧力群（指當時的鄧力群）有非分之想。陳雲同志主要是對你的講話憋了一肚子氣。我倆是在同一條船上的，同舟共濟。」

事後，胡啟立對我說：「耀邦對你說的同舟共濟很高興。」

就在陳雲批耀邦前後，姚依林和宋平聯名給中常委和鄧寫信，說耀邦到處亂講話，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計委工作很難做。這封信當時沒有反應。在小平確定不開省委書記會之後，才找姚依林談了一次話，說「你那封信有股情緒。」姚說：「我也承認有情緒。」

當時，的確有不少人對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作法有意見。我也有意見，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時並不是想把耀邦搞下來，包括陳雲。也可能我看得比較簡單。

陳雲的確有一肚子氣，我勸耀邦到陳雲那裏去談，但後來沒有去。

領導班子中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

小平後來為什麼不信任耀邦？根本原因外界不能猜測。小平對耀邦態度改變，有挑撥。挑撥是有的，關於四項基本最多只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對講話，鄧並不看重。鄧瞭解他，根本原因是兩個問題。第一

由胡來搞，中國自由化肯定要泛濫。鄧在反自由化^①問題上對胡越來越失望。1981年批思想理論戰線軟弱，第二次是反精神污染^②，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主持的工作領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滿。中間鄧讓啟立和喬石兩次傳話給胡，批評他對自由化太軟弱，對有些人不處理。第一次是讓啟立傳的話：「對自由化採取這樣放任軟弱的態度，是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

尤其是反精神污染，這使鄧、胡分歧增大。反精神污染是鄧提出來的。反精神污染有擴大化現象，搞了二十多天不了了之。本來也就完了，鄧自己也覺得反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這以後，胡多次對這一段評來評去：「提法不科學」、「搞了擴大化」。外國記者也從中挑撥。

1984年12月，作協四大，在耀邦講話的空氣下，在反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怨氣很大。作協選舉，所有的反精神污染比較積極的人全部落選。這樣一來，很多老同志有意見，認為作協四大是對反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協四大是耀邦和啟立主持的。老同志對他們當然有意見。

1985年，小平讓喬石給耀邦的傳話中說：「現在外面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麼不講？」

1985年在北戴河，在啟立、喬石給耀邦傳話之後，我對耀邦說：「要研究一下，給小平要有個交待。」當時他同意了，但他隨即去了新疆，此事結果不了了之。後來我問他：「老爺子打過幾次招呼，你不表態，怎麼想的？」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鄧不信任耀邦的第二個問題是耀邦同陸鏗^③的談話。鄧對這件事

① 反自由化運動。1986年中國南方發生學潮。1987年1月鄧小平指示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總書記胡耀邦下台，三名知識份子，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被開除黨籍。

② 反精神污染運動。1984年，隨著港台流行音樂及外來文化的入侵，由鄧小平發起反精神污染運動。一批文化人受到批判。

③ 陸鏗（1919—），雲南人，資深記者，先後被國共兩黨開押二十二年。1985年訪問胡耀邦，成為胡下台原因之一。1999出版自傳《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看得很重。陸鏗1985年和耀邦談話我不知道。就在1985年7月，鄧要喬石傳話時，喬石、啟立對我說：「耀邦同陸鏗的談話太不像樣。陸把他說成開明派，挑撥離間。耀邦沒有批駁，而是迎合的態度。」

1986年，從北戴河回來的一位老同志〔楊尚昆〕問我：「耀邦同陸鏗的談話你看過沒有？」小平曾對這位老同志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小平還對這位老同志說：「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我觀察到，從這時起，老人們對耀邦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

後來我聯想到，1986年4月，小平找耀邦談話，讓耀邦接顧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他換下來，採取的是平穩過渡的方式。鄧是以年輕化的名義和他談這件事的。胡耀邦也是這麼理解的。

1987年1月耀邦下台，這是必然的，只是老人們的決定提前了，形式也變了，由平穩過渡變為這種辭職的方式。

對後來耀邦辭職，我既沒有投井下石，也沒有為他說話。我知道，老人們已經定了，說也沒有用。

事實上，1986年學潮發生後，鄧在12月30日的談話中指名批評胡耀邦，這個講話當時就發到各地去了。他已經無法工作了，只能辭職。

我確實不願當總書記。我願意把經濟改革搞下去。但是，當時讓我代總書記，我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在那種形勢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後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總書記，首要任務是少傷一些人，把運動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調整轉向到改革開放。那個時期我雖然多次講過不當總書記，但又想，讓別人搞就沒十三大這個結果，肯定不如我。那時不可能為胡講話，講也沒有用，早就定下來了。能把啟立保下來很不錯了。耀邦下去了，常委會不能開，搞了個五人小組，啟立是一個。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贊成，小平同意了。耀邦下來後，啟立受到很大牽連，他參加五人小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

對我和胡耀邦關係的傳言有三個原因：一是不瞭解胡為什麼下台；

二是胡、趙在經濟問題上確有分歧；三是胡下台是我接他的職務。

外電說，鄧受到壓力，在胡、趙兩個人中，鄧只好犧牲胡保趙，不是這麼回事。鄧不是受壓力才讓胡下台。

也不是胡讓鄧退休，鄧才讓胡下台。如果是這樣，鄧就沒有偉大之處了。

鄧每次對思想戰線上的批評，材料不是來自胡，都是喬木、力群反映的。鄧一問，他們反映的確有其事。思想戰線是耀邦分管的，這當然使他被動。

鄧瞭解胡。有一次鄧向我介紹胡的長處之後，說胡不夠持重。他們之間的關係比較深，鄧對胡很瞭解。

我和胡的關係基本是好的，但也不是很好。他這個人的確有毛病。例如，在小平處已經定了，經濟工作主要由財經小組和國務院管。1984年，他又以端正行業不正之風的名義，一個部一個部地聽匯報。匯報會上，他又下指標。他定的指標國務院不知道，但部裏都來國務院要錢要物，說是耀邦定的指標。

總之，在改革問題上我們基本是一致的，是互相支持的。在經濟發展上，我們的意見有不同，他還是傾向於搞宣傳鼓動，搞群眾運動傳統的老辦法。

39

1995年12月24日

同施濟海的談話記錄

我又按約定的時間，與中國市場經濟報編輯部主任施濟海^①一起走進了趙紫陽的書房，趙作了兩個小時的談話，施濟海整理要點如下：

施問：人們常在懷念「胡趙體制」，你能不能就與胡耀邦相處時的關係談一下？

趙答：我與耀邦相處那些年，不好也不壞，但基本上是好的；經濟工作上有過分歧，政治改革上則互相配合。

由於耀邦對經濟問題不太熟悉，而他的性格又往往急於表達個人意見，以致引起地方和一些經濟部門有意見。如，對地方省市直接下達經濟指標等。在經濟發展速度上，我主張要留有餘地，走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又比較好，人民能得到更多實惠的路子；耀邦則有時提出過高的經濟指標。

這是一點。又如，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講話，他提出了「以承包為中心的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互相結合的、職工福利和勞動成果相聯繫的經營責任制。」這個講話《人民日報》於第二天以頭版頭條發表後，發生了一個「包」字進城的問題，所謂「包」字進城，一包就靈。當時，主要是北京和天津，簡單地把農村包產到戶的辦法拿到城市工商業部門。那時，我正在非洲十一國進行訪問。回國後，感到「承包」在農村的改革雖然有了比較成熟的經驗，但城市裏的改革

^① 施濟海（1962—），上海人，中國經濟時報編輯兼評論員，與董郁玉合著《政治中國》後，1998年9月被捕，1999年3月獲釋。

要複雜得多，所以主張從「利改稅」著手，並於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題為〈堅決而有秩序地改革〉。半個月後的3月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實行利改稅是一項重大改革〉。這樣一來，鄧小平覺察出胡與趙在經濟發展與建設問題上有不同的聲音。於是在1983年3月初，鄧就把耀邦與我請到他的家裏進行談話，從而把問題說明了；鄧還定了一條，就是經濟工作上的問題，主要還是由趙來負責。不久鄧又決定成立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明確了今後經濟工作的重大方針要經財經領導小組討論決定。這樣一來，耀邦就不便再插手經濟工作了，從而我倆的矛盾也就解決了。

1983年3月間，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工作。本來，這次會議是根據鄧的意見，討論經濟指標高了還是低了的問題，但在這次會議結束前，陳雲突然向胡耀邦發難，而且事先有準備，講話有稿子。當時，陳雲的批評很尖銳，提了大概十條意見，而耀邦卻沒有思想準備，只是作檢討，沒有反駁。同時，大家都很被動，鄧也很被動。問題是陳雲這個批評耀邦的講話是否傳達，如果傳達，耀邦就很難工作下去；如果不傳達，又涉及到對陳雲是否尊重的問題。胡喬木這時在旁煽風說：中央領導上聲音的不一致，在下層已造成思想紊亂。要找各省同志來打個招呼；最後，鄧小平提出：由中央書記處研究一下，提出個意見。我提出要由耀邦參加，拿出個意見來。

會後兩天，胡啟立找到我，說鄧力群在新華社召開的會議上，散播了陳雲同志對胡耀邦的十條批評意見。我當即打電話責問鄧力群，為什麼這麼做？這是組織紀律問題；並要他在哪裡說的就在哪裡收回（據稱：當時《人民日報》得到鄧力群批評耀邦的講話，立即報告了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習仲勳，習當面也批評了鄧力群的做法）。這樣，耀邦認為我是支持他的。同樣，在「反精神污染」時，我提出在經濟領域內不搞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耀邦也認為我是支持了他。

所以，在1986年10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以後不久，耀邦曾到我家來與我傾心交談近兩個小時。耀邦當時對我說：鄧小平不久前找他談了一次話，表示到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會和顧委會，讓胡也退，

不再當總書記，而由胡接鄧的顧委會主任。看來，耀邦當時對不任總書記一職，並不介意，認為顧委會主任相當於鄧的角色，仍參加常委會。但耀邦也說了建議由我任總書記。我當時明確表示，我們倆都是一個年齡杠杠的人，那有你下台我來做的道理；在六十至七十這個年齡段當中，只有你胡耀邦最適合當總書記，再沒有第二個人；你如果實在不想擔任總書記，在十三大是否可以提出不設總書記，由常委集體決策，輪流值班主持會議。耀邦表示很贊同。同時，我還說了，我倆過去主要是對經濟工作的不同見解，我倆是坐在一條船上，應同舟共濟。總之，我倆談得很愉快，大概耀邦也摸到了我的底。據胡啟立後來告訴我，耀邦對我說的要同舟共濟這句話，感到很是高興。

施問：你認為是什麼原因促使鄧要胡退？

趙答：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鄧下決心要耀邦退，議論很多。當時在老人當中議論最多的是胡耀邦同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談話。要害並不是所傳的那樣，說是因為胡耀邦講同王震「也可能是南轅北轍」而激怒了王震^①。關鍵是，談話中陸鏗向耀邦提出：為什麼不趁鄧小平在的時候把軍委主席也拿過來？此刻，耀邦沒有予以反駁，只是回答說：「軍隊論資排輩很厲害，現在軍隊也不打仗，我與紫陽同志主要是搞經濟工作，軍隊沒有什麼事。」文章發表後，鄧小平很不高興。另外，鄧又認為，文章中把耀邦說成是開明派，顯然是把一些老人視作保守派了。而對此耀邦也沒有表示反對。鄧曾指示將該文章讓書記處看一下，所以胡啟立、喬石都閱過，並將鄧的批評意見傳話給耀邦，話說得很重。喬石曾說，看來，耀邦的問題不能按正常手續來解決了。

鄧究竟什麼時候下決心讓胡下台。我的看法至少是在1986年底的學潮。鄧小平1986年12月30日講話，當時在場的有我和萬里、啟立、李鵬、何東昌等人。鄧當時就講，學生鬧事，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

^① 王震，見161頁。

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鄧還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鄧的這個講話是直指耀邦，可以想像作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顯然很難繼續工作下去了。第二天耀邦便寫信給鄧提出辭職。

當然，耀邦下台的原因，更進一步還可追溯到1983年3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向政治局常委匯報時，陳雲突然向耀邦發難，提出批評非常尖銳的十條意見。無論陳雲的這十條意見，還是鄧對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的講話，其材料，看來當時都為胡喬木、鄧力群所收集，又不斷地往鄧、陳那裏去送，使老人在政治思想上同耀邦發生了分歧。又加上其他一些老人如王震等的圍攻，認為老人如果過世不在了，耀邦會在中國搞「自由化」。這是老人們所絕對不能容忍的，這也是鄧下決心要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所在。

施說：我最近讀了吳江的一本著作，吳江在《十年的路》中，用了一定的篇幅描述和評價你同胡的關係，吳特別認為：「胡耀邦的突然辭職下台，可以說趙紫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該書第201頁）吳在書中說：「……趙紫陽又親自向鄧小平、陳雲寫信，責怪胡耀邦對國務院工作干涉過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現在兩老還健在，及時解決這個問題。這當然是一件極其嚴重的，非同尋常的事。這封信後來在胡耀邦下台時在批評胡的『生活會』上由薄一波宣讀了。」（同書第198—199頁）誠如吳江在書中多次聲言「要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我覺得現在確實有必要澄清一下歷史真相。這是我此次來的主要目的。

趙：關於耀邦下台的原因，從上述就可以說明了。老人決定讓耀邦退下來，是在中共十三大召開一年前的暑期在北戴河定下來的。這事，我事先並不知道。當時，我在北京，是楊尚昆從北戴河回來以後告訴我的。關於主要領導幹部問題，都是由兩個老人（即鄧小平、陳雲）決定的，他們看誰行，誰就上來；看誰不行，誰就下去。我們前台的人，也沒有發言權。這可以說，也是中國政治領導的特色，就是

對其他領導幹部的安排，如這次十三大的人事安排，都是由薄一波負責組織的人事工作小組來進行，而且直接對鄧負責；不過有時只是徵求一下我們在前台工作的人的意見就是了。

至於1984年我給鄧小平寫了信，這是事實。其出發點，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著力要建立好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問題，並沒有涉及胡耀邦的事。有人借此來做文章，只能說明大概有其個人動機了。尤其是，我寫這封信，在當時知道的只有鄧、陳和我三個人，不可能會有後來像吳江所寫的那樣，由薄一波宣讀云云。這是不可能有的事。

施：來這裏之前，我曾訪問了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①，據稱，你曾專寫過一封信給他的母親李昭，並附了你1984年5月給鄧小平的那封信。（原文見本書141頁）。從這封信來看，確實，沒有涉及胡耀邦的事。據我訪問參加批評胡耀邦「生活會」的人士回憶，薄一波也沒有宣讀過這封信。但為什麼會發生這封信被誤傳為「倒胡」呢？

趙：其中原因就是有人利用了我在批評耀邦的「生活會」上有一句話，提到「我在1984年就給鄧小平同志寫過一封信」，卻沒有談信的內容。利用了我批評耀邦的「生活會」上沒有力主挽留耀邦，只是進行批評，我說：耀邦不喜歡約束，喜歡標新立異；也談到耀邦比較寬容，不記仇。並說，我倆像現在這樣沒問題，現在可以合作，但鑒於我們黨的教訓，怕的是威信高了，膨脹起來也會有大問題，到那時候也可能就不好合作了，人是會有變化的，要相信制度，一定要把制度搞好，靠制度管人。我早在1984年就給鄧寫過一封信，提出過這個問題。

在會上我之所以沒有提挽留耀邦的話，因為這是老人早已定了的問題，提了也沒有用，但也沒有「落井下石」，無論是耀邦的去或留，我都不能像吳江所寫的那樣會起什麼「關鍵性的作用」，凡是對中國政治略為熟悉的人，我想都不會有這樣的認識的。

^① 胡德平（1942-），胡耀邦之子。曾任工商聯第一副主席，中共統戰部副部長。

順便說一下，在召開批評耀邦的「生活會」的前一天晚上，我到耀邦家裏，安慰耀邦說：不要激動，要當心身體。並告訴耀邦，你還是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像這樣的「生活會」怎麼開，也想聽一聽你的意見。同時，我也提醒耀邦注意，要有個精神準備，由於對你的處理可能會引發學潮。耀邦當即表示，他一定站在黨這一邊。在談話中，我也問了耀邦幾個問題，即在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問題上，鄧多次向你打招呼，你為什麼就不聽？非要堅持你自己的意見，究竟你是怎麼考慮的？耀邦也沒有回答。

另外，1987年元月耀邦下台後，我作為代理總書記，曾向鄧提出是否可以不設總書記。鄧表示不同意，聲言：這麼大一個國家，怎麼可以不設總書記呢？以後不久，鄧小平召集我與楊尚昆、萬里、李鵬等人開了一個小會，鄧提出成立一個五人小組代表政治局常委工作。此時，我提出讓胡啟立也參加，當時有人表示不同意，但經鄧點頭，讓胡啟立參加進來了，鄧並說：「按紫陽的意見辦」，於是由趙、楊、萬、李、胡組成了一個「五人小組」，代表常委工作。這樣，胡啟立就被保護下來了。

施：「六四」事件過去一段時間以後，海內外有些人曾認為當時您赴朝鮮訪問是隔岸觀火，有政治上的考慮，您認為當時應不應該赴朝鮮呢？

趙：事後我也曾聽到過這個意見，我並不這麼認為，關鍵是並不像李鵬、陳希同他們把事態看得那麼嚴重，學生和北京知識界的要求是合理的，行動也是有序的，局面也沒有失控，政局也是穩定的；這樣一種情況下推遲或者取消訪朝，那是重大的外交事件，萬里去加拿大和美國之前，也曾同我談到是否推遲？我認為沒有必要。在人民大會堂李鵬送我訪朝的儀式上，他還問我最後有什麼要交代的，我提出的第一條就是在我不在京期間，不得召開政治局以上的會議；可是在我到朝鮮的當日晚上，李鵬就召集了常委擴大會議，事情很顯然。

施：我在上海時，就聽說您是《世界經濟導報》的後台，後來上海在耀邦追導會後就暫停了報紙的出版；為此，聽說您還批評了當時

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

趙：《世界經濟導報》^①我很喜歡，也經常閱讀，觀點鮮明，支持改革開放，我當然支持；但我與他們不熟，鮑彤和我辦公室人可能與他們熟悉一些。報紙辦得很有特色。我回京以後聽說這件事；後來江澤民還有曾慶紅當面問我意見，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們：你們把問題搞糟了，為什麼要這樣？我說完就走了。當時他們倆個人一直就站在那裏目送著我離去。

施：此時此刻，今非昔比了。

趙：那當然，我現在是張學良嘛，至少是半個張學良嘛。

施：冒昧地問一句或是說一種假設，如果您能像葉利欽那樣爬上坦克，會是一種怎麼樣的局面呢？

趙：那就意味著內戰，受苦的是老百姓；我們欠中國老百姓太多，我們在還債啊！我無法做出這種選擇。

施：您說過佛經上的那句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趙：是。耀邦也說過。

施：與胡德平做過一次長談，對於那封信，他們這一代人不曾去那樣看，但他母親還是保留有些想法，不過這在今天已不重要。他說他父親與您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個大方針是非常一致的，同您有一樣的還債情結。他說他父親下台以後，還有人（鄧力群）在耀邦面前搬弄是非，想聯合他一起倒趙。德平說，父親曾勸告那個人，「我不會那樣做，而且我也勸你們不要那樣搞。」

^① 世界經濟導報，1980年6月在上海創辦的新聞週報，欽本立（1918—1991）任總編輯，鼓吹思想解放和體制改革，1989年4月因報導紀念胡耀邦座談會，被上海市委關閉。

40

1996年4月8日

1、軍演嚇台灣只會喪失民意

在此次同趙會面時的3月1日至3月20日，我國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演習。據稱參加演習的部隊有：二炮部隊第二師、南京軍區空軍、廣州軍區空軍、東海艦隊、南海艦隊。演習的地點為東海海域、南海海域，即近東沙和西沙群島的海面。演習的項目有：海空聯合攻擊、海空局部封鎖、超常加強攻擊、機艦群編組、陸基導彈攻擊、海空兩面迂回攻擊等。在這次軍隊演習中，要顯示打高科技戰爭的戰略戰術，通過演習進一步打擊台獨勢力，挫敗霸權主義軍事、政治詭詐和挑戰的圖謀。

我說，這次演習人們分析是要影響台灣的選舉，也就是不讓李登輝當選^①。演習是衝著李登輝，但結果民進黨的支持者反而把選票改投了李登輝，使李登輝的選票大大增加而當選。據傳，有人本來不想選李登輝，經過這次武裝恐嚇反而認為不選李不行。人們又議論說，人民日報社論對李登輝罵得那樣絕，要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怎麼再同李登輝打交道對話呢？特別是引起美國出動了兩艘航空母艦來接近演習區。人們反映，這次武力恐嚇是蠢事，是丟了分！

趙紫陽說，新領導班子大概沒有考慮到美國今年是選舉年，更有國會的壓力，使克林頓不得不表示強硬的態度，並調動兩個艦隊逼近演習區域，這就增強了台灣人民的信心。趙認為，現在台灣搞的是真正選舉，並不是在搞台獨活動；而這次顯示軍事威力，顯然是針對了台灣的民主，企圖以武力來影響台灣人民的心理，來搞李登輝；結果

^① 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第一次全民普選總統，國民黨候選人李登輝（1923—）以54%高票當選。

1996年4月8日

卻給李登輝幫了忙。

趙說：本來台灣是中國的內政，這次自己把它推向國際化；本來東亞諸國對中國有「威脅論」的疑懼，這次自己卻自動表現出來了；本來台灣是個不為人們所注意的小地方，而這個軍事行動卻引起全世界矚目，成為焦點；致使幾千名記者雲集台灣，看到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第一次民主直接選舉總統，走到了大陸的前面，這就長了台灣的威風。

趙接著說，同樣，在香港問題上，中國也是失策的。彭定康^①在香港玩了一手立法議員民主選舉，但其結果卻也是香港人民自己直接選出來的；中國卻表示到1997年後不予承認，要在籌委會內部成立臨時立法機構，以代替之；這也是違反民意的行為。中國委派的籌委會在選舉時，據說有一個人投了反對票，魯平就找他談話說：你不同意，那麼臨時立法委員中就沒有你的份。談到這裏，〔趙紫陽風趣地比喻〕這如同過去提工資時因你不贊成，與領導上有不同意見，增加工資也就沒有你的份是一樣的無理，這都是喪失民意的。

談到民主問題時，趙說：現在世界上只有兩種民主：一種是議會民主，有合法的反對派制約政府；一種是列寧式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執行起來，實際形成為領導人的專政工具。對直接民主，趙說，同意顧准的看法，也不過是領導人手中玩耍的手段而已！說的是相當響亮，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總之，趙紫陽認為現在世界上還沒有一種理想的民主制度。

我說：在我和體改委同志議論時，人們認為江澤民的心態是：既然共產黨把權力交給了我，我這一代就不能把共產黨的權丟掉；鑒於蘇聯的教訓，自己這一代不能搞政治上的民主改革，那是下一代人的事。安志文的看法：目前江澤民強調政治，就是要地方服從中央，軍隊服從黨的領導，就是要樹立中央權威，樹立江的權威，這是江澤民強調政治的涵義。而喬石、李瑞環強調政治，則又是一個涵義，那就

^① 彭定康（Chris Patten 1944—），英國保守黨政治家，1992-1997年任香港總督，提出加快民主化政改方案，遭中共批判。

是民主與法治，雖然反映還好，也只是說說而已，沒有具體表現，安又說，看來十五大領導層也不會有大變動，雖然群眾對李鵬印象不好，但江澤民也擺脫不了他；李鵬還是中央常委。有人說他想當國家主席，江澤民不讓，認為李鵬的胃口太大啦！據說江曾求助於薄一波作解釋工作，江聲稱為了穩定大局，需要集中。安志文評論說，一切為了穩定這個思路不行。認為江是在大力抓槍桿子、筆桿子，又抓幹部調整，為十五大作準備。

趙紫陽說，喬石在人大繼續幹下去還是可以的，論年齡還不算太大，主要是江在孤立喬石。並說，李瑞環已倒向江，大概是李有當總理的意圖。總之，總理人選是中心問題。

二、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不是高明之舉

趙紫陽從桌上拿了一本《中國可以說不》^①的書問我，是否看過？

我說：我有這本書，但還沒有怎麼看，只是翻了一下目錄。

趙說，這完全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他很以為然地〕這些人不看看現在是什麼時代。

我說，該書書名作者說是從日本引用而來，日、美貿易發生摩擦，大概受到了美國的經濟制裁。因此，日本有些人提出：現在日本經濟力量已經壯大，可以強硬起來，對美國可以說不。在中國，由於外資的引進，國外商品的侵入，使中國的有關企業產生危機或破產，從而使中國的有些民族工業受到了損失，人們有失落感，遂在少數知識份子中引發了民族主義情緒。據我瞭解老干部、老工人中也有認為中國被殖民地化了，表示不滿，就是在軍隊中也有人認為中國對美國、日本的表現太軟弱。該書的出版迎合這些人的口味，並和人們的懷舊情緒相結合。可以說這本書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容易引起共鳴。

書中還提到中國同資本主義國家這種矛盾，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是要發生戰爭或世界大戰的，甚至

提出晚打不如早打的叫囂。

正如趙紫陽所說，這些人不看我們現在處在一個什麼時代，世界又是一個什麼樣潮流。我說，以我的理解，現在的時代人類的生存是第一位的。由於人類吃的糧食、喝的水、呼吸的空氣，也就是說，人們所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生態環境都遭到了嚴重破壞。

是人類自己把自己推到了毀滅的邊沿，現在需要的是拯救人類從這個誤區裏走出來。現在拯救地球是第一位的。由於核戰略武器的出現，世界現存核彈頭可以毀滅地球多次，如果發生核戰爭，既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過去幾十年的冷戰，把人類社會推向毀滅的邊沿，現在是需要拯救地球從這個誤區裏走出來。也就是說，人類的整體生存利益是至高無上的，而國家的、民族的、階級的利益現在已退居到次要地位，如果再進行「你死我活」的主義之戰，意識形態之爭，人類社會還能存在嗎？現在是人類利益高於階級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時代。現在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首位的。由於世界經濟在走向一體化，世界各地區、各民族、各個國家都在被市場經濟的力量撞擊著、同化著、融合著，相互聯繫，相互發展，相互依賴，你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對別國的損害也就是對自己的損害，要求彼此相互協調，既競爭又合作，共同和平地發展。同樣，人們的思想觀念也變化了，那就是，哪裡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就向哪裡去發展；哪個地方生活好，就向哪裡流；再不願受國家、黨派、主義意識形態的限制了。也就是說，現在是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權，追求生活幸福的時代！是人類社會的新紀元將要到來的時代！

趙接著我的話說：中國近代曾長期受外國帝國主義的欺侮，青年學生的民族激情很容易挑起。有位學者在國外講演批評了《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被留學生起哄即可說明。但這書卻為當政者所喝采，雖然江澤民對外國記者問答時，聲稱自己沒有看這本書，但實際是支持，企圖以民族主義情緒來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藉以增強中國人民的凝聚力，並轉移人們的視線；也就是以民族主義來壓制民主。

^①《中國可以說不》，1996年在北京出版的政論書。作者宋強、張藏藏等，暢銷一時，其強烈民族主義觀點引起中外高度關注。

但趙又說，民族主義也是兩面刃，激起來後容易爆發反政府行為，而控制不住會發生大問題，目前有些地方掀起保護民族工業的情緒，反對外國投資、合資形成的經濟，並洗刷被認為是外國殖民地的一些標記字型大小，即可說明。對此，趙明確說，現在時代不同了，不是中國受欺負的時候了。中國的民族問題已解決，無必要再搞反美，以至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不是高明之舉。趙認為發展中美關係至關重要，這關係到世界戰略的格局。

我說，這次在中國召開的二十一世紀亞洲論壇會議，有人評論是給中國領導人上了一次政治課。他們認為，中國應從戰略眼光來處理中美關係，美國對中國並沒有領土要求，只是貿易；真正有領土企圖的是日本，還有俄羅斯。因此，中國更應在東亞避免「中國威脅論」的藉口。

我說，現在學生認為政府對外軟弱，實際是反映出對政府不滿；政府正在控制學生不要因外交問題上街，怕引起突發事件。

41

1996年9月26日

1、中國的改革出現了特權階層

趙紫陽說，根據這一時期的思考，對社會主義轉型的國家，自己有這樣一個看法：中國的改革已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這些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建立了社會關係網，利用內部資訊、各類批件、貸款額度、外匯差價、地租差價以及買賣股票，至於回扣更是普遍化、公開化，尤其在實行股份化後，乘機把國有資產流入個人手中，一舉暴富成上億富翁。這些人利用市場經濟這個機遇，利用公有制這個條件，大量侵吞國有財產，簡直是無孔不入。這種情況越持久就越嚴重，越日益尖銳化，使市場經濟向畸形方面發展，這是很糟糕的。

趙又分析說，這些人也形不成中產階級，也不是平等競爭中成長起來的企業家。他們既不要退回原來的計畫體制，也不願再深入進行改革去形成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機制；但這恰符合目前當政者「求穩」「怕亂」的要求，形成了當政者的社會基礎。這也是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省、市、各機關都在抓住權力不放，政企難以分開的根本原因所在。

趙認為，這種情況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不容易形成，那裏雖然有集權專制，也是市場經濟，但不是公有制，沒有上述條件，且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不容易發生侵吞現象，也不同于與中國條件相似的前蘇聯，它進行的是激進性的改革，雖然代價太大，但經過陣痛過程後，恢復起來比中國這樣拖下去的前景會好。

趙又回過來分析說，中國產生這個情況也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是必須有一種政策來進行遏制才行。這點卻沒有為當政者認識，相反，客觀上卻將特權階層形成為自己的社會基礎。

我插話說，這同「萬言書」所提出的，中國已兩極分化，已產生了新的階級說法都一致了！

趙說，這乃是事實。正因為是這樣，就必須深入進行改革，發展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機制；而「萬言書」則是要退回到原來的計畫經濟體制去。

為了分析社會主義轉型期間產生特權階層（階級）的原因，在此，我附帶引證一段光明日報剛刊載不久的深圳學者何清濤^①的談話，其中談到：

討論中國的經濟問題，首先得弄清中國經濟改革發生的原點。比如，我們總在說，現在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據以確定這一理論的依據是什麼？實際上我國的經濟改革是通過政策自上而下導入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基本要素——由市場配置資源，直到目前還沒有具備；政府在資源配置中……是代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功能，由各級政府組織進行資源配置。權力在中國社會轉軌期，通過「市場化」作用而成為一種「社會資源」，可以這樣說，在目前的中國，政治資本作為一種最主要的「資本要素」在參與國家資源的分配，許多人的「經濟資本」就是因其擁有政治資本才形成的。

中國目前存在著一個既不同於計畫體制，又不同於規範化市場體制的資源配置系統，在承擔著現階段的資源配置功能。這個系統是一種非正式的社會關係網路，其實也就是進行權錢交易的神經網路。許多國有資產正是通過「內部人」和關係網而流入私人手中的……權力參與分配的直接後果是：少數執掌權力和接近權力中心的人，通過「按權分配」為自己及其家族在短期內積累起巨大的財富。^②

我又談到另一篇文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帆

^① 何清濤，女，湖南人，中國經濟學者，1998出版《現代化陷阱——當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頗具影響力，2001年逃離中國，定居紐約。

^② 記者譚庭浩訪問何清濤文章：《權力市場化與國家資源分配》。

①的〈中國的危機：權力資本惡性膨脹〉，權力資本發展有幾個階段：權力資本創造市場的第一階段，是農村承包土地時，有二十億元人民幣集體財產流入幹部手中。

第二階段是商業資本階段，即在商業資本形成過程中，由國家壟斷形成的貿易管道轉換為私人掌握，大約有五萬億元財富被轉移流失。

第三階段是以生產資料雙軌制為標誌的生產資本階段，腐敗加劇到直接依靠審批權獲得個人好處的程度。九十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雙軌價差七百億元人民幣，五年三千五百億元，有10%大約三百五十億元的財富流失。

第四階段是1992年以後的金融資本階段，從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額度的分配，股票證券市場的操縱到房地產泡沫經濟，保險業，基金業產權交易與重介定計劃利率與黑市利率長期並存，貸款權力的使用，每一個金融創新都伴隨著極大的利益再分配，動輒數億數十億元，非商品層次可比，甚至發展到地方當局以司法權力保護本地債務人，大量的借款不還，以國家信用為擔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權力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的必然產物，估計財富轉移流失，不下於十萬億元人民幣，加上其他種種以權謀私，如有的領導者秘書收取賄賂以及亂罰款、亂收費等等，估計在中國改革轉型期二十年中，權力資本形成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於三十萬億人民幣，目前六萬億居民存款，如果採取實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無人認領。國際收支統計中，每年有一二百億美元的「誤差與遺漏」，表示我國已經有數千億的財富外流。^③

我之所以引證以上材料，是在說明趙紫陽提出的中國改革已出現了特權階層這一看法的確切性；是在說明中國老百姓過去幾十年勒緊

^① 楊帆（1952—），北京人，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② 摘自中國改革報1998年6月25日五版。

腰袋所積累起來的公共財產被這些人又一次掠奪了；也是在說明中國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不同步，不能進行公開監督，所造成的腐敗之風多麼嚴重啊！

我的看法，這大概是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的特色。問題是這些以權力積累資本形成的特權階層，能否發展成為真正的企業家，並發展市場經濟，促使中國現代化？有人認為這樣能做到。我認為一般做不到。因為這些人是發的意外之財，或者說是不義之財，他們既沒有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那種冒險創業精神，也沒有靠公平競爭發展起來的企業家那種敬業精神；而往往是揮霍浪費掉，或把款存入外國銀行，作外國公民、過自己的豪華生活。這同清朝末年改革形成的買辦資本所產生的買辦階層，同國民黨統治時代形成的官僚資本產生的官僚階層是大體相似的。

二、李銳「是立了一功的」

我說：章大林對我說，鄧力群當不上總書記是死不瞑目的。有人在議論鄧力群是地下總書記。安志文說，是王震在活動讓鄧力群當總書記，傳稱曾對趙紫陽說了你當總理合適。意指由鄧力群任總書記。安說，王震這樣說也是很厲害的，王震在倒胡時是先鋒，在炮轟趙紫陽時也是英雄。這些事實已為人們所共知。李銳對我說：陳雲也在支持鄧力群，鄧力群善於給領導人編纂文選博得好感。由於鄧力群在十三大選舉時先在選中央委員時落選，被安排去中顧委，在中顧委會選常委時又落選，據說在機關選黨代表時，也同樣落選了。李銳說，當時傳言，認為是我們幾個人活動造成的。

對這個問題，我記得趙紫陽只說了，鄧力群任總書記有人提過也醞釀過，但具體情況趙沒有向我談。只是因吳江這本《十年的路》，而李銳又和吳江比較熟，趙紫陽曾要我約一下李銳見見面，我於是按約定的時間，陪同李銳到了趙紫陽的書房。為了便於他倆談問題，我後來有意迴避了一下。我只聽到最初談話中，趙紫陽對李銳說了這麼一句話：在對鄧力群這個問題上你是立了一功的。據我所知，是指李

銳當時寫過一個報告給鄧小平，由趙紫陽轉給鄧，反映了鄧力群一些問題，使鄧力群任總書記一事未能提到議事日程。

此外，我說，人們在議論中央打算恢復黨的主席制一事。這樣，到十五大換屆時，對李鵬、喬石都可以作適當安排了，領導層的矛盾可以解決。也有人評論說，這是江的高招，有人則認為這是因人設事，不以為然。

趙紫陽說，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過去改主席制為總書記制是有一套說法的；現在再改過來，人們質問起來，是難以回答，也回答不出來的。

我又說，人們又在議論胡錦濤、朱鎔基、李嵐清^①究竟誰是總理人選。

趙說，目前階段，還只是醞釀，放出空氣，作個試探，不到最後是定不下來的。趙認為朱的可能性不大。

我認為，趙紫陽這一判斷主要是從與江澤民的合作關係出發來分析的，那就是趙紫陽曾對我說的，朱鎔基去上海工作，江澤民是不同意的；後來，是趙將了江一軍，才定下來。

我說，據稱，有一智囊人士向江澤民進言，為了江澤民權力地位穩固，政局穩定必須首先使國家經濟穩定，為了穩定經濟，必須由朱鎔基出任總理才行。從而在十五大召開前，由朱鎔基擔任總理一職才被確定下來。但人們又議論說：江澤民是在以李嵐清任常務副總理來制約著朱鎔基。

^① 李嵐清（1932—），江蘇人。50年代赴蘇實習汽車製造，曾任外貿部長，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42

1996年10月3日

一、不形成中產階層，社會是不穩定的

我說：于光遠對我講，這些年在改革問題上思想、理論都沒有發展，當政者一切都是從控制出發；因此，對十五大也不抱有什麼希望。理論界有人還抱怨說，不但現實問題不讓研究，歷史問題也不讓研究。人們對電影大型歷史文獻片《鄧小平》^①抹掉胡耀邦、趙紫陽改革開放情節極為不滿，認為太不尊重歷史了。趙健民也對我說，只要政策路線不正確，就不會有統一，誰能料想到毛澤東逝世後，出現了對「四人幫」處理那樣的形勢，而且是那樣的及時。

趙紫陽說：今天人民日報社論強調，新聞報紙一定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提出要政治家辦報。這樣，就又走到過去毛主席的那一套辦法，對新聞言論實行壟斷，不能進行輿論監督，這就使腐敗問題無法解決。趙舉例說，陳希同案件至今不敢處理，也搞不下去。據說彭真、萬里出來說了話，陳希同在北京工作還是有功的。江澤民在常委擴大會議上講，對陳希同的問題到此為止。為此，在會議上還批評了檢察長沒有按中央意圖辦事，據說致使檢察長精神失常住院。

我插話說，當局雖然要控制，實際上是控制不住，也封鎖不住的。陳希同案件不讓見報，結果北京青年報登了；「萬言書」不讓上報，貴州月刊登了。江澤民批示停刊北京青年報，尉健行^②則改為邊整邊改。中國經濟時報反駁《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丁關根聲稱要檢查，

①《鄧小平》，中國官方紀念鄧小平逝世六周年拍攝的大型故事片，丁蔭楠導演，描述鄧最後20年事蹟。

②尉健行（1931—），浙江人，50年代留蘇實習，曾任全國總工會主席，中共中央紀委書記、政治局常委。

1996年10月3日

也是不了了之，各地方小報也並不聽上邊的。胡績偉說，現在「言禁」突破了，出版沒有自由，「言論」講話有些自由，在下面可以說話了。

趙紫陽繼續說，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體制轉型，實行市場經濟，如果再搞集權，必然發生權錢交易，自然要產生特權階層，他們借助權力發展官僚資本主義，這是最糟糕的。

我說，過去我們搞革命，號召要打倒國民黨的官僚資本主義，那麼現在無形中我們卻又在發展官僚資本主義，這不是又回到國民黨的覆轍嗎？

趙說，這種借助權力形成的官僚資本，所產生的特權階層，是要阻止市場經濟向公平競爭的現代化方向發展，使市場經濟向畸型的方面發展，成為腐敗的市場經濟。這些人由於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盜竊國家資產，發的是不義之財，自然引起廣大群眾不滿，從而激化社會矛盾。這種畸形發展的市場經濟，加大社會分配不公，走向兩極分化，不能形成廣大的中間階層。在此，趙明確地說，一個社會如果形不成兩頭小中間大的廣大中產階層，這個社會是不穩定的。

二、議會民主是今後必走的路

我說，我見了童大林，他提出社會主義發展四個時期的看法：一、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空想社會主義時期；二、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時期；三、列寧、斯大林計劃經濟體制社會主義時期；四、現在鄧小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期。童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發展並沒有終結，目前就看中國的改革能否成功。

我又說，李銳告訴我，他正式向江澤民提出了兩個二十年歷史經驗都需要總結的建議。即第一個二十年（從1957—1977年）的歷史經驗，經過四千高幹討論，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決議，評價了毛的功過，使國家走上了新的發展階段；現在是第二個二十年（從1978—1998年），也應總結這一段的歷史經驗，當然應包括對胡耀邦、趙紫陽的評價在內，以使中國再走上一個新階段。

我還說，于光遠見了我說，他提出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三個三十

年的看法：第一個1919—1948年是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三十年；第二個1949—1978年是中國自己反復折騰的三十年；第三個1979—2008年是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三十年。于光遠又提出了他自己的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模式，即社會所有制+市場經濟+按勞分配。

我又敘述說，人們往往公認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已經失敗，還談什麼模式！尤其青年人根本不信仰共產主義了。也有人認為將來社會主義必勝，並提出對東方模式與西方模式的見解，認為西方模式是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上的，容易發生極端個人主義。東方模式是建立在集體基礎上的，容易產生集權，扼殺個人創造性。

趙紫陽說，對社會的發展不應定什麼模式。因為社會形態是實踐發展的產物，一切要經過實踐；經過實踐的檢驗，該是什麼形態就是什麼形態。有的發展成為北歐模式，所謂「福利國家」，用二次分配、國家進行干預的作法來解決貧富懸殊；有的是扶植發展大量中小企業，不使財產集中壟斷，實行均富，並大力開展社會保障事業；有的則是發展中產階層，使社會兩頭小、中間大，以保持社會的穩定。當然也有採取股份制的作法，使財產分散化，人人都擁有財產所有權，這也符合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不反對個人佔有，只反對個人壟斷。

趙又明確地闡述說，這樣發展形成的社會形態，既有生機又公平，還有效率，就是人們嚮往的理想社會，也是孔子和孫中山所提倡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目標。由於這種社會符合人們的理性，這就是社會主義，只有這種社會主義才是必勝的。總之，不要定什麼模式，至於公平這個目標，也要逐漸來實現，要隨社會生產力水準的提高來實現。

我說，《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作者哈耶克提出人類社會歷史是人所創造，但人不能去設計，是有道理的。過去正是設計了一個目標模式，資本主義說它們的模式是最好的；社會主義者認為自己的模式是最好的；法西斯主義認為它們的模式是最好的。彼此不擇手段地去進行「你死我活」的目標模式鬥爭，導致了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幾次

大災難。

趙最後說，東方這一套形不成什麼模式，就是台灣、韓國所謂集中集權的模式，政治上也實行多元化了，怎麼能成為模式呢？所謂提倡東方儒家文化，乃是為統治的需要，但這是違背現代化潮流的；就是「中學為體」這一套也不適用。趙認為：還是以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來發展社會主義。即不能搞西方那樣的兩極分化，也不要搞「中學為體」的東方集權。

最後，我說，為了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過去我也是個「暴力論」者，但自己經過這麼多年的暴力革命和各種群眾運動，深感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和對人民造成的災難嚴重，現在自己的思想傾向轉到了走漸進的改良道路方面來，認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胡適提倡的少談些主義多談點問題，又適合自己的口味了。

趙說，你這個思想傾向，有代表性，是目前一般存在著的思想傾向。暴力革命確是代價很大，不過激進與改良都是客觀存在，走哪個道路，往往也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在談到西方議會民主時，我說：政治上也需要有競爭機制才行。

趙說，議會民主是今後必走的道路。在這個問題上顧准是先知先覺者，但實行政治民主需要有個過程。趙認為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是有一定道理的。

43

1996年10月29日

同楊繼繩、張廣友的談話紀要

他們二人因需核對一些歷史材料，要求和趙紫陽見見面，經同意後，今天由我帶領，由楊繼繩整理敘述如下：

趙紫陽開始談到他的健康狀況和日常活動，趙說，除了眼睛，身體很好，一個星期打兩次高爾夫球（他的寫字檯上有一本《中國高爾夫》雜誌）。同意我去打，但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打，別的地方不能去。看看電視，愛看歷史劇，不管寫得好壞。看書少，看些閒雜書。《國內動態清樣》^①看不到了，資訊也不靈。國事已經很淡了，不能說不關心，的確是淡了，對當前事想得少，想多了也沒什麼意思。

談到境內外寫他的書時，提起《趙紫陽傳》的作者趙蔚^②，趙說：我不認識。他是抄報紙寫的，我的家庭情況他也寫得不對。在談到《趙紫陽的崛起與陷落》這本書，問他看過沒有，他說，我沒看過，聽鄧沒聽說過這本書。吳江的《十年的路》我看過，再版了也聽說過。他的書我很不高興。對我評價好壞無所謂，但事實不對。他說1984年我給鄧寫過信，告了關邦的狀。沒這麼回事。我是寫過信，但信中根本沒有講關邦。我不認識吳江。聽說他很嚴謹，是個學者，不知道他這個材料是從哪裡來的。分析評價無所謂，重要的事實不能編造。這一點我對他不大諒解。我處在這樣的處境下，編造更不該。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開說清楚，他曾是關邦周圍的人，他說的話有影響。我給鄧那封信是靈機一動寫的。陳俊生在人大會上發言有個簡報，談

①《國內動態清樣》，新華社編印的內參文件，刊載國內突發重大事件與黨內高層重要政策，每天1-2期，保密級高，發至省級，俗稱「大參考」。

②趙蔚，中國青年學者，1988年在香港出版《趙紫陽傳》，1989年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再版。

到長治久安問題，這就引起了我的動心，寫了這封信，信中說要實現長治久安，需要解決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指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領導制度問題。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變動而變動，真正在中央領導集團實行民主集中制。

我寫這封信，除了看了陳俊生的發言以外，因為領導制度問題我過去想過。我當總書記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書記處和常委的議事規則，我主張重大的事情必須一人一票。否則誰贊成誰不贊成，多少人贊成，不清楚。事情一過，就會說「我當時就不同意」。我主張重大事情舉手或投票。但這個想法沒能實行，黨內要有制度，還要遵守制度。《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③很好，就是沒有執行。我們人治的傳統，特點太厲害了。粉碎「四人幫」後，葉帥^④出來進去地說「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黨內生活不正常」，問題在沒有制度，有制度就好辦。我寫的那封信就是這個意思。信送上去後我沒有再問，也沒有回音。

楊問：有人說，「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的說法是您先提出來的，是不是這麼回事？

趙答：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有個發言，其中有這個意思。我在經濟領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領域是保守者。現在有改變。在四川工作時，一位陝西工人給我寫了一封信，說「經濟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後來我跟別人說過這封信，說這兩句話有道理，承認我是有這種想法。到北京工作後，還是不贊成政治上搞得亂糟糟的，有人說我贊成新權威主義，不知道這個人說的新權威主義是怎麼回事。（宗插話說，新權威主義是吳稼祥提出來的，）我不認識吳稼祥^⑤。有

③《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89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基於文革教訓，準則強調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專斷的重要性。

④葉帥，葉劍英（1897-1986），廣東人，中共軍事家、元帥，逮捕四人幫的主謀之一，曾任全國人大委員長、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⑤吳稼祥，（1955—）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倡導新權威主義。

幾個學生到台灣中央研究院，他們很欣賞美國的民主。認為台灣比大陸民主。一位台灣教授教訓這幾個年輕人說：「你們應當瞭解一下台灣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沒有一段時間的強人政治，獲得一個穩定時期，使經濟得到發展，台灣就沒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裏，小平提到方勵之^①。我就把上面說的事講給他聽。有一種新權威主義，就是政治強人穩定形勢，發展經濟。他說：「我就是這個主張。但是不必用這個提法。」我的確主張過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搞改革。現在我的想法有改變，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要配合，如不配合，經濟上搞市場經濟，政治上還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這兩套很難長期在一起，矛盾會很多。但是我也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過急，要漸進，要考慮社會承受能力。不能搞得天下大亂，不能像走馬燈一樣換領導人，今天你在台上，明天我在台上。西方這樣可以，社會照常運轉。中國不行，幾個月換一次領導人，什麼事也幹不成。台灣地方小，人的文化教育程度同我們也不同。他們經過了一個過渡時期。現在他們一個大黨，一個小黨，目前還不能形成輪流執政，但有合法的反對派。

談到「六四」。趙說：「《許家屯回憶錄》^②寫的『六四』那一段是符合事實的，大體是那麼回事。」

我們的話題又轉到十三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趙說，外面傳說，十三大時議論萬里當總理，我不贊成，說寧可讓李鵬當總理也不讓萬里當。這是胡說八道。耀邦下台後沒有中常委，只有一個由我牽頭的五人小組，五人小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託「七人小組」，七人小組由薄一波牽頭。七人小組直接對小平負責。我這一層也在七人小組議論之列。常委名單中，除了後來定的五個人外，還有萬里和田紀雲。這兩個人大概是小平提的。「七人小組」在徵求老

① 方勵之，（1936—），浙江人，物理學教授，曾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1986年學潮的精神領袖之一，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後，逃入美國大使館，被中共圍困，一年後流亡美國。

② 《許家屯回憶錄》，中共駐港領導人許家屯流亡美國後，1999年由台灣聯合報出版的回憶錄。

同志意見時，堅決反對萬里進常委。姚依林說：「萬里如果進常委，國家一旦有事，他就會帶頭起哄。」陳雲也反對萬里進常委。「七人小組」向鄧匯報這個意見。鄧才同意萬里不進常委。剩下田紀雲。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紀雲有什麼什麼問題。鄧小平說：「萬里不進常委了。又說田紀雲有什麼問（這不一定是事實），但時間很緊了，田紀雲也下來吧。」這就定了五個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這一段情況有些我是從鄧那裏聽到的，有些是從薄一波那裏聽到的。所傳說的萬里當總理，實際上從來沒有這個說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下一屆總理必須比我年輕，萬不能進常委後，鄧曾同我交換過意見，讓萬里當人大委員長。鄧把這個想法告訴薄一波。「七人小組」也不贊成。這時鄧就找萬里談話，批評他：「你是怎麼搞的，人事關係搞得這麼緊張。」鄧要萬里挨門挨戶去訪問，做自我批評。萬里到我家來過一次，他說還去過宋任窮^③家。

人事安排鄧委託「七人小組」搞，不是鄧一個人定的。「七人小組」還要向陳雲匯報。

在問到：李鵬怎樣當上總理的？

趙答：總理人選只有李鵬一個人，當時比我年輕的只有李鵬和田紀雲。田紀雲嘛，沒有人提他。我也不好提他。有人說我提過田紀雲，沒那麼回事。對李鵬當總理有些人有不同看法。鄧說：「他年輕，知識面廣」。不知道小平怎麼會認為他知識面廣。（楊問：鄧大姐起了什麼作用？）鄧大姐起了什麼作用我不知道。在考慮李鵬當總理時，有人擔心他只懂電力，不懂經濟，就提姚依林。小平否了，說姚年紀太大，身體又不好。

話題又轉到「六四」。趙紫陽說：大概是5月3日，在萬里出國前，我到萬里家和他長談了一次。談得比較好。我主要向他講了學生的事怎麼看。現在開放搞了這麼多年了，外面什麼東西學生都有印象，

③ 宋任窮（1909-2005），湖南人，解放軍上將，曾任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中組部長、政治局委員。

學生們覺得什麼話都可以說。老一代人的思維方式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學生說我們不好，不能就認為是要顛覆我們。這樣，本來不是對抗性的就搞成對抗性了。有的人把學生的話收集起來，往這兒送，往那兒送。往鄧那裏送，說矛頭指向鄧了，把鄧激怒了。我說這事沒有什麼了不起，採取對話疏導的方式可以緩和下來。我說時代變了，思維方式也要變。不能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來看待學生的言論，否則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青年，反把問題看得太嚴重。萬同意我的看法說：「對呀，李瑞環給我打電話，說我們太軟了，主張中央要堅決一些。李瑞環不對呀！」萬也認為，開放時代的青年思想變了，我們還是老思維方式不行，一聽到不同意見就說反黨，不是那麼回事。我們的看法比較一致。

「六四」以後沒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為我在國外有影響。不能像鮑彤那樣秘密審判。鮑彤有什麼事？查清了，什麼事也沒有。說他反革命煽動和洩露機密。什麼機密？起訴書說，有人問他「趙是不是不行了？」他回答：「一個星期以後就知道」。這也算洩密？就連這件事鮑彤都說沒有。說他反革命煽動，一是議論了朱琳（李鵬愛人）出國時丟了一個假項鍊，緊張得不得了；二是議論了戒嚴。反革命宣傳和洩密這兩個罪，這樣隨便就可以加上。審判鮑彤連證人都不讓出庭。現在說是把他放了，但還是不給他自由，天天講法，這是什麼法？

原來搞鮑彤是為了搞我的問題。以為我和學生私通，還通過鮑彤跟外國人私通。結果什麼也沒有。他們查所謂索羅斯基金問題，索羅斯是匈牙利人，一個人富翁。他出資金支持體改所的研究工作。他有沒有美國中央情報局背景我不知道。對這個人，公安部和安全部看法不一致。公安部認為他有這個背景；安全部認為沒有這個背景，他是安全部的客人。公安部1987年7月給我寫了一封信，說索是個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支持波蘭團結工會。我比較慎重，把公安部的信批給了安志文（當時安是體改委黨組書記），讓體改委同這個基金脫鉤。我的意思是社會上對體改委的議論已經不少了，不要再增加議論。

鮑彤的事是先入為主。李鵬對鄧說過鮑彤是壞人，說我受了鮑彤

的影響。在老人家腦子裏留下了印象。

趙紫陽接著又對胡耀邦下台和萬里的一些事進行解釋。他說，重要人事問題不是我這一層所能定的，耀邦時也是如此。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都沒有。「七人小組」也沒有決定權。他們只能到幾個老人那裏聽取意見。小平、陳雲二人達成一致意見以後就能定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去。毛主席當年也是這樣。「趙孟能使貴之，亦能賤之。」這是東方政治，更是中國政治的特點，歷來不容改變的。

我當總書記時，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對宣傳部長王忍之^①我很不滿意，我還罵了他一次，只能罵罵而已，換不了他，因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撥亂反正」。我問他：「撥誰的亂？反誰的正？撥胡耀邦的亂？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問題吧？」我還說：「我知道，這話不是出自於你」。他急忙說：「是我說的，是我偶爾失言。」我批評他：「聽到小平說『主要是反左』，你們宣傳部如喪考妣，這是什麼精神狀態？」和他在一起聽批評的還有王維澄^②，我罵他時胡啟立也在場。

這一層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決定的，總書記胡耀邦不能決定我能不能當總理。在最高領導層的人事上，我們前台的人沒有發言權。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只要兩位老人達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瞭解中國政治的人，不會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吳江講的幾件事都不符合事實。說耀邦贊成鄧退休，鄧就讓他下台。耀邦決不會說「我舉雙手贊成」，鄧也決不是在這件事上對耀邦有意見。耀邦下台前，鄧從來就沒有對我說過他退不退的問題。外

① 王忍之（1933—），江蘇人，曾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宣部長（1987-1992），社科院黨委書記、全國政協常委。

② 王維澄（1929—），浙江人，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秘書長、中宣部副部長、中共中央政研室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國記者問我鄧退休問題，我從不回答。

小平對耀邦很好。有這樣的結果是兩個人政見不合。主要是對知識份子問題。從反精神污染沿下來，到同陸鏗談話。同陸鏗的談話是導火線，86年學潮也是導火線，僅這次學潮小平不會把耀邦拿下來。小平跟耀邦分手與跟我分手不一樣。「六四」前鄧對我是信任的。他認為「六四」看清了我，說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跟我分手沒有耀邦那麼長的過程，只是「六四」。他同耀邦是幾年的積累。他對耀邦的信任一年一年地減少，最後到完全不信任。

耀邦下台我沒有為他說話，也沒有落井下石。為什麼不為他說話？說也沒有用，我也認為耀邦再也無法幹下去了。

耀邦下台後，在我腦子裏最重要的問題是怎麼對待反自由化問題。搞不好就會傷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鄧力群一批老人勁頭大得很。他們一搞就會傷很多人。我跟鄧力群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決裂的。他恨我勝過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讓他管意識形態。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這是因為他們勁頭太大，沒有迴旋的餘地。我在國務院工作時不知道耀邦的苦處。我一當總書記就怕意識形態這件事。我說我這個人對意識形態沒興趣，也不大懂，只喜歡幹些實實在在的事。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鄧力群，還有中紀委，我很難。開名單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顧委一些老同志一說反自由化，就認為過去幾年都錯了。還好，我把我的想法同小平徹底談了一次。他這根神經（怕否定改革）比較緊。我跟他談了一次，他轉過來了。說，不能這麼搞。這就產生了我的「五一三」講話。我不願當總書記，但是，在反自由化的情況下，我認為我在這個位置比別人要好一些。要讓別人當總書記更不好辦。

小平在政治上決不放鬆，經濟上他無所謂，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就行了。這也是你提的「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那個問題吧？我現在認為，長期政治上專權，經濟上放開，不行。現在社會上很多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在這裏。再這樣搞十年，中國社會成什麼樣子很難說。

現在要找到政治體制如何逐步適應經濟基礎的辦法。現在這個問

題是禁區，不允許討論。這就找不到建設性意見。

腐敗啊，社會風氣不好啊，問題都在這裏。解決這些問題原來的辦法不靈了。不研究新辦法只好用老辦法。整風，整黨，教育，培訓，解決不了問題。現在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另外的原因。只有完全回到過去，所有的都由國家安排，離了國家飯都沒吃的，老辦法就有效。能回到那個時代嗎？又想搞市場經濟，政治上又想搞老的那一套，不行。怎麼辦呢？這個很重大的課題，要允許討論。閉著眼睛不看現實，只搞思想淨化運動，是不靈的。有人說現在的辦法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我看連標也治不了，都是空話。

現在社會上這些問題究竟是怎麼產生的？怎樣才能解決這些問題？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如何改變？過急了不行。完全照搬外國的也不行。但是，怎麼走，要允許討論。他們怕一說可以討論，就收不住了，還是搞輿論一律。

楊問：聽說1975年您去四川時，小平同您有一次重要談話。1976年您在這個問題上保護了他。這是他後來起用您的一個原因。是不是有這回事？

趙答：1975年我去四川時，小平是同我談過一次話，主要內容是要大刀闊斧地幹，不要怕人說你是「還鄉團」。那時派賈啟允^①到雲南，小平也同他談過這樣內容的話。在批鄧時賈啟允慌了，沉不住氣了，把這段話說了出來。「還鄉團」^②就成了鄧的一條罪狀。我當時覺得這是口頭談話，就沒有說出來。

楊問：外面有這樣一種說法，說北京風波時，鄧之所以沒有採納你緩和矛盾的意見，是因為那時鄧對你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陳毅元帥的兒子^③讓您跟鄧劃清界線，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還按照

① 賈啟允（1914-2004），山西人，曾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貴州，雲南省委第一書記。

② 還鄉團，國共內戰時期，被趕走的地主土豪及其武裝，隨國民黨軍隊反攻得勢而捲土重來，被稱為「還鄉團」。

③ 陳毅元帥的兒子，即陳小魯。

這個想法有些活動。有這麼回事嗎？

趙答：你說是陳小魯吧？他曾在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工作過。北京風波時我沒見過他。我下台前沒同他接觸過。他當駐英國使館武官時，我在英國見過他。我下台後，他來看過我一次。我說：你還敢看我？他說，我已經下海做生意了，怕什麼？

楊問：前一段時間外面傳說，楊尚昆今年曾表示，趁老同志還在，把「六四」問題搞清楚，他可以承擔責任，有這麼回事嗎？趙答：不可能！

此外，在此我附帶說一下，隨後楊繼繩還想要求核對兩個問題〔由於時間原因，沒能核對成〕。

1997年1月10日晚，在北京鴻翔大廈，安志文對楊說，1989年春，鄧、李鵬等在上海時，有人向鄧反映了趙紫陽不少問題。鄧聽完後，態度很明確地表示：不能倒趙。李鵬回北京向趙紫陽轉達了鄧的這一態度。趙對李說：「不要在會上傳達，個別說說就可以了。」①楊又聽傳說：鄧回北京不久，鄧向趙提出，要把軍委主席職務讓給趙，自己完全退休。趙不同意。〔經宗核實，趙的確對鄧說過：改革任務很重，還是你擔任一段時間好！〕

1997年3月21日，朱厚澤對楊說，倒趙的風聲不是1989年春，在1988年秋就有。物價闖關失敗以後，內部就出現了倒趙的輿論。這時倒趙實際是反鄧。因為價格闖關是鄧決定的。

① 作者註：後由安志文核實，李鵬回北京後，向薄一波轉達，薄對李說：「不要在會上傳達，個別說說就可以了」。

44

1996年12月13日

一、從掛出第三代領導核心畫像談起

我說：最近我看到安志文，見面後，安問我：現在部隊裏並排掛起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幅畫像，聽說了沒有，我說還不知道。

安志文對我說，看來是在樹立第三代領導核心的形象。自鄧定下「江核心」之後，是在各方面作了佈置的，如讓二楊兄弟的下台；對顧委會的撤銷；讓萬里不要逞英雄，少管閒事的交待；並使江澤民身兼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總書記三要職，而江澤民本人又在各方面作了佈置，如，對部隊上將的提升①，加軍銜軍薪；對武警部隊的擴充，已達一百三十多萬人，相當於正規軍的三分之一，並予以現代化裝備；對地方幹部大加調整，省委書記、省長撤換百份之六十以上；對民運分子抓捕，嚴加制裁；對新聞報刊更是嚴加控制。安志文說，目前在領導層內部沒有力量予以制衡，在地方上沒有人敢於出頭挑戰的。對外政策上爭取了主動，對美國敢於說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有了進展；國內則是生產增長，物價得到了控制。

安又說，因此，江認為局勢得到了穩定，核心地位已經形成，江也就以核心自居，在竭力樹立自己獨立自主決策的形象，掛出了第三代領導核心的畫像。「政治智囊」王滬寧②也在策劃為江澤民樹立大國政治領導人的形象，醞釀第三代理論，建造江澤民思想體系而努力。據稱，汪道涵③也在說：「第三代領導核心，要有〔不同於毛、鄧的〕

① 江任軍委主席八年，共提升上將七十九位。

② 王滬寧（1955—），山東人，復旦大學教授，受江澤民器重，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江氏三個代表論的主要設計者。

③ 江道涵（1915-2005），安徽人，曾任上海市長，1991年起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1993年在新加坡與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舉行歷史性會談。

自己的東西」。

安說，江澤民所以強調講政治，是要樹立中央權威，也就是要樹立個人權威，一切服從他。

據稱，在1994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全會上他就提出：「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這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重大問題。」

接著光明日報發表的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的文章提出：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充分肯定傑出人物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領袖人物對於政黨的作用；半個多世紀以前，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同志成功的找到了民族解放的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同志又成功的找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主持中央工作以來……，贏得了全黨全國人民的信賴，……；實踐證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全黨全國人民愛戴的黨中央，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是對黨的利益，對人民利益的愛護……；維護黨中央的權威，維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我說，這就是在進行帶有濃厚的個人崇拜的吹捧，毛主席也只說過，核心只能是黨，是黨的領導集體，任何個人不管才能有多高，貢獻有多大，是不可能也不應成為黨的核心。

杜潤生、李銳認為江澤民一切是從穩定統治、保住權力出發，其他都是套話。

我的看法是：毛澤東、鄧小平的個人權威，是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也就是說，今天已沒有這種條件來建立這種個人的「權威」了；誰如果以主觀任意性，還想謀求個人權威或人為地製造個人權威，勢必會被潮流和社會需求所拋棄。過去華國鋒曾製造過，結果以失敗告終。因為時代不同了，人們思想上同過去那一套告別了，不會再接受那一套了。在今天的時代裏，只有建立民主法治的權威，

實行民主政體，才是合乎潮流的。

趙紫陽聽後說：反正《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是適合了當政者的口味。

二、經濟增長必須保持百分之十

趙紫陽說，既實行市場經濟，又堅持集中領導，還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使政企不分；如果將它作為一個模式固定下來，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種選擇。

趙又說：像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中國家進行改革，跟一般發展中國家還不同。那裏雖然是市場經濟，又是集權制，但卻不是公有制，財產不能隨便侵吞。像中國、古巴、越南這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下進行社會轉型的，必須把握這一特徵。也就是說，有了市場經濟這個機遇，大小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都在撈一把；從而產生社會性、機體性的腐敗，使市場經濟向畸形的方向發展，變為腐敗的市場經濟，這些人有了錢就揮霍、浪費掉，或存入外國銀行，來進行個人享受，這同過去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原始積累資本不一樣。雖然他們野蠻搶佔掠奪殖民地，並對童工和婦女進行殘酷剝削，但他們積累了資本後還是用於再投入發展生產；而在中國這些人卻不是這樣。

趙接著說：問題還在於強調公有制、強調公有制企業占主體，為了維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即使企業虧損也要投入，產品積壓也要生產，即所謂「在為倉庫而生產」。在這種形勢下，導致企業有了錢，有了貸款，或吃喝揮霍，或搞投機炒房地產，炒股票，不想還也根本還不了債。這樣拖下去，銀行無法改革，也商業化不了；財政包袱越背越重，而企業效益卻越來越低，稅收越來越少。為支付利息，每年還必須發票子；銀行存款又是人們的儲蓄，如果發生通貨膨脹，銀行也得垮台。因此，趙紫陽說，應當拋棄公有制、公有制為主體這個框框，認為公有制不過是一種手段，應當允許有個人財產；馬克思也不是反對個人所有制，而是反對個人壟斷。趙肯定地說：沒有什麼特色

模式，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是統一的；所謂東方的家族式企業，西方也經歷過，後來也起了變化，成為股份制，現在家族股份比例也很少。

我說，我們不能一方面堅持實行市場經濟，改革放開；一方面又堅持集權制這種專制政體。清朝就是因堅持專政政體，腐敗不堪而被推翻。國民黨也因實行專制政體，腐敗問題無法解決而垮台。難道我們還要步其後塵嗎？

此外，我們又談到經濟增長問題。趙說，中國資源少，增長靠投入，資源消耗又大，經濟增長必須保持在百分之十才能支持下去（據稱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使300—400萬人員就業）。國外是效益型，只增長2—3%就可以支持。所以，在中國經濟問題不能只看效益，還要看增長速度。

隨後又談到鮑彤問題，趙說，對鮑彤這樣嚴重的處理，又關押這麼多年，以這種辦法對待，真沒有料想到，在目前只有忍耐，要樂觀，要健康競賽，將來總有一天會看到公道處理的。

我看到：趙紫陽對鮑彤是很關懷的，也很重情義，到年節總要通過我去給他家屬送點禮物，表示下慰問。認為鮑是為他受牽連，內心過意不去！

45 1997年5月16日與6月17日

一、對〈意見書〉草稿的意見

由於十五大要召開，全國人民八、九年聽不到趙紫陽的聲音了。因此，我又把有些老同志的意見重述，認為趙紫陽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最有發言權，也最有資格、最有權威，應針對目前改革開放出現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雖身在「園囿」仍關心中國人民的事業，藉以表明自己的責任心，表明自己的歷史使命感。趙紫陽這次表示了同意。

經趙同意後，於5月16日下午兩點四十分到六點二十分時，我帶領《科技導報》副主編蔡德誠來同趙紫陽交談。趙提出請蔡幫助設計給中央的意見書。主要談反腐敗問題和黨的改革問題。蔡回去後根據這個要求，寫了一個草稿，於6月17日（上午九點至十一點）又由我與他一起來同趙紫陽交談。蔡將草稿念完後，趙發表了以下意見：

當前腐敗問題和社會弊端叢生不止的現象相當嚴重，雖不斷嚴打，重典嚴懲，又搞思想教育、搞模範引導，但仍難以遏制腐敗和社會醜惡現象的蔓延。說明這些問題有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性根源，只有從根源上著手，才能扭轉，才能解決。

我們國家進行漸進式的改革有得有失，這一方面是符合國情的，在社會震盪不大，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情況下，穩步地推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和轉型；但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利用權力搞「尋租」^①，搞權錢交易的情況，且普遍發生。因為市場開放後，利用市場經濟的機遇，可以利用手中執掌的各種資源，來大搞「尋租」逐利行為。

趙紫陽說：二

① 尋租，指非生產性的牟利活動。非制度化的追求權力，也稱為權力尋租。

今後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市場經濟的建立是不可能與腐敗、腐化「共存共榮」的。不解決腐敗問題，最後要導致社會真正的不穩定。

當前對腐敗的失控，同多年來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兩者脫節、不同步密切相關。在經濟改革大規模推動和開展的情況下，政治改革不宜久拖，否則，必然積累矛盾，產生被動。

在當前情況下，全面推動政治改革是有風險的，也有一定難度。因此，應採取逐步啟動、循序漸進的方針。

目前社會風氣不正、政風不正，根源在於黨風不正、黨風不純。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從黨的改革、黨的民主建設開始。我們黨的建黨原則、組織體制、領導體制是在長期嚴酷的戰爭環境中形成的，實際上早已不適應「建國」「治國」這個歷史任務了。這種體制只講下級服從上級，不講監督制約上級組織；只講集中，不講民主；只講統一思想，不講存在不同意見。黨的改革要從改變領導人權力過於集中、防止個人專斷開始。如果執政黨自身缺乏法治性的制約機制，而想在政府和社會層面上實行法制建設和法治性管理是不可能的。

政治改革應適當放開新聞、輿論監督。這對打擊、揭露腐敗犯罪，對依靠人民群眾監督黨風是有效的。可以適當開放一些民辦報紙，允許他們對腐敗分子、腐敗現象作據實負責的揭發、批判；黨報黨刊，也可在這方面適當放開。

世界各國的經驗證明，司法獨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遏制官員腐敗、防止權錢交易的有效辦法。從我們自己幾十年的經驗看，各級黨委(包括中央)完全沒有必要插手司法工作和司法程式。插手了，只會使黨內有牽連的不法分子有機可乘，對司法案件橫加干擾，造成依法立案與定罪的障礙。

根據以上趙紫陽所述的意見，蔡德誠加以系統整理並寫成意見書草稿，由我轉交給趙。原文如下：（從略）

二、我的建議

我這裏補充一下，在6月17日送交蔡德誠整理的那份意見書草稿

〔此稿後未採用〕後，我曾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

我的考慮是：《潛龍八動》作者^①提出了趙紫陽模式，給我以啟發，使我認識到趙不管處在什麼位置，他是一面旗幟，他開創了中共黨史上的先例，給自己樹立了正義高尚的形象。同時，又要使中國轉向民主政治，把中國納入現代世界文明和世界市場經濟體系中來；這確立了他的歷史地位。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發展到今天，實踐證明又必須實行自我更新。因此，我建議趙紫陽要高舉兩面旗幟：一是中國定要過「民主關」。根據社會焦點、腐敗問題和世界潮流，來論證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實行民主政治。這也是消除機體腐敗的根本所在。以建議的形式向中央和全國人民明確提出自己的意見，可以目前蔡德誠寫的這個意見書草稿作參考。二是應革新社會主義、革新黨的政治主張。並以宣言的公開形式來表達。

我的出發點是：

一是實踐證明馬克思的原理有缺陷有不完善的地方，應予以修正。正如《參考消息》曾刊載的蘇聯報刊的評論說：「馬克思的原理有犯罪的基因，基因中包含著原始罪惡」；「使活生生的人成了抽象人的犧牲品；使個性成了集體的犧牲品；使生活成了公式的犧牲品」。

二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分析太絕對化了，他的「暴力革命論」、「階級鬥爭論」和工人階級日益貧困化理論是擴大化了。正如趙紫陽所說，他沒有預見到資本主義也能進入人類社會現代文明，由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轉向資本輸出，發展經濟，形成中產階級。

三是馬克思的觀點有烏托邦成分，如取消貨幣，沒有商品交換，沒有市場，這也就沒有動力了。那麼社會如何進步呢？這只是邏輯推理的產物，實際行不通。

四是根據原蘇聯七十年、東歐四十五年與中國五十年的實踐證明，公有制是失敗的，計劃經濟道路是走不通的，專政體制是會走向崩潰

^①《潛龍八動》作者，該書作者署名「開顏」，是中共體制內一位政論作家。

的，應當拋棄。

五是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已演變成領導人的個人專政，對人民專政；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變成了領導人的工具；這些已不適合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應當拋棄。

總之，我認為在這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應當對馬克思主義有新的發展；對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和行不通的一些理論、觀點、模式，應當修正。這就是對社會主義，對共產黨提出了革新的任務來，否則必然會被淘汰。

我認為，趙紫陽身居國家領導人的位置多年，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根據他的思想水準和智慧，完全可以而且有這個能力來作出系統的闡述，來革新社會主義革新黨，為社會主義的新發展，譜寫出新的篇章，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實現現代文明作出貢獻。從《戈爾巴喬夫自傳》^①對趙紫陽的評論，也可看出，其中寫到「在會見中，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坦率令我吃驚……」。總的說，同趙紫陽的談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面前坐的是一位具有非凡智力和政治素質的人，他能夠提出對這些或那些原理和觀點的懷疑，尋求對困難的問題的答案。這令我想起趙紫陽對我所說過一句深刻而又有歷史意義的話：「只有符合現實理性的社會主義才必勝」。

①《戈爾巴喬夫自傳》，前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1995年出版《真理與自由——戈爾巴喬夫回憶錄》，2002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該回憶錄的中文「精選本」，「自傳」應是此書的另一譯名。

46

1997年7月6日

一、鄧小平逝世後，趙紫陽誠盼萬里站出來表態

趙紫陽於6月20日，曾對我說過，鮑彤出獄後，仍受限制。這兩年沒有公民權，只有忍耐，並且還要謹慎避免被抓住口實，重新被投入監獄。

正因為如此，鮑彤雖然出了監獄，我卻沒有去看他；在監獄中，他曾表示，「絕不做使問題複雜化的事」。從而我認為鮑彤在任何情況下會堅持實事求是，堅守正義的。事實證明他是一個有骨氣的男子漢。

接著趙紫陽談到想讓張廣友^①給萬里捎個信，因為都是當事人，都到這個年齡了，是否要對「六四」表個態，對歷史作個交代，這也是從萬里本人著想。趙說，他還想給楊尚昆捎個信，就這個問題大家都各自表一下態。

我說：我非常支持這個意見。

隨即我於7月6日上午九時領著張廣友去趙紫陽那裏，趙對自己的思考作了闡述。趙紫陽當時談話的主要內容如下：

趙紫陽首先談了關於萬里進不進常委的問題，趙說：這首先須要向楊尚昆詢問情況。因為他是人事小組的成員，是比較瞭解的。當然最清楚的是薄一波，但薄今天再講話，會不會實事求是？因為他是主要當事人，他是不是願意講呀？開始時是他們七個人議論的，然後由鄧小平來定。我所知道的也是從他們那裏來的，十三大的人事安排，

①張廣友，新華社資深名記者，80年代曾任《農民日報》總編輯，深入報導過萬里在安徽農村推行的包產到戶政策，怎樣導致人民公社解體。

很多人都不瞭解，以為是常委議的，根本不是。原來的常委（包括萬里）我們前台的幾個人，根本就在圈外。就是小平同我也很少談。他們有什麼意見告訴鄧，鄧有什麼意見告訴他們，需要他們從中斡旋的呀，穿梭一下的呀，由他們搞這些事，主要是通過薄一波等幾個老人來搞這個事。常委名單開始是七個人，後來七個人中萬里通不過^①，通不過的原因是姚依林提出到關鍵時刻萬會起哄。最後剩下六個人，在這個節骨眼上，姚依林又提出田紀雲有什麼問題。有一次在鄧那裏開會，鄧就說那就這樣吧，兩個人都不要參加了。萬里通不過，六個人也不好，加上有人反映田紀雲不行，乾脆就五個。這個問題定下來之後，鄧才又提出要萬到人大。當時小平怕他到人大當委員長也通不過，所以又找萬談了一次話，這是萬里告訴我的。小平要他到幾個老人那兒走走，萬里確實到幾個老人那兒走了走。

趙說，「六四」以前萬里的情況是清楚的。問題是後來有沒有什麼變化？一直到現在，他在回顧過去那段時有沒有什麼變化？外面有這麼一個傳說，據說萬里說過：「天安門動武，強力壓下去了。」意思做法是正確的。他說：「哪個國家也不會容許這樣。」有沒有這個說法？一個可能是萬里根本沒有講，是別人傳出去的；一個是講了，在什麼場合，跟什麼人講的，也要作具體分析。對有些人，萬里只能這樣講，因為這是中央的政策，他只能說鎮壓是必要的了，他不能說是不必要的，說不必要的就不能同中央保持一致了呀。我剛才問的意思是：一個他沒講；一個他不得不這樣講。

趙指著張廣友說：我腦子有這麼個想法，你考慮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可以給他建個議，如果沒有必要就算了。

趙接著說，我的這個想法是，小平同志已經走了，「六四」的問題短時期不可能有別的什麼說法。江澤民他們不可能改變這種看法。他們自己怎麼看，這是一個；還有個威望問題。一個自己的看法，一個是威望。即使是有這種看法，沒有威望也不行，即使有看法也不可

能對「六四」有個什麼新的說法。因此，「六四」近期或不太久時間不會有什麼新的說法，我不抱這個幻想。但是，我也認為將來終究會有個說法的，歷史最後會有個新的說法，究竟是哪一年就不知道了。因為這件事情，從歷史來講，現在這個說法是不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而且在中國相當多的人中間，在知識份子中間「六四」問題始終是個結，心裏邊是個結呀，總有一天還得解開。當然什麼時候，是個時間問題。所以我認為「六四」問題近期不可能有什麼新的說法。有些人這樣想，那樣想，希望怎麼，現在不可能，但是將來終會有新的說法，但那是將來的事情，因為社會終究是要進步的，中國是要進步的。這個問題終究會恢復它原來的事實真相，終有一天會說清楚的，我是這樣看的。

我現在想說的是什麼意思呢，我覺得萬里^②對「六四」問題最好有個完整的交代，他前邊這段情況，在國內、在國外都很清楚，也就是說截止到他回到上海以前，他前邊這段都很清楚。但是後來究竟怎麼樣呢？國內人們不很清楚，國際也不一定很清楚。我覺得萬里在這個問題上應當對歷史有個完整的交代。因為很難講啊，我們這些人都八十多了，也可能還活多少年，也可能哪一天就不行了。小平在時不可能有別的說法，小平不在了，我覺得萬里不應該再有什麼顧慮了。誰能怎麼樣他？就這樣了。我的想法就是，對「六四」怎麼看，萬里對這個問題最好有個明確說法。他可以向中央、向江提出自己的看法，因為這是個重大事件，而且萬里也是當事人之一。他這樣提出以後，一個是重申了自己的態度、態度明確了，從始至終，態度明確了，外面瞭解了，中間一個時期他沒講話，是因為不能講話。現在不講，今後也不講，幾年以後也不講，不講話當然這也是個表態。不過你們可以比較一下，萬里他講那些都沒問題，因為國外一直把萬里作為中國

^① 作者注：萬里進常委沒有通過，也就無法擔任總理一職。社會上曾傳，萬里未能擔任總理，是因為趙紫陽不同意。這純屬謠言。

^② 萬里（1916—），山東人，曾任北京市副市長、鐵道部長、副總理、政治局委員。文革後主政安徽期間成功推行包產到戶政策，有「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之譽，1989年時任人大委員長，同情學潮，1993年退休。

一個開明的領導者，一個開明的政治家，一個意志堅定的搞改革的人，這都是毫無問題的，這都是國際國內所公認的。

具體講「六四」問題，因為他前一個時期整個態度是很明朗的。但是以後的情況人們就不清楚了。一個是，他講沒講？講過，是在什麼情況下講的？終究後邊這是問題啊。因為有群眾可能會這樣說，當時他主張是怎麼樣的……，可是萬里，委員長他還是一直作下去，有沒有人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還有他從美國回來飛機降落在上海，確實他在上海發表了個東西才回北京的，瞭解內幕的知道前因後果，不瞭解內幕的會怎麼樣想？我是說萬里在全國人民、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有個形象問題，有個有始有終的形象，有個完整的形象問題。因為我們這些人，說不定哪天走了，走了以後，他現在沒有這個態度，別人替他講話都沒有力，自己應當有個態度。我設身處地為他想想，這樣做對他沒有什麼害處，絕不會因為有這麼一個東西，人家就會對他怎麼樣，是他自己的一個意見嘛！如果小平在時他不好講，因為同小平有過那麼個歷史關係。現在小平不在了，新的中央了，是可以在適當時機，用適當的方式，考慮一下這個問題。話不要多，幾句話就行了。因為現在全國、全世界人們都還在關注著這個問題，究竟這個問題應當怎麼樣？這件事情儘管當時有這樣那樣原因，終究是不對的，是不得人心的，國內國際都還在關注著這個問題。希望他能建議中央在適當時機，用適當方式來有個說法。鄧在時鄧是支持他的，他的話人家會考慮的；現在鄧不在了，人家不會聽他的，他也沒地方去說話了。我考慮的是萬里的個人形象問題，他的形象有點中斷。

但如果說萬里後來態度確實發生了變化，那就不產生寫信問題，那就是有個新的看法〔變了〕。如果說並無新的看法，還是原來的看法，這個觀點應當讓世人瞭解，通過什麼形式？通過這個形式，簡單的形式，簡單幾句話，簡單的信件就解決了問題。將來不管到哪一天，不管過若干時候，「六四」的問題重新翻到桌面上，萬里的這個問題就非常完全了，從頭到尾，始終一樣了。他出國前就主張解決，人大開了次常委會，討論了學潮問題。以後他出國了，出國後在加拿大有

個講話，態度還是依然明朗〔見1989年5月17日新華社消息〕。以後到美國，也很明朗的。回到上海後發表了那麼個東西，這個國內、國外不是很清楚的。認為他的態度變了。如果他現在有個說法，在「六四」問題都沒有清楚以前，他就有了個態度，說明沒變。如果有那麼一天，「六四」問題重新提出來了，他再想有個態度，那時就很不好了。如果現在寫了信，他們不理〔他們肯定不會理〕或者甚至找萬里談話，批評萬里一下。從壞處想，又會有什麼呢？萬里也不可能再丟掉什麼。就這樣嘛，我就這麼一封信，有這麼一個建議，你對我怎麼看我不管，你能怎麼樣我，不會因此就把我怎麼樣，給我穿什麼小鞋，現在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也不會再怎麼樣了。

宗插話說：這兩年關於「六四」問題有傳言說：萬里說過「開槍鎮壓是必要的，哪個國家也不會允許！」我也聽說過有這種說法，是否有這麼回事，應當把它澄清了。如果有這回事，那就要實事求是，思想有個變化就是這麼個變化；如果沒有這回事，那就應予澄清，歷史上有個了結。一個人對自己的歷史要有個完整的記載，快進八寶山了，到底是怎麼樣，到底有沒有，自己應當有個態度。你自己沒個態度，人家就把它當個態度了，就等於是默認了，歷史是無情的。如果你自己表過態，當時是違心的，你就說是個違心的，那不是我的真思想；如果是我的真實思想，那就是真實思想。這個問題對歷史要有個明確的態度，也是對自己形象要有個交代。我覺得是需要這麼個東西，不僅是他，其他人也應當這樣，何況歷史人物哪！

趙繼續闡述說：現在倒不是說這個話有多麼重要，知道這話的人也不多。我的意思是說，有這種可能，那就是他也不得不這麼講。如果僅僅這樣的，不是真正自己有什麼變化；如果是沒講那就更沒有什麼了。總之，如果是講了，是不得不這樣講，並不代表自己的真實思想，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是剛才提的那個建議。這個問題你考慮一下，設身處地為他考慮一下。因為萬里在「六四」以前整個學潮期間，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從國內到國外我們倆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

一到上海以後就發了那麼個東西，當然很多人瞭解，上層人都瞭解他為什麼不能回來〔回北京〕，社會上傳說是不讓他回北京。但是總有人會那麼說，你看他在國外講了那麼一通，回到上海發了那麼個東西。所以呀，這委員長就保住了，所以他還可以繼續做下去，以後沒有再說什麼話。如果他就到此為止，什麼也不說了，「六四」問題再沒有表態了，那麼這終究是個空白，終究這個問題是容易使人們對他發生誤會的一段。他在小範圍講的那些，是沒有別人知道的。別人知道的是以前他是怎麼樣，到上海發表了那麼個東西，上海回來以後這幾年沒再講，所以在「六四」這個重大問題上，他作為當事人，這後一段的態度人們不瞭解，他現在也沒有辦法再表明這後一段的態度怎麼樣了。他只能用這種方式，就是建議中央對這件事應當重新有個評價，其他的就不用講了。這樣他就連貫了，重新投入，從一開始怎麼樣，回來以後幾年也不能講話，也不允許他講，最後鄧小平一走就提出這個問題了，這就完整了。現在我們都這麼大年齡了，這個話只有他自己來說，別人不好替他說，別人說就沒有力了，自己申明一次。

趙還談到：萬里無論在「六四」以前，還是長期以來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態度是明朗的，在國內外很有威望的。他講過一句非常精彩的話，他說：「為什麼把一些好名稱都送給資產階級？」講得非常深刻，在書記處會上他講過幾次這樣的話：「把自由、民主都給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就那麼好？我們就不自由，不民主？為什麼把自由、民主都送給資產階級？」這話講得很好。

趙還想到一件事，趙說：這件事當年我有我自己的判斷，有我的看法，但是還不大清楚。這個事是十四大之前，同時在上海決定下來了，萬里也下來了。照道理講當時情況，萬里還可以再搞一屆嘛！委員長他才搞一屆嘛，委員長年齡也不是那麼嚴格，當時小平為什麼讓他下來，你瞭解不瞭解，他自己是怎麼看的？本來他當時還可以，一是還再搞上一屆委員長，一是還可以當國家主席，當上一屆。為什麼小平就把他拿下來呢？

當時，在座的無人能加以回答。

宗插話說：對「學潮」問題表個態。因為都是當事人，這是應當的。我記得許家屯回憶錄曾提到，楊尚昆曾讓許家屯給趙紫陽捎過話：學潮事件，先按趙紫陽的意見做，如果有責任的話，我第一個負責。李銳曾告訴我楊尚昆去香港，群眾為「六四」向他舉行遊行示威，楊說了一句：這是自己「代人受過」，可說明其心態了。

二、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事與願違

接著趙又談了關於戈爾巴喬夫訪華，是中蘇兩黨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趙說：事前我們有個大體上的安排，最高級會晤是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我們必須十分注意這個問題。強調的是兩黨最高級領導人會晤，從鄧和戈一開始見面就標誌兩黨關係恢復了。對戈來訪問題，當時決定低調處理，不要太正式化了，不搞正式宣佈兩黨關係正常化，但是要有個交代。怎麼辦呢？就是兩黨最高領導人見面，就象徵兩黨關係的恢復。

在會見前兩天，我去小平那裏商量這個問題時，小平說：我會見戈爾巴喬夫時，我要說一句「我們今天的會見就是兩黨關係恢復了」。那天上午可能是小平身體不大好，他會見時沒講這句話，把這句話給忘了。本來是說一開始就說這句話，直到最後也沒說。我想小平沒講，我再不講，那麼這句重要的話不就懸空了。所以我在下午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就把原來決定的由他來說的「我們今天的會面就是兩黨關係的恢復」的這句話，由我在下午會晤戈時予以補充。於是在下午會見戈開始說：「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實現了你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一直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為了說明鄧與戈的會晤是最高級會晤，接著，我就說了那一段話。大意是：在前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退下來了。但是，全黨同志都認為，從黨的事業出發，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

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接著我就把鄧會唔時準備說而沒有說的話說出來了：「這次高級會晤，也就意味著中蘇兩黨關係的自然恢復。」

我講這段話的另一個背景就是，李鵬向小平匯報時說有人說鄧小平搞「垂簾聽政」，鄧對這種說法很不滿意，我想我需要做做解釋工作，把所謂「垂簾聽政」這個問題說清楚。在這之前，有一次在同工人對話時，有人就提出這樣問題：為什麼有的不是主要領導了，還在行使領導權呢。有的就說是在「垂簾聽政」。小平對此很不滿意，我當即予以解釋，予以澄清。我說不是小平自己要的……而是我們要請教小平同志，不是他要管，而是我們要他管。接著我把十三屆一中全會內部作出的上述決定的內容和情況，給大家講了，大家聽了也就沒什麼了。陳希同在對話或談話中好像也講過這層意思。這個問題，在十三大以後我記得我不只講過一次，而且有的是公開講的。我這次講話公開發表後，鄧家的人不滿。

趙最後強調說：我講「鄧小平同志一直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目的是說明向小平匯報是符合組織原則的，駁斥所謂「垂簾聽政」的說法，借此機會把十三屆一中全會的這個決定在報上公佈出去，以正視聽。照理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們以一切事情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更不是看到形勢不可收拾，而把鄧小平拋出去。我對形勢的看法並不是那麼嚴重，不是不可收拾了，所以我主張做工作。〔趙闡述說，鄧小平看法不是這樣想，他認為問題嚴重，沒辦法了，無能為力了，所以才採取堅決措施……〕我也沒想到這會對小平有什麼傷害。後來，看來其結果不是自己的願望，而是相反的結果，我非常遺憾。

我在同工人對話時就講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目的就是說明不是小平同志攬權，而是我們需要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需要他來掌舵。小平要退出黨的領導，我們不同意，原因是在領導層裏面好說話，在外面說話不大方便。小平為什麼要下？

他說如果我不下，那些老同志如何肯下？他是想以自己的行動帶動大家。

十三屆一中全會關於「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的決定，是有記錄的。事情經過是這樣的，事先大家都談好了，然後通過我的講話，當眾講出來，大家鼓掌通過，給予他合法性；贊成不贊成，合不合法是一回事。

我與戈會談時談的這個問題，就是出於這樣的想法，應當說，動機是好的，只能說考慮不周，絕不是把小平同志拋出來，傷害小平同志。

「六四」之後，聽到這種反映，我很遺憾。本來是想辦件好事，結果事與願違，被誤解了。^①

^① 作者注：這次談話材料，宗是通過德高望重的趙健民，也是萬的老領導，轉交萬里的，但沒有回音。

47

1997年9月11日

給中共十五大寫信

趙紫陽於9月11日上午要我去他那裏，見面之後，趙紫陽首先把列印的一份材料交給我，對我說，過去你們一直要我表個態，現在寫了這封信。〔趙同時交代說，這樣蔡德誠那個稿子就不用了，要轉告蔡。〕信的原文如下：

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同志們：

這次召開的十五大，是我們黨在二十世紀最後的一次代表大會。值此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圓滿成功。

請允許我向大會提出一個對「六·四」事件重新評價的問題，請予以審議。令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了八個年頭。現在回過頭來看，有兩個問題應該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予以回答。

第一，那次學潮不管存在什麼偏激、錯誤和可指責之處，但把它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是沒有根據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亂就不應該用武裝鎮壓的手段去解決。當時的武裝鎮壓，雖然迅速平息了事態，但不能不說人民也好，軍隊也好，黨和政府也好，我們的國家也好，都為當時的那種決策和行為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其消極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在黨群關係、台海兩岸關係以至我國的對外關係中繼續存在。由於這一事件的影響，還使十三大開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以至在我國經濟上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出現種種社會弊端迅速滋生蔓延，社會矛盾加劇，黨內外腐敗愈演愈烈的嚴重情況。

第二，對那次學潮當時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既避免流

1997年9月11日

血又可以平息事態呢？我當時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為了爭取這種結局。我現在仍然認為採取這種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態的，至少可以避免嚴重的流血衝突。大家知道，當時學生中的多數是要求懲治腐敗和促進政治改革的，並不是要推翻共產黨，顛覆共和國。如果我們不把學生的行動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接受他們的合理要求，採取耐心的協商、對話、疏導，事態是可以平息下去的。這樣就不僅能夠避免流血衝突所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而且能夠在執政黨、政府和人民之間建立起一種新型的溝通和互動模式，促進政治體制的改革，使我們的國家不但在經濟改革上取得豐碩成果，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將會出現一種新的局面。對於「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即使時間拖得再久，人們也不會淡忘掉的。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現在全國形勢尚屬穩定，思穩怕亂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人們當年的那種激動情緒，也逐漸趨於平靜。我們黨如果能在這種情況下主動提出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問題，並主持進行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來自不同方面的極端情緒的干擾，而把解決這一歷史難題的進程引上理性、寬容、和解，以及嚴格遵照解決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著重總結經驗教訓，不著重追究個人責任」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樣就既可以使歷史難題得到化解，保持國內局勢的穩定，同時也可以為我國的改革開放爭取一個更好的國際環境，希望我們黨審時度勢，早作抉擇。

以上建議供大會審議。

趙紫陽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三日

趙又說：這個材料列印時費了些勁，明天十五大開會即送交，七個常委每人一份；另外，送楊尚昆、萬里各一份。還有幾份讓我（指宗）送交參加開會的原中顧委于光遠、李銳等各一份，其他就不送了，以免被抓住口實。

我又追問說：當政者能對「六四」重新考慮嗎？

趙紫陽答道：不可能。趙還說了一句，這樣一來，能對我開除黨籍嗎？

我說：一個黨員向黨的代表大會按手續提出建議，是權利所在，是不至於加罪的。

我感到趙紫陽寫給十五大的信，已深思熟慮，各方面都作了考慮，思想上也作了個人境況嚴重化的準備，決心已定；我也不再有其他想法了，只按他的囑託將材料一一送交就是了。

我看趙紫陽當時的心態，寧願被開除黨籍，也要在這次召開的十五大代表大會上，表達自己一貫堅持的立場。

我回來後，第二天晚上就接到張廣友給我打的電話，他從中央辦公廳得知趙紫陽給中央給十五大寫了封信，問我是否有這回事？中央辦公廳不讓看，他想看一下全文；張廣友又說：從萬里、李瑞環那裏得知有此信，原文萬里也沒看到。

為了使萬里能看到這封信的全文，我即告訴張廣友，我可以搞到這封信的全文，但有個條件，你必須把這封信親自送給萬里。後據稱：萬里看到這封信後，首先問了張廣友這封信從那裏得來的，並以緊張的神情說，千萬不要外傳，還告訴張廣友，社會上流傳假的東西很多。

趙紫陽送交十五大這封信的第三天，香港報刊^①登載出來並進行了廣播，其速度之快出人意料之外。接著就傳出中央辦公廳派人去趙紫陽那裏，批評趙違反紀律，不照顧大局。為此，趙甚為震怒，當即予以嚴詞駁斥。聲稱：一個黨員為什麼不可以向中央向十五大寫信，為什麼扣壓我的信件〔意指給楊尚昆、萬里的信被扣壓了〕？弄得去的人也無話可答。到第二天就通知趙紫陽處不讓會客，也不讓外出打球了。就這樣，趙紫陽又被徹底軟禁起來了。趙紫陽就是這樣被完全

^① 趙紫陽致中共十五大的信，於1997年9月中旬，由北京友人帶到香港交《開放雜誌》編輯，再由《開放雜誌》轉發路透社與《蘋果日報》，於9月15日首次報導，《蘋果日報》刊出全文及傳真照片，落款日期是「九月十二日」，和248頁之原信對照，只有個別的文字差異。9月17日，《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共外長錢其琛在北京證實十五大收到趙的信。

剝奪了一個黨員的權利、一個公民的權利。作為一個前總書記一位國家領導人的趙紫陽的個人權利都不能保證，還談什麼普通人民的人權呢？就是這樣，趙紫陽始而因對處理學潮問題有不同意見，被加之以「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罪名，而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繼而又因向十五大寫信，再被加之以違反紀律、不照顧大局的罪名而被徹底軟禁。

我的看法，趙紫陽只是提了個不同意見，就加以治罪，寫了一個建議信也加罪；還談什麼法治呢？人治的國家、專制的國家大概就是這樣！

接著又傳出趙紫陽的一個親屬女孩從南方來，下火車後去趙家住，被門衛阻攔，怎麼也不讓進門。據稱是硬被趙夫人梁伯琪拖進家門的，這事大概有點太不近情理，後來才又規定，趙的親屬可以進家門，其他人仍不准。我又聽說，給趙紫陽檢查身體的醫生聲稱：你的身體必須多加運動，多多活動才行。趙紫陽答稱：我已被徹底軟禁，不讓外出，怎麼活動呢？醫生說：根據你的身體狀況，我們回去要提建議。

後來，王志華〔趙的女婿〕來看我，我問及以上情況，他說基本屬實。我向王志華提出，我可否仍以氣功師名義去那裏？王志華回答：再說吧！他說，連山東省元老趙健民提出去看趙紫陽，都未得允許。

當我問及趙紫陽明知重新評價「六四」不可能，為什麼還要向十五大提出來？王志華說：他是為了向歷史作個交代。

真令人感歎！趙紫陽雖身在「囹圄」，仍堅持正義，寧肯被開除黨籍受審判也要對歷史負責；正如明朝忠烈之士于謙所吟：

粉骨碎身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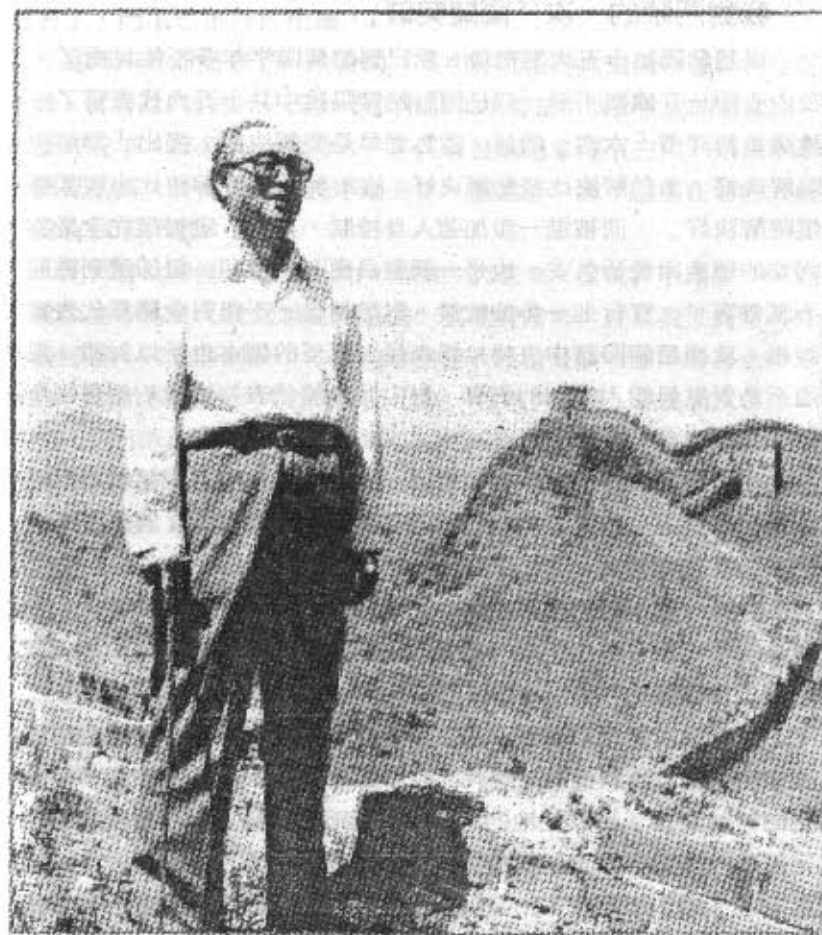
在這裏我改作

坐牢軟禁若等閒，

要留正義在人間。

以此，獻給為堅持正義、為使中國轉向民主政治而獻身的趙紫陽。

續 篇



趙紫陽1992年5月在河北承德

1

1998年5月27日

我對門禁的一次「闖關突破」

從趙紫陽給十五大寫信後，我已與趙紫陽半年多不能見面了，但我內心卻一直憤慨不平，只是因為趙紫陽給中共十五大代表寫了一封建議重新評價「六四」的信，認為遲早是要解決的，提出「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而被進一步加強人身控制。其實，這封信完全是為了國家的穩定與長治久安，也是一個黨員應有的權利，但卻遭到懲罰，不讓會客了，實行進一步的軟禁。對這封信，不但對全體黨代表實行封鎖，就連趙紫陽請中央轉給楊尚昆、萬里的副本也予以封殺。這難道不是對黨員個人權利的剝奪，對中共全體代表知情權的剝奪嗎？而對個人轉交信件的一種扣壓不是也違反憲法的嗎？

正是出於這樣的義憤，我要闖一闖。首先，我打電話給趙紫陽的女婿王志華說，我要去看望趙紫陽，問他是否能進去？答稱：不行。聲言：趙健民曾要求來，經請示，不准許。

我再一想，趙紫陽被軟禁，不允許外人見面，但他的老伴，並沒有被軟禁，沒有理由不允許見面吧！於是直接打電話給梁伯琪，我說明天上午我要去看你，請你在家等候！

於是我邀請了趙紫陽一位在軍隊工作的老戰友，也是他少年時的同學鮑鴻閣會同家鄉的一個人，於1998年5月27日上午九時許，按約定的時間到達了趙家住地的大門口。我按了門鈴，說明是與梁伯琪約定好的，門衛要我交驗工作證，讓我等候，他先向領導請示。回來後告訴我，梁伯琪不在家。我又說我帶有東西要轉交，請她的保姆出來一下，因我與這保姆也很熟悉。該門衛轉回來又告訴我，媳婦也出去

1998年5月27日

了，也不在家，並隨手乒乓一聲把小門關上了。我確信她們都在家，顯然是不准見就是了。

隨後我又想，這需要有個辦法，轉個彎才能爭取進去。於是我們幾個去了航空部機關，見到了趙健民，又給梁伯琪打電話，說明剛才的經過情況後，請她自己來到大門口接我們。然後我們又二次轉回去，到趙宅門口時，梁伯琪也剛好開門出來了。這樣我們幾個人也都跟著進去了，門衛也不好再阻攔。

進門後立即出來了一些警衛，其中除門衛外大概還有參謀和秘書人員。當著他們的面，我講，我們和梁伯琪都是半個多世紀的老戰友，都已到晚年，都是八十歲的人了，又有從遠道家鄉來的人，如果不讓我們見見面，於情於理太說不過去了。我這麼一講，這些在場的人員都沒有表示什麼。

見到趙紫陽後，他首先說：能讓你們進來，這就算不錯啦！但對此我卻並不滿足，我還想能同過去一樣能經常來，於是我又找到那裏的楊秘書，同他個別談：你是知道我的，我也是氣功師，過去是經常來的，我還想和過去一樣來這裏。他說，我也有難處，過去我說了算，通知一下門衛就可以；現在換人了，由新來的陳參謀負責。我說，既然這樣，你能否將這個意見向上邊請示一下，說明我和梁伯琪是老戰友，又是經常來研究氣功的。楊秘書答曰：可以。還說梁伯琪也向他提過，老戰友來看看都不能允許，這太說不過去了。不過楊秘書又告訴我，你就用這個辦法來，由梁伯琪來接你，你這次不是已經就突破了嗎？

趙紫陽說：自向中共十五大寫那封信後，當政者曾查問這封信是怎麼捅出去的，並打算將駐在這裏的所有人員予以調換。還說：已作好了女兒也被趕出去，自己被進一步與外界隔絕的思想準備。我說，還需要作被趕出北京城的準備。

趙紫陽雖然遭到不公平的對待，但是我看他精神仍然是泰然自若，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似的。看來他早把個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真是胸懷開闊啊！

2

1998年6月4日

關於印尼專政體制的瓦解

「六四」是個敏感日子，據說每逢「六四」這一天都是戒備森嚴的，我想試探一下，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又於1998年6月4日順利地進了紫陽的住地。

趙紫陽首先從印尼事件鐵腕人物蘇哈托^①慘然下台談起，認為印尼學生運動既避免了大規模的暴力流血衝突，又成功地迫使專制獨裁者下台。他分析說：這一事變，很可能一是由武裝部隊總司令兼國防部長維蘭托在操縱，二是由副總統哈比比在掌握，再是由身兼國會議長和人協主席的哈莫斯推動的，但維蘭托的可能性最大。他要我收集點資料，看國外對這一事件是如何評論的。

顯然，趙紫陽是在觀察、分析、思考著一個問題，即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制度而政治上卻又搞高度集權，實行集中統治的所謂「東亞模式」是否能成立，是否走得通？趙紫陽又明確地說：「什麼『東方模式』呀！就是南韓、台灣也都變了」。

我簡單介紹了蘇哈托1965年上台以來的政治制度與專制貪污及經濟危機情況。

我認為，從印尼事件可說明，實行市場經濟而不與民主政治相結合，必然會產生腐敗的市場經濟，為人民所反對。一方面要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又要進行高度集權、集中的政治統治，應該說此路是不通的，因為，既然要實行市場經濟，就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規

^① 蘇哈托（1921—），印尼第二任總統，1965年鎮壓印尼共產黨事件的東方鐵腕人，1998年在民主運動中下台（哈比比繼任總統），2000年以貪污罪名被起訴。

1998年6月4日

律行事。市場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在發展過程中不承認個人權威，也不承認固定模式；它要衝破一切不適應它發展的上層建築，過去它衝破了計畫經濟體制，現在正衝破公有制；還要衝破一黨專制政體。什麼西方模式！什麼東方模式！什麼又要改革開放，又要四個堅持！這種人為的設障統統都是阻擋不住的，統統都是要被衝破、衝垮的。

市場經濟是天生的自由民主派。它的正常發展，必然開出科學、自由、民主之花，給人類社會帶來現代文明之果。

國外報導，中國國內有一種論點：正是由於蘇哈托當年對號稱世界第二大共產黨的數百萬印尼共黨員和數千萬支持者群眾的一場鎮壓，使之銷聲匿跡，才換來了印尼數十年的穩定，因此，認為中國以「六四」的鎮壓換來穩定也是值得的。

記得江澤民在美國同克林頓公開對話時也是這樣講的，聲稱沒有對「六四」事件的平息，就沒有中國今天的穩定，國外評論說：這是「屠夫哲學」。這就是說，江聲稱：以鎮壓求穩定是對的，中國繼續要走高壓政策的道路，要實行專制政治。

但歷史是無情的。蘇哈托以血腥鎮壓起家，並以高壓統治人民達時間長達三十年，社會矛盾卻日積月累，終於像火山爆發那樣，一朝終波衝垮。這又該作如何觀呢？有一位學者這樣評論：「印尼獨裁者的倒台，是繼東歐、蘇聯變色後，對中共的又一次強烈的國際衝擊波。」

最後，趙紫陽還同我談了關於鮑彤與國外記者電話採訪的講話，認為應設道保護線，不要被抓住口實，特別是在跟人的接觸往來方面應注意。趙紫陽向我表示了他對鮑彤的關懷。

3 1998年

我向趙紫陽轉達與鮑彤的一席談話

鮑彤被判刑七年期滿後，又被軟禁在西郊一個小院內。因為還有兩年沒有公民權，不能自由活動；告誡不能出院外活動，不准會客，但家屬可以去。於今恢復了公民權，我要去看望他，這也是我很早的心願。我對趙紫陽說：鮑彤是於1998年6月29日被安排住在最高檢察院的對面，兩棟房子的中間，設有高高的鐵欄杆，還專門蓋有門房，有人在那裏值班，負責登記並盤查來往人員。那天下大雨，我是繞道走過去的，沒有受盤查。鮑住在二層，一層據說住的是特工人員。鮑彤說，我這裏一些便衣人員是常客，說不定什麼時候就進房子裏來了，夜間房子外邊又是長明燈，又是閃光燈在照。他說，國家真捨得花錢，住處周圍就作這樣的佈置，而我外出時又說不定有多個便衣在盯梢。

我說，看到你身體很好，很高興，這些年來沒有被壓垮。

鮑說，得益於樂觀。我的問題國務院向人大報告起訴：「洩露國家戒嚴機密」，但法院判決書上卻沒有列入戒嚴洩密事項，這樣他們自己就把向題否定了。

我說，據我所知，國家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曾向中央常委寫報告，認為鮑彤的向題不夠起訴條件，而且幾個常委都圈閱了。不知怎的，後來傳到鄧小平那裏，據說，鄧並沒有看報告，就說為什麼不可以判刑呢？鮑彤是壞人麼！就這樣法院才作了判決。

我談到趙紫陽曾對我說過：「當時作出了戒嚴決定，散會回去後，其他常委據說將這一資訊告訴了身邊的秘書，幸虧我沒有談，否則這就麻煩大了。」

我對鮑說：你並沒有機密來源，當然無密可泄了。

鮑說，關於我洩密問題，北京市委陳希同怎樣向李鵬匯報的，國務院又是如何向人大起訴的都不知道，但起訴材料與我個人實際所經歷的過節，與事實都不相符，根本對不上。在對我審訊時，都錄音下來了。將來歷史會說話。鮑鄭重地說：我鮑彤其他辦不到，守密這一點是能做到的。

接著，我把別人從網際網路上抄錄鮑彤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方原的電話採訪講話交給他，目的是要核實這個講話是真是假，事實是否就是這樣。鮑彤看了後說，基本就是這樣。當時通知說，他有公民權了。鮑問：是真的，還是假的？對方說是真的。鮑就說，那麼，我就像你們一樣有說話的權利了。因此，鮑就接受了電話採訪。這次見面我把原文帶給趙紫陽閱看，原文如下：

鮑彤：我在5月28日被人通知說要開會，結果呢，送到了秦城。到了秦城以後，我立即向他們要三個權，一是黨章，一是憲法，還有是刑法跟刑事訴訟法。他們到30日給我拿來了。31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封信請當時監獄轉交給一個政治局委員，轉交給常委的。是我到秦城的第一封信。這封信裏是這樣說的，我想不到我今天受到的待遇，不是黨章對待黨員的任何合法的手段，也不是國家法律所規定的對待一個中國公民所應該採取能夠採取的正常的手段，這是非法的手段。我說我想不到在三中全會以後的今天，居然出現這樣一個局面，我認為在整個過程當中，犯法的不是我，犯法的是執行法律的那些機構。此外，我可以再告訴你一個笑話，當我在監獄裏邊已經待了三年的時候，才向我出示逮捕證，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出現過這樣的問題？這個人還沒有逮捕，已經在監獄裏面坐了三年半了，這不太可笑了嗎？那就是說，當他們拿出所謂逮捕證以前，根本找不到任何逮捕的理由。我想這樣一講問題你該清楚了把？

BBC：在您被捕之後，外界傳言一直很多，說是您透露了當時中央政治局做出戒嚴令的這個命令，跟學生透露了這個消息，我不知對

此你有何評論呢？

鮑彤：這個問題我倒很感興趣，因為這個問題呀不是外界透露，這是當時的國務院向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的常設委員會，也就是人大常委會做的報告當中提到的，說鮑彤洩露了街上戒嚴的機密。但是，這個問題，我提醒一切想研究這個問題的人注意，在法院判決書裏已經沒有這件事情了。由此可見，兩者必居其一，要麼國務院向人大撒謊，要麼法院判決的時候包庇了我。如果國務院沒向人大撒謊，那麼法院應該在它的判決書當中說，鮑彤洩露了戒嚴的命令。過了三年以後，事隔三年啊！1992年的7月，法院在判決書裏邊一個字都沒有提到我洩密是泄的即將戒嚴這樣一件事情。這個報告名義上來說是陳希同作的，但是我認為不是的，因為陳希同當時是代表國務院作的，所以我認為，這是國家最高行政機構向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委員會的報告在撒謊。

BBC：您剛才講，說您被捕之後三年才向您出示了逮捕證，那麼您在秦城監獄裏面的基本生活狀況是如何呢，能不能介紹一下？

鮑彤：在秦城裏邊，我向中共中央寫了三封信，向中共中央常委寫了三封信，這三封信我送上去以後石沉大海。我這三封信指責他們違犯黨章，我指責他們違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法，也違犯了他們自己黨的黨章，他們沒有一個人敢為他自己做辯護，他們說不出任何理由說我講的哪一句話不是事實。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做了一系列的決定，其中包括黨內政治生活準則，這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決定，說今後不再用超越黨章跟超越法律的手段來對待黨員。但是對待我，恰恰採取了這樣的手段。

BBC：你剛才提到的是在政治方面的待遇，那麼，在肉體上或在其他方面，你受到一些虐待沒有呢？

鮑彤：沒有，沒有，我非常肯定地對你說，他們對我沒有肉體上的折磨，只有精神上的，沒有肉體上的折磨。我在監獄裏邊他們給我住的房子是好的，吃的飯是好的，醫療條件是好的，是好的。這是與其他監獄比較來說的，或者說啊……

BBC：因為六四被抓起來的其他一些學生，比如說王丹啊，其他一些學生，你可能瞭解也可能不瞭解，據說他們在獄中都受到……

鮑彤：我不瞭解他們的情況，我想很可能即使在監獄裏邊也並不是人人平等，大概他們對我還有點優待吧，不過這個優待我覺得很不安。

BBC：我們再轉看天安門事件本身。現在馬上就要九年了，我想可能沒有人比你更多地對這件事不斷進行反思了，因為你是其中一個主要人物。你認為應當怎樣來評價這場運動呢？

鮑彤：我認為六四是一個大悲劇，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悲劇，是人類的一個悲劇。據我所知，在中國的歷史上，學生運動流這麼多血，這麼多人犧牲，這是空前的，我當然希望它是絕後的。我認為六月四號，它的意義，它的作用，影響，我認為超過了五四。想到「六四」，我今天心裏百感交集。我各種各樣感覺都有。但是，在我自己來說，我沒有感覺後悔，我沒有一點感到坐牢而後悔的事，這種感覺我沒有，除了這個感覺以外，別的感覺我都有。比方說，我有自豪感，我覺得有這麼多的關心祖國的命運和前途的青年跟市民，我為他們感到自豪。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想將來啊，「六四」應該成為我們的國慶日，應該全國慶祝，慶祝我們有這麼好的人民。當然，「六四」也應該成為我們的國恥日，國家的恥辱，居然用槍炮來對待自己的人民，這個事情我想歷史永遠不會忘記，永遠不會忘記，應該有深刻的反省，怎麼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的呢？我想「六四」還應該是我國的國殤日。屈原《九歌》最後一首歌叫《國殤》，《國殤》就是國家的最大的悲痛的紀念日。我為「六四」非常悲痛。我沒有想到，我當時是一個共產黨員，我覺得我們共產黨領導人所做的這樣的一個決定，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感到恥辱。

BBC：有一種觀點認為當時的情況的確是失控了。如前幾天印尼，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時間很久，在全國據說也有這種局勢失控的情況，有人認為，維持秩序，保持穩定是十分必要的。你考慮沒有呢？

鮑彤：我也認為，保持穩定，維持秩序是完全必要的。我認為，採用暴力的武力手段的不是老百姓，如果你說烏合之眾失控，這個

還說的過去。可笑的是，烏合之眾沒有失控，就是說一個有組織的國家力量，居然人民沒有辦法控制這個力量，一個政府不能接受人民的控制，人民無法控制自己政府的行為，這個是最可怕的事情。

BBC：還有一種說法是，因為中央裏面出現了分裂，據說，您的老領導趙紫陽與他們意見完全達不成一致，是權勢鬥爭也好，說是分裂也好，或者是不同派系之間的鬥爭，於是形成了最後不得不出軍隊鎮壓的局面。你認為這種說法如何呢？

鮑彤：如果有了不同意見就出動軍隊，那這是一個什麼組織？這個軍隊難道是這個組織可以拿來對付不同意見的人的嗎？確實有不同意見，這不同意見在我看來是兩個原則的對立。紫陽的意見我清楚，他主張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解決問題，我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辦法。紫陽並不主張用動武的手段來解決，紫陽認為並沒有發生反革命性質的動亂。有人說，因為紫陽說了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解決問題，因此把問題複雜化了，因此激起了學生的憤怒，因此出什麼問題，我想沒有這個問題。當紫陽說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時候，據我所知，學生是贊成的，學生是心平氣和地在考慮這個問題。他們也在研究到底是不是這樣，有人說贊成，有人說還要看一看，有這種考慮我認為沒有什麼不好。這是做一個研究的過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把這個問題作為什麼反革命的根源，我覺得可笑。

BBC：大家非常感興趣的就是，在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的時候，趙紫陽在會見他的時候曾經說，我們現在的很多決定都是由鄧小平來決定，而我們似乎決定不了，後來據說這段話被引述說是趙紫陽洩露了國家的黨內的機密。還說，這段話是你為趙紫陽起草的。我不知道趙紫陽當時講這句話是不是有向鄧小平攤牌的意思呢？外界很多人當時都感到有這個意思，你能不能講講這個背景？

鮑彤：這個報告是我起草的，當時中聯部給趙紫陽起草了一個講話的提綱，沒有這幾句話。但是中聯部主管這方面工作的同事來匯報的時候講到，上午的時候是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會見。下午的時候是戈爾巴喬夫跟紫陽會見。當時鄧小平見戈爾巴喬夫的時候，我是中午

的時候聽到這個中聯部的同志說，鄧小平講，兩國最高領導人的會見是意味著兩黨關係的自然恢復，有這麼一句話。我覺得這句話應該明確一下，是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會見而不是指趙紫陽跟戈爾巴喬夫的會見。因此我在寫的時候就寫了這麼一句話，我覺得紫陽應該告訴戈爾巴喬夫，實際上，中蘇兩黨關係的正常化不是從今天下午紫陽跟戈爾巴喬夫會見開始，而是從當天上午鄧小平跟戈爾巴喬夫的會見開始的。我想為紫陽表示對戈爾巴喬夫的尊重需要說這麼一句話。那麼我這句有沒有根據呢，有根據的。為什麼？我想這也不是秘密。因為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時紫陽有一段講話，紫陽這段講話，中央委員會的全體委員們大家都鼓掌表示贊成。當時紫陽講，小平同志退下來了，但是我們黨遇到最重要的問題我們還要向小平同志請教，還要請小平同志用自己的經驗來幫助我們做好工作。當時紫陽講這段話的時候大家都鼓掌。所以我想講這個話，不僅是為了表示對小平的尊重，而且也符合當時十三屆一中全會所做的決定的內容，因此這句話是我加的。後來這句話變成說是要鎮壓學生，是小平出的主意。我真不知道，我覺得匪夷所思，我作為一個起草人我當時覺得不可理解。所以我這時候才知道，中國有一句話叫作「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BBC：如果當時你預料到這一點的話，你認為你會建議趙紫陽說那樣的話嗎？

鮑彤：可惜的是，第一，我沒有預料到這樣的事情；第二，如果我預料到這樣一個東西，我也就不成其為鮑彤了，那我就成了一個陰謀家了。我想只有陰謀家才會當時在字裏行間來埋伏，如果他起草的話。我看也只有陰謀家在看到別人說話的時候就往這方面去猜測。

BBC：現在戈爾巴喬夫寫的回憶錄，也談到了這次會見。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這次會見中，趙紫陽突然向他提了一個他認為很突然的問題，趙紫陽問他，你說像中國和像蘇聯這種情況，一黨制到底能不能行的通？他問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做出正面的回答。那麼，鮑彤，你經歷過這次會見，「六四」之後也九年了，有很多反思，那麼從現在你看，你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國家，一黨制究竟能不

能夠行的通？

鮑彤：我記得毛澤東講過一句話，這句話不是毛澤東發明的，但是毛澤東是贊成的。他講，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個是大革命時期流行於國民黨內的一個說法，當時共產黨是國民黨的一部分，是共產黨集體加入國民黨的。當時國民黨主張一個聲音的時候，不同意所謂一個聲音「一黨治國」的人，就說了這麼一句怪話。我認為，有不同意見，就會有不同人群。所以我認為「一黨治國」這個口號，當國民黨在六十年以前提出來的時候，共產黨反對過。共產黨如果自己也提出來「一黨治國」這樣一個口號，我想共產黨不會提。如果他記得自己的歷史的話，他還記得當初反對國民黨「一黨治國」的口號的話，共產黨應該不好意思提。

BBC：你認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天安門這個案子才會被作出重新的評價呢？在什麼條件下呢？

鮑彤：我看，只有在人民，中國人，中國老百姓，中國所有的人，都有言論自由的情況下，這就可以了。大家都有一張嘴巴，大家都可以把心裏話說出來，而不必講自己不願講的話。可以講什麼事好，真是好，就講好，真是不好，就講不好，到這個時候，這個問題就很容易解決。所以說，我說，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是人民共和國，這個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BBC：「六四」過去將近十年了，在經濟方面，中國似乎還是保持了相當高的增長速度。去年九月中共十五大會議上，又重新提出了趙紫陽制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綱領等等，你認為按照目前這種發展下去，是不是基本上也能夠實現了你當時和趙紫陽一塊所設計的中國這種改革的路線呢？

鮑彤：我但願如此啊！我希望別人的事情做的比我們好。我希望過去做了錯事的人，甚至於過去有罪的人，也能夠做一點好事。我希望過去沒有做過好事的人，能夠做更多的好事。我認為，現在中國經濟的增長，這個是第一件事情，應該歸功於中國人民的辛勤勞動，不是哪一個人的哪一句話扭轉了乾坤，沒有這樣的事情，十五大是在講

政治改革，但是我注意到，十五大講政治改革以後到現在我沒有看到什麼改革。十五大已經從去年十月到現在，在政治上改革了什麼，我不知道，我還沒有感受到，那麼是我孤陋寡聞吧。但是我希望中國能夠走向什麼呢，至少你憲法上給中國人民的一切政治權利都要不折不扣的，百分之百的兌現，這一點是應該做到的吧。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應該跟中國人的幸福聯繫起來。如果離開了中國人的幸福來講經濟改革，那本身就是空的。我是這樣想的，我們現在提市場經濟是非常正確的。可惜的是，當時反對市場經濟的人，現在好像一個一個都「咸與改革」了。……就像西太后鎮壓維新派後來也引新政一樣，這批人是給歷史裹挾過來的，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麼就連官都當不成了，太后也當不成了，所以只好順著這個潮流轉過來。但是他做的時候他是被迫做的。被迫做，但是功勞全在他們，這個問題是小事，功勞是誰是小事，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終於有自己的學校了，終於廢除了科舉了，終於有了比較新式的東西了，什麼鐵路啊，電燈啊，這些東西都是好的。那麼當年所說的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啊，這些人實際上在享受西方文明的時候呢，拿出中國的封建的東西來作為自己維持統治的一個手段，一個口號，一個根據，所謂「中國的特色」，不是這麼回事嗎？

BBC：但是最終康梁變法還是徹底失敗了，那麼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你認為中國目前這場改革的前途如何呢？

鮑彤：大家都說康梁還是徹底失敗了，我認為康梁當初所提出來的目標不到二十年統統實現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中一些人死了，他們是作為一個犧牲，是被送上了祭台。但是，他們的信念在二十年以後都實現了，這難道不好嗎？有什麼不好呢？我覺得如果不是從個人的角度而從民主的角度，那這個事情就好得很，好得很。用六個人的生命換來了多多少少的一點進步，這些進步畢竟是大家都享受到的吧？

BBC：最後，我想請您評價一下剛才你不斷提到的這個人物，就是鄧小平，他在「六四」過程中，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他已經去世

一年多了。您過去也跟他有過很多的交往，此時此刻，如果蓋棺論定的話，你覺得應該是怎麼樣來評價他呢？

鮑彤：我是這樣想，他有功，他也有罪。他的功在於改革，他的罪在於又扼殺改革。當他主張改革的時候，他對中國人民是有功的；當他實際上中斷改革、逆轉改革的時候，他對中國人民是有罪的。我認為是這樣。大家都說他是好的很，我想，就他好的方面來說，你怎麼說，我都贊成。如果因為他有功，就說他沒有過，或者說沒有罪，我覺得這樣不能信服、不能信服。他也是人，他也糊塗過，他說過糊塗話。比方說，我舉一件事情。他講自己是領導核心，這個話就是糊塗話，違犯黨章。黨章上規定是，五年選舉一次，沒有說是一代選舉一次，既然是五年選舉一次，哪有什麼一代的領導核心的？難道一選舉就當一代啊？那麼黨章就得修改，改成一代開一次代表大會，一代選一次領導核心。糊塗到這種程度，怎麼一個人能夠想出對自己的人民拿出軍隊來呢？我看他一百條功勞，也不能夠就說這件事情他沒有罪。照我說，是這樣。歷史的功罪跟法院判的功罪是不一樣的，但是，歷史的功罪，我看哪，他的評論者是人民，是中國人，中國老百姓，比法院的法官更權威。

當時，在鮑彤看完訪談所載稿後，我就向他轉達了趙紫陽的意見，請他注意，不要被抓住口實，要有個防線，保護自己，人員的往來也要慎重些。

鮑彤說，他們如果要搞我的話，我就是接觸一個人也是會搞的。鮑彤又說：我已接到二十幾個國家電話要採訪，我這篇講話，當局對我如何動作，是否動作，幾個月後就可以分曉。我和家人已作了第二次進秦城監獄的準備，自我這篇講話後，已向我作了五、六次警告。他們說，外國記者電話採訪要經登記、批准，否則，按規定要罰款的。鮑彤辯說，對記者罰款，那是他們的事，但這是違章，不是違法，如同行人走路規定靠右邊走一樣。對方強調說，我的這篇講話不合適，鮑就回應說，你作為公安人員，不能對我說合適不合適的問題，只能

說違法不違法的問題，合適不合適那是我自己考慮的問題。

鮑彤以比較嚴肅的神情又說：我在電話上曾對人講，人總是要死的，一是等自然死亡，一是當烈士，如果我再進秦城監獄就不打算再出來。本來很想同趙紫陽見面，也有這個打算。看來，不能抱希望了。請轉告有什麼交代要辦的事否，我也不能去看望其他老同志，免受牽累！

今天我將以上見面的經過、談話情況統統向趙紫陽作了轉達。我聽鮑彤這些談話過程中，一再深思，一再靜默，在心中自言自語地說，鮑彤真不愧是個「男子漢」，正如魯迅所稱的「中國的脊梁」。像這樣一個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又是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中共十三大趙紫陽作《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這一政治報告、這一重大歷史文獻的主要起草人，特別也是為鄧小平所稱讚的「這個設計好」、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概括的創始人之一；居然遭此厄運！實感傷懷！如果說過去彭德懷曾被扣上「裏通外國」這個莫須有罪名，被毛澤東迫害致死一事已受到了道義上的譴責，那麼現在對鮑彤不也是同樣用「洩露或嚴機密」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在進行迫害嗎？我不知他們對歷史該如何交代。安志文曾跟我說：鮑彤是個冤案，但目前卻解決不了。明明是冤案卻無法解決，又談何正義！這無疑會引起一切主持公道有正義感的人們的不滿。

臨別時，鮑彤還向我說：中國自戊戌變法起就要實現現代化，可到現在也未實現現代化。他說：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毛澤東只解決了一個民族問題，使中國走向獨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把中國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算是初步解決了民生問題；至於民權問題、所謂「人權」到現在都沒有解決，公民權利隨時都在被侵犯。他聲言也要「逼蔣（逼「黨」）抗日」。我看他是有抱負的一個人，我衷心祝願他在推動社會進步、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現代化方面能多做些努力。

在此，附帶說一下，後來我將鮑彤說的有什麼交辦的事否的話轉告趙紫陽，趙說：我在任十年的改革開放，鮑彤都是親身經歷的。後來又見到鮑彤時，我對鮑說：諸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怎樣形成的，改革開放與商品市場經濟的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概括，政治體

制改革的設計設想，以及「六四」事件等，可請他能把這段歷史回憶一下寫出來；遇有不清楚和疑問的問題提出來，然後，由我再從中轉告。但鮑彤聲稱，由於自己和趙紫陽的這個關係，他寫這些不合適，再說這樣來回轉告，有人會誤解為串聯活動引出麻煩。

看來，搶救這段歷史資料無法實現，實在是件憾事！趙紫陽曾對我說：這段歷史空白起來也好；將來會有後人來寫的。

4 1998年8月19日

江澤民傳話給趙紫陽：「這是你自己造成的！」

1998年3月，一年一度的人大將要召開，我曾寫信給趙紫陽，建議他是否就關於個人自由、恢復公民權利問題，向人大會議提出來。同時，我也將安志文的看法一併作了轉告。安認為提出恢復個人自由，容易得到黨內外老同志的同情，若提「六四」問題牽動面太大不好辦。後來，社會上又傳言，趙紫陽寫了第二封信，我也得到一份，但不知是真是假（因為社會上流傳的事也多），鮑彤對外聲稱，這是真的，完全像趙紫陽的文筆語氣。為了核實起見，我就於1998年8月19日去趙紫陽那裏，見面後，首先將這封材料交他看。文中主要提了這樣四個問題，其原文如下：

1998年8月19日

一、關於國有企業的產權股份化改革的問題

國有企業的經營不善和巨額虧損現在已經成了影響整個國民經濟機制能否正常運轉的關鍵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同時會帶來結構性的貪污腐敗。少數人利用經濟改革中發生的產權不明確而上下其手，化公為私，製造人為的社會不公，我認為，厲以寧^①等同志多年前就提出的逐步進行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革的意見是正確的，必須大刀闊斧的進行在法律保障下的產權變革，經由國家立法的形式，把國有企業的股份化納入法制運行的軌道。比如，是否可以先試點，通過由國家向國有企業職工發放有價證券或股票的方式，盡可能使大多數職工在這一改革中得到實惠和基本生活的保障，以減少產權變革過程中造成的社會震盪。我以為，只要黨的決策層不猶豫、不動搖，爭取在三四年內完成這一根本的、關鍵性的改革是完全可能的。

二、關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問題

馬克思主義向來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在經濟基礎發生變革的過程中，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體制必須進行相應的變革，否則，經濟改革既不能持久，也不能徹底。粉碎四人幫以後，是小平同志鑒於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第一個提出進行政治體制的民主改革的。他正確地指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使這一制度不因領導人的變更而改變，也不因領導人的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只是由於後來出現的一些不正常情況，才延宕了這一改革的進行。然而這一耽誤卻使黨和人民蒙受了重大的傷害，其中包括發生像八九政治風波這樣歷史性的失誤。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我建議，黨中央在起草十五大政治報告時，專門補充關於政治體制民主改革的章節，黨向全國人民承諾有階段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和步驟。我以為，當前開放縣以下的政府首

^① 厲以寧（1930—），江蘇人。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全國人大常委。

長直接民選應該是可以做到的。我們必須堅持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原則。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得到確實的保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應真正落到實處，各級人民代表的選舉必須是公開、公平和公正的。為了確立憲法的權威，我建議可考慮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建制下，設置獨立的憲法法庭，公民可以通過憲法法庭追究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憲行為。

在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上，我建議同志們重溫毛澤東同志五十年前的一段話，他說：「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堅持這個原則，我們才有勇氣邁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

三、關於建立健全的黨內民主制度的問題

回顧我投身革命事業的六十多年中，我認為，對黨的事業傷害最大的是毛澤東同志晚年違反黨內民主原則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這場動亂幾乎把我黨幾十年來經由無數奮鬥犧牲得來的革命成果毀於一旦。為了防止重犯這樣歷史性的錯誤，在鄧小平同志主持下，我黨於1980年制定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在黨內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之後在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中廢止了黨的主席制，規定黨的總書記在黨的會議上只能以平等一員的資格參與會議和進行表決。這些規定對防止黨內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和發揚黨內民主起了積極的作用。事實證明，執政黨只有堅持黨內民主的原則，才能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貫徹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但是，在小平同志晚年，固於傳統和現實中的一些消極因素，黨內的集體領導沒有得到堅持，黨內一再發生違背民主原則的現象。在處理耀邦同志辭職和八九實行戒嚴這兩起政治事件中，我黨遷就小平同志個人的意志，未能嚴格按照黨章及〈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辦事。在處理耀邦同志的問題上，我本人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離開中央領導崗位的七年中，我有機會重新反省我入黨以來的全部生涯。我發現，只有我們堅持黨內民主原則的時候，我們才可能

問心無愧地履行一個正直的共產黨人的責任和義務。當我們因某種功利的原因而放棄原則時，我們將受到歷史的懲罰和良知的遺責。

鑒於上述認識，我冒昧建議中央可否考慮廢止關於以個人為「核心」的提法。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核心」只能是黨，是黨的領導集體，任何個人，不管才能有多高，貢獻有多大，是不可能也不應該成為黨的「核心」的，以個人為核心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政黨和領袖的學說的，客觀上也會助長黨內的個人迷信。

列寧指出，「階級一般是由政黨來領導的，而政黨通常由被選舉出來的少數最有經驗的、最忠實的、最富有犧牲精神的黨的領袖集團來領導的。」列寧認為黨的領導核心應該是集體而不是個人。列寧畢生為反對個人崇拜和領袖個人專斷而鬥爭。遺憾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集體領導的民主原則往往被違背和遺忘。這也是我黨歷史上產生像文革這樣無法彌補的重大錯誤的主要原因。

四、關於堅持革命人道主義的問題

這是我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向黨提出最後一個建議，即我們應該弄清楚，我們共產黨人究竟為什麼要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問題。解放戰爭快結束的那一年，我的父親因為被劃為地主，被我家鄉的土改工作隊鎮壓了。（宗注：這非事實。）當時我作為黨和軍隊的重要幹部，堅持革命原則，說服自己相信鎮壓地主是必須的、應該的。

今天，我回顧這段往事，我遺憾我沒能盡力按人道主義的精神挽救我父親和其他許多罪不致死者的生命。因為即使為了革命的理由，也沒有必要從肉體上來消滅那些沒有反抗行為的剝削階級分子。當小平同志宣導改革，我們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以來，更促使我對黨在歷史上長期實行的消滅剝削階級分子的政策有所反思。實際上，這是要不要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原則的問題。我們共產黨人進行革命，並不是要無謂的增加人類的犧牲和痛苦，而是為了增進人類的文明和幸福。馬克思說，「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全人類自由發展的前提」，我們應當盡可能地減少革命過程中可以避免的流血，即便流

血者不屬於我們同一個政治陣營。我想我這個觀點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不僅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類的原則的。當我認識到這一點之後，我就把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當做我的一個基本行為準則。這就是我在1989年政治風波中為什麼堅持反對戒嚴的主要原因。因為按當時的形勢，我意識到，實行戒嚴的必然結果是流血。遺憾的是儘管我竭盡所能，也未能制止事態向我最不願看到的方向轉變。這就是我被指責為「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由來。也許我沒有完全按黨組織的要求來行動，但我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人道主義原則來行動的。

1989年5月16日，我對來訪的戈爾巴喬夫說，「我們黨有決心面對快速改變的外部環境，我們黨將能順應歷史的潮流。」今天我還是認為，我們黨能不能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關於按事物的本來面目來認識事物的原理，實事求是地總結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是我黨能不能再次得到人民認同的關鍵。

以上就是我在小平同志去世後向黨的十五大籌備組提出的四點意見。我再次申明，我是一名忠實於共產主義理想的共產黨員，我向黨寫這封信，是為了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為了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完〕①

趙紫陽大致翻閱了一下，隨即說，這是假的，不是我寫的，我說這卻反映了社會上人們的心態、一些看法和政治需求。〔注：故特收集於此，供參考〕，就是鮑彤也對外界聲言是真的。趙紫陽說：我寫了一封信是不錯，但不是這個內容。隨即他將列印的信稿交我閱看。據我回憶其內容全是針對江澤民的一句「這是你自己造成的」傳話而寫的。

由於趙紫陽在1997年中共召開十五大之際，寫了一封建議重新評

① 此信已收入吳國光、蔡偉國、鮑橋主編的《紫陽千古：趙紫陽紀念文集續編》，題為：《趙紫陽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委員的信》，時間是1997年10月13日。

價「六四」的信，觸犯了江澤民，始則批評趙紫陽不照顧大局，繼則進一步實行軟禁予以懲罰。當趙紫陽提出這樣限制一個人的人身自由對一個黨員和公民權利的剝奪是違反黨章，違反憲法時，江澤民則又怒言相加：「這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看了之後，心裏也憋氣，一直在沉思：一個國家領導人怎麼能這樣對待問題呢？好像是在表示說：誰叫你趙紫陽亂說亂動啦！對你限制自由，進一步軟禁這個苦果，自然應由你自己去吃！這顯然是一種毫不講理的做法，也說明了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心胸太狹小了！作為一個政治家太沒有風度了！倒不如明確地說，對你趙紫陽就是在進行專政，不准亂說亂動，如今你亂說亂動了，我江澤民握有專政的權力，就是要對你執行制裁！這樣，倒顯得有點政治家氣概和風度說的話；其所以如此，也只能表明他自己是理屈詞窮罷了！

5

1998年9月18日

「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政治改革」

我上次曾送給趙紫陽一本北京的暢銷書《交鋒》①。今天（1998年9月18日）趙見了我，他首先說：「這本書我看了；第三次思想解

① 《交鋒》，馬立誠、凌志軍著《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1998年北京出版的暢銷書。

放只能是政治改革，而不是姓公姓私的問題」。

一般看法是：文革後第一次思想解放主要解決個人崇拜問題，就是如何對待毛主席的問題。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解決了姓「資」姓「社」的問題。那時，「左派」一般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市場經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復辟資本主義，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認為實行「特區」就是殖民地化，引進一個外資，就是多一分資本主義；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階級基礎。江澤民也受此影響，大講「反對和平演變」。如果不從姓「資」姓「社」這個思想枷鎖下解放出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會被扼殺，就會半途而廢。

那麼，第三次思想解放是什麼呢？應該怎樣看呢？《交鋒》認為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姓「公」姓「私」的問題，中共十五大明確了「抓大放小」，非公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的確有所突破；因而《交鋒》認為這是第三次思想解放。然而，經濟學界認為，仍屬於經濟範疇。

趙紫陽對我說：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解決市場經濟問題不行，不解決所有制問題也不行，這乃是市場經濟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趙認為由於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不同步，腐敗愈演愈烈，發生了機體性的腐敗，使市場經濟在向畸形的方向發展，已成為突出的問題。趙對我一再說：「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也應當是政治改革。」在這個問題上，他說：「自己的思想也有個認識變化過程。開始認為群眾吃的還沒有解決，談什麼進行政治改革。後來認為這個問題不結合進行，社會腐敗無法解決。」

我說：政治改革滯後，這大概是全國上下人們的普遍看法。但據我所知，江澤民對此卻不以為然，對政治改革滯後這個說法是頗為反感的。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權力市場化」現象一直在發展，形成權錢交易，大量侵吞國家財產，再加上亂攤派亂集資，敲詐勒索而使民怨沸騰，形成了特權階層和兩極分化，使社會矛盾越積累越大，這都是由於政治改革不配套造成的。

我又說：國外有人評論說：「江澤民的機遇是政治改

我認為這確實是難得的歷史機遇。如果說毛主席抓住了歷史機遇，建立了新中國。鄧小平抓住了歷史機遇，實行了改革開放；給中國人民開闢了新的航道。那麼江澤民就應當抓住機遇進行政治改革，把中國推向民主化現代化，實行向民主政體的轉型。

遺憾的是，江澤民不是利用這個歷史的機遇，進行政治改革，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使之走上現代化，而是在上台後一再聲明：黨的前兩任總書記「犯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他大講：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要大力反「和平演變」，這就是對外仍要堅持「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鬥爭，對內則強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能變，限制私人經濟、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後又提出反對「西化」，不能學西方政治那一套，這就是所謂中國特色的政治模式不能動搖。這也就是說，經濟上要繼續實行改革開放，推進市場經濟，政治上則仍要高度集權，實行專制政體，亦即鄧小平確定的「四項基本原則」一定要堅持下去。

因為市場經濟是天生的自由派，它要求公平、自由、有序地進行，它不承認任何特權和個人權威，只接受民主與法制的引導；它要求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自由、民主與法制的新的秩序，來擴大發展自己的活動空間，這是世界的潮流。

在1989年批判他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趙紫陽曾說過這樣的話：「在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時代的潮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而且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不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條路，我們與其被動的走，不如自覺的主動的走。」

趙紫陽根據自己的體驗一再對我說：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革命勝利後不可能立即建設社會主義，只能為社會主義創造和準備條件，應補資本主義這一課。他認為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即使實行私有化，發展資本主義也沒有什麼可怕，也沒有可責難的。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走向共同富裕，趙明確地說，這就是改革的

理論。也就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趙的思想是通過發展市場經濟而使中國轉向民主政治。

趙從歷史的回顧對我說：中國百年來，為在中國實行現代化，自戊戌變法開始，許多仁人志士所爭論的想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老辦法，來解決並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是辦不到的，就是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行不通的，因為它容納不了市場經濟。

趙紫陽很欣賞李澤厚^①有關「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提法，他認為要實行現代化，就是要西化，就是要實行西方那一套。它乃是世界現代文明的主要潮流，要與之接軌。他認為西方的議會政治還是比較成熟的，是一種好形式；國會可以制約總統，議員又受選民所制約，無論總統或議員，你不代表人民說話就不選你。

從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出發，趙又對我說：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社會矛盾多，人員素質差，容易發生變亂動盪。如在中國實行多黨制，可能會產生上千個政黨。然而目前中國實行的一黨專制政體也專政不下去，實行民主政治應採取逐步漸進的方式，如強調人大、政協的作用，予以制衡；實行地方自治；發揮工會、婦女團體和社會各民主黨派的作用，並讓有各自利益的代表予以制約；應逐步實行民主政治，建立民主政體。

趙最後又說：中國的改革，雖然經過曲折的道路，但總算走上了市場經濟的軌道，這是值得慶幸的，隨之而來的必須是政治上的改革開放。自己有這個使命感，也有此抱負。要把改革事業進行到底，可是未能如願，實在是遺憾，甚感傷懷！此時他指著自己住的四合院，對我的小孩宗培英說：「我就這麼大的活動空間啊！」

^① 李澤厚（1930—），湖南人，哲學、美學名家。倡「告別革命」說，1992年旅居外國。

6

1998年10月17日

趙紫陽談人權

1998年10月17日去了趙家，這次趙紫陽首先從人權談起。他說，中國人既沒有納稅人的觀念，也沒有人權觀念。由於長期封建帝王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所謂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人們只有皇權、官權觀念，認為自己是靠皇帝的恩賜過活的；只有依附性，只好奴隸般的服從，才能生存。不像西方歐美民主國家那樣，人們知道國家一切官員都是由納稅人來養活的，人民擁有自己的權利來監督；認為行使自己的權利是不可侵犯的，同時，納稅也是自己應盡的義務。

他又說：過去我們一直宣傳「人權」是資產階級口號，這實際是否定人權的正義性；過去又不斷地批判「人性論」、「人道主義」，認為都是屬於資產階級思想範疇，其實乃是人類的本性、共性。

後來，雖然承認了「人權」，但又認為西方世界所謂的「人權」同我們講的「在本質」上是兩回事，觀點上是根本不同的，應予以抵制；繼而強調「人權」是一國內政，屬於主權範圍的問題，強調「國情」不同，人權的標準不同；從而提出了「人權」就是生存權、發展權，以此同人權的普遍性原則相對立。在世界潮流的推動下，最後，才簽署了兩個人權公約，承認了人權的共同標準「普遍性原則」，這樣，才算與國際接軌了。與此同時卻仍藉口：不能干涉內政，來進行抵制。但《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就明確的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凡簽署國均要有接受監督的任務，每年都必須向國際人權委員會寫報告，敘述本國在執行國際公約改進人權的情況；如果以「不許干涉內政」為盾牌那就切斷了與世界範圍的人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際關係，中國就成為孤島了。

我說，馬克思主義是以解放「人」為中心的學說，這就是人權價值觀；馬克思提出的「工人無祖國」這個口號，就是否定國家主權論，實際也是在宣導「人權」的普遍性原則。

趙繼續說，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確體現了兩次世界大戰後人類的覺醒！兩個公約都體現了人民的自決權，規定了「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那就是所有人民都有權自己決定自己的一切。明確了「每個人的權利的實現，才能表現出集體權利」，「每個人享有言論自由才能表明一個國家的言論自由。」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就是不要對不同政見搞大批判，不要制裁異端，不要封鎖消息，不要建立審查制度，不要以言入罪，不要大興文字獄，所謂言論自由就是發表意見的自由，持有自己主張的自由，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我說：朱厚澤的看法是：中國雖然簽署了兩個人權公約，他也不抱任何希望。

趙對此評論說：大概是給外國人看的，中國也不打算執行。如憲法規定「結社自由」，但國務院的〈社會團體登記條例〉又規定「成立社團必須事先登記得到批准」。還沒有成立憑什麼登記？否則成立過程就視為非法，這就取消了結社自由。又規定成立社團必須有掛靠單位，這就是只能依附官方，這怎能叫結社自由呢！

我繼續說：但朱厚澤的看法又認為，這同過去不承認「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只強調人權就是生存權、發展權相比有進步，這就為致力於人權而鬥爭的人們，為爭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民主運動帶來了合法性。

正因為此，我說，目前在國內出現了〈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社會公正與公民權利宣言〉呼籲書（隨即將此材料交給了趙紫陽）。繼而又出現了各種政治性團體如：中國發展聯合會、腐敗行為觀察小

組、人權觀察小組，以及中國民主黨等組織。

此時趙問及中國發展聯合會組織的情況。我說，據我所知該組織現有會員約四千人左右，計畫在三年內發展到一百萬會員，以知識份子為主。他們是在香港註冊，已在國內舉辦了二十多次時局研討會，自稱為中國大陸最大的真正獨立的合法的政治組織，以加速在中國實行民主化進程為己任。其宗旨：聯合一切有識之士和相關組織，推動中國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軌，以人類的永續生存和人性的健康發展為最高目標；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公民的幸福健康；當前的重點是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憲政建設和人權狀況的改善。中國發展聯合會的工作，遵循自己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合法、和平、公開、諧合。中國發展聯合會成立了執行局，彭明任執行局第一書記。

趙隨即問我，彭明^①這個人是幹什麼的？我說：據我所知，彭明現年才四十二歲，武漢農學院畢業，曾在北京首鋼政策研究室工作，後又到航空航天工業部下屬航空航天電業集團任總經理，現任中國發展新戰略研究所所長，被人稱為「非趕超戰略」創始人。

至於中國民主黨的情況，我說瞭解不多，只知山東和湖北的異議人士，曾分別向山東省與湖北省民政廳申請成立中國民主黨籌備處。據稱，曾受到兩省民政廳的接見，並告以按〈社會團體登記條例〉辦理，要送交人員名單，辦公位址，及一定數目的註冊資金等。當時不少人認為中國的政治氣候寬鬆了，繼而浙江、湖南、遼寧、黑龍江、上海、江蘇等約十多省回應，申請成立中國民主黨各分支部，在很短的時間裏猛然發展到近廿個省份。高層領導大概認為中國人如果都參加了民主黨，都不贊成共產黨，這將是大的威脅，遂產生了危機感。接著公安部長賈春旺^②就宣佈：十幾個城市有敵對勢力、敵對分子的組織，以及對現實對現行制度不滿和反對的人士，提出申請成立所謂

① 彭明（1957—），90年代在北京任企業領導人，並研究戰略問題，1998年出版論21世紀非趕超發展戰略著作，組織「中國發展聯合會」，1999年被捕，2000年逃往海外，2003年被緬甸引渡回國，2005年被中共以恐怖活動罪判無期徒刑。

② 賈春旺（1938—），北京人，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曾任公安部長、國安部長，

反對黨：中國民主黨、中國社會黨、新世紀論壇等政治政黨團體，是海外敵對勢力組織和內地敵對分子在製造謠言，挑動人民群眾和黨政部門的矛盾和對立，煽動下崗待業的職工搞示威、集會，衝擊黨政機關，堵塞交通，用暴力攻擊製造流血事件。中央治安治理委員會書記羅幹^①則進一步聲稱：這是一個有後台、有政治氣候、有時間、有準備的政治性挑戰的起步；鄭重提出「我們的方針政策是明確的」，繼而發出了〈關於堅決依法打擊制裁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的顛覆破壞活動〉文件。隨後，就傳達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及江澤民的講話；提出，在現時期和今後較長一段時期（十年廿年或長時期）強化人民民主專政，是絕對不能動搖，絕對不能鬆懈的。這樣一來，打擊、鎮壓、逮捕、拘留判刑異議人士就是勢所必然的了。江澤民一再聲稱：一定要消除在萌芽狀態中，這是成功的經驗。中國民主黨就這樣還未出爐就給封殺了。

趙說，其實這些異議人士目前還是比較成熟的，不像「六四」時那樣激進；他們提出在和平、合法、理性口號下來進行；都十分注意維護政治穩定、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遵循要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進行活動的原則；如包括對「六四」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處理，更提出了可以把平反「六四」放到一邊，先把「六四」冤案翻過來；該放人的放人，該撫恤的撫恤，該回國的回國，該取消處分的取消處分，該恢復名譽的恢復名譽。

趙認為，江澤民究竟是前進還是倒退，歷史的方向盤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如果採用一面欺騙洋人，一面鎮壓國人的兩面手法，是不可能掩天下之耳目的。

我最近看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②提出了「任何國家都不能以維護主權為藉口，對本國人民進行迫害。」安南聲稱：只要他還是聯合國

^① 羅幹（1935—），山東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

^② 安南（Kofi Annan 1938—），加納人，留學歐美，1997年任聯合國秘書長（2006年底止），2001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1999年5月16日

秘書長，「聯合國作為一個機構，就將一直把人權置於每項工作的中心。」他又說：「作為聯合國秘書長，我又在聯合國發起的每一個專案以及開始進行的每一項工作中，都把人權作為優先考慮的事」。他認為人權是聯合國中各國人民之間的神聖聯繫的核心。

《國際內參》評論：這就是聯合國出現的「人權主流化」趨勢，就是指一切以人權問題為中心，把人權看作評判是非的唯一標準。聯合國並明確規定了任何一國當政者，如果殘害本國人民，就是犯有反人類罪，就都要受到國際法庭審判。

這就是「人權國際化」，這是潮流，也將是人類社會新紀元的一個標誌，也是人類社會文明的一個新發展。我非常贊成安南這個講話。

最後，我向趙紫陽轉述了胡績偉一句話，他去美國訪問，人們問到中國人權情況時，他說：我們前總書記趙紫陽也沒有人權！

7

1999年5月16日

杜潤生希望趙紫陽研究黨的理論問題

這次，我是受杜潤生的委託，於1999年5月16日去見趙紫陽。我首先談了我接觸的理論工作者、學生和一些老幹部都在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反思；西方輿論認為廿世紀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共產主義是失敗了，甚至說，共產主義是廿世紀一股逆流。中國有些中青年學者則說馬克思主義破產了。黨內一些有理論知識的老同志認為馬克

思設想的共產主義乃是可望而不可及，是永遠達不到的；馬克思的許多論點是站不住的，是烏托邦，是邏輯思維的產物。總之共產黨是發生了意識形態危機信仰危機。

我說，這些年來，自己也在反思。由於東歐的巨變，蘇聯的解體，當時原蘇聯共產黨的解散，如同一聲巨雷，使我迷惑不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否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要退出歷史舞台，是否自己奮鬥一生所追求的社會、目標方向錯了，是否自己終生為之奮鬥犧牲的事業到頭來是走錯了路？這樣，中國的社會主義旗幟還能打多久？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能否成功？中國究竟向何處去？未來社會應是什麼樣？馬克思主義還靈不靈？這些問題成了我晚年反復思考的問題。

經過反思，我寫了一本書《理想、信念、追求》，在這書裏，我將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顧，對我終身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作了反思，對未來所追求的新社會也作了個描述。我的反思是：「理性異化」統治著我，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裝了我束縛了我。《參考消息》^①刊載蘇聯報刊的評論說：「馬克思原理有犯罪的基因，基因中包含原始罪惡。」「使活生生的人變成了抽象人的犧牲品；使個性成了集團的犧牲品。」

我向趙介紹杜潤生的新觀點後，轉達杜對趙的評價。杜說：自己是個知識份子，應有知識份子的良知，應有對社會的責任感、使命感。在現今的世界裏，他想同一些志同道合者從理論上全面探討一下對馬克思主義的改造、對社會主義的改造、對黨的改造問題。並說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路線還是比較實際的。最後鄭重地對我說：趙紫陽是從舊的意識形態走出來的，是很少有的國家領導人。他不但經濟上開放，政治上也主張開放；他既有內功又有外功，是個人才。我們想利用他的智慧，在探討如何改造馬克思主義、改造黨這一重大問題上，幫助出點力；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階級鬥爭學說、暴力革命論，以及現實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共產黨的領導等諸問題，也希望他

^①《參考消息》，1957年新華社出版的內部發行報紙。可以直接刊登外電新聞，發至縣團級。1985年允許個人訂閱，1993年發行300萬份。

1999年7月16日

能從理論上作個闡述，要我轉告。

杜潤生給了我一份張愛萍上將從河南省南街村考察回來後寫的一個題詞，讓我交給趙紫陽：

山窮水盡焉無路，柳暗花紅南街村；

各盡其勞同富裕，美好未來奮勇奔。

該題詞是讚揚南街村的，並刊載於《求是》雜誌還發表了社論，引起了人們關注。

8 1999年7月16日

趙紫陽：「鄧小平的路線走到盡頭」

1999年7月16日去趙紫陽那裏，這次談話是從改革形勢、通貨緊縮開始的。

我首先談了安志文的看法。安說過幾十年在中國都是通貨膨脹，老百姓有錢也買不到東西，都是憑票供應，所謂「短缺經濟」，現在則是通貨緊縮，有東西賣不出去，這是個新課題。雖然銀行一再降息鼓勵消費，但群眾還是不買，刺激不起來。政府採取大搞公共設施的財政政策，效果也不顯著。農民賣糧難，收入減少，城市工人下崗越來越多，失業人數越來越增加；拖欠公職人員、退休人員和工人工資

嚴重，靜坐示威事件各地不斷發生；再加上腐敗這樣嚴重而且是肌體性的，甚至是執法人員都在犯法，人們擔心這樣下去，會發生動亂，抱有悲觀情緒。如老干部王鶴壽說：腐敗這樣厲害，改革還改得下去嗎？再改革就是實行多元化，就是共產黨下台。

安志文說，現在「左」派與右派對現象的看法都是一樣的，就是結論不一樣。接著我談了極「左」派與極右派的幾點看法，他們都認為：

1. 幹部隊伍中的腐敗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已病入膏肓。
2. 失業、半失業是1951年以來最多的，還有幾千萬農民流入城市；已兩極分化，形成特權階層。
3. 拖欠公教人員工資，甚至拖欠公安人員工資，這是自傷手腳，自挖牆角。
4. 社會治安之惡化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殺人搶劫、綁架、吸毒、賣淫、嫖娼全面恢復並在發展。
5. 國有經濟的比重低於俄羅斯，私有化的主張成為經濟理論界的主流。
6. 幹部群眾的思想混亂，普遍認為搞的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認為今日中國最大危險是：私有化；認為「國有經濟全面崩潰之時，就是共產黨全面垮台之日」。認為共產黨領導的改革，越來越抽空自己的統治基礎。

但安志文又說，這些情況的產生，「左」派認為是由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是實行市場經濟的結果；改革者則認為是改革不徹底，是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不同步，是高度集權，不實行民主政治，沒有公開監督機制造成的。安認為雖然在轉軌期產生腐敗不可避免，如南朝鮮、台灣都一樣；但在中國是太嚴重了。

談到這裏，趙紫陽插話，又強調了前述一個看法說，我國在公有制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政治上又實行集權搞集中，那麼，很容易使一些人用手中權力，利用市場經濟這個機遇來侵吞國家財產，化公

為私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並由於官商結合，會使市場經濟向畸形發展。這種現象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不易產生，他們雖也在政治集權，也實行市場經濟，但由於不是公有制，財產不能被隨意侵佔。我們在過去計畫經濟條件下，雖實行集權高度集中，但管理嚴格，沒有市場這個機遇，所以雖有權在握，也不能隨便侵吞公產，變為個人財產。

接著我說：安志文很同意台灣中山大學一位學者的看法，認為中國的改革不單純是經濟改革，而是實行現代化問題。從中國近百年來的鬥爭史來看，仁人志士都是為在中國實行現代化。所謂現代化，乃是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學術研究無禁區。由於中國是從封建社會轉向現代化，而中國傳統文化意識形態是根深蒂固，所以中國的政治轉型是個漫長的過程。

安的看法是，對江澤民的政治轉型、實行民主政治不抱任何希望；認為從他安排接班人這些佈置，仍是鄧小平垂簾聽政那一套，從他的「三講」佈置來看，其中心就是要同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要樹立自己的核心和個人的權威；也就是過去毛主席宣導的變相馴服工具論。中國的改革如沒有外力推動，江澤民是不會進行政治改革的。因此，要使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使中國的經濟運作與國際接軌，引進外國的資金、技術、管理，對國有企業實行兼併合資改組，迫使其進一步深入改革；迫使金融業、電訊業，進一步開放，用這個外力來推進中國改革，進而才能使中國轉向政治改革。

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的看法是，鄧小平留下的是人治而不是一個制度，這樣高度集權的人治社會是不穩定的。《動態清樣》刊載了《大失敗》的作者的文章。此人過去曾預言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現在國外又評論鄧小平的跛足改革，即經濟上改革開放，政治上高度集權實行專制，早晚也會走上崩潰。據說，許家屯在國外表示：自己已多年不說話了，過去對江澤民曾抱有希望，現在看來江對鄧小平遺留下來的問題，不但不去緩解，相反，按鄧的這條路線堅持走下去，致使政府腐敗愈演愈烈，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勢將導致中國必亂。

最後，我也談了鮑彤的看法，認為中國必變，但目前變不了。他

說：雖然農民負擔重，對收入減少發生不滿，但中國農民承受能力強，揭竿而起也發生不了。雖然職工下崗、失業增多，生活困難，但還有最低生活保障線，城市工人也不會出現大的問題。雖然政府腐敗而且是肌體性的，還在繼續發展，但政府還能控制。認為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大國，外國的壓力干預是有限的。認為上層領導還沒有向江挑戰。中國現在不是原蘇聯的勃列日涅夫停滯時期，而是窒息時期；各方面的控制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嚴，簡直把人悶死。

趙紫陽說，這說明鄧小平的路線已走到盡頭，說明鄧小平的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與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此路是行不通的。同樣，江澤民一方面實行市場經濟，一方面實行計畫控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道路也行不通。趙說，如果作為一個步驟，經濟改革先行一步，而隨之再進行政治改革可能是行的，但如果作為一個路線堅持下去是不行的。改革開放開始實行高度集中，對推動改革開放效果還是好的，正面作用是大的；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改革開放與高度集中的矛盾越來越大，正負兩方面的彼此消長顯示了高度集中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也就是阻礙改革這方面的負面影響越來越顯著。這樣矛盾越積累越多越大，最終會形成社會危機，會發生又一次大災難。

趙頗有感歎地說了一句：「中國的政治改革失去了良機。現在不要考慮公有制了，政府不要干預企業了」。

最後我談了杜潤生對目前經濟形勢的看法。

杜說，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方針政策的指導下，1992-1996年國家進行大量投資，每年都以30%的高投資，換取了10%以上的高增長。結果形成了重複建設，經濟結構也越來越不合理，造成了生產過剩。這種生產過剩的危機，在過去的資本主義國家，直到二次世界大戰才消化掉。現在的日本已經經過八、九個年頭，還未消化掉。這次在中國，也得六、七年時間才能辦到；尤其目前實行的醫療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社會保險還沒有完全到位或完全建立起來，人們有錢也不買東西，有東西就是不買。

杜認為這個禍害是鄧小平造成的，但誰也不敢說這句話，而這恰是根源所在。朱鎔基不得不採取貨幣緊縮政策，但貨幣政策也失靈了，連續七次降息，需求仍啟動不起來；靠財政政策大量投資公共設施，款又收不回來，這些款又是銀行老百姓的存款，這樣做容易發生危機。目前機關又是大量裁減人員，企業工人下崗，農民負擔過重，退休工人發不出工資，致使一再發生工人、農民示威靜坐。所以改革也難以推動。

趙紫陽說，對經濟形勢這種生產過剩危機的看法，乃是一種學派的觀點。有另一種觀點，認為是由於貨幣緊縮造成的，這也是厲以寧的看法。鄧南巡講話後，國家是大量投資，又普遍搞開發區，發生了泡沫經濟，但只是一年多的時間。從1994年就開始貨幣緊縮，實行所謂「軟著陸」，接著就實行國有企業的改革，提出三年大見成效，實行機構改革大量裁減人員。在農村又實行糧食、棉花統購統銷，農民賣糧難，又負擔重，收入減少。城市則是工人下崗也收入減少。民營企業更是得不到資金貸款，經營困難，再加上醫療、住房、教育改革，人們預期心理不好，有後顧之憂，儘管物價下降，也「惜購」，公務人員增加工資，也有錢不花，需求刺激不起來。從而形成整個經濟上的貨幣緊縮。表面看起來，是生產過剩，東西賣不出去，實際是收入減少，通貨緊縮造成的。而這種通貨緊縮受害最大的還是民營企業、鄉鎮企業、集體企業，經營困難，發生倒閉。政府雖然採取大量投資搞公共設施，但款卻是一時收不回來，況且也是銀行的款，還是老百姓的存款，又會發生危機。

出路在哪裏？趙紫陽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要增加對民營企業的投資，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是靠非國有經濟發展起來的。

趙說，我們必須有一個目標，那就是要使中國現代化；為了實現現代化，首先要工業化。這就必須把中國80%的農民轉移到第二、三產業上來，否則，就談不上工業化。並根據這個目標進行全面的規劃。有了這個根本的考慮和佈置，就不致於在執行政策路線上東一榔頭西

一斧，頭疼醫頭腳疼治腳，左右搖擺和發生矛盾現象。如日前對糧食系統提出，為了不傷農，要敞開收購；為了不虧損，要順價銷售；為了不使仲介商介入，要封閉運行、統購統銷。這種政府干預，政府採取完全控制的做法，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厲害。就是在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時，還允許農民將餘糧銷售。這樣，政府不是根據市場經濟的發展來逐步退出市場，讓市場競爭去解決，而是採取加強控制的做法，這就是在執行政策路線上的自相矛盾。

接著我談了朱厚澤的看法，朱認為領導層在政策路線上亂套啦。又要放開搞活，又要進行統購統銷；又要產權改革，實行戰略性改組，又堅持國有制主體地位，不搞私有化；又要「以法治國」，又要實行權力高度集中，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不能動搖；一方面簽署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一方面又嚴禁結社、言論自由，嚴加控制，對民主黨任意逮捕實行高壓；一方面有危機感，工人下崗失業嚴重，發不出工資有「憂患意識」，一方面又大動干戈，大搞五十年大慶，勞民傷財，粉飾太平；一方面接受西藏轉世靈童承認迷信，一方面又大力圍剿法輪功，反對迷信。朱說，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對遇難人員怎能下半旗呢？這大可不必。

最後，趙紫陽對我說，他也要給杜潤生出個題目，就是對領導層在政策路線上的這種矛盾狀態作個分析，要我予以轉告。

1999年9月26日

9 1999年9月26日

趙紫陽推薦鮑彤的論文：〈中國的憂思〉

這次見面，趙紫陽首先對我說，鮑彤寫了一篇論文，他認為很好，交給我，建議我一讀。我對此文反復看了幾遍，確實觀察銳敏，分析深刻，句句針針見血，切中時弊，令我感歎不已。

鮑彤這篇1999年9月26日發表的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週年的文章，題目是〈中國的憂思〉。

- 1、發展需要憂患意識；
- 2、中國的大患在於權力沒有制約；
- 3、絕對權力和停滯僵化；
- 4、絕對權力的腐敗變質；
- 5、絕對權力和文明危機；
- 6、遇上絕對權力，什麼都會變質；沒有民主，什麼藥都用不上。

鮑彤文章最後說：

鄧小平有句名言：不改革死路一條。這句話是對的，用在經濟上是對的，用在政治同樣是對的，——在經濟改革進行了二十年而政治改革尚未上路的情況下，尤其是對的。

中國現在問題成堆，腐敗，市場變形，不公平競爭，失業，鯨吞國有資產，貧富懸殊，社會動盪，宗教，民族，人權，法制，統一，環境，人口，道德，以至國際社會中的面子和地位等等，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離不開民主。有了絕對權力就沒有民主，而沒有民主，什麼藥都用不上，仔細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的歷史就能知道，不管什麼處方，什麼良藥，只要和有封建特色的極權政治一結合，就一

定變質，變得有名無實：有的無法實施，有的面目全非，有的不起作用，有的適得其反。無藥可治的病是最危險的。不進行民主改革，中國現在面臨的諸多重大社會問題沒有一個能從根本上解決。

有人怕民主影響穩定。中外古今的經驗恰恰相反，高壓必然導致大震盪，民主具有最可靠的內聚力。秦始皇統一六國，焚書坑儒滿以為高壓可以長治久安，結果二世而亡。處在大國之間的瑞士，小國，多民族，不靠高壓靠民主，然而和睦，團結，穩定，昌盛，贏得全世界的尊重。中國要穩定，要消弭矛盾，避免震盪，推進統一，承受得住風險，也唯有靠民主。民主是共和國的生命線，有民主則共和國存，無民主則共和國亡。所以，不要怕民主，民主能救共和國，亡不了共和國。

有人提醒我們說，中國老百姓素質低。據說，革命早已成功的中國老百姓的素質，比革命遠未成功的西方老百姓差了一大截，自己作主會天下大亂，所以必須把公僕請出來當家。他們的話也許有某些道理，但是我不相信中國老百姓比陳希同的素質更差。毛澤東要老百姓造反時，從來不說他們素質低，想不到造反成功了，卻有人勸告中國人放棄自己的自由和權利，這算什麼理論！

現在處在世紀之交，最好別讓絕對權力這個不光明的東西污染二十一世紀。願中國的公眾能在實際生活中享有自由說話和自由行動的法定權利。願中國以民主之體進入二十一世紀，成為名實俱存的人民共和國。

趙紫陽對我說了一句：這篇文章寫得很好！

另外趙還讚賞李慎之〈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一文，說這是很見地的，指出了中國歷史文化的真諦。即中國的文化傳統乃是專制主義，而儒法互補又是專制主義的核心理論，就是所謂道統。要我也好好讀一下。同時，我也讀了李慎之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向趙說，李慎之敢於直言，代表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良知。

趙紫陽也稱讚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他說，這本書很值

得一讀，它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變化的真實。我也閱讀了何清漣所著《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我的看法，她不僅提出了權貴資本的形成，即權力市場化，權錢交易，瓜分了公有財產，造成兩極分化嚴重，社會不公；而且何清漣又為弱勢群體鼓與呼，代表了社會正義和社會公正；是在燃燒自己，照亮社會，代表了中國人的良心，表達了對人的終極關懷。

10 1999年12月19日

趙紫陽對江澤民心理狀態的分析

12月19日去趙家。這次我主要是談趙紫陽前次向杜潤生提出的，對領導層在政策路線上矛盾狀態的分析看法，向杜轉告後，杜轉反映。

杜潤生從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歷史回顧，說明江澤民繼續鄧小平的六四路線，並鎮壓法輪功，是沒有走出專政的怪圈。

趙紫陽說，江澤民的基本心態是共產黨把權交給我了，在自己任期內，絕不能把共產黨的權丟掉；同時在執政時期又要為自己樹立個好形象。但無論如何「權」不能丟掉，這是基本的。「六四」事件當時，高級領導決策層認為不能退讓，退讓會發生像波蘭工會那樣的事件，使共產黨的領導格局發生變化，從而決定出兵鎮壓，這就激化了

社會矛盾，繼而發生東歐巨變與原蘇聯瓦解，使人們對共產主義信念產生動搖；再加上國內腐敗越演越烈，農民負擔加重收入減少，工人下崗失業人數越來越多，人民不滿情緒也越來越大。這不能不使江澤民產生危機感，提出所謂要有「憂患意識」。越有危機感，越怕不穩定，就越要施行高壓；在這種危機感的思想支配下，既不敢轉向民主政治，也不可能平反「六四」，認為這都會導致共產黨垮台。所以江澤民一再提出反對「西化」，就是在政治上決不能與西方接軌。這當然同當代世界民主化、多元化的潮流相違背。但發展經濟又離不開西方，不參加世貿組織又不行；參加世貿組織就必須遵守世貿組織的經濟運行規則，這又必須與世貿組織的法律體系接軌；但這又涉及不保護私有財產不行，這又同社會主義國家標誌的「公有制」有悖，同中國的憲法相矛盾。

趙接著說，因此，中國的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固然不行，首先腐敗就解決不了；而且，想不同西方主流文化結合起來也不行。東方文化是愚昧落後的，西方文化則是先進的，這種看法符合歷史事實，也是世界潮流；所謂現代化說的也就是「西化」，反對「西化」就是不同西方現代文明接軌，當然也要同中國傳統精華文化相結合。西方文明並不全是資本主義的，也並不為資本主義所專有，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近代現代文明，應為全人類社會所共有共用。

趙最後說，「五四」運動當時提出改造國民性問題，就是要實行「西化」，但是夭折了；結果又出現了學習蘇聯模式，傳來了馬克思主義；孫中山如此，蔣介石如此，毛主席更是如此，結果又都轉向了專制政體。當然這也是當時的國情決定的。這些領導者在台下時的口號都是要實行自由、民主；但上台後卻都要強調統治，強調服從，無論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是這樣，都走上了獨斷專政。

11 2000年5月13日

我們不能過於苛求馬克思

我於2000年5月13日去趙紫陽那裏，首先，我談了目前的一種國際輿論是，全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運動失敗了；認為在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給人類帶來了災難，有的學者甚至於說這個學說破產了。他們認為馬克思的哲學辯證法是詭辯論，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勞動價值論不是馬克思的發明。商品使用價值中，通常包含自然資源（原料），資本（工具、設備）和勞動，三種共同的東西，對於勞動所斷言的一切，對於自然資源和資本都適用。因此，勞動獲得工資，自然資源獲得租金，資本獲得利潤和利息，道理基本相同。這三種生產要素的供求決定價格，不是單單決定於勞動量的耗費。對馬克思的關於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設想，他們認為更是烏托邦。他們說：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論」、「無產階級專政」論，以及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把舊世界打它個落花流水，進行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鬥爭，把人類社會引向了災難，犯有反人類罪。

另一種看法是，認為馬克思以「人」為中心，以解放全人類為宗旨，要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的「自由人聯合體」新社會，求得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這個學說永遠是光輝的。馬克思根據自己創立的唯物史觀提出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原理，推演出了新社會一定要代替舊社會的歷史規律，社會總是由低級的形態向高級的形態發展，認為這乃是人類社會前進的規律。不能因為東歐巨變，蘇聯瓦解，就認為馬克思主義已「徹底崩潰」，應該進入墳墓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信念應該消失了。但也認為馬克思及其追隨

者所採取的手段、方法確是錯誤的。馬克思要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不要商品，沒有市場，實行計劃經濟。而實踐結果，卻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形成了對廣大人民的另一種形式的奴役，人民反而被剝奪了自由，成為新的專政體制的基礎；由於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尤其斯大林、毛澤東過於突出階級鬥爭，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結果被演變成對人民實行專政，並發展成為對黨內外一切不同政見者，不同意見者打擊鎮壓的工具；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變成個人專政的工具；演變成黨內的家長制和個人專權，自封為核心。從而，使「唯物論」、「唯物史觀」演變成「唯意志論」、「唯政史觀」了。從而認為，對馬克思學說必須進行更新，該肯定的肯定，該否定的否定。應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面貌。可以說，這後一種看法也是我的觀點。

總之，人們一般地從事實上認為，經過廿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長期較量，資本主義勝利了，共產主義失敗了，在共產主義內部，社會民主黨的政策路線是符合實際的，能推動社會進步；共產黨的政策路線是錯誤的。而資本主義內部美、英的自由經濟型市場經濟是有成效的，而二戰前德、日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則是不成功的。

趙紫陽說，記得過去〔同我〕談過，問題是資本主義有一種內在的自我調節機制，使其自身不停頓地、不斷地更新發展、變化，而社會主義則是由於體制的僵化而停滯了。例如，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即由於亞當·斯密自由放任理論的指導，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導致資本主義週期性地一再發生經濟危機，使工廠倒閉，工人失業。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更發生持續四年的經濟大危機，工業生產下降了40%；西方的世界貿易1933年比1929年減少了三分之二，此期間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共損失二千五百億美元，使四千萬工人失業，數千萬農民破產，生產力水準倒退了幾十年，使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一片恐慌。隨後資本主義各國採取凱恩斯主義，對工業企業實行國家干預，對國民經濟實行國家調控，並用國家財政

來補償居民的需求不足，國家採取減免稅或增加公共開支的辦法，以提高需求；使生產恢復，使工人充分就業，出現了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

又如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挽救經濟危機，曾到處掠奪殖民地，以取得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從而發生了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尖銳矛盾。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國家為爭奪市場、瓜分殖民地，就爆發了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從而原蘇聯社會主義就利用這個矛盾，聯合殖民地國家人民要埋葬帝國主義。這時，資本主義就調轉船頭，轉向資本輸出幫助殖民地發展商品經濟，開闢市場，使殖民地國家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以壯大自己。

再如，初期資本主義為了獲得最大利潤，就拼命加重剝削，壓低工資把工人推向貧困線上，致使工人罷工起義，造成工人與資產階級的尖銳對立。於是，資本主義國家就制定〈勞工關係法〉，規定工人最低工資標準，來緩和企業主與工人的矛盾；並實行社會救濟、勞動保險等福利措施，來穩定社會秩序。同時，也制定〈產業復興法〉來發展經濟，解決工人就業問題。

還有，由於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使資本主義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社會越來越不穩定，資本主義國家就實行〈反壟斷法〉、〈公平競爭法〉、〈扶植中小企業法〉，並將私人獨資企業逐漸變為股份公司，實行股票分散化，使企業職工擁有股權。同時，實行高額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來限制資本家階級財產的聚集與集中。特別是科技的進步，電腦的出現，「資訊時代」到來，尤其第三產業的發展，更使知識者階層、經營者階層、服務性工人大大擴展壯大起來，這樣就在資本主義國家造就了一個廣大的中間階級，使資本家和無產者工人隊伍相對縮小，從而使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結構發生變化，使社會趨於穩定。

趙接著說，至於在政治層面上，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經過同封建貴族以及資產階級各黨派間彼此殘酷的鬥爭後，認識到為了不至於同歸於盡，應該節制鬥爭，要適時相互妥協，遂採取了議會民主，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實行多黨競爭，輪流執政，實行分權與權力制衡制度。即便是國家領導人，如不代表人民說話，人民就不選你，因此誰也不敢做得過分。同時強調輿論公開監督，人民可以批評任何國家領導人，這樣越批判，越競爭、越改進，就越發展。從而也保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與國家領導人的穩定交替。

我插話說，自己曾經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過《資本論》，現在看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是絕對化了。例如，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分析，及由此必然產生危機的理論。至於列寧提出的資本主義已變成「垂死的、沒落的、腐朽的」理論應該說是破產了。又如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資本的積累與集中和工人階級日益貧困化的理論，認為資本的積累，就是對工人剝削的擴大，使工人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資本的集中，就是剝奪小生產者，使之破產貧困化；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就是擴大無產階級隊伍。事實的發展並非如此。再如，馬克思提出只有由社會佔有全部生產資料，「剝奪剝奪者」，消滅資產階級所有制，全部生產資料都歸屬於公有制，才能解決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佔有這個基本矛盾的理論。而事實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實現形式發生了變化。由於股份制的出現，私人資本變成了社會資本，股份的主要持有者，已不再是個人，而是各大公司和各種基金會組織，也就是說資本已社會化了，由社會來管理了，從而也就解決了資本主義這個基本矛盾。資本主義這一新發展，馬克思沒有預見到。另外，馬克思也沒有預見到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變化和廣大中間階層的出現。

趙接著說：馬克思還沒有預見到資本主義制度也能創造日益豐富的社會產品，使人類社會走向繁榮，實現現代文明，而這也已為實踐所證明。也就是說，馬克思只從消滅私有制、推翻資本主義這一條途徑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文明，他沒有分析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可推動社會進步和資本主義消亡的另一途徑。當然，我們不能過於責備馬克思，一個人再偉大，也不能跳出時代的局限性。不過，馬克

思的觀點確有烏托邦成分，如取消貨幣，沒有商品交換，沒有市場等。沒有矛盾，沒有動力，那麼，如何推動社會進步呢？

我說，馬克思過分突出「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過分強調「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鬥爭，他也沒有料到，他的崇拜者會由此把人類社會推向了極端，從而發生了災難。

趙紫陽說：馬克思尤其恩格斯晚年是承認並主張議會民主道路的。第二國際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派別，走的就是這條道路。在馬克思看來，走暴力革命道路乃是不得已。至於馬克思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乃是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後，認為對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必須實行專政，以維護無產階級的統治。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他把這個「過渡」看得極其短暫。至於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趙強調說，這是列寧所創立的，並不是馬克思。列寧在回答第二國際共產黨究竟是群眾專政還是階級專政的問題時說：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群眾是以階級來劃分的，無產階級是由無產階級有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而共產黨又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的領袖和領導集團來領導的。這樣就自然會演變成群眾專政就是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就是領袖專政了。

趙進一步說，根據這個理論建立的專制政體是不可變，不允許變的，這跟國民黨建立的專制政體還有些不同，他們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聲言到一定階段要還政於民。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軍人專政，也聲稱到一定時期實行民主選舉，也要還政於民。

趙深有感慨地說，總之，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治建設難以實現。

我認為，這確是問題的根源，也是各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僵化的癥結所在。從而又轉達了安志文的一個看法，說當今中國出不了企業家，也出不了思想家、文學家。隨後我補充了一句，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沒有在科學上出現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這都是制度造成的。

趙紫陽最後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出現了大思想家魯迅，

大文豪郭沫若，大學者馬寅初^①等。〔作者注：在台灣也出現了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大科學家李遠哲^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度裏，是國家最高領導人駕馭一切、統治一切；一切由他來發號施令、無所不能，只有他才具有這樣或那樣的權威，所謂「全能主義」。一些學者只能論證最高領導人決策的正確性，對最高領導人的講話進行註解，這種體制是靠權力權威來推動、維持的。因此，這種體制必須要極力樹立個人權威，而國家最高領導人也在追求個人的權威製造對自己的個人崇拜。

在此，趙打比喻說，過去封建皇帝為了傳世後代，永保家族江山不變，造就了一個傳世的家族體制。這種體制形成後，只有其家族的嫡親傳人可以做皇帝，也不論其年齡大小，由這個體制來保證皇帝權位的穩定性。不管誰當了皇帝，自然也都在維護並強化這個體制。

我說，這同我們共產黨的體制也有類似之處，只要秘書班子起好稿，無論誰處在這個位置，都可以在會上念。

台灣問題只能在和平民主的基礎上實行統一

我談到現在台海局勢很緊張，人們議論紛紛，據悉軍方主張是要打的，要動武（只要台獨勢力有所動作）。聲稱：要準備好打一次有把握的高科技局部戰爭。南京軍區作好了一級戰備，大有台海戰爭一觸即發之勢。1996年台灣選舉時，我們進行的是實彈演習，所謂「武嚇」並大罵李登輝，結果反而幫了李登輝的忙，使李登輝當選了；這次用的是「文攻」，尤其朱鎔基講得那麼凶，企圖影響台灣的選民，結果又幫了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陳水扁的忙，使陳水扁當選了總統。

^① 魯迅（1881—1936），浙江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左翼旗手，文學家、評論家、翻譯家、大學教授。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人。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曾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中央政府財總總、人大副委員長。

馬寅初（1882—1982），浙江人。教育家，北京大學校長，經濟學家。

^② 李遠哲（1936—），台灣人。化學家，美國博士，教授，科學院院士，1986年獲諾貝爾化學獎，1994—2005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

2000年5月13日

可見無論「文攻」或「武嚇」，都使台灣人民的心起了逆反作用。

我又說，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問題研究所一個負責人在一個座談會上有關對台的發言中聲稱：打台灣除了我們有核導彈優勢外，其他軍艦、戰艦，目前我們還沒有攻佔台灣的能力，而飛彈射擊目標能否準確，又很難把握，受害的還是老百姓。況且，戰爭打起來，對台灣各階層人民的心理傷害太大，幾代人不能恢復過來。並說：過去對西藏、新疆政策上的錯誤，所造成的民族傷痕即可說明。但台灣問題若這樣長期拖下去，又對中國有十個不利，諸如軍備負擔重、在國際上爭取一些國家不支持台灣所需費用加重等等。我認為江澤民還有在任期內急於完成統一祖國大業、來樹立自己形象的一面。

趙紫陽說：對台灣問題，我個人分析，不過是四種方式：

（1）海上封鎖，使台灣經濟發生困難，使其難以生存下去。但那樣，會引出決策上對外國商船能否採用封鎖？這很可能會引起國際糾紛，發生國際爭端，遇到國際上的聯合干涉。

（2）空中打擊，使其經濟癱瘓。但台灣空軍力量也相當雄厚，必對中國大陸新發展起來的沿海地區進行還擊，會使中國經濟發展也處於困境。

（3）武力登陸，攻佔台灣。但我們的戰艦力量還沒有能力實現登陸作戰；再說：這會使美國根據與台灣的〈關係法〉介入。1996年台海出現緊張局勢時，美國兩艘航空母艦的出動即可說明。

（4）利用導彈優勢予以征服。這為全世界人民、全中國人民的「民心」所不容，哪有對自己的同胞用導彈來進行毀滅之理，實為天理所不容，成為千古罪人。

趙紫陽感歎地說：我看誰也不敢下這個決心。

在此，趙紫陽又舉例說：就是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對日本廣島、長崎用原子彈毀滅了這兩個城市，死傷近二十萬人，迫使日本投降，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但到現在美國並不宣揚，並不理直氣壯，認為這不是光彩的事，因為這實際上是對人類的毀滅。

接著，趙紫陽又向我敘述了這次在四川成都，四川省的一位台辦負責人對他談的一個內部傳達，說這次一定要對台灣動武。趙紫陽說：當時，我就明確向這位台辦負責人說，這是領導上有意放出這樣的口氣，通過你們做這個工作的人的口說出來，使人們認為是可信的，可靠的，對台灣人民心理實行高壓，以影響台灣人民的選舉。這實乃是「心理戰」。

趙紫陽明確地向我談了他的主張，說：「台灣問題只能在和平民主的基礎上實行統一」。

他闡述說：那就是台灣不要搞獨立，中國大陸也不要搞統一。這樣，不統不獨，各自和平發展各自的經濟，都使經濟走向繁榮，都實行民主政治。這樣，既有經濟生活富裕程度的趨同，又有民主與法制的保障，對各自的所有權利都能得到保護；這樣，自然會走向統一，都願回到「一個中國」的立場上來。

這就是趙紫陽解決台海兩岸問題的方案。

趙紫陽又附帶說：就是對西藏也應當給以高度自治，那就是除了外交、國防外，統統交西藏人民自己去管理自己，讓他們自己去獨立地發展來發揮地方積極性。這樣快一點慢一點，他們也不會抱怨中央，中央政府也不背大的包袱。

我說：當政者目前在利用台灣、西藏有人搞獨立問題，在宣傳國外侵略勢力在分裂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統一，企圖以此來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情緒，以增強人民的凝聚力；同對，也轉移人們對民主改革的要求；這樣一來，民主改革的呼聲，就被民族主義思潮所淹沒，也就是說：反民主的勢力就是這樣利用中國人本能的排外性質的民族主義情緒，來抵制國家向民主現代化方向前進，結果吃虧的還是中國人民自己。

趙紫陽說：固然，中國受帝國主義百年的欺負、侵略，人們對這個創痛記憶猶新，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中，很容易激發起人們的排外情緒。但他又分析說：目前中國是一個大國，民族問題已經解決，被侵略、受威脅的時代已經過去；相反，周邊國家卻感到中國「威脅」。

2000年5月30日

因此，趙紫陽明確地說：激發起來的這種民族主義情緒並沒有現實感，只不過是利用了人們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心理狀態，這只能是喧嚷一時，起不了什麼大作用。

趙紫陽又深有感歎地說：台灣這兩次搞的是選舉，實行的是民主，是順從民意的，並不是搞台灣，當局沒有必要來進行「文攻」、「武嚇」。趙紫陽最後又說：就是前香港港督彭定康在港搞的立法委員選舉，雖然有他們的意圖，但其本身卻是民主的，也不能反對。

12 2000年5月30日

一切社會弊端淵源於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

5月30日這次，我是遵安志文一塊前往的。首先，我將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①，呈送給朱鎔基總理的一封含淚的上書交給趙紫陽過目。

我聽說，這封上訴信朱鎔基閱後，先是派人去私訪調查是否屬實，在核確屬事實後，朱才批轉給湖北省委的。我看過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農業部等幾個部門關於〈涉及農民負擔惡性案件情況的通報〉，由於鄉鎮幹部組織小分隊或動用武警到農民家中扒糧食、牽

^① 李昌平（1963—），湖北人，中南財經大學碩士，二十歲開始任農村黨委書記，2001年著書《我向總理說實話》，反映農民疾苦，震動全國。

牲口、搬家具、強行收繳財物、收取村提留款、鄉統籌款及其他稅費，不少省份都發生了致使農民自殺死亡的惡性事件，情況都非常悲慘。相比之下，我國五十周年國慶活動搞得空前浩大，只北京就耗資據說上百億元，如果全國各省市都加起來不知耗資有沒有上千億！

趙紫陽說，搞這樣大規模的國慶活動，耗資這樣多，只有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辦，其他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辦不到；首先人民不會答應，議會也不會通過，他們是有權力制衡的。

接著我又談了目前的腐敗也越來越嚴重，而且產生雇人兇殺的惡性事件。原河南省鄭州市委付書記張質彬，後調平頂山市工作，向我談及平頂山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李長河，因對一個鎮長呂淨一舉報自己心懷不滿，並擔心自己的「烏紗帽」不穩，就雇兩個殺手闖入呂淨一家將呂的妻子殺死，呂被捅刺十幾刀經搶救倖免於難。腐敗涉及的面的確越來越廣，職位越來越高，且金額越來越大，所傳廈門遠華走私案上千億元，而且是整體性、系統性的，也就是集體腐敗。所謂領導帶頭，層層分配，人人下水，個個沾光。實行股份化後，更是以股份的名義，把公有財產化為個人所有，中國人民幾十年來勒緊腰袋，用血汗積累起來的財產，被這些特權階層所侵吞。人民的心裏很不平衡，真是民怨沸騰。目前當局又是採取高壓政策，無論是對和平組黨的人士還是民間組織，只要認為是有組織的活動，就加以取締鎮壓。如對法輪功、中功就是這樣。但這是消滅不了的，從法輪功人員一再衝向天安門練功示威也可說明。因為這是一種信仰，這反而會使信眾信仰更加堅定。如有位醫生情願被開除黨籍也要練功。有位婦女離退休還有一年，寧願開除公職也在堅持，也有的寧願在派出所被拘留也要練。有些人是在拘留中受折磨死去的。

趙紫陽說，法輪功的特點，如同中功一樣，都是精神層面上的修練，講究「真、善、忍」，追求更高級的精神境界，而把外界的折磨，作為通向高級精神境界的途徑。基於這種信念，把受折磨、受鎮壓當成是修練的功課，當作是成功得道的必由之路，因此，它能吸引人。

趙接著說，目前社會上積累的矛盾確是越來越多，兩極分化也越來越大，形成了特權階層。尤其對腐敗問題，人們的不滿情緒越來越高。但目前社會上出現的一切弊端，皆淵源於鄧小平雖主張經濟上改革開放，卻又堅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是由這條政治路線造成的。〔我插話：無怪乎現在國外又在評論說：鄧小平這種「跛足」的改革開放路線要「崩潰」。〕中國的腐敗是制度問題，過去則認為是人員素質不好。在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也產生腐敗，那裏是私有制，財產不能隨便侵吞，而且有言論自由，能進行公開監督。中國則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抓住市場經濟這個機遇，大肆侵佔國有財產。改革越緩慢越拖下去，瓜分得就越厲害，腐敗也就越普遍，越嚴重，從而兩極分化也會越來越大，人民的不滿情緒也會越來越高，越來越激烈。

趙說，在這種情況下，江澤民是有危機感的，他就繼承過去的習慣，一靠槍桿子，二靠筆桿子來加強控制；同時，對民間組織也嚴加防範，實行高壓。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穩定，才能保持政權。但這樣矛盾會越積累越大、越深，如同一個氣球越吹越脹，又沒有一個出氣孔，到了極限，就會爆炸。因此，引起人們擔心：會不會發生暴亂，像義和團式劫富濟貧之路的重演？那將是中國人民的災難。談到這裏，趙轉向安志文：你看，江澤民在政治上高度集權嚴加控制，這條路走下去，前景如何？

安志文說，只要中國經濟能保持增長而不衰退，中國局勢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說到底，經濟改革實行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政治改革實質就是要改變一黨專政這個政體。

趙接著說：中國這個私有化是「黑箱」作業，是權錢交易，即所謂「黑金」現象。不是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這樣下去，國家人民所積累的財產就被這些特權階層私吞，時間越久，侵吞就越多；而這些人又與當局要求穩定，即穩定壓倒一切結合起來。

安說，現在實行股份化後，各企業經營層都持股，知識份子也在實行高薪，這些人的利益和當政者穩定要求都結合起來了。

趙說，這些人的利益和當政者的要求都一致，他們都要維持現狀，

維護這條政策路線，維護現存這個政體，並使改革向有利於自己既得利益的方向發展。

安說，過去江澤民強調政治，其涵義就是就是要聽江澤民的話。今年提出「三講」，就是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以進行控制。

趙說，現在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思想，就是要以維護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地位，來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這就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

安說，政治改革在中國如何進行？這個路怎麼走？許多國外專家認為，跟其他國家轉向民主政治都對不上號，在中國還沒有路。這些專家認為，中國走向民主政治離不開中國的傳統：一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傳統；一是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傳統。安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

趙說，中國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沒有一定的壓力，是不能轉上民主政治的。例如，南韓、印尼都是在反對派的壓力下，才能轉向民主政治的。目前在中國實行的村民選舉是無濟於事的。

安說，「六四」後，中國的政治改革停滯了，蘇聯、東歐事件更使鄧小平的政治改革發生倒退了。台灣國民黨的下台，當政者認為是蔣經國開放黨禁、開放報禁的結果，從而使中國的政治統治大大收緊了。

最後，趙紫陽說：我自己對政治改革的認識也是逐步變化的，開始認為中國社會矛盾多，人民素質低，不宜過早地進行政治改革。現在看來，政治改革如不同經濟改革同步進行，社會矛盾會更大，而這種矛盾的積累，會引起社會震盪。

13 2000年7月4日

蔣經國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

7月4日見面後，我首先說：據我所知，知識界現在不少人認為，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路線比較符合實際，事實上，它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分支，一個派別，他們在北歐諸國實行的結果還比較成功。目前西歐社會民主黨在人們的心目中呈上升趨勢，且紛紛上台執政；就是在東歐和俄羅斯現在所實行的，實際上也是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路線，並以此來改造自己的國家和黨。安志文上次在這裏談話時也提到，中國也應以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路線來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與黨的自我更新，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安還一再向我說，社會民主黨的主張，容易為中國人民所接受；因為是要實行社會福利政策，這與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思想所謂「均貧富」的平均思想相符合；而且中國人民這些年來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下，一直在反對資本主義，因此提高資本主義化，在人們的心目中不容易接受，而對社會民主黨就大不一樣。

對此，趙紫陽說：在中國目前實行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路線，進行社會主義的自我更新，轉向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目前既沒有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來進行新思維，提倡民主化、公開化，也沒有蔣經國式的人物來主動推動民主政治。

趙強調蔣經國是個了不得的人物，應該好好研究他。其他如南韓、印尼等國家，都是在反對派的壓力下轉向民主政治的，而蔣經國則是順應世界潮流，主動推行民主改革的。蔣經國曾受過國民黨長期的一黨專政的傳統教育，又受到蘇聯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傳統教育，卻能從這些舊的意識形態束縛下走出來，確實不簡單。談到這裏，趙又

把話題轉向中國的當政者說：目前江澤民是在一心維護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權力不能變，認為黨既然把權力交給我，自己無論如何不能把共產黨的權力丟掉，一切從保權出發。這就必然加強控制，只要認為是不穩定因素，都要消滅在萌芽中，同時，也就必然要實行高壓政策。所以，中國即便簽署了兩個人權公約，實際也不打算執行，只是表示個姿態，以樹立個人的「開明」形象，並以此來同國際社會作鬥爭。那就是，對外要求多元化；對內要一元化。

我說：歷史的教訓是明確的，清朝是在全世界工業化的潮流下，仍堅持「中學為體」，那就是專政體制不能變。結果被潮流衝垮，以瓦解而告終。原蘇聯，是在新的技術革命潮流衝擊下解體的。那麼，中國在目前全世界經濟走向一體化、資訊化的新時代，仍堅持「中學為體」所謂一黨專制政體不能變，是否會重新陷入前者的覆轍呢？這是我所擔心的。目前當政者的政策路線，政治上是倒行逆施。如在國際上，同南斯拉夫專政獨裁者米洛舍維奇^①相結合，稱其為人民的領袖、英雄，結果，其人在選舉中，一夜之間就被人民所拋棄。在國內，對異議人士、民間組織更是實行高壓，尤其對報刊，不准發表任何不同政見，不允許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出現，這種嚴格控制是前所未有的。

趙問我，目前大講江澤民「三個代表」的思想，其涵義到底是什麼？

我說，據我所知，「左」派說是在為「十六大」修改黨綱、黨章作準備，認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提法不行啦，階級的劃分也不行啦，生產力的代表將是知識份子，因此，江澤民要改變共產黨的性質，在搞修正主義黨。另一派認為，江澤民是要為個人樹「里程碑」，在搞個人權威，這樣一來，離江澤民「萬歲」就不遠啦。也有人認為共產黨發生信仰危機，是在為共產黨的合法執政地位製造理論根據。總之，

「三個代表」並沒有創意，沒有新的觀點。趙插話說，大概是為了鞏固共產黨執政的合法地位。

我又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不僅對蔣經國這個歷史人物要好好研究，對戈爾巴喬夫也應該研究。戈爾巴喬夫結束了冷戰思維，從而把人類社會的發展轉向了和平的方向。他解脫了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的束縛，提出要革新社會主義。雖然工作中有失誤，但他還是為了拯救社會主義。相反，在中國，無論毛澤東或鄧小平，都沒有擺脫封建專政意識形態的羈絆，都導致了晚年的悲劇。

最後，趙說：看來，中國的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固然不行；但是若不同文化結合起來也不行，須要有個文化啟蒙運動來清理中國這個基地。本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個啟蒙運動，要解決「國民性」問題，但被民族危機淹沒了。中國這塊基地不清理，正如魯迅所說，無論什麼東西放到這個大染缸裏面，都會變顏色。由於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意識形態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相結合，所形成的全面專制政體，實比歷史上任何朝代控制得都嚴密，可以說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談到這裏，我站起來準備告辭，正走出書房門口，趙又說：現在對我的管制又嚴了，並問我，聽說中央有個與此情況有關的通知發至縣團級，是否看到過？我說，沒有看到，回去查閱一下吧。

回來後，我陷入沉思，歷史潮流總會湧現出歷史人物來推動人類社會進步，並使其向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胡耀邦、趙紫陽不就是這樣的人物嗎？他倆是走出了舊的意識形態束縛要轉向民主政治的人物。遺憾的是被小平扼殺，夭折了。否則中國社會的發展將是另一種情景。儘管這樣，但我相信，這樣的人物一定還會湧現出來，這是歷史規律，是不可抗拒的。

^① 米洛舍維奇（1941—2006），1987年任南斯拉夫共產黨總書記，1989—2000年先後任塞爾維亞和南聯盟總統，發動三次戰爭，1999年遭北約轟炸，海牙國際法庭控其犯種族滅絕罪，暴死於牢中。

14 2000年10月18日

歷史總不能留下空白

10月17日是趙紫陽的生日。我邀同幾個老戰友去跟他一起過生日。他讓我們今天來（18日）。在談話當中我說：上次問及最近中央有個涉及你和「六四」問題的通知，是有兩個通知：一是6月4日〈中央宣傳部新聞出版署關於加強對涉及1989年政治風波內容的出版物管理工作的意見〉；一是7月11日又經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同意，以黨中央、國務院辦公廳名義又重新轉發這個文件的通知，並發到基層，這是事實。

據我所知主要是說，最近一個時期發現有少數出版物在涉及1989年政治風波和趙紫陽問題時，違反了中央精神。同時，在書刊、音像市場和互聯網上還發現一些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和文章，公然為所謂「六四」事件翻案，攻擊黨中央為平息1989年政治風波採取的果斷措施，貶損黨和國家領導人……

為此，大概提出：今後凡出版或發表涉及1989年政治風波和趙紫陽問題的書刊、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和文章、圖片，必須按照新聞出版署的規定履行備案程式，未作備案，一律不得出版或發表。

報紙、廣播、電視和通訊社公開發表涉及1989年政治風波內容的報導和圖片……未經審定，一律不得擅自發表。

對違犯規定，擅自出版和發表涉及上述內容的新聞出版單位，要堅決予以查處。同時，要對責任單位的有關責任人員相應的黨紀、政紀處分。

強調各級出版行政管理部門和執法部門，要把查處涉及1989年政治風波和趙紫陽問題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的工作，作為日常管理和「掃

2000年10月18日

黃打非」集中行動的重點；一經發現，必須立即收繳和取締，對製作、販賣此類出版物的單位和個人，要依照有關規定，嚴肅查處。對互聯網上出現的此類內容，有關部門要採取切實措施予以封堵、刪除。

對已經出版的或正在製作及計畫出版的圖片、期刊、音像製品和電子出版物，認真進行一次清理。對存在問題的一律封存銷毀。

另外，據稱：還規定十二個人（未列出名字）的文章各報刊不准登載。

我講了之後，隨口就說了一句：這就把趙紫陽列入「掃黃打非」的重點了。

趙說：據自己所知是外交部搞了個大事記，其中大概列舉了我任總理和總書記那些年，有關我在國內外的一些大事活動。江澤民看到了，作批示：要刪除、銷毀，不能有趙紫陽的影響。從而才引發了這兩個通知。

我說，大概也由於今年六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有北京黨、政、軍幹部參加的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曾脫稿講了這樣的話：近來黨內和社會上有人提出要為八九年那場動亂和趙紫陽平反，這是十分錯誤的意見……。中央早已有明確結論，這個案是不能翻的，今天不能翻，永遠也不能翻，要使它成為一個鐵案，誰也翻不了，根據這個精神，特又轉發這個通知。據我所知，過去在中南海已印製好的圖片畫冊，因有胡耀邦、趙紫陽的圖片，也都完全銷毀了。

趙說：我任總理八年，總書記將近兩年，這段歷史總不能留下空白吧。他又說，這樣做是沒有道理的。總之目前各方面控制都很緊，也是空前所沒有的。諸如加強報刊導向，實行輿論一律，不准有不同聲音出現；擴充武裝軍警進行統治，不准有組織的團體出現，「一切要消滅在萌芽中」；實行新聞封鎖，實際是在進行愚民。

記者稱：「江是世界上共產黨最後一位專政獨裁者」。

趙：「這些話是確實的」。

我說，社會最近傳言江澤民最近接受美國一個「六十分鐘」節目的

記者採訪。美國名記者華萊士^①對江說：您是世界共黨最大最後一個專政獨裁者。江答：你不瞭解中國國情，我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的，我在黨的中央常委會上也是一票。該記者回答說：我們美國有句俗話，鴨子它不承認自己是只鴨子，但它的叫聲、走相、行動就是個鴨子。弄得江澤民很尷尬。這些話不知是否確實？據說對江刺激很大。

趙說，這些話是確實的。據說，華萊士是個很厲害的記者，許多國家領導人都不敢同他對話。江澤民主動召這個記者，也是不容易的。因為這跟一般記者招待會不同，可隨問而過，避開自己不願回答的問題；但這個「六十分鐘」節目的採訪，記者對問題是要追問到底，逼你表態的。這次在華萊士一再追逼的情況下，江澤民認可自己對「六四」問題是同情學生民主要求的。這就同李鵬所定性的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拉開了距離。

15 2001年

2001年與趙紫陽多次談話的綜合記述

我記得孫中山曾說過：「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

^① 華萊士（1918—），出身俄裔猶太人之家庭。CBS大牌記者，以主持60分鐘時事節目聞名於世。1986年曾訪問鄧小平。2006年退休。

我認為趙紫陽就是這樣一位適應潮流，順乎民意，致力改革推動社會進步，實行人類社會現代文明而「求真、率真」的人。

從這些年我同趙紫陽的接觸談話中，他始終不離開思考中國走向現代文明新途徑的話題。他一再說，中國的一黨專政制度固然不行，但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也不是理想的制度；他很欣賞孫中山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主張，對資本主義實行又利用又限制。他又聲稱，經濟上固然不能烏托邦，這是我們的歷史教訓；但政治上也不能烏托邦，實行民主政治、多黨制應具備一定條件。他對孫中山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認為有一定道理。趙對我說：孫中山雖然離開我們已半個多世紀了，但他的這些思想仍然是光輝的。

使我感到趙總是在思考探索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途徑，這從他提出的今後社會的發展是否不以這個主義那個主義作為先進與否指標，而應以社會綜合指標作為先進與否為標準的主張，也可說明。

趙在談到中國走向現代的文明時，他一再強調說，不治理中國這個基地不行，不解決國民性問題不行。由於中國人民長期生活在專制統治下，國民性中形成了依附性，容易信賴權威，卻不相信自己，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所謂「奴性」。再加上我們過去一直強調集體，強調服從，即所謂的「馴服工具」論。這就必然全面束縛了人性、個性的解放，國民性中缺乏自由、民主、人權觀念。趙引用魯迅的話說：無論什麼東西放到這個染色缸裏而都會變顏色。因此，他提出，在中國需要有一個新的文化啟蒙運動。

我理解趙紫陽之所指，即中國人民的這種劣根性已深入膏肓，必須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要治本。從而才能使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行列。

趙回顧歷史時曾對我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個啟蒙運動，但很快被民族救亡運動淹沒了。他認為當時新文化運動宣導者也分化了。如梁漱溟^②等轉向了儒家學說，提倡東方文化；而陳獨秀、李大釗則

^② 梁漱溟（1893—1988），廣西人。國學大師，三十年代倡導鄉村建設運動。1953年遭毛澤東當面批評並整。

轉向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只是胡適^①等人仍堅持「西化」，嚮往西方資本主義，但胡是弱勢。從而這次啟蒙運動夭折了，使中國也失掉轉向現代化的良機。

趙聯繫現實談到，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由於窮國、富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民族工業受衝擊，南北差距拉大，兩極分化，從而出現了「新左派」思潮。它以保護民族工業，以維護國家主權為名，以強國富民為由，來抵制全球經濟一體化，抵制中國走向現代世界文明。針對這種情況，趙的看法很明確：這種思潮很容易觸痛中國百年來受侵略被欺負所沉澱的民族主義傷疤，從而點燃狹隘民族仇恨情緒。而這又易於同當政者想以反對「西化」、「分化」來增強民族凝聚力，以團結內部來保持穩定鞏固統治的需要相適合，使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努力再一次受挫折。因此，趙曾說過：民族主義將是最大的威脅。

趙明確對我說：所謂現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要同西方現代文明融合；東方文化是落後的，是開不出自由、民主、人權之花的。當然，也要同本國優秀文化相結合。趙認為美國這個民族值得很好研究。這個國家經濟上一直在增長、繁榮、發展，高科技又一直領先，社會是穩定的，國家領導人也是一直穩定交替的；對外並不進行領土擴張，搞殖民地，而是開展自由貿易。當然，他們也是從自己國家利益出發，這主要由於這個民族的價值觀與憲法制度根植於人心。

我說，我認為美國這個民族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是符合人性，符合人類社會的理性要求，也是現代世界文明的核心。在我看來，立國二百多年的美國在一紙白紙上畫了最美最好的圖畫，顯示了她一直在高舉自由、民主、人權的旗幟，一直在推進世界政治、經濟、科學文明的發展。趙說，美國這個價值觀是符合人類社會走向現代文明要求，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利益的。

^① 胡適（1891—1962），安徽人，1910年留美，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1917年回國，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曾任北大教授、駐美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長，中國自由主義先驅，著述甚豐。

趙紫陽還談到，所謂「三個代表」，從國際範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趙不無幽默地說了一句：這樣，有人一定會說我是賣國主義，但這卻是客觀的現實。

趙還擔心：這種「新左派」所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走上軍備競賽的道路，把中國拖垮。他說，原蘇聯就是這樣被拖垮的。他說，所謂武力攻台，實際是要同美國搞對抗，目前我們還沒有這種條件。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是美國在主導世界。就是聯合歐盟，拉攏拉美，企圖制約美國，也不是高明之舉。同美國搞好關係，乃是戰略利益。美國對外並沒有領土野心，主要是發展貿易；求經濟利益，當然，也想推廣他們那一套民主制度，這同過去的德國、日本、蘇聯不一樣。

他作了這樣的一個表述：經過自己這一時期的思考、觀察，二十一世紀前半世紀或者說至少前三十年，主導世界的仍然會是美國，其他無論歐盟和日本都起不到這個作用。至於俄羅斯、中國更不用說了，這是客觀情況決定的。因此，中國要發展，必須跟美國搞好關係。他說，鄧小平就是從這一戰略高度來處理問題的。他舉例說，從美國大使館放走方勵之，即可說明。只有鄧小平才能作出這樣決定。鄧認為不能跟美國搞對抗，只有跟美國搞好關係，才能發展好經濟。

趙還說到，要同美國搞好關係，必須爭取美國人民，因為美國政府的政策路線受美國人民所影響，所制約。為此，必須在美國人民面前樹立中國的好形象，而無論美國人民或美國政府，對民主、自由和人權，對專制都是敏感的，這是他們歷史形成的理念。認為中國是專制國家，他們認為專制主義的特徵，就表現為對人權沒有保障，對外則是擴張侵略，由此認為中國的專制就是一種威脅。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障世界和平發展，才能使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所以，無論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都不能容忍一個專制的國家發展起來。

趙紫陽不止一次對我說過，中國不轉向民主政治，也是違背世界潮流，違背人心的，首先腐敗無法解決。

我曾向趙提問過，你過去也受到封建意識形態的熏陶，又經受無

產階級專政意識形態的長期教育，但你卻從這種舊的意識形態走出來了；你這個思想是怎樣變化過來的？他說，我有兩條：一條是不拘泥於教義，而是注重現實，關心民意，觀察潮流。所謂「潮流」，也就是「民意」，也就是人們的需求；這一直是指導自己行動的根本出發點。他又說另外一條是：不擅權、不搞個人權威。

這就使我進一步認識到，趙紫陽要把中國轉向現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其來源和本質了。

以上所述，是2001年這一年間多次談話的主題，由於內容相近，故我對趙紫陽觀點的作了以上幾點綜述；我認為都是涉及中國走向現代世界文明一些重大問題，也是有關中國前進方向道路的發展前途和命運問題。追記於此，以供讀者研究參考。

16 2002年1月27日

關於中國的文化傳統

我首先將安志文的看法作了如下轉述：中國今後五十年有可能轉向民主政治，因為歷史潮流是任何人阻擋不了的。一黨政治只剩下中國、越南、朝鮮、古巴了。對江澤民則不抱任何希望，他是權迷心竅，搞個人權威，為個人樹碑的。他身邊的人認為江是在搞平衡。其實江是要權術，外邊的人說江是拉幫結夥。國外人固然對李鵬不看好，但

對江印象也不好；卻對胡錦濤、溫家寶^①印象還好。

安說，這次江澤民在美國購買個人專機一事，花費了這麼多錢不說，還被人家安裝了一套竊聽器。這個「醜聞」，如果允許言論自由公開出來，江就得下台。這次中央全會江主動退下來，對江本人說是好的，不管如何在他任期內保持了穩定，經濟高增長。如果垂簾聽政，江沒有這個資本。就是今後，無論誰當主席、總書記，也沒還有個資本。

安還說：所謂潮流不可擋，從現代歷史看得很清楚。二十世紀初發生的工業革命，繼而引發的中國人民救亡浪潮，把清朝推翻了。二十世紀後期發生新的技術革命，把蘇聯瓦解了。現在則是經濟全球化，自由、民主、人權乃是世界主流，這種新的國際潮流不是哪個人、哪個國家所能阻擋的。從世界近代歷史看，歐洲的啟蒙運動動搖了中世紀黑暗統治；後來的文藝復興，提出來的自由、平等及天賦人權觀念，產生了人文主義，西方的這一文化傳統把人類社會推進現代文明。

中國是幾千年專制主義，根深蒂固，沒有個性解放，沒有民主、人權概念，雖然梁啟超提出啟發民智，陳獨秀提出民主與科學，但被民族救亡及此而產生的國民黨專政，以及1949年後我們的專政，長期壓下去了。中國始終沒有擺脫儒教思想統治，幾千年搞人身依附，毛澤東又提出「馴服工具論」。安志文感歎地說，反思起來，我們大家都成了毛澤東的工具，這就是中國人的文化傳統。

在中亞、北非地區一直是神教統治，巴比倫、埃及、猶太、突厥族等都信神信上帝，或師法耶穌，後又分裂為基督、天主教新舊兩大派。接著發生宗教戰爭，十字軍東征。另一方面，伊斯蘭教又宣導為「聖戰」而死，這是這一特定地區的文化傳統。

馬克思學說創立時，也是有各種派別的，馬克思是承認派別存在的。只是到了列寧，在那種極其嚴重的戰爭環境下，逐漸搞成一黨制，不准派別存在，形成了極權主義。實際上執行的是各級組織專政，最

^① 溫家寶（1942—），天津人。1965年加入中共，1986年擔任中辦主任，2002年任政治局常委，2003年任總理。

後發展成斯大林的絕對個人專政。毛澤東也大搞個人崇拜，說「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不能丟」，從而發生悲劇。

安志文還說，是陳獨秀最早提出斯大林問題的實質不是個人品性問題，而是制度問題，是一黨專政的制度造成的。中國卻搬來了這一套「一黨制」，不准其他派別獨立存在，不能有言論結社自由，大搞思想控制，連清朝、袁世凱、蔣介石時代都不如。中國的知識份子被整肅得都不敢說話，不敢觸及政治改革，謹小慎微，沒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思想。有的人下海，有了高收入，就被既得利益化了。江澤民又實行高壓，被壓的知識份子只能處於弱勢。

外國學者評論說，中國只搞體制改革沒有出路，實際是制度問題。「一黨專政」權大於法，民主憲政就實現不了，改革難有推進。在這種文化傳統、政治控制下，即便搞些改革也都變形，無論過去的聯產承包、股份制改造，金融改革，鄉鎮企業，公司治理都不行。

趙紫陽對安以上觀點評價說，正如魯迅說的，中國這個舊的文化傳統，什麼東西丟到這個染色缸裏都會變顏色。也就是說在這種專政體制下，由於黨控制一切，政府干預市場，什麼「好」政策出台都會變樣。

我說：杜潤生在你對美國的看法上有不同意見。你上次曾談到美國是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政治，你說雖然是從他們本國利益出發，但卻推進了人類現代文明，與人類社會發展是一致的。杜老認為美國是在搞霸權，對台灣就說明這一點。我說，由於中國百年來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又加上過去多年的「反美」教育，中國人民尤其知識份子，對民族主權國家觀念是很強烈的，對美國的政策看法也是敏感的。

17 2002年2月23日

我對趙紫陽思維方式的一點感受

這次見面，我首先將此前與他〔趙〕十餘年間談話整理複印的材料交給他一份，並說按他的指定，給了杜潤生、鮑彤等各一份，我自己保存一份。同時也轉告他，杜老表示一定尊重你的意見，不再搞另外摘錄印發。隨即又轉告了杜的另一看法。杜老說，有了這個談話材料，從歷史的角度看，人們對你的整個歷史就更清楚更完整了。過去你在廣東、四川地方工作的情況和作為，人們都清楚，在中央執政十年人們也清楚，至於你對「六四」問題大家更清楚，唯獨「六四」後被軟禁這些年，人們對你的情況就不瞭解了。

我說，杜老還要求對他過去向你提出過的關於社會主義更新、黨的更新問題，進一步聽聽你的見解。中國社會究竟應怎樣向前發展？杜老認為你現在有時間、有精力，也有智慧，在這些問題上想得到你的幫助，聽聽你的看法。

趙紫陽說，我對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已不感興趣，而現在的時代很難建立什麼理論學說。從社會的歷史發展來看，本是個自然過程，是根據實踐發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根據民意一步步向前發展。民意就是人們內心裏的真正的需求，當然在實踐中間會有曲折，而不是靠什麼理論、主義或設計來推動。過去正是靠理想的設計，從而走上了空想、烏托邦。趙說，他很欣賞顧准提出的走向經驗主義。

我理解從人的需求出發，作為動力來推動社會發展，這就回歸到人性上來，這也就改變了、擺脫了從商品物質「物」的追求出發，用邏輯推理出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動力的正統觀點。

趙接著說，資本主義社會是在自身自發發展中，逐漸自我調整，

逐步自我演變向前進步發展的。而這關鍵在於要啟發民智、民意，要有言論自由，互相爭論，互相啟發，發展創新思維。如果過去資本主義搞專制不允許不同意見，就出現不了凱恩斯。資本主義社會也就不能向前發展。至於中國的問題，關鍵就在於一黨專政，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就是一黨政治不能變。也就是說，過去是毛澤東，鄧小平，現在是江澤民的權力不能分享。當然，一個國家轉向民主政治，會有代價，會發生動盪。目前的南韓、印尼都是經過動盪後轉上民主政治的，俄羅斯也是如此。台灣國民黨轉上民主政治由於有個蔣經國較好較平穩。德國是在外力幫助下轉上民主政治。英、美、法是早就都轉上民主政治的國家，這都是歷史潮流。過去列寧在俄國革命後沒有轉上民主政治。孫中山國民黨在中國也如此。毛主席執政這幾十年更不用說了。

我的看法，客觀的事實是：凡是既搞市場經濟又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都會繁榮富強，社會穩定，過去的英、美、法是這樣，後來的德、意、日也是這樣，就是目前的南韓、台灣也是這樣。凡是既實行市場經濟，但又實行專制的國家，都走向腐敗，成為腐敗的市場經濟，引發社會矛盾動盪不安，無論拉美、印尼、中國均如此。我說，不少人在議論北歐社會民主黨，為之嚮往，希望我們中國也走這條路。

趙說，目前這也不可能，中國還沒有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來推動，去實行民主。目前進行的所謂憲政民主、漸進民主改革也是空話。當前社會腐敗這樣嚴重，貧富懸殊這樣厲害，當政者又實行高壓政策，矛盾的積累會不會導致義和團式的暴亂，王力雄^①所提出的「經濟文化大革命」看法是有道理的。當然，義和團式的劫富濟貧，這是人們所不願看到的，如果真發生，到那時我們這些人也都會受牽連。

最後我以杜老的名義向趙發問：你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思想是怎樣產生的？

趙說，轉告杜老，我不拘泥於馬列主義的教條、公式、定義，而

^① 王力雄（1953—），山東人，自由作家、民族史專家、環保學者。1991年出版《黃禍》，1998年出版《天葬》，主張遞進民主論。

是重視實踐。自己強調的是要立足當前實際情況，尊重民意，認為民意就是潮流。當然，必須反思歷史，尤其要認識清楚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歷史同現實是緊密相關聯的。這樣，我才體會到趙紫陽的思維方式的實質是開放型的。他這種思維方式使他善於接受新事物。每次談話，都感到他思想清晰透明，談事談問題，中肯可信，使人樂於接受。他的想法是，只有在不同派別爭論中才能發現新觀點，正是如此，他的思想才能不斷向前發展。

臨別時，趙又特別對我說了一句：自己的歷史到「六四」就是句號了。下台後這些年的談話談不上什麼主張和意見，也不是理論上的系統闡述，只是些零星的思考和隨意談話。至此，我才明白，他為何意欲要把這十幾年的談話材料「束之高閣」了。

最後，他囑託我瞭解一下，杜老有什麼新看法。

18 2002年5月8日

關於經濟危機能否演變為政治危機問題

今天我將杜潤生關於經濟問題能否變為政治問題，也就是說經濟危機能否演變為政治危機的看法先作了轉述。

杜老說，目前中國首先是金融危機，銀行呆賬壞賬這麼多，政府靠印刷票子把負擔轉嫁到老百姓身上，國有企業改革實行的債轉股，

實際就是借錢不還賬。工業品賣不出去，農民生產的糧食也賣不出去，醫療改革、教育改革，還有養老金，都是掏老百姓的腰包。有點錢的人也不敢輕易化掉，有資本的人由於利潤少也不投入。富豪暴發戶則是資金外逃。政府搞的形象工程、高速公路投下的款也收不回來，目前中國財政赤字已高達三千億，為世界第一。如果外國銀行介入，會擠兌中國銀行。所謂刺激內需也刺激不出來。

機構改革實際上是變相增加公務員人數，城市失業人員、下崗工人的生活保障線各地兌現不了。目前失業人員城市達百份之十，加上農村百分之五十剩餘勞動力，改革的代價都壓到工農身上。東北大慶油田、遼寧遼陽工人大示威事件中，有一千餘人退黨，還開工會組織自己的聯合工會。這說明我們過去依靠的核心力量已開始反叛，這是過去沒有的事。蘇共的垮台就是這樣發生的。在蘇聯改革出現了權貴資本主義，出現了所謂權貴階層有十萬人，加上七大大巨頭，掌握國家經濟命脈，資金又大量外逃。在中國，也將如此。蘇聯的今天可能就是中國的明天。中國政府現在用權力主導經濟，保證經濟百分之七增長，一旦增長滑坡，一切難保，危機就會爆發。但中國執政者江澤民卻自我感覺良好！至於危機什麼時候爆發，以什麼方式爆發，目前還看不出來。

我接著轉達了安志文的看法。安認為危機確實存在，但只要經濟增長，還可以維持。他說，目前全國群眾集體上訪增多，面也廣，而且是有組織的集體維護自己的權益。據說也有民主黨的介入。為此四月上旬中央常委專門發了通知。安認為在恐怖主義和民族主義抬頭的情況下，在江澤民穩定是首位的方針下，搞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又將體改委研究會秘書長石小敏^①去各地觀察的觀感作了介紹。石說，目前的改革對象主要是政府。由於加入WTO，是國際市場運行規則來推動中國政府必須進行改革。在國內是民營企業在推動。民營經濟已擴大發展起來，民營業主比例一直在上升，民間金融在掘起，關係好就與政府合作，不好則遠離，民營企業不受政府限制。如這次

^① 石小敏（1950—），北京人，中國經濟改革研究會秘書長。

全國選出來的民營十大企業，皆是民營企業自己聯合組織辦理的。這次江澤民、李鵬到南方，就曾去浙江溫州民營企業家那裏參觀「朝聖」，這就表示對這種形勢的完全肯定。沿海地區也並不依靠政府，只有西部地區才依靠政府，而西部要發展只有加入東部地區市場經濟大循環，如同中國要發展只有加入世界市場經濟大循環一樣。

石小敏認為中國的民生問題已基本解決，現在發展到民權問題，人民要求維護自己的權力，要求政府少干預。他說，國家的公有資產瓜分的差不多了，產權已經明晰，只差法律上還沒有保護私有財產所有權。這樣一來，政府掌握的資源就會越來越少，成為弱政府，使政府的權力走向衰退，這就逼得政府只有走改革之路。現在的省、市領導幹部都是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又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響。因此，他認為五年內中國有可能轉向民主政治改革。

趙紫陽說，經濟危機的提出是人大一位搞財經的代表的函文，這說明現已為人們所認同。由於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專政體制下進行的，缺乏透明度，沒有監督。中國幾十年來被積累起來的公共財產，被權貴階層內外勾結所侵吞，表面看來繁榮，其實是虛假現象，已形成的兩級分化越來越嚴重，實際上社會危機在發展。而當政者江澤民又不轉向民主去緩解，相反採取高壓手段，從而使社會矛盾積累越來越大，而且形成惡性循環，這就會引發政治危機。如同汽球越吹越大，終究要破裂。這就是王力雄所稱的：底層毛澤東與「經濟文革」，將形成大災難。至於何時爆發，採取什麼形式爆發，現在看不出來，也很難預料會發生什麼樣的突發事件。

此時，趙接著又說了一句：我對江澤民轉向民主政治不抱任何幻想。

我說，最近普京^②提出，向美國學習，就是學習勝利。又說，只有融入歐洲，俄羅斯才有發展。匈牙利的發展是靠引進外國資本，但

^② 普京（1952—），聖彼得堡人。曾任KGB、國安局長、總理，2000年當選俄羅斯總統，2004年連任。

我國有人認為外國資本湧入是為了佔領中國市場，勢將淘汰本國的產品。

對此，趙說，中國不要考慮什麼民族資本、外國資本了，中國人多資源少，不融入外國資本，不利用國外資源、技術，中國經濟是發展不起來的。東歐、俄羅斯想融入利用外國資本而不得，因為條件不夠。中國的發展離不開美國，如果美國經濟衰退，發生像1933年那樣的危機，中國經濟也會垮的。

對安志文提出的，只要經濟增長，中國還可以維持的看法，趙說，看什麼樣的增長，公路建設資本收不回來，工廠生產產品賣不出去，這樣的增長也是虛假的，如同大城市的吃喝繁榮一樣。中國靠政府的財政赤字搞增長是支持不下去的。

我說，杜老曾給你出過題目，你表示對馬克思主義更新，對這主義那主義不感興趣。杜老又提出對過去黨的傳統問題，想聽聽你的看法。

談到傳統，趙說，所有制問題不能單純的孤立來談，必須同生產力聯繫起來，應以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為出發點。國有制肯定是失敗的，馬克思所指的所有制是反對壟斷，並不反對個人所有制；公有制必須量化到個人，即所謂股份或股份合作。但公有制與國營公用事業也不同，不能相提並論。

趙最後說：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就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權力壓倒一切，共產黨要統治一切。

我補充說：江澤民是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來剝奪廣大人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權利，來打擊迫害不同意見者和不同政見者。

臨別，我說：杜老對你有個評論：趙紫陽的下台乃是中國的悲哀！

19 2002年6月22日

趙紫陽表示中共十六大不再表態

這次見面，我說：今秋要召開中十六大，不少學者希望你有個態度，向人民表示一下自己的見解。對此，我曾徵求了安志文的看法。他說，不反對，如果要寫，也要避開「四項原則」，「六四」也不要提。但實際意義不大，上次十五大趙紫陽寫了建議信，被江澤民封鎖，且又進一步軟禁予以治罪，江心胸狹隘，報復心強。這次也會同樣嚴厲對付趙紫陽。再說，也不會推動江澤民轉向民主改革，最近出了一本《中國即將崩潰》^①一書，再加上金融危機，銀行呆賬、壞賬這麼多，外債、內債已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四，當政者有危機感。他們認為蘇聯共產黨、台灣國民黨丟掉政權的教訓是搞了「民主化」。雖然江澤民最近在政治上講了許多好話，但都是空話，沒有措施，只是表示個姿態給外國人看，實際內部控制很嚴，連王若水的追悼會都不准開，許多人被監視，還開出黑名單；今天這個人不能見電視，明天那個人的文章不准見報紙；他們目前又在搞排隊，看有哪些不穩定因素，要進行控制。

安還說，江澤民不會搞政治改革，也不敢搞，中國漸進式的改革將轉為劣勢。蘇聯的激進改革將轉化為前進，走到中國的前面。安堅信中國一定會轉向民主，一黨專政一定搞不下去，「六四」一定會平反。

安最後還談到所謂政治，實無道理可言，實際乃是利益問題，也

^①《中國即將崩潰》，美籍華人律師章家敦2001在美國出版的著作，批評中國的虛假繁榮，預言十年內必將崩潰，台灣有中譯本。

就是權力問題。如毛澤東對待劉少奇、彭德懷、高崗^①就是這樣。〔我理解，安志文所言的含義是指目前對待趙紫陽、鮑彤都是冤案，但就是不給平反。〕

趙說，向十六大建議，不提「六四」問題，等於說自己態度改變了。不提「四項原則」，只提適合當政者口味來談政治改革沒有什麼意義；如果只談腐敗問題，那就會一般化；如果從「危機」來談，其中深層問題，目前還說不清楚。因此傾向於這次不寫建議，而當局也生怕我表態，因十五大那個建議國內外震動很大。

江澤民的最佳選擇問題

在談到十六大班子人選時，趙紫陽說，看來江有三種選擇，一是自己全退，這是最佳選擇。江執政這些年沒有出現大問題，經濟又增長，是最好時機。二是垂簾聽政，這是壞的選擇，對他不會有好的結果，因為他沒有鄧小平那個威望。從歷史上來看，誰也不願意甘當二皇帝，和後台的人會發生矛盾，再說軍隊也不會買賬。三是再把總書記兼起來，這沒有合法性，等於修改黨章、憲法，必遭國內外反對。

在談到十六大班子人選時，趙說，胡錦濤在西藏工作時同他談過話，該人比較穩健講實際，上台執政還是好的，不至於採取高壓政策。過去在貴州、西藏工作還不錯。至於溫家寶恐不敢擔責任，如怕事。這樣，就很難有什麼作為，但都是守本分的好人。

最好由美國主導人類社會

當我談到俄羅斯的改革可能走到中國前面，普京的戰略眼光又從獨立強國轉到發展本國經濟利益時，趙紫陽說，俄羅斯倒向美國，融入歐洲（東歐也在排隊融入歐洲），來發展經濟謀取本國利益，這就淡化了同中國的關係。美國也是從謀取本國利益來發展對外關係的，

^① 高崗（1905—1954），陝西人，1945年任中共政治局委員，1949年任中央政府副主席，1954年被整肅自殺而死，1955年以反黨罪名開除黨籍。

但是他們發展本國利益是同人類利益相符合的，因為他們不但發展對外自由貿易，而且還受他們本國人民價值觀的支配，那就是還要推行自由、民主、人權，這就與人類社會實現現代文明相一致了。

趙說，如果人類社會發展需要有個主導的話，那麼，由美國來主導，比蘇聯，比中國來主導要好，更不用說德國和日本了。因為美國沒有領土野心，不搞殖民地。

我認為這就是趙紫陽的全球化眼光，擺脫了各種主義和民族意識形態的束縛。他是從人類社會共同走向進步，使人類社會實現現代化文明為出發點的。

此外，當我談到中國社會發生危機的看法時，我說杜老的看法是，只要有飯吃，中國農民有耐性，政府又有強大的控制力量，不至於亂。楊啟先的看法是，危機確實存在，深層次的矛盾如金融、農業、就業、腐敗等一個也沒有解決，越到下層越嚴重，但危機三、五年內不至於發生。

趙說，《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作者認為，中國人對中國入關後受到的衝擊認識不夠，且無準備；只要外國銀行進來，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中國人民把錢轉存到外國銀行，中國就受不了，現在中國是封閉作業，錢不夠就印票子，呆賬壞賬、內外債這麼多，已超過國民總產值（九萬億）的百分之十四，再加上失業、下崗、腐敗，民怨沸騰，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這樣嚴重，如果下崗工人、民工、農民結合起來，像義和團那樣揭竿而起就不得了。而中國又不像外國那樣有反對黨主導，可以控制局面，這將是中國的大災難。

趙說：他同意香港一份雜誌提出中國社會現在是革命與改良賽跑的看法，不改制就會爆發。並舉例說，滿清末年，雖然在進行改良（當然是被動的）但來不及了，被革命所摧垮。這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他也同意北京大學孫立平教授提出的，中國社會已出現斷裂、斷層的看法。

20 2002年8月25日

中國的危機已浮上水面

首先我說，安志文贊成你這次不向十六大提建議，杜老也是這個看法，認為採取放開胸懷靜觀變化的態度好。中國一定得變。安得知的一個情況是：朱鎔基曾提出趙紫陽的問題應當重新考慮，李嵐清表示可以研究，李鵬則堅決不同意，聲稱，趙的問題如果重新考慮那就是開除黨籍。安說：這說明他們內部有不同看法（一般認為這情況是可靠的，只是沒有核實，供參考），新班子上來可能會有新變化，因為胡、溫都不是強硬派。

安認為當政者感受到的民主改革的壓力，外部比內部大。反恐後，世界形勢變化很大，布希採取大國聯合共同反恐，但合作的基礎是要具有共同價值觀——自由、民主、人權的，這就跟中國的現狀相矛盾。普京要融入歐洲，提出向美國學習，向西方靠近，這就使中國很尷尬。這次布希與江澤民在私人農場會面，也是在說服江實行民主政治，促使中國演變。

安還說，誰也未料到俄羅斯會出現普京這樣的戰略家人物。中國的江澤民搞權貴資本主義，搞腐敗的市場經濟，政治上又實行高壓，比國民黨還厲害，對法輪功的鎮壓是他的一大失誤。現在他又搞個人崇拜，太過分了，引起所有老同志反感；全國上下對他印象都不好，都希望他退下來。人們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所造成的悲劇記憶猶新。安強調說，大家都知道，這是體制造成的，中國這個體制不行，不讓有不同意見，抓住幾句話就大搞清算、打擊，弄得人們都不敢說話。

趙紫陽針對安的想法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總結

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認為民主國家一般不會發動戰爭，專制主義國家才發動戰爭。他們認為為了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必須改變專制主義國家的體制與制度，使之向民主化方面發展。當然這也是從他們本國利益出發，但可以促進世界和平，這與人類利益是一致的。

趙又說，中國民族主義情結是很大的，這是由於中國百年來受帝國主義侵略沉澱下來的，根深蒂固。這次南斯拉夫戰爭，中國大使館誤炸，引發了全國人民的反美高潮，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民族主義情緒對中國的經濟和平發展將是一個不利的危險因素。而目前出現的新左派也在鼓吹民族主義情緒，這必將同目前當局利用民族主義來增強國家凝聚力相結合起來。主張新權威主義的人又聲言，正是有了「四項基本原則」才保持了中國的穩定。現在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也要求穩定，總之，這些思潮都結合起來了將成為主流。而工人、農民、自由主義經濟學者都被邊緣化。但極左派卻對工人、農民有影響，也有基礎。

最後，我說，安志文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如果滑下來，中國就會亂。但杜老認為亂不起來。

趙認為，中國的危機已浮到水面上來了。隨即取出《戰略與管理》胡鞍鋼^①的文章，文中指出：中國目前的幾個「最」：貧富懸殊已達最大化，失業率達最高峰，腐敗最厲害等等，給我念了一下。我說，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獎綱^②這次去新加坡開會，認為中國不會崩潰。趙說，這次李光耀^③邀獎綱去新加坡，是作為《中國即將崩潰》作者的對立面來請的，是被視為中國官方的代表去發言的。

① 胡鞍鋼（1953—），遼寧人。經濟學家。曾在黑龍江插隊務農，文革後留學美國耶魯、香港中大等學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主任。

② 獎綱（1953—），上海人。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教授，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③ 李光耀（1923—），華裔新加坡開國總理，現任內閣資政。

21 2002年10月1日

思想觀點不一致容易引起不愉快

國慶日前，趙紫陽給我打了電話說：國慶日放假可以到他那裏去玩，我就邀請了同趙紫陽很熟悉的老部下張策同去。張曾在中央組織部調配局工作，鮑彤作趙紫陽的秘書就是他推薦的。張策正統思想比較重，認為毛主席那一套路線是還是正確的，無論是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主要還是對的，對毛主席可以說一直是崇拜的，但張確實是個正派的好人。

今天我們是在趙紫陽的住房和他的老伴梁伯琪坐在一塊來敘舊閒談的。因為戰爭年代我們都在一塊相處，所以這次彼此也都無拘無束如同家人一樣聊天，但談的都是歷史上的往事與目前生活上的一些小事，對政治、政策與路線方面的問題則一概沒有涉及。

梁伯琪比趙紫陽大一、二歲，她身體狀況不好，已大顯病態了，生活也難以自理，必須有人照顧。雖然有一個女兒在一塊住，但女兒上班很忙，每天很晚才回來。趙紫陽也說平日裏一般看不到她。

臨別時，趙紫陽約我過幾天再來，他後來跟我說，思想觀點不一致，交談不起來，容易引起不快。他說，他同張策談話一般不涉及政治，只談往事和生活上的事。他也坦率且親切地當面對張說，咱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上可能不一致。

22 2002年10月5日

胡績偉建議突破軟禁，趙十六大不表態

開頭我就說：前幾天胡績偉要我去他那裏談一下。他說，中國目前這個局面，總得生法找個突破口。首先應當使趙紫陽解除軟禁。因為趙是面旗幟，這樣可以緩解鮑彤處境，進而影響「六四」，應該這樣一步一步來推進。胡建議，這次中共十六大趙紫陽要表個態，重點不在「六四」，也不在政治民主，這些只是一筆代過，重點談軟禁問題。要根據黨章憲法據理力爭，因為自己還是公民，還是個黨員嘛！以求得大會的同情。

胡還說，同時趙紫陽也要申述，自己雖然不同意對「六四」的作法，但並沒有組織活動予以反對，只是感受到自己不能勝任，而提出辭職，只因提出不同意見就遭到軟禁，這是從根本上違反黨章黨規的，還以緬甸軍人專制政權對昂山素姬^①不久前解除了軟禁為例，作個對照。

我將胡的意見轉述完後，趙反問我：這樣做究竟能起到什麼作用？你的看法呢？

我說，胡績偉這個觀點還是可取的，特別是與敏感的「六四」問題分開，可能有利於軟禁的解決。

趙說，關於對我軟禁這個問題，我曾寫過很多信了，當政者聲稱：這不是軟禁，乃是為了安全；又可外出，又可打球，沒有軟禁。當政者認為正是對我採取了這樣的措施，才使局勢得到穩定，這是個大成功，不然就不得了，因此，他們不可能解除。給他們施以壓力也沒有

^① 昂山素姬（1945—）女，緬甸政治家。1989年領導非暴力民主運動，被軍政府三次軟禁至今。1991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用，就是布希這些人也只能是向中國呼籲，施壓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當政者認為這樣做對中國的控制才能運用自如。當局又力圖將一切反對聲音，消滅在萌芽中，對內外反對意見都頂住了，認為這是他們成功之所在，所以解除軟禁是突破不了的。

趙接著說，如果這次我給十六大提建議只談解除軟禁，份量也太輕，對「六四」問題一筆而過，會使人認為趙紫陽的觀點變了，對政治改革只按當政者意見來寫沒有意義。搞建議，只能一次比一次深刻才行。這就必然涉及到一黨制政體、多黨制、議會民主等問題，這就要觸及當政者的疼處，又會使黨內外相當一大部分人難以接受，引起思想紛爭。再說，即使寫了也要封殺，連政治局委員也看不到。如果捅到國外，被認為是政治鬥爭，自然對自己要引起後果。考慮上述種種因素後，這次傾向於對十六大不表態，對十五大的表態就算個句號了。要我轉告胡績偉，謝謝他。

趙接著又反思過去的看法說，過去認為強人鄧小平走了，今後中央會有不同政見者出現，從而發生互相制約。現在看來，這個看法錯了。一旦當政，都會形成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己這個集團的既得利益，對外也就都一致起來了。因而，無論誰當政都會這樣那樣的要來維護這個體制。而對其他不同政見者的言論一概不准出頭、不准表現。長此下去，中國也走不上社會民主黨的道路，因為沒有這樣的改革人物。江澤民一切為了保權，即共產黨既然把權交給我了，絕不能在自己手裏丟掉。這是他的心態，也是他的一切出發點，他心中沒有理念，根本不是改革人物。

23 2002年11月24日

江澤民戀棧軍委，令人啼笑皆非

這次我先是將幾個人對十六大^①會後的幾點看法作了個轉述，我說，杜老認為這次會議平平淡淡，無新突破，農業也無新措施，但完成了接班，不搞終身制的制度得以實現，這也是一大進步。遺憾的是江澤民半退，暴露了他的戀權，使人們看透了他的心態。總的說老的退下來，是好的，江不能再直接插手。

安志文說：從報告文件上看，綱領上不提核心，只提以毛澤東為代表集體智慧形成的毛澤東思想，以鄧小平為代表集體智慧形成的鄧小平理論，以江澤民為代表集體智慧形成的三個代表思想，這說明強人時代過去了。問題是還提專政，但沒有提無產階級專政，提出了要建立民主法制國家，提出了任何組織、個人都不得超越憲法，這實際是淡化專政。也沒有提「西化」、「分化」、和平演變，這實際承認融入西方。在黨的領導方面提出了主要是政治思想領導，強調常委要向政治局報告，以及一人一票表決制，這說明，總書記、常委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包辦了。

安還說：至於建立法治國家，實際對司法大家都不懂，彭真還可以，蕭楊也懂，羅幹根本不行，李鵬還開笑話，說什麼，人大要在黨政治組織領導下。

另外，我也談了于光遠的三個觀點：一是中國目前是大改革、大調整時期；二是中國發展的是資本主義；三是中國的前途是再次革命。

^① 中共十六大，2002年11月8—14日在北京舉行。胡錦濤被選為總書記，中共第四代接棒執政。

趙紫陽說，這次十六大江澤民堅持軍委主席一職，是在中共黨史上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他這樣做，別人今後也可這樣做。這不僅是個戀權問題，而是體制上的倒退。過去鄧搞半退兼軍委主席一職，這是歷史條件形成的，他有這個資格與威望。而江澤民則不然，他沒有當過一天兵，也沒有指揮過一次戰鬥，還鼓吹他是軍事家，真令人啼笑皆非。而這次中央常委領導班子定九個常委，在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趙紫陽又說：這次在宣佈胡錦濤的職務時，只提總書記，既不提為首，也不提為主，更不提核心，總書記乃是職務，而不是定位問題。看來這次會議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人說這次會議是好的，是個發展，〔趙紫陽表示詫異的說〕這怎麼能是進步呢？中央常委當年曾定七十歲退，而這次李瑞環才六十八歲就退下來，七十多歲的江澤民倒不退，卻無人公開表示，感到奇怪。

我說，這又是江的一次勝利，過去把楊家兄弟打下去，上次十五大把喬石趕下台，這次十六大又使李瑞環出局。人們說，在玩手腕這點上，胡耀邦、趙紫陽都比不上江。人們過去對江澤民這一點估計不足。趙對此似乎可表示某種贊同。

我又說：杜老曾談到江澤民最近在常委會告別會上提了六點意見，大意是：一、相信胡錦濤總書記能領導起來，能領導好。二、是希望大家擁護這個領導集體。三、這次大會算是完成了新老交替。四、以後有什麼問題困難需要我，將義不容辭的盡自己的力量予以幫助解決。五、希望對美、對台方針不變。六、要搞好團結。趙說，所謂有什麼問題，要義不容辭幫助解決，這話裏有話，就是要干政。

臨別時，我說，安志文還有一個建議：應向新的領導班子表個態，只說幾句擁護新一代集體領導，其他什麼也不提。

趙說：十六大結束時，表個態還可以，至今也過去幾天了，再表示，好像對新老班子是不同態度，容易引起一些不同看法。他深思了一下，又說，最近我寫個信要求允許會客，其他什麼也不提，信最後再掛上這幾句話吧。

24 2003年8月15日

人們對胡錦濤期望值過高

記得在上次談話時，趙紫陽曾說擬在陰曆年前去貴州，時間不會長，大概五月份就回來。後由於北京發生「非典」^①，故從貴州又去了山東威海，所以離京時間較長。

今天見面後，我首先問身體怎麼樣？

趙說，老宗，看來不服老不行。過去一套生活習慣以為常了，到一個新地方就很不適應。

我接著說，這次北京發生的「非典」事件，胡、溫處理得比較好，得到控制，人們是稱讚的，尤其把隱瞞疫情公開說假話的衛生部長張文康給予撤職。但北京市長孟學農撤職，人們認為是墊背。由於張文康是江澤民的親信，據說江從上海回來後，特意邀張文康到家吃飯，表示安慰。傳說：張文康對疫情的表態，是江澤民「內外有別」的旨意。

趙說：大概又在中央給張安排了新的工作。

我說：對正在找工作的大學生孫志剛在深圳被執法人員縱容拘容人員打死事件，這次溫家寶親自過問處理，給有關執法人員以嚴懲，給孫志剛家屬五十萬元的賠償，這樣來維護弱勢群體的權益，人們甚表滿意。對新領導班子上台後，制訂的要開展黨內民主並要推廣逐步實行社會民主一些措施，人們更是抱有希望。這些具體措施我從香港鳳凰電視台看到，都作了廣播報導。但不知怎麼，「七一」突然又轉

^① 非典事件，2003年蘇斯SARS瘟疫，從中國南方蔓延部分省份及北京、香港，造成死亡和大量留醫，北京隱瞞疫情，導致衛生部長下台。蘇斯又稱非典型肺炎。

向要掀起學習「三個代表」新高潮。

這樣一來，人們失望了。杜老說，在中國實行民主自己這一輩子看不到了。李慎之也說過，中國要實行民主還得一百年。一般青年人看到老一輩不出頭推進民主，故面也缺乏信心了。

趙說，人們對胡錦濤期望值過高，如同江澤民上台後，期望江搞改革一樣。雖然胡和溫都是好人，但都缺乏理念，缺乏歷史抱負和眼光。再是中國現在已形成利益集團，無論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還是知識精英，都相互結合一致了，而工農群眾及有民主主義思想的經濟學者也都邊緣化。在這個格局下，就決定了不能進行政治改革。否則，這些抱團的既得利益者會聯合一致在江的促使下，把胡、溫搞下台。在這種框架下，胡、溫只能實行所謂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及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作些爭取民心的事。這樣江澤民就不能想怎麼辦就怎麼辦了，這樣下去，胡、溫的影響會逐漸有所增大，江澤民的影響會逐漸縮小，江就不可能把胡、溫搞下去。

我說，最近我看到中央辦公廳轉發的中央文件聲稱：一切為了穩定，要對民主派，對不同政見者實行高壓，提出要主動出擊，一露頭就抓，先發制人；至於修憲、軍隊國家化則不讓再提；堅持黨管幹部，結社自由，新聞輿論也不能開放。杜老對此說，中國當政者對實行民主有恐懼症。

黨外輿論則是要求修憲，提出實行「總統制」，取消「專政」條款，三個代表不能列入憲法，認為這是共產黨一黨的事。

趙說，政治改革究竟怎樣搞，實行多黨弄不好會翻車，把中國搞亂。目前應在黨的領導框架下，實行言論自由，放開報禁。他強調自由比民主重要，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批評港督。司法又是獨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然後再允許結社，這樣來啟發民智，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識。至於軍隊國家化、多黨制目前可先不提。

2003年10月17日

趙又說，法國革命是從民主走向專政的。由於不斷殺人，應對不了，才製造出了斷頭機。在英國不搞人民民主而是搞憲政民主，以限制政府的權力，保護人民的權力。顧准也是不主張搞人民民主，認為大民主一定會產生無政府主義，而主張議會民主。搞人民民主也容易被野心家奪取個人權力所利用。

趙評論說，顧准、李慎之是大徹大悟者，已與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決裂；而胡績偉、李銳、杜潤生則是黨內民主派。

最後我說了一句：如果新領導班子沒有自己的理念，沒有歷史抱負，能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嗎？

趙沒有表態，臨別時談到，上次給新領導班子寫信，提出自由會客一事，中央辦公廳答復：新領導正在接班轉換，等過一段吧。所以這次也不打算再追問，以免胡、溫為難。

25 2003年10月17日

往事的一個遺憾

今天是趙紫陽的生日，我特約定鮑鴻開一同去。鮑是趙紫陽小時候的同學，家居相鄰很近，彼此來往密切，抗日戰爭期間一同在那一地區打遊擊創建根據地。鮑這次又親筆寫了「壽」字來祝賀，到趙家後，我看到屋內只有他女兒女婿為他祝壽，擺放了一個花籃，還有從

香港趕來為他祝壽的兒子四軍，再未看到其他人。

這次見面我感到紫陽特別高興，精神格外爽快，興致勃勃，神情旺盛。他說，這些天在北京，疲勞得到恢復，上半年在外地時間過長，尤其在貴州有高原反應，有不適應感。北京的空氣比過去好多了，大概是燒煤少了，這對自己的氣管病有好處，今冬不打算再去外地。

接著話題談起往事，趙說，在家鄉滑縣創建根據地時，曾爭取國民黨政府委任的滑縣縣長陳曙輝倒向共產黨八路軍，〔陳是趙的老同學〕也將陳的所有人、馬、槍枝一窩端過來。這就從上層打開了創建根據地的條件，在這一點上，陳曙輝是有貢獻的，是立了功的。〔據我記憶，在他的影響下，當地名流、開明士紳賈心齋被國民黨委任該縣縣長後，也相繼站到共產黨方面來。後來，賈心齋還被選為冀魯豫邊區政府行署副主任。〕但是後來動員陳曙輝去了太行山學習，結業後被分到冀南根據地，在一個連隊裏做文化幹事。這顯然是對國民黨過來的人員不信任，對其歷史貢獻也予以抹殺，後來此人在戰鬥中犧牲了。

談到這裏，我看到紫陽很是內疚，很後悔沒有幫助陳曙輝轉回原地區來給予適當安排。看來，趙對此事一直很不安的，心裏好像欠了一筆賬，多年後仍為此事自責。

的確，共產黨的傳統就是對每個人查歷史，查出身成份，尤其對從國民黨系統過來的人更是視為異己，根本不予信任。但在一個熟地方還好，人們都瞭解，有人能幫他說話，根據實際表現也能給予適當安排，而在一個陌生地區，根本不可能，甚至會遭到清查被肅整。

抗戰開始初期，那時人們都認為國民黨是正統，抗日救國要靠中央軍，靠蔣介石國民黨；認為八路軍、共產黨不在話下，成不了氣候，在當時那種正統的意識形態控制下，如果沒有新的思潮影響，沒有新的理念產生，陳曙輝是不會倒向共產黨的。況且那時八路軍衣食無著，生活艱苦得很，而國民黨中央軍則是生活條件好，衣食有保障。

由於紫陽這時時而興奮，時而心情沉重，一時間為陳曙輝事甚為傷感，情緒頗為激動，他的女兒隨即走過來，伸手輕撫她老父，勸慰

不要過於激動。這說明趙紫陽是很重情義的。平靜後，趙又問道：最近十六屆三中全會有什麼新精神？人們有什麼反映？

鮑鴻閣說，最近聽三中全會傳達，三個代表要列入憲法，國有制要搞股份制，提出要維護人權。

趙說，這次將三個代表列入憲法，到將來修憲時，同樣也可能把三個代表刪掉，中國的憲法機動性太大，每屆國家領導人都可以定自己的憲法。

趙又問我聽到了什麼？

我說，這次說話時間很長了，你也累了，時間也晚了，改日來再談吧。

隨即一起照了相，告別。

26 2003年10月25日

中國目前發展的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按約定時間到了趙家，我首先說，上次你對胡錦濤、溫家寶在目前政治格局中處境的分析，杜老認為是深刻的，對胡、溫的看法也認同。也認為在這種格局下，胡、溫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但對你提出的，爭取像在香港過去殖民統治時期那樣，雖沒有民主，但可以有自由，有言論、結社自由的空間，來逐步發展公民的民主意識，有不同看法。

杜老認為，香港是在西方民主精神長期薰陶下，故能得以啟發民主意識，同時又允許言論、結社自由，從而能啟發民智。在中國則一直是專制主義的控制，根本沒有民主傳統，更不允許言論、結社自由，也無從啟發民智。至於企業精英雖然跟當政者利益結合一致，但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求民主，實行政治改革，況且九十年代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都相當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影響。這個生長起來的中間階層，是民主政治的一種基礎和希望。

對此，趙說，在中國，民營企業要發展，但究竟有幾個不與當政者勾結的？不與當政者去勾結，民營企業就發展不起來。趙認為目前在中國權錢交易相勾結是普遍的，把中國人民幾十年積累的公共資產瓜分。〔我插話：安志文說中國最可怕的是發展成權貴資本主義〕。趙接著明確說：中國目前發展的就是權貴資本主義。政府圈地，把群眾的土地圈起來，把地價壓得很低，然後批發給開發商，高價銷售，致使發生多次群眾自焚事件。又操縱股票，圈股票，把社會上的資金收集過來；還圈走儲蓄，就是把老百姓的錢拿過來，政府再用這些錢進行公共設施投資，刺激內需，以求高增長。

談到這裏，趙取出《特供資訊》2003年四十期所刊載〈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悖論〉一文及吳敬璠的一篇論文讓我看，其中提到中國經濟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同時又是最無效率的經濟增長。每4元投資只收回一元成本，其虧空靠發國債來彌補，實際又轉嫁到中國人民頭上。如果銀行儲蓄允許自由兌換，資金就會流出國外，增長就會停止。一旦發生搶購，銀行就要發生危機。

我說，目前當政者對新聞控制又嚴厲了，上次曾談到高壓政策主要是針對不同政見者，尤其是民運派人士的。提出主動出擊，一露頭就抓，消滅在萌芽中。現在中央又發文件，要抓意識形態的控制，中心是要反新自由主義。據稱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也列出了名單。這次是起因於李長春^①出國訪問古巴、阿根廷，兩國元首均告誡他：全球

化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帝國主義要搞垮社會主義，搞國有企業改革就是要搞垮共產黨。實行市場經濟就要葬送社會主義。為此還寫了專門報告，形成中央文件。

趙說，這不只是外國領導人的原因，恐怕還有江的插手告誡。上次胡錦濤「七一講話」的臨時變動，並又掀起「三個代表」學習新高潮，恐怕也都緣由於此。的確控制又嚴了，只是在網上發表評論也要被抓，這是空前的。

我補充說，就是對退下來的部長級官員也加以控制，聲稱：只要中央部長、地方省委書記沒有帶頭鬧事，中國就亂不起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鞏固一黨專政

我說，過去在你身邊做秘書工作的李樹橋，認為你對江澤民心理的分析，即共產黨把權交給我了，就決不能在我手裏把共產黨的權丟掉。這只是江的宣傳口號，並不是他心理狀態的實質。搞個人權威，搞個人專政，抓住權力不放，權迷心竅，這才是他的實質。

我說，現在黨已沒有政治理念了，人們也不相信共產黨、共產主義了。李銳說，共產主義就是烏托邦。胡績偉及外國評論說，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的逆流。中國青年報知名記者盧躍剛認為，就是國家領導人心理也不相信共產主義，一般青年根本不談什麼這主義那主義，還有人認為共產黨的敗象已定，已不能再整修了。在蘇聯，葉利欽根本拋棄社會主義制度；普京上台後又是全盤西化，融入西方，並聲稱，現在世界上不存在意識形態對立。

趙說，現在哪還有意識形態鬥爭？還提什麼保衛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當政者目前一切是保衛維護一黨專政，這一點，在他們看來絕對不能動，這是一切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其他都是虛的，維護一黨專政也就是維護個人權力。

趙明確地說：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鞏固一黨專政。在黨壟斷一切的情況下矛盾必然越積累越多。〔我插話：現在的俄羅斯共產黨領袖久加諾夫總結原蘇聯共產黨垮台的原因，就是共產黨的三個

^① 李長春（1944—），遼寧人。先後任遼寧、河南、廣東省長，省委書記，2002年任中共十二大政治局常委。

壟斷：財富、權力、思想文化的壟斷。〕在這種體制控制下，個人很難有所作為。在此，他很欣賞最近朱厚澤的說法：朱鎔基上台時曾發表了豪言壯語，聲稱無論前面是萬丈懸崖，還是地雷陣，我都要義無反顧，一往直前。這次溫家寶上台後也發表了類似的豪言壯語：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①。但這都無濟於事，扭轉不了，這是個體制問題。

上層革命與下層革命

我說，雖然一些年紀大的學者與民主人士對中國進行政治改革表示失望，但一般中青年還是樂觀的，認為上有WTO推動，溫著政府必須按國際市場的規則來運行，不改也得改；下有民間在推動，不改就不同你合作，自己幹。中國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石少敏的看法是：中國的改革，過去由國家領導人推動，以後是各級政府在推動，下一步將是民間力量來推動。

趙說：上層不去進行改革，矛盾必然越積累越多，如同一個汽球越吹越大，最後必然爆炸。那就是逼著下層去革命，直到訴諸於暴力，這也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正如王力雄所著《底層毛澤東與經濟文化大革命》一書所指出的那樣：這將是中國人民的大災難，如果主動進行改革，就可避免。

接著，趙又拿出《特供消息》（2003年三十四期）刊載新華社四川分社黃臥雲的文章〈上層革命〉一文，很有興趣地說：該文作者提出改革本質上就是一場上層革命，應是改革者精神氣質上的改造。只有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能容忍對自己的種種約束，才會出現新的制度變化；這一新的精神氣質就是容忍精神，不能把批評者當作敵對勢力和陰謀破壞。因此，上層革命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能發生，即政府和它的領導者把公民的普遍自由作為信仰時，把維護公民普遍利益作為自身使命時，上層革命才會真正發生。因此，推動的上層革命更多

^①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林則徐詩句。

的不是來自壓力，而是產生於信念。如果把國民素質的提高作為一個國家改革的先決條件，民主的到來將是極漫長的等待過程。民眾的素質固然重要，但上層領導者的素質更有其決定意義。因為只有少數人是從偉大的思想中來學習民主理念的，而絕大部分人則是從政治生活中去學習民主的。

我認為趙紫陽之所以興致勃勃這樣談，大概是出之於他自己多年實踐與學習中得來的信念，這完全符合他的思想實際。

臨別時，我又談了一個情況，據說退下來的十幾位部長聯名寫信要求江將軍委主席一職交出來，各單位就找這些人談話，江澤民是選舉出來的，寫信提意見可以，但不應該聯名。這些老同志嚴正反問：黨章哪條規定選舉出來的就不能提意見？黨章哪條規定提意見不准聯名？！

趙對此說了一句：這說明上層矛盾已明顯出現了。

27 2003年12月20日

社會主義旗幟舉不起來，自由、民主、人權旗幟又不敢舉

我說，根據我看到的中央文件，新領導班子確定的戰略目標是：今後二十年內中國要達到中等國家發展水準。這是根據對國際形勢的

分析，認為戰爭打不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由德國威廉二世發動，被打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由德、意、日發動，被打敗了。以後就是局部戰爭也困難，如這次美國發動的對伊戰爭就是這樣。因為人民要求和平發展。

我說，最近聽了外交部長李肇星^①的一個報告，既沒有自己的旗幟，又沒有自己的理念闡述，全是兩面討好，投其所好，八面玲瓏進行拉攏，給人印象是機會主義的市儈面孔，感受不到大國的風度，政治家的氣魄。再如據說這次江澤民被邀請去布希家庭農場，當布希談到對朝鮮金正日的反復無常不感興趣，指責是邪惡時，江隨聲附和說：是呀！他曾委派我們的一個貪污犯楊斌^②去作他們的新義州州長。在對待薩達姆^③問題上，一方面向美國示好、接近，另一方面又把從美國得知的情況通告了薩達姆以表示對薩的支持，搞拉攏，搞兩面討好。就是六國朝核會談，在談判破裂無結果，代表團分別向中方告別時，卻又特意安排美朝代表巧遇相逢，從而宣佈會談就此算結束，使人感到處處在耍小聰明，玩小點子。

趙說：目前世界格局是美國獨家強大，為了發展經濟誰也不能同美國對抗。目前中國的外交和毛主席、周總理那個時代完全不同了。那時的陣線明確、旗幟鮮明，現在是社會主義旗幟舉不起來，自由、民主、人權的旗幟又不敢舉，只能在這種兩面討好中應付應對，來發展自己。

我說，台灣問題呢？現在「公投」鬧得也兇。

趙說：現在台灣問題也變得複雜了。國、親兩黨過去由反對台獨改為不反對台獨，過去選擇的方案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現在

變為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這就同陳水扁^④的主張接近了。這主要是台灣民心的變化，為了爭取選民，國、親兩黨不得不如此，從而同陳水扁的主張趨同，這使人們更傾向陳水扁。

我又說，還是由於大陸這個專制政體，使人不敢傾向大陸。香港這次五十萬人大遊行即可說明。據親近大陸的人士也說：你大陸明明是「六四」錯了，卻不平反，而國民黨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卻平反了，這就無法說服台灣人民。

談到這裏，我說，李銳要我轉告：紫陽一定要把「六四」實情資料留下來。「六四」不單是「六四」問題，應把「六四」看作世界政治格局一個變化的轉捩點。它引起了東歐變化，促使蘇聯瓦解，從而改變了兩大陣營的「冷戰」，「六四」問題不是趙紫陽個人問題，而應從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來看，也要從自己所處的歷史地位來看待自己。

趙說，對「六四」我只留下事實材料，因為我是當事人。至於如何評價，由別人來作，由於自己已年老精力也不濟了；再說自己當年手邊的歷史材料，當政者也不允許我調看，靠我個人也不好寫，就由歷史去評論吧。

胡錦濤是正統意識形態下培養的青年幹部

趙說，過去曾談了對胡錦濤不能要求過高，他外受江的控制，常委會內又有上海派，並認為他們內部一定有矛盾。經過最近一年的觀察，看來，情況並非如此，主要的乃是胡錦濤是在正統意識形態下培養出來的青年幹部，屬於正統的思想體系。從他上任後，首先去西柏坡，又到井岡山，後又察看毛主席故居，這說明他要按正統的路線走下去，要維持舊的一套。這就不會在制度上有什麼改變，也就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只能是搞些作風上的改變而已！基於此，他們之間也不會有大的矛盾，胡、溫體制乃是江、李體制的延續罷了。從他們準

① 李肇星（1940—），山東人。歷任中國外交部新聞司長，駐聯合國代表，駐美大使，現任外交部長。

② 楊斌（1961—），江蘇人。留學荷蘭國籍，回國經營歐亞農業，成為富豪。為金正日聘為新義州特區長官，即遭中共以欺詐等罪名逮捕，2003年判刑18年。

③ 薩達姆（1937—）侯賽因，1979年起為伊拉克總統，2003年美伊戰爭中被捕，2006年11月判處死刑。

④ 陳水扁（1950—），台南縣人。曾任台灣立法委員、台北市長，2000年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2004年連任。

備在人大開會提出的：不准民間討論修憲，不准討論軍隊國家化，黨管幹部不能變，不討論政治改革，新聞法不討論，對媒體進行嚴格控制即可說明。

趙又說：但胡、溫都是好人，溫家寶是比較開明的中年幹部，是在改革潮流中成長起來的。

我說，最近我看到中共中央批發的全國公安會議文件及領導人的講話，都根本不提政治改革這個詞，好像意在淡化，使人忘掉政治改革。強調的則是所謂嚴打，主動出擊，一露頭就抓，絕不能使其形成氣候。總之是要保持高壓狀態。

趙說：上層當政者一有所謂危機感，就越控制越高壓，矛盾也就越積累越厲害。從而讓人擔憂，可能會引起「爆發」，即所謂的「底層毛澤東與經濟文化大革命」。

臨別時，趙問我：對《晚年周恩來》^①一書看法怎樣？

我說，該書把周總理的形象完全刻劃出來了。

趙說，這個作者寫的比較成功，把周總理的內心動態、處世哲學寫出來了，是從儒家思想臣對君不能不忠來敘述的。當年毛主席對周總理是不信任的，但既又離不開他，又反不了他。即所謂「反周必亂」。趙遺憾地說：周總理的一生內心是極其痛苦的。

^①《晚年周恩來》，高文謙著，2003年出版。高文謙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生平研究組組長。

28 2004年1月25日

老戰士的民主心結

上次談話我曾轉述了李銳對「六四」事件的觀點：「六四」不單是「六四」問題，應把「六四」視為當代政治格局變化的重要環節，它引起了東歐變化，促使蘇聯瓦解，改變了兩大陣營的冷戰格局。這是他從國際眼光來觀察。我從實際感受的是：動用幾十萬大軍，用坦克、機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廣大人民，即所謂人民軍隊鎮壓人民，它不僅使中國人民失去了對共產黨的信仰，使共產黨失掉了黨心、民心，也使共產黨的組織渙散或者名存實亡了，從而產生了信仰危機。對台灣統一、香港回歸，也發生了重大負面影響，認為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危險，更不用說遭到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國家所遭受的經濟損失了。

我就此評論說，「六四」的鎮壓乃是專制的勝利，民主的失敗，從此中國就繼續沿著專制主義的道路走下去。近百年來中國的許多仁人志士，前仆後繼，犧牲流血，要使中國走向現代化，實現民主政治，脫離專制主義的羈絆，但到現在還未實現。現在人們公認為，胡耀邦、趙紫陽乃是具有現代意識，富有民主理念，要把中國轉向民主政治的兩個代表人物，卻被一一罷黜。而趙紫陽又是中國共產黨內提出要把中國轉向民主與法治的第一人，並為在中國實行民主改革進行了實踐探索，一時間中國轉向民主政治似乎有了希望。可惜這一切終因「六四」而夭折，實在令人傷懷！這乃是中國的不幸！

我是一個實際工作者，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了將近一生，也歷盡了種種艱險，雖不能說九死一生，起碼也是「五死五生」了。也是革命的倖存者之一，在渴望中國走向現代化文明——轉向民主政治的心

情方面，再沒有比我們付出了犧牲的老民主戰士更迫切了。可悲的是由於「六四」事件的武力鎮壓，使中國再一次轉向專制的道路，實在使我傷感得很！

正因為如此，我抱著「六四」事件能不能避免呢？是怎樣發生的？心中盤結的幾個問題，過去向趙紫陽問尋，請他再澄清一下。〔回答內容與過去所談基本相同，故省略。〕

趙紫陽說：我的政治改革思路都反映在吳國光所著《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中，基本就是那些，也沒有什麼再探討的必要和意義。提起這些，看得出，他內心有所傷感！

杜潤生曾評論說：趙紫陽的政治思想值得研究。正因為如此，我寫下了這個談話記述。

29 2004年3月20日

約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姚監復^①談話

我深知對一個習慣了社會聯繫的人，再沒有比不讓他接觸公眾，不讓他與人來往，實行封閉，對一個人心理上的摧殘更厲害的了。我

^① 姚監復（1932—），江蘇人，農業問題專家。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業生產力研究室主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協作研究員，現任中國管理科學院農業經濟技術研究所副所長。

雖然不時為趙紫陽收集點材料，提供些情況，以緩解其孤獨感。但由於我自己的社會聯繫面也小，又有心臟病，走路有困難，故我今天介紹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一同前來。談話內容由姚整理如下：

宗鳳鳴：這是姚監復同志。

趙紫陽：姚監復，我看過你寫的東西。

姚監復：趙老好！許多同志關心你，要我向你問好。

〔註：姚先是介紹1999、2001、2003年自己訪美的一些見聞，回答趙紫陽關心的問題，然後姚向趙提了以下問題。〕

姚監復：吳稼祥認為楊尚昆是「六四」風波以後的最大受益者，當時他是唯一可同各方面交談的關鍵人物，是否在「六四」中起了惡劣作用，是不是陰謀家？

趙紫陽：楊在鄧作出決定調動軍隊、實行戒嚴的前後，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前一段，楊是不贊成調動軍隊、戒嚴和鎮壓的，他是贊同我的意見的，在我訪朝時期是一種態度，而當北京市不準確地匯報了動亂情況，鄧下了決心要調動軍隊後，楊態度全變了，定要站在鄧的那邊。這是所有老同志們的特點。按鄧的意見辦。

姚監復：整個「六四」決策的責任人是誰？誰下令開槍的？

趙紫陽：整個責任問題，是個禁區。政治上對「六四」沒有新的說法和評價，就談不上責任，也不必著重個人責任，一定去追究個人責任。主要是當時的體制問題。開槍不需要下命令。因為軍隊已經調進來了。上面督促楊，為何進不來。要追問一定是什麼人下令開槍，可能也沒有，只要求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進駐到什麼地點。

姚監復：李先念^①在「六四」風波中起了什麼作用？對趙是否不滿意？

趙紫陽：李一直對改革開放政策很不滿意。因為鄧提倡支持改革開放，故不敢公開說，但是經常生氣發火，把氣撒到胡、趙身上，有

^① 李先念（1909—1992），湖北人。曾任財政部長、副總理。文革後曾任國家主席，政協主席，中共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時簡直是罵人，在外地講話就是罵人。在上海、天津，有的場合就是設罵。陳雲為人正派，但是對改革開放不放心，認為上海絕對不能開放。陳雲一直對改革開放不積極，主張「烏籠經濟」，不要大變化；雖不主張經濟統得很死，但又不贊成完全放開。陳雲一直被毛澤東批判為「右傾」，批評他「大計畫小自由」，「擔心沒有頭髮夾子、小販叫賣聲音」。陳主張大的總體上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小的是市場調節。大小結合，應開明一些，不必搞死。陳對鄧的一套不放心，認為將會出問題，同鄧有矛盾。而李在下面講出來，有私心雜念。他認為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否定過去的成績，因為過去李是在國務院實際主持經濟工作的，是多年來的不倒翁，包括文革期間也沒有倒，仍能具體主持經濟工作。改革，等於否定他過去的一套，否定他的政策與領導成績，幾十年的功績成為問題了。改革，就等於否定他長期主持國務院經濟工作的成績。這樣，他對改革的評價就有些情緒化、政治化，實際上是從政治上反對改革的政策。

姚監復：是否李的不滿會同王震、李鵬等人在「六四」事件中所起作用有關？

趙紫陽：這些不知道。

姚監復：「六四」實情，鄧是否受了騙，才作了錯誤決策？

趙紫陽：鄧是不會受人騙的。他的一貫思想是，對他的權威不能挑戰。他認為亂了，就搞不成建設，從來高度重視集中的權威。在形式上，胡、趙是總書記，在意識形態方面，在人事上都要聽鄧的。鄧和陳是主要決策者。半退是形式上的，實際上還是他們倆人決策，適當照顧一下楊、李等老同志的意見，楊、李對此也是不高興的。胡與我實際上就是一個秘書長，名義上是總書記。

姚監復：在批胡耀邦之後，才確定你擔任總書記嗎？

趙紫陽：不，早就定了。在十二大之後就定了。

姚監復：鄧對你是支持的嗎？

趙紫陽：在我四月訪問朝鮮之前，一直對我很好，是支持的。從

訪問朝鮮回來之後，特別是北京市陳希同、李錫銘匯報情況多有不實之詞，才有所變化。特別是我對「動亂」說法和他們的看法不一致。我說：「中國不可能發生大的動亂，可保持穩定」。對這個判斷，鄧是不高興的。學生不滿意社論中「陰謀」、「有組織動亂」提法，而對我的估計是滿意的。有人挑撥，把學潮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有計劃有組織的陰謀」，我認為不能這樣看，只是「動亂」。但「動亂」這個詞是中性的，有內部動亂，有外部動亂。

姚監復：關鍵時刻的關鍵問題是北京市領導誇大了事實？

趙紫陽：在我訪朝之前，我同鄧對學潮的估計與處理方針沒有不同意見。關鍵問題是北京市領導大大誇大了學潮的嚴重性，並且提出要向常委匯報。我認為，可能不是李鵬授意要北京誇大事實，這沒有證據。^①

我在4月24日上火車去朝鮮之前，李鵬還問我有什麼意見。我重複了對學生的方針。我認為對胡耀邦的追悼會已經結束了，學生懷念胡耀邦的要求也得到滿足了，現在應該復課，要恢復秩序。除了搞打砸搶的以外，不要動武抓人，激化矛盾。李鵬當時也同意我的意見。

姚監復：何時又定性為陰謀、動亂？

趙紫陽：中央常委會上，李鵬定了調子。4月25日在北京市領導向常委匯報後，又向鄧匯報，就定了性：有計劃有組織的動亂。當時實際上大部分學生已回學校，學生也分化了，多數已復課，但是不少學生害怕「秋後算賬」，政治上沒得到保障，有些擔心。如果繼續進行對話，緩解矛盾，化解思想上的不穩定狀態，可以使事件平息。我認為不會鬧起來的。但是在北京市委向常委會匯報後，李鵬定性「反黨反社會主義」為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的活動。常委會沒有定性為動亂，但是提出不採取手段處理不成。北京市領導的匯報是關鍵，其他都是藉口。李鵬利用鄧這個講話，召開幾千人開會傳達。再以「4·26」社論方式發出，定性為陰謀動亂。如果不過樣擴散，事態不會這

^① 作者註：據李樹橋談，李先念要求李鵬通知北京市委，要對學潮採取強硬態度。

樣厲害，天下本無事。這樣定性的結果是把大量學生推向對立面。本來，在耀邦追悼會後，天安門前只剩下少數人了，大部分人沒勁了。接著出來「4·26」社論，把中間的一部分又挑動回來了，結果十萬人上街。出事後，李鵬擔心我從朝鮮回來不支持他的決定，無論如何要我按這個調子講，並把鄧的講話傳達下去了。其實鄧也有感覺，李鵬不該把鄧拋出去，鄧家孩子也說過不該這樣講。鄧的態度是既然請出來了，就不收回，怕矛頭掉過頭來，喪失威信。

姚監復：你的5月3日紀念「五四」的講話和接見亞行代表的講話的背景是什麼？

趙紫陽：5月3日我關於紀念「五四」的講話，專門應鄧家人要求，要鮑彤加上了一段鄧小平愛護青年的話。我對亞行官員的講話中，強調了要在秩序和法律的軌道上理智、冷靜地對話，而「4·26」的社論和擴散出去的鄧的講話，造成學生對鄧不滿的情緒。特別是社論判定學潮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一場動亂，要採取堅決措施處理的「4·26」社論是最關鍵的，把學生推到對立面去，沒有退路了。但也沒想到會開槍，因為政治空氣已經寬鬆了。李鵬也感到搞壞了，怕反復。

姚監復：5月16日你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中，講到上午鄧同戈見面標誌乃中蘇兩黨關係正常化，因為中央內定，重大事情我們要向鄧請教。這個講話是否引起了誤解。

趙紫陽：我是為了說明上午鄧同戈見面，即標誌中蘇兩黨關係正常化，而不是我下午同戈見面標誌中蘇兩黨關係正常化，想不到引起這樣大的誤解。實際上，我們向鄧請教的說法，李鵬也公開說過。

姚監復：為什麼鄧對你的態度會改變？

趙紫陽：李鵬、何東昌起了很壞的作用，他們到處挑撥，把一些反鄧的講話集中起來向上反映，這刺激了鄧作出決定「為了穩定，決定戒嚴。」鄧講完話，會後對李鵬說：「不要像上次那樣把我的話拋出去。」李鵬說：「對，對，對。」這說明鄧對於公開擴散他在4月

24日的內部講話有所感覺，並不滿意，不認為傳達他的講話是好事，把鄧推在前面。鄧家的孩子也有看法，也有這個意思。我接見亞行官員時的講話沒有要求什麼，但是要完全阻擋這種影響也困難，關鍵是有人竭力挑撥，想方設法刺激鄧，極力宣傳學生把矛頭已對向鄧。而鄧是很愛護自己形象的，對國慶三十五周年學生打出的橫幅「小平你好」是很高興的。這樣，造成鄧對風波定性的意見。

姚監復：同學生對話不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趙紫陽：有人破壞對話。何東昌召開大學黨委書記會，在會上講話堅持「4·26」社論的意見。本來，我在對亞行官員講話以後，局勢大為緩和，而何東昌強調，這是趙個人意見，仍要同社論保持一致，堅持「4·26」社論的觀點。何東昌的兩邊搞的作法，實際上是破壞對話。他認為只能同學生會對話，不能同遊行代表對話。我認為，應同時同遊行代表對話，因為學生會反對學生示威。同時，何東昌把大量材料送給鄧，認為學生反鄧；另一方面，又不同示威學生對話，這就導致學生火了，把火氣對著鄧。何東昌等後來也發現不對頭了，其實，我告訴你，彭真當時也不贊成，說過，「無論如何不能動武、流血！」的話。何東昌、李鵬他們很孤立，擔心、害怕我的調子變了，所有的問題正是從這裏發生的。

姚監復：你為什麼從朝鮮回來不去看鄧？

趙紫陽：當然，也可以講生活中有緣分，有命運。但是，確實是很多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在起作用。當時鄧的身體非常壞，有病。戈爾巴喬夫又要來訪華，我們最關心的是鄧能不能出來，這次中蘇最高級會晤是很大的事。所以，醫生、家人、中央常委最關心的是無論如何鄧不能出事，決定什麼人都不見。我從朝鮮回來，同金日成會晤的問題，都無法匯報，害怕打擾他，影響他養病。只有楊尚昆通過他的家人傳話，鄧家子女在吃飯時傳達，必須照顧鄧的身體。我也不能去見他，不方便，更要顧大局，當時沒估計會是這個樣子，見不了他，無法去說。如果我從朝鮮回來見了鄧，也可能會好些。當時就是怕鄧

出不來，不能會見戈爾巴喬夫。如果說不去見鄧是個失誤，可能是個失誤，因為我見鄧是很方便的。最後是在會見戈爾巴喬夫之前見了鄧，當時他對我的作法還是贊成的。時間就在會見戈的頭一兩天。

姚監復：你如果不去朝鮮訪問，是否形勢會不一樣？

趙紫陽：關鍵是「4·26」後面這一段時間。我能不能不去朝鮮呢？要知道，同朝鮮的關係是個很敏感的問題。已經由金日成和鄧小平批准的訪問計畫，總書記又臨時不去了，什麼理由？若說國內形勢很嚴重而不去，本身就是很敏感的問題。國際上又是涉及中朝關係問題。因此，我不可能提出不去訪問。即使提出，常委也不會批准。我們原來擔心追悼胡耀邦的會能不能順利結束，後來比較順利結束了，身上很大的擔子放下來了，只有一些善後工作要做。因此，我就去朝鮮訪問了。但是，沒想到北京有人把問題誇大，做了更大的動作，說什麼「中學生串聯」，「到外省串聯」，類似於搞文革，這樣把問題更激化，變得更為敏感了。

姚監復：鄧對你同軍方的關係是什麼態度？

趙紫陽：鄧多次要我同部隊的同志多見面。鄧一直是真心支持我的工作，包括軍委的工作。

姚監復：對「4·26」社論定性後，在領導人之間關於處理方式上有哪些分歧？

趙紫陽：「4·26」社論對學生運動定性為有計劃有組織的陰謀、動亂，使整個局勢發生根本變化。常委中，喬石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胡啟立的意見也是一致的，楊尚昆列席會議同我的意見也是一致的，而李鵬、姚依林兩個人厲害，他們害怕搞到自己頭上，他們同北京市領導人一致，是主張採用堅決措施的。究竟是採取嚴峻辦法還是溫和辦法，是主要分歧所在。

姚監復：對亞行官員講話，政治局常委都同意嗎？

趙紫陽：其實，我對亞行官員講話時說過了「中國不會發生大的動亂」以後，李鵬也是同意的，還捧我的講話講得好。楊尚昆也說講得好。我希望局勢緩和。學生的緊張局勢在這次講話後，實際是鬆動

了，緩和了。我真不願意再講「六四」這些事了。這次你要來，本來我是聽你講的，結果我還是又講了。

姚監復：李銳同志說過，黨的歷任總書記多是以檢討、認錯方式結束任期的。只有你和陳獨秀^①沒認錯。

趙紫陽：〔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姚面前，指著姚的臉〕你說陳獨秀？

姚監復：不是我說的，是李銳同志說的。

趙紫陽：哈哈！

姚監復：趙老，我可以同你照個相嗎？

趙紫陽：可以，照吧！

^① 陳獨秀（1879—1942），安徽人，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中共創始人，連任五屆總書記。1929年反對共產國際，被中共開除。1932年組織托陳反對派，被政府逮捕入獄，1937年出獄，死於四川江津。

30 2004年5月15日

約姚監復的第二次談話

經趙紫陽同意，我今天又約姚監復一同來。所談內容，由姚整理如下：

姚監復：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十三大報告的立論的背景問題。

趙紫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在十三大報告之前出現過兩次，一次是在「黨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一次是在「關於精神文明建設問題的決定」中。兩個文件中都出現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不是十三大報告的首創。十三大報告的貢獻在於，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同改革開放方針的新政策聯繫在一起，作為鄧小平提出的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思想基礎。以前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點不在於「初級階段」，而重點在於「社會主義」。過去《決議》作這樣的論斷，基本上是立足於反右，針對懷疑現在是不是社會主義，雖然講初級階段，但是重點在堅持社會主義。如果否定現在是社會主義，就是錯誤。當然，思想停留在這個水準上，不解決問題。當時還是針對右的，反右。《關於精神文明的決議》不針對反右，但是未展開，只說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應要求太高，未深入地展開討論。

真正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同改革開放政策聯繫在一起，作為理論基礎，是十三大的貢獻。為什麼用這個提法？我當時非常興奮。找到這個論斷，雖然不是新提法，但是可以避免爭論。因為當時有種思潮，認為「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針對改革開放是「政策」，不是「目的」觀點，我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過改革開放

2004年5月15日

問題：建國以來的基本理論「四項基本原則」是綱，同改革開放不能並提的提法是不對的。那時未找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改革開放不是具體政策，是總政策、總方針。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不應貶低其中的任何一個。後來，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改革開放的基礎，又是社會主義，又要改革開放，怎麼搞？於是就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表示現在只是初級階段，重點不在社會主義性質未變上做文章，而是在「初級階段」上做文章。最大的想法是不會引發爭論。不是趙發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時對此就已沒有爭論，重點是反右，思想保守的人也不反對這個提法，因為他們重點是反右，批判那種不認為現在是社會主義、懷疑現在是社會主義的思潮，所以那時能被接受，現在也能接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我在十三大重點論述的是「初級階段」，前提是不爭論。對社會主義的政治內涵並沒闡述，而是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初級階段」作為十三大的立論基礎，據此確定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基礎，將兩者聯繫起來，並作了大段論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點不在「社會主義」，而在「初級階段」，即現在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說還不是社會主義。這是我論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蘇紹智論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同之處。

姚監復：你的對立面是胡喬木、鄧力群嗎？

趙紫陽：對。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彭真也講過：「四項基本原則」是綱。但沒意識到其後果。在十三大報告起草中有過爭論。我向外國人多次講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對於鄧力群講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綱，其他只是政策的提法，乃是一種顛倒，誰統帥誰？這話彭真也講過。針對這個問題，書記處開過多次會，我大段大段地講過這個思想。十一屆三中全會有兩個要點：一個是四項基本原則，另一個是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只講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文革不也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嗎？那時以階級鬥爭為綱，

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落實到基層。這樣，如果只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法批倒文化大革命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新，正在於改革開放。過去反右，不也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嗎？那段時間，我就此系統地講過多次。1987年新華社發過我在宣傳理論戰線工作會上的講話，與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這兩個要點。1987年的講話，集中闡述了這個思想。對此有人想批我「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宣部理論局盧之超擬在中央黨校召開十三大路線座談會，名義上是理論座談會，實際上矛頭是對著我講的兩點論，認為這是要擺脫四項基本原則，盧認為改革開放不能與四項基本原則相提並論。我知道後，問過中央黨校校長高揚^①，他也不贊成。盧之超知道在查這事後，就沒開會了。實際上盧後面是鄧立群、王忍之這些人。

姚監復：關於中辦研究室，後升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1987年9月十三大之前，你果斷地撤銷這個研究室的建制的背景是什麼？

趙紫陽：其實，對於這個反對改革開放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耀邦早就想解決，但是猶豫，沒有解決。啟立也知道。胡喬木、鄧力群不聽耀邦的。書記處研究過這個研究室和《紅旗》雜誌問題。我決定撤銷它，是沒有別的法子了。他們經常向上面幾位老人送上很多東西，亂搞材料，如把「特區」說成「租界」的材料送給陳雲，陳雲根據報上的這些污七八糟的東西批評開放政策。書記處的話他們也不聽。這個研究室的一部分同志，林潤青、林子力是開明的，而《紅旗》的熊復^②，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批兩個凡是時就批評過他，鄧力群繼續圍剿了熊復這一批人在他周圍。

姚監復：戴晴說：1989年初，上層已經在改革，存在自上而下，以較小代價、較和平方式向法治、民主轉型的可能性。改革斷送在「極

端冒險分子」手中。應調查誰下令開槍，和什麼人破壞了黨內溫和派的和解努力。

趙紫陽：把「六四」的學生，說成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有陰謀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暴亂，至今沒有證據。實際上「六四」學生運動是一場無計畫無組織無領導無綱領的群眾自發運動。黨已不起作用。誰在指揮？無論誰上台發表演講，提出激烈口號，誰就可以當領導，誰講激動人心的話，誰就可當指揮，而不能見好就收。誰能指揮學生？王丹單純、幼稚。左傾冒險主義，誰是左？實際上是一股思潮，不滿意現實的很複雜的思潮。學生受國外影響，認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好，蘇聯也比我們好，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比我們快。有的對國內改革出現的一些現象，如腐敗、官倒、批條子不滿意。但是，誰是黑手？「六四」的指揮者找到了嗎？戴晴也曾被當作「黑手」被查過。她也想去做學生工作，希望撤離、和解、讓步。為何不走？他們同情學生，做學生工作，不是想把亂子搞大。陳一諮、王軍濤、陳子明也被說成是「黑手」，他們想利用同學們的情緒做工作，甚至想搞個組織。但是學生不聽他們的，沒有形成自己的組織。學生又反對又不反對社會主義。領導人完全可以平息事態。如果學生有領導，就可平息，正因為沒領導，才這麼亂。學生實際上已經很難堅持下去了。如果沒人刺激學生，他們就不堅持了。某些人不斷地刺激學生，學生沒動了，有意刺激一下；學生搞不下去時，又刺激一下。天安門學生本來可以結束了，「五四」講話和「亞行」講話後，大部分學生都回學校了，大部分學生復課了。北京市委的匯報，何東昌的講話，江澤民在上海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都刺激了學生、社會，新聞單位、機關也都同情學生，出來遊行了。如果及時疏導，可以結束，即使拖也可以結束。為什麼不去引導，反而不斷刺激學生？何東昌偏於保守，不滿意上面佈置。後面有人沒有，不清楚。

學生鬧事原來是對著胡耀邦去世的，在追悼活動以後，事態已平息了。在4月23日我去朝鮮訪問之前，已經平息下來了。天下本無事，

① 高揚（1936—），遼寧人。曾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部長、化學工業部部長、中共吉林省委書記、農林部部長、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黨校校長。

② 熊復（1915—），四川人。曾任中宣部秘書長，中共外聯部副部長。1966年任中宣部黨務部部長兼新華社社長。1976年任毛著編輯副主任，1978—1988年任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總編輯。

為何又弄來這麼多人？胡耀邦追悼會前也就幾萬人，後來二十多萬人。為什麼？「4·26」社論定性為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有陰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激起中間派的學生上街了。我從朝鮮回來找了一些校長書記談，他們一致認為「4·26」激起了中間派的學生。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神經過敏，對學潮只看表面。這是第一次大發動。第二次大發動是在「五四」講話、「亞行」講話之後。學生原本認為上面態度變了，不算賬了，回去沒事了。學生擔心的最大問題是這次鬧了一下，組織上作什麼結論，會不會秋後算賬。只要宣佈不入檔案，不作問題處理，學生擔心的最大問題——帽子問題解決了，事態就好處理了。學校中有激進分子，擔心這次不了結，將來不得了，擔心畢業分配。這時只要領導人明確上面所說的兩條：不秋後算賬，不入檔，而且同學生真對話，就可平息事態。但李鵬只同意同學生會對話，這是開玩笑。鬧事的不是學生會領導的，官辦的學生會本已走向學潮的對立面。後來學生會幹部和北京市委領導人都認為被出賣了。本來學生會奉命堵、鎖，不讓學生去遊行，嚇唬學生不要出去，衝出去不得了，要流血。結果，4·27大遊行，衝出去遊行的，回來後很高興，啥事都沒有。學生會幹部都灰溜溜的。

「亞行」講話後，遊行的學生更覺得沒事了，對此，學生會幹部也不服。北京市委也認為被出賣了。李錫銘、陳希同一進書記處會議室，陳就對我說：「我們被出賣了！」李鵬、姚依林也是這樣看。閻明復告訴我：「李、姚說『要趙紫陽不能變調』。」「他一變調，我們下不來台」。他們竭力維護個人得失，而不是考慮正確還是錯誤。「4·26」社論定的調子大家都不滿意，實際定錯了，我去朝鮮訪問前專門交待了「不要激化矛盾」。現在事情鬧大了，不好收場了。他們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挑動學生繼續鬧。另一個是要鄧、趙不改調。回顧「六四」，不複雜也很複雜。「六四」這個大事有很多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很多問題不可能一下解決，應該教育學生。但是沒有緩和下來，「4·26」定性後的形勢也沒變化。學生回校以後，思想上有個結子，因為上面堅持不對話。原來學生會不讓學生出來，警告

學生不要出去，信誓旦旦。而學生遊行回來後一片歡騰，學生會灰溜溜的。教委、北京市委也沒搞好，如果一檢討，等於要承認錯誤。

鄧樸方跟吾爾開希^①是否接觸，互相做做後面的工作？不太清楚。柴玲幼稚，原來還說要同學們堅持到底，實際上自己搶先撤退，走了。^②

姚監復：能談談關於新權威主義及拉美模式的教訓嗎？

趙紫陽：康曉光^③在《戰略與管理》上宣傳新權威主義，以前是吳稼祥宣導。新權威主義，就是新加坡模式。政治集權，經濟開放，一黨專政，集權於中央。我向鄧小平匯報新權威主義的時候，鄧小平說：「我就是新權威主義。但是，話不這樣說。」。

拉美化的新權威主義導致權貴資本主義，這種經濟開放的結果導致社會矛盾，兩極分化，權錢交易。俄國、中國也是這樣。中國早就是新權威主義。中國暗箱作業，比國外情況更嚴重，不公開，私下搞。中國搞的就是權貴資本主義的私有化，更加不規範、更為不公平。暗箱作業後，工廠經理、書記得益，國企賣了股份，大量財富落入權貴他們手中。過去是統治經濟、計畫經濟，基本上沒將價值反映出來，如土地不值錢。而市場化，價格一膨脹，價值被少數人帶走。過去沒拿走，現在一畝地以3—4年收成的價格就拿走了，局面一變，隨即大量增值，錢到哪裡去了？到了政府、官員、建築房產商手裏。

姚監復：土地制度怎麼改革？

趙紫陽：永佃制，永包制。九百九十九年都不要變。

姚監復：對曾慶紅的《1999—2000年中國調查報告——人民內部矛盾研究》（中共中央組織部課題組編，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出版）怎麼看？

① 吾爾開希（1968—），新疆維吾爾族人，北師大學生，1989年北京學運領袖之一，被中共通緝，流亡法國、美國，定居台灣。

② 柴玲沒有搶先撤退，她和同學們一道最後離開廣場。

③ 康曉光（1963—），遼寧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人民大學教授。

趙紫陽：這本書不一般，外國評論過，有政治主張，是他的政治綱領，不是個別事件的調查，是組織部的報告。這本書請留下來，我自己看。有人說他是「黑馬」。（吳稼祥的觀點認為只有曾慶紅可能為「六四」平反）。我知道，曾慶紅對吳、鮑、陳作過些事，本身是好事。為什麼做這種事？一是比較開明，也是積累政治資本，以備將來。他同胡、溫不同，對江無所顧忌，究竟將來怎麼樣，還要看。曾、江實際是一體的，是一個靈魂，現在面貌不清，因得到江信任，無所顧忌。胡、溫一定會堅持原則，但比較教條，當然也會隨情況變化而變化，畢竟是新的一代。

姚監復：你還是高爾夫球協會名譽會長嗎？

趙紫陽：有次打高爾夫球，遇見香港一位高爾夫球協會會長，說請我當香港的高爾夫球協會名譽會長。後來我開玩笑說：「我是中國的高爾夫球協會名譽會長。我只剩這個職務了」，結果反映到中南海，就問：「怎麼他還有這個協會會長名頭？那樣，不必再當香港的會長了。」中國高爾夫球協會會長回答說：「沒有」。於是，不知不覺我這個中國的名譽會長的職務也沒有了。

姚監復：上次我拍的你的照片可以公開發表嗎？

趙紫陽：不要發表，更不要在國外發表。

31 2004年5月25日

近在咫尺，老戰友生病不准看望，死不得告別

今天我是陪同鮑鴻閣的兩個子女來趙家的。見面後，趙紫陽首先表示內疚說：目前自己這個處境，鮑鴻閣病了未能去醫院看望，去世後自己也不能去告別。兩個子女只是熱淚盈眶，表示理解。他們手捧遺物說：這是爸爸生前最喜愛的一個木製整體花瓶，轉送給趙伯伯作紀念。

我看到此情此景，內心非常沉重。鮑鴻閣與趙紫陽不但是小時候同鄉同學，也是革命戰爭年代創建根據地生死與共的老戰友，晚年身患癌症，非常痛苦，幾次報病危，家屬也曾告知趙紫陽。去世後，我又親自將訃告送給趙紫陽，希望他最後能參加追悼會去告別，結果也未能如願。

我在沉思，究竟趙紫陽犯了什麼法？違了哪條紀呢？為什麼這樣苛待他，連人情表達都不准許，這不是不講人道嗎？同時也苛待了死者。我不理解的是，趙紫陽又究竟犯了哪些錯誤，本人要求將事實進行公佈，也不答應！就這樣不清不白地軟禁十多年，至今還不罷手。究竟天理何在？正義何在？這就不是惡政之下無道可言嗎？我面對此情此景，心中甚是不平。

這時，紫陽向鮑的子女敘述了往事，在小學與鮑在一起讀書，又如何一塊串門，往來於兩家之間；還談到鮑鴻閣的父親如何好客，熱情招待；還敬佩鮑鴻閣一生正派為人，做事敬業，是個堂堂正正的好人。

隨後，紫陽又把鮑的兩個子女電話留下，並囑託自己的女兒與之保持聯繫。

最後一起照相留影告別。

32 2004年6月20日

這個體制實際上是腐爛了

首先我說，上次中央文件通報曾提出：〈加強馬克思哲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就是尋找理論根據如何鞏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地位。這次又發文件通報〈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一文。提出了「西強我弱」的政治思想形勢，認為西方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為世人所認可，我們則缺乏鮮明的旗幟以服人，我的理解認為，存在意識形態危機，其目的想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為框架來論證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現階段的新發展，去進行工程設計，以營造共產黨新形式下發展的新意識形態，便於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我又說，在這種意識形態存有危機感的情況下，宣傳戰線上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嚴格起來，就是在網上發表論文也要被抓判刑。在公安系統更是採取高壓態勢，對不同政見者，採取一露頭就抓。今年「六四」到來之時，更是全面進行控制，對國內的一些異議人士，所謂不同政見者都進行監控，隔離切斷與外界聯繫或限制人身自由；與以往一樣，對這些不同政見者處理上，仍是以政治問題非政治罪名問罪。即以貪污、漏稅、嫖娼等罪名予以判刑。如《南方都市報》程益中等以私分獎金經濟罪論處；對農民企業家孫大午以非法集資判刑等。這只能說明一個政黨的墮落，不敢正視真理就是了。

這樣，越高壓，越控制，越專政，越濫用權力，就越腐敗。人們在議論說，現時的腐敗程度超過任何朝代，致使這個機體腐朽了。深圳有個民營企業家，乃是與孫中山、黃興時代幹革命的毛簡春先烈的後代，他親自對我說：自己是烈士的後代，當然希望共產黨執政，但共產黨已是個危房，難以維修，讓人失掉信心，太腐敗了。

2004年6月20日

趙紫陽說：這個體制實際上是腐爛了，主要是沒有民主監督。

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

我說，雖然當政者如臨大敵一樣採取各種各樣的高壓控制，但各地的民主思想還在發展。如先有蔣彥永要求為「六四」正名的公開信，又有網上要求為「六四」平反的簽名運動，國內與國外民主訴求結合起來這是新發展。香港民主人士也提出要和大陸民主運動結合起來。以余杰為代表的中青年知識份子也在呼籲民主政治乃世界潮流，不可阻擋。黨內一些上層人士也認為民主、法治與專政不相容，提出要把人民民主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制度。原體改委幹部曹思源在大連舉行的民間修憲討論會，提出憲法序言中應取消「專政」二字。北大副教授焦國標更是寫文章〈公開討伐中宣部〉，對中宣部的控制已忍無可忍！中國青年報著名記者盧躍剛也發出公開信進行較量。至於全國廣大農民的維權鬥爭、上訪活動更是連綿不斷，有的地方已發展到要求罷免本地長官，甚至組織了自己的獨立組織——農民黨。

趙紫陽說：現在國際上提出了所謂中國改革模式，認為它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和迅速增長，對中國改革的模式稱讚起來。國內一些學者如康曉光對現在中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三結合為主導的這個模式也大加讚揚。但真實的情況是，中國的改革與經濟發展是在黑箱作業下做起來的。這便於權錢交易，便於侵吞國有財產，致使國有財產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設為名，大搞圈地、圈錢，實際上是對人民的一種掠奪。這跟原蘇聯不同，他們是在現代民主轉型中改革的，是公開發股票，每人一份，雖也有貪污腐敗，但都受公開輿論監督，又有多黨相互競爭，誰也不敢作得過分。俄羅斯改革曾一度震動較大，但現在他們的經濟也在高速發展。也就是說，經濟發展了，現代政治也轉型了。

趙此時深有感歎地說：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究竟哪個好？還很難說。但目前中國當政者卻認為正是中國過去採取了高壓手段，保持了穩定，才保證了經濟大發展，認為這是成功的得意之作。

我問，對中國的改革究竟應該怎樣看？極左派一直在批判鄧、江的改革路線，認為復辟了資本主義，把共產黨搞垮了，懷念舊的一套，要恢復毛主席的路線走回頭路。而改革派則認為，現在出現的種種問題是改革不徹底，不進行政治改革，不兩條腿走路，沒有民主公開監督造成的。安志文的看法是：不要再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了，已經毫無意義了，現在都是資本主義了，再討論社會主義還有意義麼？如果一定要說什麼主義，現在就是權貴資本主義。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聯合起來壓迫剝奪廣大人民，使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又受苦難。只希望有一個好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腐敗的市場經濟。

談到這裏，我看到趙紫陽基本是同意安志文的看法的。他說：現在胡、溫的政策路線只是採取小恩小惠給廣大人民一個甜頭，來樹立自己的親民、為民形象，而不去觸動這些精英的利益，更不觸動這個體制制度，這就不可能解決問題。過去認為胡、溫是在江的控制下，不敢有什麼大的動作。後來，則看出胡錦濤還是受正統意識形態的支配，只想恢復毛澤東正統意識形態地位，並沒有自己的政治理念，沒有歷史責任感和相應的政治智慧。這就不可能去進行政治改革。

三、陳水扁依靠的是台灣民意

我又問：對台灣陳水扁最近表現的看法。

趙紫陽說，看來，目前當政者最頭痛的還是香港、台灣問題。陳水扁這個人是在走台獨道路，美國壓一下他就收斂一下，中國強硬一下他就軟一下。他依靠的是台灣民意，即台灣人民的民主意識與獨立意識。他又逞強又害怕——怕大陸統一吃掉。至於在內政方面，陳水扁這些年沒有什麼政績可言，不為台灣人民所稱讚。中國方面對台灣動武又下不了決心。中國通過在外交上施壓，不讓他有國際生存空間，這就失掉台灣的民心，認為這是打壓台灣人民。尤其這次中國堅持不讓台灣列席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引發台灣人民不滿，使台灣人民民心遠離大陸，是失策的。

而在香港，以全國人大釋法方式，堅持不讓港民直選香港行政長官，致使香港與台灣人民懷疑一國兩制的虛偽性，進一步失掉民意。但不如此，又怕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落選，進而控制不住香港的局勢，實在兩難。

最後，我又轉述了安志文對幾個具體問題的看法。

民主集中制的問題，認為民主與集中是矛盾的，民主制的實質是尊重多數，保護少數。不保護少數就不是民主制，而是集權制。

黨的領導與人大關係問題，憲法規定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和有人說的人大要在組織上服從黨的領導是不能相容的。^①

法治與專政問題，實行專政就不能實行法治，因為專政是超越法律，是不受法制約束的。

階級鬥爭問題，雖然社會矛盾是普遍的，永存的，但矛盾不是不可以協調平衡的，並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過去我們搞的政治思想領域，如反「右派」，從思想上劃分階級的作法更是荒謬。

主權與人權問題，認為主權來源於人權，如果本國統治者壓迫、奴役、鎮壓本國人民，主權的存在的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

「六四」這個死結問題，實行民主與「六四」事件相聯繫。如果實行民主，勢必平反「六四」，當政者誰也不敢動這個「死結」，因此趙紫陽的問題也不能解決。

以上判斷趙都贊同，均表認可。

臨別時趙說，自己的呼吸系統出現問題，引發頑固性咳嗽；過去感冒會引發肺炎，現在不感冒也會得肺炎，這是自己家族遺傳所致，父親就是此病去世的。還談到此病同我的心臟病不同，心臟病有突發性危險，但現在有辦法治。而這種肺氣腫目前沒有辦法治，肺炎發一次，肺的纖維面積就擴大一次。

此次會面不久，趙就住院了。

^① 是李鵬說，要在組織上服從，一時被傳為笑料。

33 2004年9月8日

解決社會危機的出路

根據趙紫陽的病況，子女的意思是，要少接觸人，怕引來感染，也要少談話，怕耗氧太多。李銳聽到趙二十四小時不能離開氧氣，感受到病情甚嚴重，於是在八月間致信胡錦濤並江澤民，提出應立即恢復趙紫陽的自由。原信如下：

錦濤同志並澤民同志：

根據憲法新增的「保護人權」條款，黨中央強調「政治文明」、「黨內民主」的精神，建議給予趙紫陽同志應有的公民權利和黨員權利。

根據紫陽同志「六四風波」中所定「分裂黨」、「支援動亂」的錯誤，已給予嚴厲的撤銷黨內外職務的處分，但仍保留黨籍。現在事過境遷，政治經濟形勢很好，社會穩定，對趙紫陽的長達十五年的軟禁應當解除，給予公民權利，黨員權利，有人身自由，有會客、訪友、外出等自由。據趙的家人反映，趙健康狀況堪憂，肺部纖維化病變加劇。最近住院需二十四小時吸氧。八五老人餘年不多，身患重病，日薄西山了。有我這個看法的老同志很多，我也不便於聯合簽名。

這個意見是否可行，請酌。

李銳

2004年8月11日

安志文聞訊後，則執意要見趙紫陽，要我去聯繫，其主要目的是，建議趙紫陽要親自留下個材料作為歷史資料。這次見面是在趙臥房內，

2004年10月24日

因為他已離不開輸氧。

趙紫陽說，這次能讓我們進來，就算不錯了。表示高興。安志文問了幾句近來身體情況的話後，就先從目前的社會問題談起。他說，現在形勢是經濟發展、增長，還算繁榮。問題是社會矛盾、積弊大，民工、職工下崗、就業、貧困（國家統計三千萬人，聯合國統計九千萬人），兩極分化嚴重，城鄉差距越來越大，腐敗越來越嚴重，城市拆遷鬧事，各省市上訪人員越來越多。這主要是由於不進行政治改革形成腐敗的市場經濟，發展成權貴資本主義，產生了社會危機。出路在於要建立一個民主與法制的社會。

安說，過去專制制度的「法治」，是官治老百姓，現在的憲政法治是限制官員的權力，保護人權——保護人民的權力。目前各地出現的拆遷上訪鬧事，就是人民要維護自己的權力，這是「維權」行為。我們同世界民主國家在和平與發展要求上是一致的，矛盾點也就是民主與人權，這也是世界潮流。潮流不可擋，正逼著中國要走這條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出路也只有這條路。

趙說，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出路，就是要走建立民主與法治社會這條路，應該是結論，是完全對的。

安志文繼續說，但現在當政者卻只強調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以所謂「新三民主義」空話來樹立自己的形象，這不能解決問題。而建立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實行政治改革也如同經濟改革一樣，也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時間。前一段時間曾去香港，看到那裏成長起來的中產階級是要求實行民主的，這次人大釋法〔香港〕不實行民主普選是個失誤。

政治改革就是要放棄黨的壟斷權力

趙紫陽說，如果政治改革再拖上幾十年，首先人民承受不了，社會上也難以接受。由於中國的改革與原蘇聯不一樣，那裏是公開實行私有化，把國家的公共財產平均的分配給每個人，後來雖然被大企業家收購了，乃是通過市場經濟公開進行的。中國的改革和拉美等發展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國家的改革也不一樣，那裏原來就是私有制，財產是不能隨便被別人侵吞的。中國的公有制為權力者所有，全國的資源實際上都是由這些人來壟斷，把全國人民用血汗積累起來的資源，用黑箱作業的方式被一些權錢勾結者侵吞，這當然要引起人民的不滿。這種矛盾會越積累越大，形成社會危機。由這種經濟改革方式形成的社會問題可能比拉美還要糟。

趙又分析說，現在這些利益集團都相互結合起來。就是受過西方民主文明薰陶的留學人員也加入這個利益共同體，被權力化了，即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形成三位一體。而知識界著書立說自稱為新保守主義者的年青代表人物康曉光，又從理論上論證這種精英相結合的主導模式，是中國穩定的最佳狀態。

正是這些利益集團使中國的改革深入不下去，同時也制約著國家的政策路線的走向，使之向著既得利益集團的方向發展。也正是這些人實行高消費，大肆揮霍、吃喝造成假繁榮，生產的產品銷售不出去，實際上也是假增長。

趙又明確地說，所謂政治改革，就是要放棄黨壟斷一切的權力。不削弱不放棄黨的部分權力，社會組織就發展不起來，不能形成力量對政府實行監督。這就涉及權力的得失，又是當政者最敏感的問題。如這次討論憲法，朱厚澤提出的「權為民所授」本來是正確的，也予以封殺批評。大家都清楚黨控制一切的這種體制如不去觸動，就不可能進行改革；中國當政者如不能從體制外超脫出來看問題，也不可能去進行黨的改革。

最後，安志文向紫陽建議：一方面保護好身體，同時要親筆留下一個材料作為歷史資料。

接著我又轉述了李銳常談的三條意見：一、要弄清楚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尤其現代、當代的，包括西方和我們自己的。二、理論上要弄清是非，包括馬恩列斯毛的理論。如第二國際伯恩斯坦、布哈林是對的。以及理論在歷史上的作用。三、關於「黨」的問題，要研究其歷史形成與現實作用〔中國古代傳統是「君子不黨」、「黨同伐

異」，「黨」是個貶詞〕。我們這個黨如不改造，不從專制傳統中解放出來，不變成遵守憲法的民主政黨，政治體制問題就無法解決。中國需要一個新的啟蒙運動。李銳多次轉告，趙一定要將六四問題寫清楚，有個歷史文存。

34 2004年10月24日

南有孫志剛，北有孫大午

本來10月17日要去為趙紫陽共度八十五周歲生辰，但他電告，生日那天不要來。後來才知道，由於趙的病情傳出，引起各界關注，據國外電台事後廣播，生日那天有一百多名群眾，還有記者和外國人齊集趙宅大門口，要進去為趙紫陽祝壽。其實那天只有兩個學生打著小旗，要為趙紫陽過生日被驅散，對上面有些人來說，趙的生日也是個敏感的日子，也要嚴加防範，是可以想見的。

今天見面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他未能站起來相迎、握手，使我感到他的病情發展了。當我問到病情是否得到控制？他說，反正這種病沒有好辦法，下步準備吃些中藥來做些調理。

稍息後，我介紹了這次去河北省徐水縣農民企業家孫大午集團參觀後的觀感。開始時養一千只雞，五十頭豬，經過近二十年的自我積累，滾動發展，現已成為集養殖業、加工業、工業、教育為一體的大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型科技型民營企業。員工一千六百餘人（其中大專畢業生六百餘人），中學師生近三千人，固定資產上億元，年產值過億元，是全國五百家民營企業之一，從不偷稅、漏稅，不搞回扣，不搞權錢交易，也從不欠工人一分工資，一身清白。孫聲言，自己敢脫下褲子上大街走一趟。

孫大午有自己的理念，他是依據傳統的儒家思想，當代的法治思想，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思想，堅持以「人為本」，提倡先學做人，後學做事；勤勤懇懇做事，實實在在做人。我看到他企業裏的格言是：求知，求真，求實，孫大午的夢想是在那裏建立一個當代的世外桃源，使園中人都能祥和地過好自己的日子。

我說，中國有人才，如果有像孫大午這樣的人去做農業部長，或許中國的三農問題有望解決。孫在北大講演時曾指出：現在農村是八個大沿帽管一個破草帽，如果農村只剩一個大沿帽管八個破草帽，農村就不是這個樣子了。他還指出，農村所有稅收佔全國一萬六千億整體稅收的大約百分之二十一，可是其中縣以下政府部門消耗掉的佔了百分之七十多，也就是說國家花了一千塊錢去徵五百塊錢的稅，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嗎？他還指出，政府各部門都搞立法，唯獨至今沒有一部保護農民的法律。

由於孫大午仗義執言，為農民叫苦，揭發一些政府部門限制、剝奪農民，不讓農民自由勞動，自由發展生產，遂被地方政府以非法集資罪判刑三年。其實他在農村籌集資金、發展生產都有收據，本屬於資金借貸關係，卻借此給予判刑，實屬冤案。

趙說，孫大午的情況，我瞭解一些。南有孫志剛，北有孫大午，同屬冤案。

我說，這主要是孫大午發表了不同觀點，為當政者所不容，被視為異類，又拘捕，又抄家，還要判以重罪，即使是農業先進生產力代表者，也予以封殺。後在新聞界、學術界的聲援、呼籲下，又有張勁夫的出面，才放棄重判，但仍以非法集資罪名判刑三年，作緩刑四年處理，並以不上訴為條件。

胡錦濤的面目暴露出來了

接著趙問我，對胡錦濤在四中全會的講話都有什麼看法？

我說，據我所知，中辦通報了胡錦濤在四中全會的講話，其主要精神：……意識形態領域歷來是敵對勢力同我們激烈爭奪的重要陣地。如果這個陣地出了問題，就可能導致社會動亂甚至喪失政權。敵對勢力要搞亂一個社會，顛覆一個政權，往往是先從意識形態領域打開缺口，先從搞亂人們的思想下手。從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的教訓看，當時戈爾巴喬夫提出：「意識形態多元化」，提出所謂「公開性」，放棄馬克思主義在思想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結果導致非馬克思主義在思想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結果導致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甚囂塵上，這成為蘇聯解體、蘇共垮台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必須清醒地看到，西方敵對勢力不會放棄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各種敵對勢力也總想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一個時期以來，境外敵對勢力和一些西方媒體攻擊我國的社會制度和領導人，一些人打著政治改革的幌子，宣揚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企圖從根本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我國的國體和政體；境內外「民運」分子仍在大肆鼓噪為1989年的政治風波翻案，「法輪功」邪教組織等加緊進行滲透和破壞，境外宗教組織千方百計地在我境內進行非法傳教和建立組織的活動，等等。……要堅持弘揚主旋律，對錯誤的思想政治觀點和言論，對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挑戰和攻擊，要堅持原則敢抓敢管……。

還提到：……近一個時期，境內外敵對勢力為了達到遏制中國、分裂中國、搞亂中國的政治圖謀，頻繁在宗教、人權和台灣、香港、西藏等問題上向我發難……各種敵對勢力加緊勾聯聚合，遙相呼應，「台獨」、「藏獨」、「民運」、「法輪功」等勢力合流……；境內外敵對分子廣泛利用互聯網等現代傳媒手段進行結社及其它違法活動……要堅持主動出擊，露頭就打，先發制敵……。必須保持高壓態

勢……等等。

接著，我說：聽到反映是，還是階級鬥爭那一套，對胡錦濤失望了。有的則認為這是策略性，不是他的真實思想，于光遠說，本來江、胡就是一個人，是一體。朱厚澤認為可能比江還向壞的更左方面發展。李銳曾說過，等一等再看；四中全會後，也認為面目清楚了。有些學者聲稱，在中國實行民主這一輩子是看不到了。

趙說，胡錦濤這個講話，把自己的面目暴露出來了，如果是個人講話，也可以不這樣講，這同中央文件不一樣，胡錦濤是清華大學學生，做青年團的工作，是在我黨教育培養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後來分配到甘肅工作，是在宋平領導下，受宋平的正統意識形態影響。總之，他是在我們黨正統意識形態所謂「馴服工具」「教育」出來的一個青年幹部。而胡錦濤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是鄧力群提出來的，自然也受鄧力群一些思想觀點的影響。

趙又說：從他上任後，首先去西柏坡，後又去延安，還去毛主席家鄉。這表明自己要繼承毛主席這個傳統，從這次毛主席一百一十年壽辰紀念文章作了大讚揚也可說明。在這種正統的意識形態支配下，不可能有什麼新的理念，使自己有什麼使命感、歷史責任感來改變中國的政治局面。同時，他也沒有這個魄力，也沒有力量來改變。否則，這個體制〔權貴〕，這個利益集團就會把他搞下去，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被既得利益集團搞下去的。這些利益集團已形成的體制，是要維護一黨專政的，是絕對不允許觸動的，權力是獨攬的，否則就要失掉政權。

趙說，但胡錦濤本身是好人，是在我黨正統教育下培養出來的。不同意朱厚澤所說的「比江更壞更左」的看法。相比之下，溫家寶的改革意識要好些，溫是在改革開放潮流下發展起來的，但該人謹小慎微，要在尊重黨的一把手的這一傳統下工作，看來，在改革上也不會有大的作為。

從我與趙紫陽這十幾年的接觸中，從未感到過他有什麼偏激的情

緒。無論談什麼問題、談什麼人，他都能抱著一種平和的心態就事論事、就人論人。我曾問過其他許多與他接觸過的同志，他們也都抱有這樣的看法。大家都認為他是一個很有胸襟、很有氣度的政治家。

我說，上次你同安志文談話，不同意安所說「中國的政治改革還得經歷二十年的過程」，認為那樣中國人民、社會都承受不了，其內涵指的是哪些？

趙說，首先這樣會使整個社會腐敗下去，不得了，會使整個體制爛掉啦！再是貧富懸殊這樣厲害，兩極分化這樣嚴重，廣大人民群眾能承受幾十年嗎？在這種嚴重的情況下，當政者不是採取疏通的辦法給人們以希望，而是採取高壓態勢加劇矛盾，形成社會嚴重對立，這樣能不反彈嗎？只靠員警鎮壓，而員警來自人民也會變化的，從目前各地上訪越來越多，且帶有組織性，兇殺案件也越來越厲害，多帶有仇恨心理。就連學者焦國標、記者盧躍剛也敢公開站出來進行較量，來維權，膽量越來越大，遇有突發事件，就會發生社會爆炸。當然暴力革命是誰也不願看到的，大家都會遭受其害。

我隨即說，正是腐敗越來越厲害，社會風氣越來越壞，人們越懷念毛澤東，所謂〈底層毛澤東與經濟文革〉，有可能形成。同樣，正是由於實行專政，越搞高壓，人們越嚮往趙紫陽提出的走民主與法治道路。正因為如此，人們倍加關心你的健康、病情。

鄧小平改革與趙紫陽改革發展道路的不同點

我說，馬列主義的經典教義是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經濟。你則提出要發展商品經濟以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要實行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經濟。你認為資本主義成分越發展，社會主義成分也就越多，要經過發展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你又提出要走民主與法治的道路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些思想你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趙說，回想起來，自己在農村搞聯戶承包制，是為了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繼而在城市搞改革發展個體經濟、集體企業是為了解決失

業問題。後來提出商品經濟是為了發展城鄉貿易，接著提出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其實就是在搞市場經濟，不過是為了回避「市場」這個詞就是了。在政治改革方面，基本就如吳國光一書《趙紫陽與政治改革》所寫，自己的思想是先黨內，後黨外，再推廣到社會。對黨外，對社會首先要建立參政機制，對話管道，進行溝通。在黨內先從上層開始，再推廣到基層，不過對政治改革，自己的思想也有個變化過程，開始認為中國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文化素質又低，問題也複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實行多黨制，中國會亂，認為中國首先應解決貧困問題。後來感到只搞經濟改革，不限政治改革相結合不行，不實行民主監督，首先腐敗問題就無法解決，接著又感到要發揮群眾組織的獨立監督作用，不放棄不削弱黨控制一切的權力就不行，像過去那樣什麼都管，都要控制是不行的。

我說，鄧小平的改革，一方面要實行市場經濟，一方面又要集權，堅持不搞實質性的政治改革，這種「跛足」的改革國外早就有評論，會走向崩潰。事實上，中國已發展成為腐敗的市場經濟、權貴資本主義。何清蓮女士將其評論為「改革的陷阱」。

趙說，最近國外學者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召開中國改革研討會，題目之一是「趙紫陽與政治改革」。會上提出了類似你說的看法，認為鄧小平的改革是市場經濟加專政，其發展道路越走越窄，最後是走不通的。而趙紫陽的改革是市場經濟加民主與法治，這條道路會越走越寬，會發展成為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這就是兩個改革道路發展的不同點。目前中國當政者特別強調黨的執政能力，就是要加強一黨專政的統治能力，一切都是為了保持黨的專政地位不能動搖，無論誰觸犯這一條絕對不允許……。〔此時趙忽然一陣止不住的咳嗽〕但中國社會的發展，無疑總會轉向社會民主黨主導的方向……趙談到這裏，又是一陣咳嗽。這次談話，咳嗽、吐痰連續不斷，我勸他先不要再說話了。一時間我倆只是默默相對……

一會兒，他又說，北京這個氣候對自己的病不利，醫生擔心冬季病情會發生變化。自己現在也常常感到沒什麼食慾了，這樣身體機能

勢必會越來越弱……。

聽到這些，我心情沉重起來，猛然感到趙紫陽已處在慘澹晚年的後期了。

雖然這樣，我覺得還是應當把李銳要來看他的話轉告給他。我說：李銳無論如何要來看你，他們不讓進，他也要來。

趙說，都這樣大的年紀了，不要找那個沒趣吧。趙健民已九十幾歲高齡了，幾次來了始終都不讓進門（還有杜星垣也有此遭遇）。李銳再來，也不會讓他進門的。

最後，我將杜老給趙紫陽的一首詩詞交他：

好友頻頻來相問，

言君閉門苦讀書。

往事歷歷載青史，

一片冰心在玉壺。

接著我過去看望其夫人梁伯琪。她雙目已經失明，要靠保姆架著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處於半痴呆狀態，剛說過的話很快就忘記。過去的事倒還記得一些。白天女兒上班，整個庭院不見人影，倒見許多被秋風掃落的枯葉。此情此景，使我頓感淒涼。趙紫陽夫婦晚年已是如此境況，還不能獲准與近在咫尺的老戰友相見，我默默憤語：「這對趙紫陽真是太殘酷了！」

沒想到這次談話竟成了我們兩個老戰友之間的最後一次談話！此後不久，紫陽便住進了醫院，再也沒有出來。

結束語：趙紫陽走出了舊的思維方式

中共高層領導提出中國要走上民主與法治的第一人

一、趙紫陽破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先例

根據自己多年經歷和體驗，過去我們往往習以為常地遵循以下的思維原則：以黨的意志為意志，以黨的利益為利益，要為黨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黨內的氣氛又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一切服從黨的利益。黨需要你犧牲，你就必須表現出犧牲的精神，如果表現出膽小怕事，缺乏犧牲精神，那你在眾人面前就抬不起頭來。對黨員的要求是，全心全意為黨的事業而奮鬥獻身，緊緊地團結在黨周圍，一刻也不離開黨；若要離開黨就等於沒有了生命，認為個人的肉體生命可以犧牲，但政治生命不能犧牲；如果一個黨員犯了錯誤，任何處分都可以接受，就是要求不開除黨籍。有的人留下遺言，甘願犧牲以保留黨籍，或以此請求組織追認自己為中共黨員。

此外，我們的思維方式還都以黨組織意志為意志，個人一定服從組織，認為黨組織的決定都是正確的。遇有自己的認識同黨組織的決定、黨的領導人的認識不一致時，都無例外地檢討自己，努力改變自己的觀點。那就是說，都必須服從組織。那時提倡的是黨的力量就在於組織，因此個人一定要服從組織，一切行動要通過組織；口號是沒有黨的組織就沒有個人的一切，一切實際行動都要聽黨組織的指揮。正如毛主席號召的，要我們當一個馴服的工具，不管組織的決定對還是錯，都必須先要服從執行。行動上都必須與組織保持一致，否則被認為是反黨、反組織。

黨過去培養我們的就是這樣的意識形態，我們就是在這樣封閉的意識形態下接受培養的一代人，要改變上述這種傳統的思維方式是很

困難的。

正如前述《潛龍八動》一書作者指出的：中共黨內從彭德懷到劉少奇，從鄧小平到胡耀邦，過去受到批判的所作所為，都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卻一再認錯、認罪，致使黨內發生是非不分，盲目主義唯上是從的弊端。趙紫陽則改變了這種錯誤的傳統，創造「趙紫陽模式」揭示真理和信仰的價值。

趙紫陽大概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後，有了新的認識，再也不能做馴服工具了。自己認為不正確的，就不能服從；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就不應作檢討。從而他獨樹一幟，開創了黨內的思想鬥爭和政治生活史上的先河。問題是趙紫陽為什麼能擺脫正統的意識形態，很多人難以擺脫的舊的思維方式的束縛呢？

我認為，首先，基於他對理想的追求。

趙紫陽說：改革開放就是高舉民主的旗幟，要實行民主政治。中國必須變成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才能向前發展，才能順應世界潮流。這是他的理念。正是從此出發，在他任黨的總書記進行政治改革設計時，從黨內開始，擴大黨內民主，改集中制原則為民主制原則。首先在上層改變中央常委決定一切方針政策的例行做法，提出不設總書記，採取中央常委輪流坐莊方式，防止走上個人專政的道路。他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其實就是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因此趙在十三屆政治局第一次例會上首先就制定了中央議事規定的決定，即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議事規則的決定，重大問題必須以表決方式解決，少數服從多數。其目的就是防止個人包辦決定，從黨內，從上層領導，從中央做起，使中國走向民主。作為黨的領導人，自己甘願受組織制度的約束，同時提出要擴大社會民主，實行社會監督；凡議事、人事選舉皆改內定性模式為公開性模式；要實行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在村、鄉、縣、市等基層實行直接選舉，省以上要實行差額選舉。提出了要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改變黨包攬一切的做法，群眾的事要由群眾自己來管理。要實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工廠、企

業、學校等基層不設黨的專職隊伍；強調工會的監督作用；真正做到黨政分開，中央政府各部不設黨組，黨委不設對口部門。要給人民以言論自由，要保障人民公民權利；實行公開化、增加透明度。

其次，基於他對現代化的追求。

趙紫陽一再聲稱：改革開放就是要把中國納入現代文明和世界市場經濟體系。認為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世界經濟越來越走向一體化，各國的經濟、文化已超越國界走向全球化，給人們的生活、工作、學習都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中國再閉關自守，再抱殘守缺，那將是能否保有「球籍」的問題，也就是鄧小平說的：死路一條。這是基於中國現代化的迫切感，認為自由、民主、人權、平等，不屬於哪一個主義、哪一個國家，是歷史發展形成的、是整個人類的現代文明，是社會進步的產物，我們決不能拒絕。

再次，基於新潮流的要求。

據《戈爾巴喬夫回憶錄》所介紹，在同趙紫陽會面時，趙曾問戈：你看，一黨制到底還能不能行得通？對此，我曾詢問了趙，他說，對方可能這樣領會，但話不是這樣說的。當時是說共產黨執政地位不變，但領導方式必須改變，要實行開明執政。趙紫陽出訪朝鮮前夕，在同萬里的一次交談時曾談到，現在是開放時期，各種思潮蜂擁而入，使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及文化生活日趨多元化，再搞大一統是不可能了。現在開放搞這麼多年了，外面什麼東西學生都有印象，學生們覺得什麼話都可以說，老一代人的思維方式，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學生說我們不好，就認為是要顛覆我們。這樣一來，本來不是對抗性就搞成對抗性了。

他還強調說：時代變了，思維方式也要變。不能用「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來看待學生的言論。這時，他和萬里倆個人都認為，一聽不同意見就說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是那麼回事，這不行。這說明，趙紫陽已從以階級鬥爭為主導的意識形態中解脫出來了。

趙認為共產黨必須適應新時代、新潮流，進行自我更新改造。他一再談過，黨這樣控制一切，什麼都要管的狀態必須改變；如不改變

黨壟斷一切的狀態，社會能向前發展嗎？因此，他提出首先要改造黨的政治思想工作。這曾遭到不少省、市書記及大學和企業黨委書記的責難。客觀的現實是：現任俄羅斯共產黨書記久加諾夫曾聲稱：過去原蘇聯共產黨失敗的教訓，一是對財產所有權的壟斷，一是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一是對思想文化的壟斷。這難道不是最現實的教訓嗎？

再次，基於他對賦於自己的歷史使命感。

趙紫陽曾對我談到中國革命史，認為從「維新變法」到孫中山、毛澤東等，幾代偉人和仁人志士奮鬥犧牲流血，都為的要使中國現代化，可到現在還沒有真正實現，致使中國人民一直在苦難中熬煎。對此，趙甚感傷懷。這使我深深感到他是一個有歷史責任感的人，有自己的政治抱負。我曾向他轉達安志文的看法。安說，鄧小平是那樣性格的人，在「六四」問題上，你不該提出同他相左的意見來。趙對此也明確地對我說，作為總書記，我必須有自己的態度，這是歷史責任所在，我不願在歷史上欠一筆帳。我理解他是要對歷史負責，是以歷史賦於自己的使命為己任的。

正因如此，趙紫陽確實擺脫了正統意識形態的束縛，從而在「六四」問題上會作出如此突出的表現，寧可總書記「寶座」不要，而甘遭後來軟禁之苦。他甚至做了坐牢的準備，也要堅持正義，主持公道，認為是正確的，就是要堅持。在「六四」事件上，完全受自己政治理念、價值觀所主導，真正表現出了政治家的風度，使他的形象變得更為高大。「六四」後，趙紫陽雖一直在被軟禁，仍在中共十五大召開前夕，致函主席團和全體代表，聲明「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是沒有根據的，提出了重新評價「六四」的要求；信中對個人的蒙冤受屈卻隻字未提，目的全然在為這個震驚世界的事件爭取公道。至於由此將會招致什麼後果，他繼續置之度外，仍以堅持正義為己任。

趙紫陽在「六四」問題上的態度，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歷史上的一個壯舉、創舉，是沒有先例的，他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打開歷史新的一頁，這是永垂不朽的。

二、趙紫陽衝破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教義

根據我過去學習的馬克思原理，馬克思是從商品分析出發，邏輯推出生產商品的勞動既是私人勞動，又是社會勞動，這種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是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基礎。由於每個商品都由許多不同部門的勞動所生產，融合為統一的社會化勞動，但生產資料、勞動成果、生產成品卻為私人所佔有。這種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佔有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從而馬克思結論說：私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他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又一經典原理：要消滅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取消貨幣，沒有商品交換，沒有市場，實行計畫分配，他號召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在全世界範圍內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由於親自經歷並總結了歷史的教訓，趙紫陽在四川任職時，首先推行擴大自留地，「包產到戶」，就是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來承包，實行聯產承包制，實際上是私有化。在全國第一個把鄉人民公社牌子摘下來。繼而又在城市發展集體企業、個體經濟，實際也是私有化。後到國務院出任總理，又提出必須發展商品經濟，來開展城鄉貿易。接著宣導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實際這就是要搞市場經濟，這都是要發展資本主義。

趙紫陽的觀點：資本主義成分越發展，社會主義成分就越多。他的指導方針是：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來發展資本主義，趙曾自豪地明確地說：即便是說發展了資本主義，也沒有什麼可責備的。他認為發展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走向現代文明的一條必經道路。客觀的現實又是全世界都資本主義化了。

問題是趙紫陽為什麼能衝破馬克思主義經典教義的束縛？我認為：首先趙的思維方式不是從馬克思的教條、定義、公式出發。他曾明確地對我說過，自己是不拘泥於教條定義的。他說，社會的發展是個自然過程，是在自身自發發展中逐漸自我調整，逐步自我演變向前

發展的，而不是靠什麼理論、主義或計畫來推動。而過去我們的問題正是靠理想的設計，從而走上了空想、烏托邦。因此，他又說自己對這個主義、那個主義，不感興趣了。但他很欣賞顧准提出的走向經驗主義。

正因為此，趙紫陽尋求的是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社會指標。如前所述，他提出今後國家的類型應以生產力來劃分。即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國家、中度發展水準的國家與低發展水準的國家；社會類型的劃分，應是發達的社會、欠發達的社會和低發達水準的社會；或工業化的社會、後工業化的社會和欠工業化的社會。對社會進步指標，可以生態環境即生活品質，文化水準即人的素質，生活水準即富裕程度，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指標來衡量。這樣以「人為本」，以實際生產力等為指標，取代主義之戰，意識形態之事，不再以這主義、那主義作為先進與否的指標。

其次，趙紫陽的思維方式是重視實踐，尊重民意。他說，民意就是人們的需求，就是潮流，就是社會發展的方向。關鍵在於要激發民智、民意，因此，一定要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互相爭論，互相啟發，來發展創新，啟迪新思維。

我體會趙紫陽的思想一貫是從實際出發的。經過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大鍋飯的災難，當時的國情可以說餓殍遍野，人民窮困到極點。何況後來又經過十年浩劫。因此在四川上任後，他首先考慮的是如何解決農民「吃飯」問題，只有同農民的本身利益聯繫起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去發展生產，才是出路，從而實行了聯產承包制。後到國務院任職，首先遇到的又是全國各大小城市上山下鄉青年就業問題，從而提出了要發展個體經濟，集體企業。為了開展城鄉經濟貿易，又明確地提出了，只有發展商品經濟才能解決中國的貧困。為了使商品經濟有序的向前發展，經專家討論，繼而又提出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方針。趙紫陽就是這樣通過自己實踐，從實際出發，根據群眾的需求一步步把中國引導到市場經濟軌道上來，使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序地進行下去。

再次，趙紫陽的思想是開放的，善於接受新事物。

趙曾明確地對我說：改革開放就是要同西方現代文明接軌。他認為中國的文化是落後的，開不出自由、民主、人權之花。當然要與中國的優秀文化相結合。他說：西方宣導的自由、民主、人權乃是現代普世文明，各國都不能拒絕。他認為目前美國在主導世界，在高舉自由、民主、人權這個大旗。雖然是從本國利益出發，（也是他們的價值理念）但對推進人類社會現代文明是有益的。他聲言，我這樣談會有人罵我是賣國主義，這也沒有什麼可怕的。這是人類社會進步的要求。

我理解趙紫陽的思想境界是從人類社會進步，推進人類社會實現現代文明的高度出發，吸收人類社會發展的新文明，以使中國走上現代化。他既超脫了所謂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也超脫了狹隘的國家民族主義的視野，而是放眼全人類的進步，站在了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高度，而在實際工作中他也善於傾聽各方面不同的意見，同時也有自己的主見。在不同的觀點中，發現新思維，找出平衡點，能使各方皆樂於接受。他既不冒進，又不保守。他的思維方式是從實踐中步步推進。我的感覺趙紫陽腦袋好像是多晶體，非常透明，有洞察力，時時在接受新事務。當他發現從事實際工作的幹部、學者，提出了某種新觀點和新建議時，他就即時研究試行推廣，如實行股份制，就是這樣來的。可以說，他的思想動態始終在與時俱進，始終是新穎的。

我曾對趙紫陽說過：你的思想特點是「開放」。

再者，趙紫陽的思想體系和理念是在實踐中提升形成的。

杜潤生評論說：趙紫陽是在把自己的思想轉化為實踐，在實踐中將感性認識形成自己的理念。

由於趙紫陽是從基層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區黨委書記、省委書記以至國務院總理、總書記，這樣一步步從實踐中走過來的少有的國家領導人，所以他特別注重實踐，從實際出發。他首先是個實踐家。在農村，為解決農民吃飯問題，提出要包產到戶，實行聯產承包制，

這就衝破了大鍋飯、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為了解決上山下鄉青年失業問題，提出要發展個體經濟、集體經濟，這就衝破公有制一統天下。為了溝通城鄉貿易交流，發展生產，提出了發展商品經濟的理念。為了使商品經濟沿著正常有序的發展，提出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經濟理念，這就衝破了計劃經濟體制。在企業改革方面，也是首先從群眾要求最直接最迫切的利益出發，所謂：「放權」「讓利」「鬆綁」。以及抓大放小，對國有中小企業實行國有民營（或出租承包、租賃轉讓、承包出賣）和股份制的改造。根據改造中發生的權錢交易，國有資產流失，腐敗現象，於是認真提出：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不同步不行，沒有民主監督不行，不建立獨立的群眾組織不行，不放棄黨控制一切的權力不行，這就必須改變一黨制的政體，這是由於他能站在體制外看問題，能洞察出這個體制的弊端，從而形成要建立一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理念。

趙紫陽也曾評論新執政者胡錦濤，論述胡錦濤，乃是在正統意識形態下培養出來新的一代青年幹部，從而不能站在體制之外去觀察問題。由於受舊的意識形態的支配難能有自己的新理念，這就在改革上難有什麼作為。趙認為胡錦濤提出的「以人為本」為民思想，不過是為自己樹立一個形象就是了，不能解決問題。趙臥病期間還評論說：胡錦濤提出的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仍是在加強黨的一黨專政，這樣下去，社會矛盾越積累越大，這只能加深社會危機。

就是這樣趙紫陽提出要對黨對社會主義實行的更新，也就是在使馬克思主義現代化。這也是從實踐中走出來的改革思想路線。從經濟到政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從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趙紫陽在改革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

三、實踐檢驗了鄧小平改革道路與趙紫陽改革道路的不同點

無論鄧小平或趙紫陽都是主張搞市場經濟，這是無疑問的，但兩者的出發點與歸宿點不同，致使改革發展的道路不同，其結果差異甚大。鄧小平實行改革、發展市場經濟前提是鞏固一黨制的政體，必須

加強黨對整個國家的控制。那就是要在黨的集中領導，絕對控制下來進行改革。正如國外學者評論說，走的是市場經濟加專政的道路。這在客觀上就便於握有權力的當政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內外勾結，上下串通進行權錢交易。圈地、圈錢、圈股票，來侵吞人民用血汗積累起來的公共財產，形成體制性的腐敗，實際是對人民進行又一次掠奪。結果發展成腐敗的市場經濟、權貴資本主義。於是造成社會分配不公，兩極分化，使廣大人民又受原始資本積累之苦。引起群眾鬧事上訪，社會矛盾加劇，形成社會危機。造就了一個權貴資本主義社會，使社會主義異化。

趙紫陽主張改革、發展市場經濟要同民主、法治相結合，要有透明度，增加公開性，那就是要實行民主監督，反對黑箱作業。如企業改革要有工人群眾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參加，這樣就可以做到起點平等、公正，並可杜絕和減少腐敗產生。為此，趙認為，這就必須加強群眾組織的作用，使其能發揮獨立監督作用；這就必須改變黨的領導方式，放棄黨控制一切權力的作法，從而也要進行黨的改革，那就是必須同政治改革相結合。正如國外學者評論說，趙紫陽走的是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相結合的道路。我的理解，這就同西方現代政治文明相接軌了，從而可以使中國發展為文明的市場經濟，使中國轉型為一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

總之，趙紫陽總的指導思想是：要把中國建立一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要實行一黨專政向民主政體的過渡。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這樣才能達到國家的政治穩定與長治久安。這從1984年他寫給鄧小平與陳雲的信即可說明。他突破了中國歷史上「人治」的專制主義怪圈，這就同仍囿於舊的意識形態、舊的思維方式的人，發生了分歧，而分道揚鑣了。

基於此，對「六四」事件，趙當然主張要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採取對話方式來解決，堅持正義和公道，從而個人付出了最大的犧牲。在這個一黨專政的制度下，在這個不講法治只講人治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遭到終身的軟禁。為此，我曾詢問過趙，當時，為什麼不舉

起自己的旗幟公開站出來？原來，他有更深一層的考慮。他說，那樣，中國可能會內戰。他認為這樣中國老百姓就又要遭受連綿不斷的戰爭的苦難。我理解他的看法是，中國再也經不起戰爭的摧殘了，中國人民再也經不起苦難的折騰了！

我也曾建議，針對目前體制的制度性的嚴重腐敗，由他站出來舉起社會主義更新、黨自我更新的旗幟來。而後來他卻以信函形式，僅對「六四」問題向十五大全體代表提出：「早解決比晚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形勢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此外，他還曾向江澤民建議，如果有哪些不好解決的問題，自己願出面化解。我是這樣理解趙的看法的：通過上層來主動解決問題，不容易發生社會動盪。其出發點是，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是脆弱的，經不起動盪；中國人民生活還是困難的，迫切需要發展經濟，一心在謀求中國的發展與穩定。

就是在目前失去自由的情況下，他仍時時在關心著國家、社會的發展，希望中國這次千萬不要再次失掉歷史機遇。他一再對我說，清朝慈禧後來雖然也進行改革，但那是被動地為形勢所迫，且仍堅持「中學為體」不能變，結果矛盾積累越來越大，被辛亥革命一陣槍聲把專制政體打碎了，繼而發生多年的內戰，使中國失掉了轉向工業化的良機。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搞三面紅旗烏托邦，再發動文化大革命，結果在世界新的技術革命時期，又使中國失掉了轉向現代化的機遇。目前是資訊革命時代，是民主觀念的復興、個人價值的覺醒時代。如仍堅持高度集權的這條政治路線，專政體制不肯變，社會矛盾同樣也會越來越大，遇有突發事件還會發生動亂。趙紫陽擔心的是中國可能再一次的失掉歷史機遇，中國人民再一次遭受災難。

後記

胡耀邦下台後，較普遍的公識是：胡耀邦的思想體系是堅持民主的新民主主義，強調共產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進行活動。鄧小平則是堅持專政的社會主義，主張黨要絕對領導一切。黨內外均公認為，胡耀邦比較有現代意識，他認為群眾、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在世界民主國家是平常的事。鄧小平則認為，胡耀邦這是在縱容知識份子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故而要他下台。

由於胡耀邦執政時，提出了只要是冤假錯案，不管誰定的，不管歷史多久，都要一律平反。這就使歷史上所有錯案以及「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恢復名譽了。對全國被打倒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恢復了工作，並對全國地富分子摘了帽，這就恢復了民心，使經過文化大革命浩劫，滿身瘡痍的中國社會風氣為之一振，轉到建設上來，這一歷史功績是要永載青史的。

同樣，趙紫陽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把中國引上了發展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的軌道，使中國人民擺脫貧困有了希望。對於趙紫陽執政的那些年，就是鄧小平在南巡講話時，也肯定趙紫陽使中國經濟的發展上了一個新台階。萬里至今還稱讚「趙紫陽功不可沒」。同時，趙紫陽堅持政治改革，改變黨領導一切、控制一切專政的體制制度。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民主與法制的國家。鄧小平則是堅持黨領導一切、控制一切，控制一切的專政體制，而且絕對不能動搖。這就與鄧小平有了分歧。在「六四」事件上，趙紫陽提出要在民主、法制的方針下來解決，不贊成武裝鎮壓，被定為「支持動亂」「分裂黨」予以罷黜並軟禁終身，這就是專制的勝利，民主的失敗。

使我感到傷懷的是：中國近百年來，許多仁人志士犧牲流血、瀝

熱血拋頭顱，要讓中國走向現代化，而至胡耀邦、趙紫陽的執政，人們方才感到有了希望，卻又被一一罷黜，使人民繼續在專政體制下受苦受難，中國是何其不幸！

杜潤生評論說：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這是當前社會的共識：趙紫陽的下台，胡耀邦的下台，乃是中國人民的悲哀，社會主義中國的又一悲劇。

問題是，為什麼中國人民一直不能擺脫專政主義的羈絆，教訓在哪裡？

趙紫陽曾說：不清理中國這個地基不行，由於中國人民長期生活在專制統治下，國民性中形成了依附性，容易依賴權威，卻不相信自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所謂「奴性」。再加上我們過去一直強調集體，強調服從，即所謂「馴服工具論」，這就必然束縛了人性、個性的解放，國民性中也缺乏自由、民主、人權的觀念。趙紫陽引用魯迅的話說：「無論什麼東西放到這個大染缸裏都會變顏色」。因此，他提出：在中國需要一個新的啟蒙運動，即既要肅清封建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又要克服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識形態。趙紫陽稱讚蔣經國，既從原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形態影響下走出來，又從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意識形態影響下走出來，從而使台灣既平穩地進行了政治轉型、實現了民主政治，又繁榮了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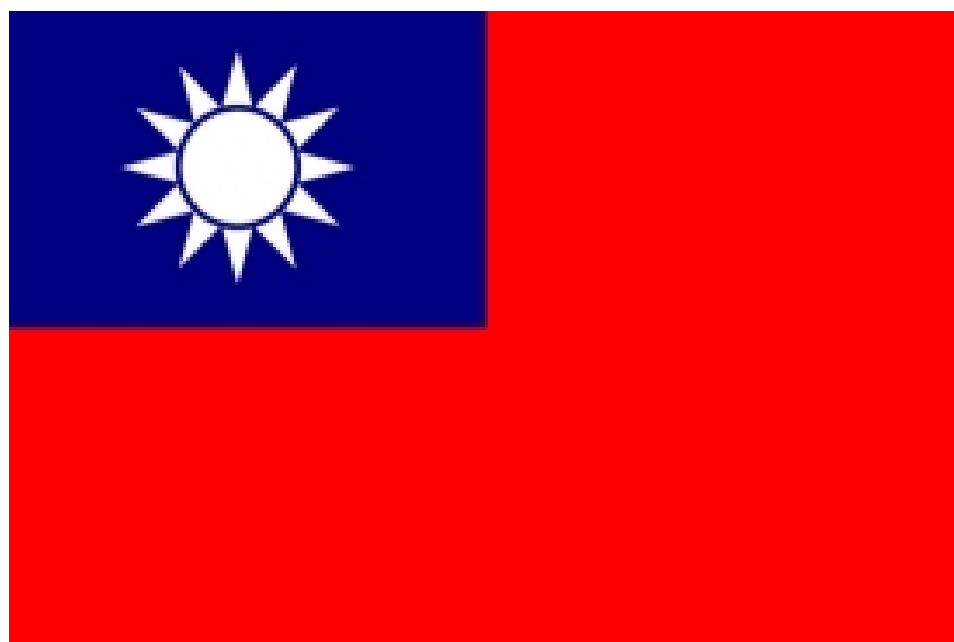
問題又是，胡耀邦、趙紫陽為什麼能從傳統的舊的意識形態解脫出來，轉向現代民主政治意識？對他們兩個人的思想演進應當研究。

我接觸到的同趙紫陽熟識的老同志都認為，趙紫陽不但經濟上開放，政治上也開放。他能從舊的政治思維走出來，主張實行民主政治，是少有的國家領導人，也是要使馬克思主義走向現代化少有的領導人。他有學問，有能力，有智慧，是治國人才。提出趙紫陽的思想尤為其值得研究。

因此，我整理記述了同趙紫陽在軟禁中上百次的談話，以供後人研究參考。因為他確實是中國百年來民主向專制反復鬥爭的歷史潮流中，湧現出來的有時代意義的一位光輝的歷史人物。

在本書歷時十餘年的追記記述過程中，也送交了趙紫陽審閱，並一直得到杜潤生、李銳、胡績偉、安志文幾位老同志的深切關注。鮑彤出獄後，也不時向他通報了探訪和追記的情況。定稿前也曾分別送請他們幾位審閱，並得到他們寶貴的指導性意見和重要的補充、修改。其中，李銳同志，以八十八歲的高齡，細讀、精改了全文，從文字、內涵到標點符號，逐字逐句地作了精心的推敲和修改。由於他們幾位的幫助、把關，使我這本文字原本有些粗糙的追記拙作，在思想表達層次上，顯著地提高了一個水準，從而使這個文本更增加了它的歷史存照價值。同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單少杰及紫陽家屬也提了寶貴意見。在此謹表示我誠摯的敬意和感謝。

此外，科技導報原副主編蔡德誠教授也前後三閱全文，志願參與了本書手稿初步編改，完稿修改和定稿清樣校訂的編輯工作，也謹致謝意。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